蘇聯黨案記

袁文瑞・鄧其美・吳偉華 合譯

南京 中蘇文化協會 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0992B

蘇聯黨案記

袁文瑞・鄧其美・吳偉華合譯

馮劍凡校訂

南京中蘇文化協會印行

1937

1606939

蘇聯黨案記
一九三七年六月初版
1—3000册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實價一元二角

校訂者附言

本書由負責當局交下，係根據蘇聯政府機關報新聞報所載，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庭于本年一月二十三日至三十日審判『平行中心』案簡要紀錄譯出。

——校訂者

蘇聯黨案記目錄

一・公訴書……一
二・對被告皮達可夫之審訊……二三
三・對證人布哈爾切夫之訊問……七一
四・對被告拉迪克之審訊……七五
五・對證人羅木之訊問……一〇五
六・對被告索考里尼可夫之審問……一一二
七・對被告舍列布略可夫之審訊……一二四
八・對證人洛根諾夫之訊問……一二九
九・對被告巴古司拉夫斯基之審訊……一三八
十・對被告多羅布尼斯之審訊……一四九
十一・對被告摩拉洛夫之審訊……一五七
十二・對被告舍斯托夫之審訊……一六六
十三・對被告司托羅依洛夫之審訊……一八二

320497

十四．對被告諾爾金之審訊……一九一
十五．對證人石頓之訊詞……一九九
十六．對被告阿爾諾里特之審訊……二〇六
十七．對被告利夫什茨之審訊……二二四
十八．對被告克尼亞節夫之審訊……二三七
十九．對被告屠洛克之審訊……二五一
二十．對被告拉達依查克之審訊……二五五
二十一．對被告格拉舍之審訊……二六三
二十二．對被告普森之審訊……二七四
二十三．對證人唐木之訊問……二七六
二十四．不公開的審訊……二八三
二十五．國家公訴人——蘇聯總檢察長維省斯基的公訴詞……二八四
二十六．辯護人布拉烏德的辯護詞……三六八
二十七．辯護人卡兹諾也徹夫的辯護詞……三七二
二十八．辯護人孔莫多夫的辯護詞……三七六

二十九·被告皮達可夫的最後陳述……三七八
三十·被告拉迪克的最後陳述……三八八
三十一·被告索考里尼可夫的最後陳述……三九八
三十二·被告舍列布略可夫的最後陳述……四〇五
三十三·被告巴古司拉夫斯基的最後陳述……四〇六
三十四·被告多羅布尼斯的最後陳述……四一〇
三十五·被告摩拉洛夫的最後陳述……四一二
三十六·被告諾爾金的最後陳述……四一三
三十七·被告舍斯托夫的最後陳述……四一四
三十八·被告司托羅依洛夫的最後陳述……四一五
三十九·被告阿爾諾里特的最後陳述……四一八
四十·被告利夫什茨的最後陳述……四一九
四十一·被告克尼亞節夫的最後陳述……四二〇
四十二·被告屠洛克的最後陳述……四二三
四十三·被告拉達依查克的最後陳述……四二五

四十四・被告格拉舍的最後陳述……四二七
四十五・被告普森的最後陳述……四二八
四十六・判決詞……四二八

一．公訴書

因皮達可夫（尤．勒，）拉迪克（卡．畢，）索考里尼可夫（格．亞，）舍列布略可夫（勒．畢，）摩拉洛夫（尼．依，）利夫什茨（亞．阿，）多羅布尼斯（亞．拉，）巴古司拉夫斯基（米．索，）克尼亞節夫（依．阿，）拉達依查克（索．安，）諾爾金（波．沃，）舍斯拉夫（阿．阿，）司拉羅依洛夫（米．索，）屠洛克（約．特，）格拉舍（依．約，）普森（加．葉，）及阿爾諾里特（瓦．沃，）等，背叛祖國，從事偵探活動，進行軍事破壞工作，實行陰謀暗害勾當，準備恐怖暗殺行爲，卽犯蘇俄刑法五第十八條第一款甲項，第五十八條第八款，第五十八條第九款以及第五十八條第十一款所指明之罪，而提起之公訴書。

在審察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合暗殺總部時，（該總部之份子，已於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四日，由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庭判决治罪，）曾經查明，除該總部外，同時尚存在有所謂後備總部，此所謂後備總部，係遵照托落茨基之直接指示，恐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萬惡罪行將被蘇維埃政府機關破獲所成立。已被判决治罪之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合總部份子——季諾維也夫，加米業夫以及其他等人，曾經供稱，加入此後備總部者，有以前著名之托落茨基份子——皮達可夫，拉迪克，索考里尼可夫

及舍列布路可夫。

本案預審之結果，已經查明所謂後備總部，實為平行的托落茨基總部，該總部係在僑居國外之托落茨基直接指示之下所組成，而進行其活動者。

此托落茨基平行總部，在基羅夫被慘殺以及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合總部被破獲以後，遂更積極開展其犯罪之活動。

平行總部所抱定之主要任務，卽為以暴力推翻蘇維埃政府，以期改變蘇聯現存之社會制度及國家制度。托落茨基以及接受托落茨基指示之托落茨基平行總部，曾力圖憑藉外國助力，奪取政權，以謀達到其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關係之目的。

托落茨基在其致托落茨基平行總部之指示信中，已將上述反蘇聯之叛國陰謀詳盡說明，此信係由拉迪克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收到。

被告拉迪克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預審時供稱：

『托落茨基寫道：須知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取得政權後，如不使蘇聯社會制度在相當範圍內適合於資本主義列强制度，則無法維持此政權，亦無法保持和平。

『容許德日兩國資本自由開發蘇聯，結果必將在蘇聯境內造成很重要的資本主義的關係，而鄉村中尙未放棄資本主義心理以及不滿意於集體農塲制度之階層，亦將起而傾向於此種關係。

『德人及日人將要我們緩和鄉村中之空氣，因此，吾人必將實行種種讓步，解散集體農場或容許自由退出集體農莊。』（見案卷第五本第一四二、一三四頁。）

拉迪克繼續供稱：

『我與皮達可夫讀完這個指令後，認爲這個指令已將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之活動，作一總結；並明明白白，淸淸楚楚，嚴厲指出無論如何，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之政權只能是資本主義復辟之政權。』（見案卷第五本，第一四六頁。）

被告皮達可夫，敍述他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沃斯洛城附近與托落茨基所作談話時，也供稱：托落茨基在要求蘇聯境內之托落茨基組織，積極進行軍事破壞工作、暗害工作、以及暗殺行爲時，曾着重說道，因與資本主義國家協商之結果，務須向後退到資本主義。（這是他當時所用之語句。）

被告皮達可夫供稱托落茨基當時說道：

『這就是說，必須向後退却。必須切實瞭解這一點。向後退却到資本主義。退却多遠，退却到什麼程度，現在還難說，——只有在取得政權以後，才能把這一點具體化。』（見案卷第一本，第二六九頁。）

被告索考里尼可夫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十日預審時也供稱：托落茨基平行總部之綱領乃是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之綱領。他供稱：

『這個綱領預定放棄工業化及集體化政策，預定因放棄此政策之結果，資本主義將在鄉村中

在小經濟基礎上發展起來，而這種鄉村中的資本主義與工業中的資本主義成份結合起來，就形成資本主義在蘇聯復辟之局面。

『……總部之各參加者，曾一致承認在目前條件之下不能有別的綱領，曾一致承認務須實行的，正是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之這一綱領。』（見案卷第八本，第二二五頁。）

托落茨基及其平行總部之同夥，曾根據此種方針，而與外國代表進行談判，以期借助於武裝干涉以推翻蘇維埃政府。

托落茨基與平行總部曾提出以下諸條件作爲此種賣國談判之基礎：在蘇聯容許私人資本底發展，解散集體農塲，取消蘇維埃農塲，將蘇聯許多企業出租於外國資本家，並給予列強以其他經濟上及政治上之利益，以至於割讓蘇聯一部份領土。

被告拉迪克供稱：托落茨基，在上述致拉迪克的信中，關於這事情寫道：

『如果以爲不取得最重要資本主義政府方面之友善態度，尤其是最有侵略野心，如目前的德國和日本這一類政府方面之友善態度，而能取得政權，那便是一種癡想。現在就與這些政府發生聯繫和彼此協商，乃是完全必要之步驟。……』（見案卷第五本，第一四〇頁。）

審查之結果，已查明托落茨基與德國國社黨領導者之一進行關於共同反對蘇聯的談判。

被告皮達可夫供稱：托落茨基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與他談話時，告訴他說，因進行此種談判之結果，

他（托落茨基）已與上述國社黨領導者訂立協約，其條件如下：

『一、保證對於德國政府一般的友善關係，並保證在最重要的國際問題上與德國政府實行必要之合作；

『二、同意割讓領土；

『三、准許德國企業主以租借形式（或以其他形式）經營蘇聯各種企業，即德國經濟所必須藉以補充之各種企業（即鐵礦，錳礦，石油，金礦，木材以及其他等等）；

『四、在蘇聯造成便利於德國私人企業活動之條件；

『五、在戰爭的時候，在軍事企業中以及在前線上，開展積極的軍事破壞工作，而且此種軍事破壞工作應依照托落茨基與德國總參謀部商妥之指示而進行之。

『當時托落茨基說，此種協商基礎，他（托落茨基）在與希特勒代理人格斯會面時，即已完全商妥並經採納。

『當時托落茨基又說，他與某國政府也有完全妥帖之聯繫。』（見案卷第一本第二六七和二六八頁）

托落茨基在他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致被告拉迪克之信中，曾特別說明這一協約之性質和割讓領土之程度。

被告拉迪克供稱，托落茨基在這封信中寫道：

『……一定要割讓領土……必須將濱海省和黑龍江沿岸一帶讓與日本，將烏克蘭讓與德國

『德國需要原料、食品及銷售市場。我們必須允許德國參預開發礦山，錳礦，金礦，石油，燐灰石，並必須於一定期間內，以低於世界市場之價格供給德國以食品及脂油。

『我們應將庫頁島之煤油出讓于日本，並保證在日本對美作戰時，供給日方以煤油。我們也應當允許日本開發金礦。我們應當同意德國要求，不去阻碍德國佔領多腦河流域諸國及巴爾幹半島，同時也絕對不去阻碍日本去侵佔中國。……』（見案卷第五本第一四二——一四四頁。）

托落茨基除親自與外國代表進行談判外，並囑咐平行總部份子與上述各國駐蘇聯代表發生聯繫。

被告皮達可夫供稱，托落茨基在其致平行總部之信中：

『……曾要求有可能進行此種談判之拉迪克及索考里尼可夫，在蘇聯與外國正式代表發生必要之聯繫，並幫助他——托落茨基——所實際進行之辦法。』（見案卷第一本第二五七頁。）

被告拉迪克和索考里尼可夫，依照托落茨基此種指令，曾與上述兩國代表發生關係。

關於這一點，被告拉迪克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預審時供稱：

『……托落茨基說他自己與某國政府代表有聯繫，這並不是一句空話。我能深信這一點，因爲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幾次接見外賓時，我與軍事參贊某先生以及與某國公使館新聞事務參

贊某先生——消息很靈通之德國代表——談過話。他們兩人都用一種審愼之口吻，使我瞭解某國政府是與托洛茨基有聯繫。』

拉迪克繼續供稱：

『我曾對K先生說，如果希望目前政府實行讓步，那便是完全徒勞，某國政府只能指望「蘇聯實際政治家」之讓步，即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之讓步，即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一旦取得政權時之讓步。』（見案卷第五本，第一一九——一二二頁。）

被告索考里尼可夫也已供認，他利用自己所擔任之外交人民委員部副部長職位，依照托洛茨基之指示，曾與一外國之代表進行祕密談判。

被告索考里尼可夫供稱：

『有一次在我辦公室中正式談話完結後，某先生以及該公使館秘書已準備退出時，某先生却稍停留一下。

『此時，兩翻譯員已經退出辦公室。某先生乘此機會，當我送他出去時，與我交談數語。某先生對我說：「你是否知道托洛茨基先生向我國政府提出之種種提議呢？」

『我囘答說：「是，我知道這件事情。」某某先生問道：「你認爲這個提議怎樣呢？」

『我囘答說：「我認爲此種提議乃十分鄭重之提議。」

『當時，某先生問道：「這只是你個人之意見嗎？」

『我回答說：「不是，這也是我的朋友們之意見。」』（見案卷第八本第二三五——二三六頁。）

托落茨基及其在蘇聯之同夥，曾以蘇聯在將來與帝國主義國家戰爭中之失敗，爲其上台執政的主要保證。因此，托落茨基本人以及平行總部經過被告拉迪克和索考里尼可夫，與外國代表談判時，百般設法加速這些國家對蘇聯的進攻。

本案一切被告之口供，都已證實這一點。

例如，被告拉迪克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廿二日預審時，曾引證托落茨基致他的信中下述一段話：

『應當承認，只有當蘇聯在戰爭遭受失敗時，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方有實際取得政權之可能。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對此，應當努力準備……因爲如果不能用暗殺手段達到目的，托落茨基份子取得政權之主要條件，就只能是蘇聯在戰爭中之失敗。因此，應當竭盡可能去加速蘇聯與德國之衝突。』（見案卷第五本，第一四三頁及一一七頁。）

托落茨基及其在蘇聯之同夥，認爲在將來戰爭時，必須採取積極促使蘇聯失敗之明確立場，盡量幫助外國武裝干涉者進行反蘇聯之鬬爭。

例如被告皮達可夫，在敍述他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沃斯洛城附近與托落茨基談話之內容時，曾供稱：

『至於講到戰爭，那末，托落茨基曾講得十分明確。在他看起來，在最近將來，戰爭實爲在不可免。『托落茨基認爲，絕對必須在這次戰爭中採取促使蘇聯失敗之明確立塲。他認爲蘇聯的軍事失敗，絕對可以使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上台執政之事從速實現。』（見案卷第一本，第二五八頁。）

托落茨基，皮達可夫，拉迪克，索考里尼可夫，舍列布略可夫，利夫什茨以及本案其他被告，依照上述預備在蘇聯失敗時取得政權之計劃，曾廣泛進行暗害、軍事破壞、偵探以及暗殺工作，以便破壞我國經濟及軍事力量，因而犯有種種極重大之叛國罪惡。

審查之結果，已經查明本案許多被告：屠洛克，克尼亞節夫，拉達依查克，舍斯托夫，司托羅依洛夫，格拉舍及普森，曾依照托落茨基之直接指示並在托落茨基平行總部直接領導之下，與德國和日本偵探機關之偵探——軍事破壞工作者，直接發生聯繫，有系統地替德國和日本進行偵探工作，並在社會主義工業及鐵路運輸業之企業中，尤其是在有關國防之企業中，實現許多暗害及軍事破壞之行爲。

上述諸被告實現這種偵探、暗害以及軍事破壞工作，係依照托落茨基份子與外國偵探所訂立之協約。

例如被告拉迪克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廿二日預審中證實皮達可夫口供時，曾供稱，托落茨基與德國國社黨代表所已經訂立之協約，其中一條卽爲：

『……在德國對蘇聯作戰時，……務須使蘇聯遭受失敗，加强軍事破壞工作，尤其是在具有軍事意義之企業中……務須遵照托落茨基與德國總參謀部商妥之指示而行動。』（見案卷第五本，第一五二頁）

托落茨基平行總部，爲實現牠在德日兩國代表面前所承擔之義務，曾在蘇聯許多工業企業中以及鐵路運輸中組織軍事破壞及暗害工作團，專門從事於實現軍事破壞及暗害行爲。

被告皮達可夫於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預審時供稱：

『我曾經囑咐自己的人（而且我本人也正是這樣做法）在進行暗害工作時，切不要分散自己的力量，而要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於主要的、巨大的、具有國防及全國意義的企業。

『在這一點上，我是依照托落茨基之指示行動的，這指示就是「要在最要害的地方實行最嚴重的打擊。」』

平行總部所組織之團體，根據被告皮達可夫這一方針，曾在工業企業及鐵道運輸業方面實現許多軍事破壞和暗害行爲。

例如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審理克梅洛沃礦山方面之托落茨基份子軍事破壞工作團案件時，已經查明，彼等曾在「中央礦井」中，依照被告多羅布尼斯之指示，造成爆炸事件，結果炸死工人十名，重傷工人十四名。（請參看已幷入本案案卷之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至廿二日克梅洛

沃審案材料及證據。）

在郭爾洛夫斯基淡素肥料聯合廠內，在被告拉達依查克領導之下，造成三次軍事破壞行爲，其中兩次是爆炸，結果炸死工人多名，並使國家受到極大之物質損失。

托落茨基組織中之份子，依照拉達依查克之委託，曾在蘇聯其他化學企業中（如沃斯克列辛斯基化學工廠及聶夫斯基工廠中，）造成與此類似之軍事破壞事件。

此種爆炸事件之含有軍事破壞性質，既已由技術鑑定人查明，又已爲被告拉達依查克、普森及格拉舍本人所供認。（見案卷第四十本，第三〇三九、五十頁。）（請參看技術鑑定人之鑑定書。）

本案被告：利夫什茨，屠洛克、克尼亞節夫及巴古司拉夫斯基，曾在鐵路運輸業中進行最積極之軍事破壞及暗害工作。

例如，被告克尼亞節夫，依照托落茨基平行總部之直接囑咐，曾組織並具體實現翻車事件多次，其中大半皆爲軍車，並引起巨量之人命犧牲。

茲例舉最嚴重之翻車事件如下：

A.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七日，一列軍車在『蘇米哈』站撞倒，結果紅軍戰士死二十九名，傷二十九名；

B.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間，又使軍車在亞興諾——烏斯特卡泰夫站之間中途撞倒；

C. 一九三六年二月間，又使軍車在葉琴諾維赤——伯爾家烏斯站之間中途撞倒；被告克尼亞節夫所組織之軍車碰撞事件，不僅由於執行平行總部及鐵路運輸業方面軍事破壞及暗害工作領導者——被告利夫什茨之指示，而且亦由於執行日本偵探機關H先生直接囑咐之結果。

關于這一點，被告克尼亞節夫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預審時供稱：

『至於講到偵探工作，以及設法使軍車碰撞和傷害人命以打擊紅軍的工作，那末，我之着手開始這一工作，只是在查明托落茨基組織對於進行偵探和軍車破壞工作以反對紅軍和幫助日本偵探機關這一事情的態度以後。

『要在運輸業上進行軍事破壞及暗害工作以及組織翻車事情，這一方面的委托，我已完全照辦。因爲在這一方面，日本偵探機關之委托，是和前此不久我從托落茨基組織方面所接到的委托，完全相符的。』（見案卷第二十二本，第六十一、一五十七頁。）

被告屠洛克，同樣也供認了他們與日本偵探機關偵探實行合作的事實。（見案卷第二十三本，第一〇六頁。）

本案諸被告在協同外國偵探機關偵探，從事軍事破壞活動，組織翻車事件，實行爆炸或放火焚燒礦井及工廠時，曾不惜採取最卑鄙之手段，自覺而且有計劃地從事於此驚人罪行，如毒死及殺害工人，以圖激起工人對蘇維埃政權之不滿

例如被告皮達可夫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預審時，關於這一點曾供稱：

『我們曾估計到，在必須採取軍事破壞手段以實行暗害計劃時，傷害人命，乃必不可免之結果，我們曾顧及到這一點，而且認爲必不可免的。』（見案卷第一本第一九六、一九七頁。）

被告多羅布尼斯關於這一點的供詞，還更直言不諱，他供稱：

『如果在礦井內將有人命的犧牲，那就更好了，因爲結果會引起工人之怨恨，而這正是我們所需要的。』（見案卷第十三本，第六十六頁。）

被告克尼亞節夫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之口供，亦證明這班人民公敵在組織軍事破壞事件時，曾故意傷害大批人命，他供稱：

『利夫什茨曾特別囑咐我佈置並實現足以傷害大批人命之種種軍事破壞行爲（如爆炸，翻車，放毒。）……』（見案卷第三十二本，第九十二頁。）

被告屠洛克也供出類似之口供。（見案卷第二十三本，第七十三頁。）

托落茨基總部及其所領導之在工業企業和運輸業中進行軍事破壞工作的團體，曾決定在戰爭爆發時，更特別積極在企業和運輸業中，用爆炸、放火、翻車方法，進行軍事破壞工作，因爲在那時候，此種驚人之叛國軍事破壞行動，將給蘇聯之國防能力以特別嚴重之打擊。

例如被告皮達可夫曾特別囑咐被告諾爾金，要他準備在大戰爆發之時，放火焚燬克梅洛沃化學聯

合廠。

皮達可夫關於這一點供稱：

『不錯，這是事實。我的確給過諾爾金這樣的委託。這是我和托落茨基會面不久以後的事，因爲托落茨基在會面時曾經向我說，在大戰開始時，必須在有關國防的企業中從事軍事破壞工作。因此，我就告訴諾爾金，要他及時準備在克梅洛沃實行這種軍事破壞工作。』（見案卷第一本，第三〇九頁。）

同時，被告克尼亞節夫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預審時亦供稱：他與平行總部商定以後，曾接受日本偵探機偵探H先生之委托，即要在大戰爆發時：

『……實行火燒軍用庫，軍糧站以及衞生處。』（見案卷第三十二本，第六十八頁。）

其次，被告克尼亞節夫又會從這位日本偵探H先生方面接受更駭人聽聞之禍害蘇聯人民之委托：

『……日本偵探機關曾特別堅決要求在大戰爆發時，採用毒菌傳染之方法，將最易傳染之毒菌，施放於兵車，軍糧站及衞生處。』……（見案卷第三十二本，第六十八頁。）

被告克尼亞節夫因叛賣祖國而與日本偵探機關發生之聯繫，不但已由克尼亞節夫本人口供所證實，而且還由在他那裏所搜出之他與H先生來往信件及照片所證實。（H先生之兩封信，一封是註明在十二月十五日寄發，另一封是註明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寄發。）（見案卷第十二本，第一二一

頁。）

預審所得之材料及被告——拉達依查克，克尼亞節夫，屠洛克，普森，格拉舍，舍斯托夫及司托羅依洛夫等本人之供詞都已證明：托落茨基平行總部在其反蘇聯鬬爭中，除從事軍事破壞及暗害工作外，尙同樣注意給外國偵探機關進行密探工作。

上述各被告都與德日偵探機關偵探有聯繫，他們曾經常供給這些偵探以各種有關國家重要之祕密消息。

例如被告克尼亞節夫曾經過上述之日本偵探機關偵探H先生而將關於蘇聯鐵路之技術狀況，動員準備程度以及關於軍事運輸之祕密消息供給於日本偵探機關。（見案卷第三十二本第一〇三頁。）

被告拉達依查克，普森和格拉舍都已供認，他們曾與德國偵探機關發生聯繫，並供給以各種關於蘇聯化學工廠現狀及工作情形之祕密消息。

被告格拉舍被問及這一點時供稱：

『我所參加之組織，遵照德國偵探機關之囑咐，在化學工廠內不但進行軍事破壞工作，而且亦進行密探工作。』（見案卷第二十一本第四十頁。）

被告普森在承認自己參加偵探行動時曾供稱：他和被告拉達依查克，曾經過『林得』公司之電氣匠倫茨而與德國偵探機關有聯繫，

被告普森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預審時，曾供稱：

『我曾將下述各種消息轉交于倫茨：

『一、關於一九三四年蘇聯各化學工廠生產額之消息；

『二、一九三五年蘇聯各化學工廠之工作計劃；

『三、淡素肥料聯合廠之建設計劃，其中包括直至一九三八年爲止之建築工程。

『所有這些材料，概由我於一九三五年上半年先後交與倫茨。

『此外，我從倫茨口中知道，他曾直接從拉達依查克手上得到關於蘇聯軍事化學工廠一九三四年生產額之消息以及一九三五年之工作計劃。此外，我還經常供給倫茨以各種關於淡素肥料聯合廠停車、遇險以及技術設備之消息。』（見案卷第十九本，第三十一頁。）

被告舍斯托夫與司托羅依洛夫亦曾爲德國偵探機關進行與此類似之偵探工作，他們曾與某些假借外國技師名義來到蘇聯之偵探建立犯罪聯繫，例如在『克梅洛沃案件』中因進行偵探及軍事破壞工作而被判決治罪之工程師石梯克林格，即爲其中之一人。

托落茨基份子爲德國偵探機關進行之偵探行動，往往以他們與某些德國公司之正式聯繫爲掩飾。

本案審查之結果，已經查明，托落茨基曾與某些德國公司訂立協定，根據這種協定，這些公司曾將德國輸入蘇聯之商品之價格提高，以從中所得之餘額去資助托落茨基份子。

關於這一點，被告皮達可夫供述到自己與托落茨基之子——僑居國外之謝多夫晤談時，曾說：

『……謝多夫曾將托落茨基之指示轉告我，要我多設法定購「得馬格」公司與「波爾濟格」公司之商品，因托落茨基與此兩公司之代表有聯繫。

「謝多夫還補充說：「你得多出些價錢去買這種商品，但是你所多出的這筆錢是給我們活動用的。」」（見案卷第一本，第二二七頁。）

托落茨基和平行總部在其推翻蘇維埃政府與奪取政權之計劃中，認為對於蘇聯共產黨與蘇維埃政府之領導者採取暗殺手段是有首要之意義。

本案預審之結果，已經查明，托落茨基平行總部，遵照由皮達可夫與拉迪克從托落茨基方面得到之指示，在莫斯科、列寧格拉、基也輔、洛斯托夫、索赤、新西比爾斯克以及其他城市，均組織有暗殺團。

被告拉迪克供稱：托落茨基曾經要求：

『……組織由可靠份子組成之小團體來實行暗殺蘇聯共產黨之領導者，首先是暗殺斯大林。』（見案卷第五本第一〇二頁。）

托落茨基在一九三五年與皮達可夫談話時，也給與同樣之指示。

被告皮達可夫供稱：

『……托落茨基在這次談話中對我說道：「你要明白，除了實行大批暗殺行為，即無法推翻斯

大林政府，而且這種暗殺行爲，必須趕快實現。

『「必須使鬬爭更加劇烈，更加擴大簡直應當採取一切手段，以謀推翻斯大林。」』（見案卷第一本，第二六三、二六四頁。）

此即法西斯走狗托落茨基給與托落茨基組織之指示，而托落茨基組織卽根據這一指示而實行準備其暗殺蘇聯共產黨及蘇維埃政府領導者之許多行爲。

托落茨基總部，在組織此種暗殺行爲時，曾極力利用蘇聯共產黨及蘇維埃政府領導者出巡外省之機會，以謀實現其暗殺行爲之目的。

例如在一九三四年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同志視察西伯利亞時，托落茨基暗殺組織，卽在被告舍斯托夫領導之下，設法使莫洛托夫同志所乘坐之汽車遇險以謀害莫洛托夫同志。

直接擔任此萬惡罪行之托落茨基暗殺團份子——被告阿爾諾里特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一日預審時，曾供稱：

『一九三四年九月間，日子我已忘記，徹列浦杳特別喚我到他辦公室去，並告訴我，莫洛托夫要到普洛科比夫斯克來……他說，我阿爾諾里特應不惜犧牲本人生命，無論如何必須使莫洛托夫乘坐而由我駕駛之汽車中途遇險。我表示同意，並說一切都照辦。』（見案卷第卅六本，第卅二、卅三頁。）

被告舍斯托夫亦已證明這一點，他供稱：

「我遵照摩拉洛夫之指示，在一九三四年曾經積極從事於實行暗殺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及西西伯利亞邊委書記愛依赫之準備。」（見案卷第十五本第一五七頁。）

當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同志由普洛科比夫斯克礦務局所轄第三礦井管理處乘坐汽車到工人宿舍去時，托洛茨基暗殺團份子，確已試圖將莫洛托夫同志所乘坐之汽車中途傾覆，以謀害莫洛托夫同志；但此次謀害行為並未成功。（見案卷第三十六本第四十八頁。）

以上所述，即為萬惡法西斯走狗，祖國叛徒，人民公敵——托洛茨基份子之卑鄙賣國罪行，反蘇聯活動之情形。

托洛茨基及其同夥——皮達可夫、拉迪克、索考里尼可夫、舍列布略可夫、利夫什茨，以及本案其他被告，在其長期反黨反蘇維埃政權之鬭爭中，早已完全破產，他們已因社會主義在蘇聯獲得完全勝利而得不到人民之任何援助，他們早已成為孤立無助，在政治上必歸滅亡之匪徒，他們早已成為蘇聯人民所一致憎恨之匪夥及偵探，他們已空前叛變工農羣衆之利益，他門早已成為祖國之叛徒，早已變為替德日法西斯蒂勢力進行偵探、破壞及暗害工作之走狗。

罪狀

根據審查之結果，已完全證實：

（一）托洛茨基平行總部，係依照托洛茨基之指示而成立於一九三三年，其成份，即為本案被告皮

達可夫、拉迪克、索考里尼可夫、舍列布略可夫，該總部所抱定之任務，卽爲領導反蘇聯的、違法犯罪的、偵探、軍事破壞及暗殺活動，以謀破壞蘇聯之軍事力量，加速進攻蘇聯之戰爭，協助國外侵略者奪取及瓜分蘇聯之領土，推翻蘇維埃政權以及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制度及資產階級政權。

（二）該托落茨基總部，依照托落茨基之指示，由被告索考里尼可夫及拉迪克，與某些外國之代表勾結，以謀共同組織反蘇聯之鬬爭，同時，該托落茨基總部約定在一旦取得政權時，卽對這些國家實行許多政治上、經濟上之優待以及領土之割讓。

（三）同時，該總部，經過該總部份子以及參加托落茨基犯罪組織之其他份子，曾有系統地替這些國家進行偵探工作，把極關國家重要之祕密消息，供給該國之偵探機關。

（四）爲破壞蘇聯之經濟力量及國防能力起見，該總部曾在許多企業及鐵路運輸方面佈置並實現多次暗害及軍事破壞行爲，因而傷害許多人命，並毀壞國家重要財產。

（五）該總部曾準備多次暗殺蘇聯共產黨及蘇維埃政府領導者之行爲，並曾再三試圖實現之。

（六）積極參加該總部上述種種犯罪行爲之份子，除該總部領導者——被告皮達可夫、索考里尼可夫、拉迪克及舍列布略可夫外，尚有被告利夫什茨、摩拉洛夫、多羅布尼斯、巴古司拉夫斯基、克尼亞節夫、屠洛克、拉達依查克、諾爾金、舍斯托夫、司托羅依洛夫、格拉舍、普森、阿爾諾里特。

各被告均已完全承認自己確實犯有本案公訴書上所控告之罪惡，且各被告所犯之罪惡又爲本案

所有證據、物證及人證所完全證實。

根據上述種種罪狀，茲控訴：

（一）皮達可夫（尤利・（喬治）・勒翁尼多維切）一八九〇年生，職員；

（二）索考里尼可夫（格利哥利・亞科夫列維切），一八八八年生，職員；

（三）拉迪克（卡爾・畢爾加爾多維切）一八八五年生，新聞記者；

（四）舍列布略可夫（勒翁尼特・畢特洛維切，）一八八八年生，職員；

右列四人因參加反蘇聯之祕密托落茨基總部，叛賣祖國，犯有上述罪狀第一條至第六條所指明之罪，卽犯蘇俄刑法第五十八條第一款甲項，第五十八條第八款，第五十八條第九款第五十八條第十一款所指明之罪。

（五）利夫什茨（亞科夫・阿布拉莫維切，）一八九六年生，職員；

（六）摩拉洛夫（尼古拉・依凡諾維切，）一八七七年生，職員；

（七）多羅布尼斯（亞科夫・拉烏莫維切，）一八九一年生，職員；

（八）巴古司拉夫斯基（米哈依爾・索洛莫維切，）一八八六年生，職員；

（九）克尼亞節夫（依凡・阿列克山特洛維切，）一八九三年生，職員；

（十）拉達依賫克（索達尼斯拉夫・安托諾維切，）一八九四年生，職員；

（十一）諾爾金（波里斯·沃希波維切，）一八九五年生，職員；
（十二）舍斯托夫（阿列克什·阿列克山特諾維切，）一八九六年生，職員；
（十三）司托羅依洛夫（米哈依爾·索鉄班諾維切，）一八九九年生，職員；
（十四）屠洛克（約西夫·特米特里葉維切，）一九〇〇年生，職員；
（十五）格拉舍（依凡·約西伏維切，）一八八六年生，職員；
（十六）普森（加夫列依爾·葉夫列莫維切，）一八九六年生，職員；
（十七）阿爾諾里特（瓦連亭·沃里夫里多維切，）即瓦西里也夫（瓦連亭。瓦西里葉維切，）一八九四年生，職員；

右列十三人，因積極參加同一反蘇聯之祕密托落茨基組織，叛賣祖國，犯有上述罪狀第一條至第六條所指明之罪，即犯蘇俄刑法第五十八條第一款甲項，第五十八條第八款，第五十八條第九款，第五十八條第十一款所指明之罪。

由本案材料所再度證實確係直接領導托落茨基總部叛國罪行，現在僑居國外之托落茨基及其子謝多夫，一經在蘇聯境內發現，卽應立予逮捕，並提交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庭審判。

因上述原因以及根據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一九三四年七月十日之決議，上述諸人應提交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審判。

本公訴書，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九日製定于莫斯科城。

蘇聯總檢察長維省斯基

二·對被告皮達可夫之審訊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早庭

維省斯基：請你說，你由什麼時候起開始你最後一時期的托落茨基派的祕密活動？

皮達可夫：由一九三一年起——這是最後一時期，如果不算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的話。

維省斯基：你這個活動的表現是什麼？

皮達可夫：一九三一年我因公務赴柏林，和我同時在柏林的，有好幾個托落茨基份子，如斯米爾諾夫和洛根諾夫。莫斯卡列夫也和我一道。舍斯托夫也在那裏。

一九三一年中夏，在柏林，斯米爾諾夫告訴我說：現在托落茨基的反對蘇維埃政府與反對黨的領導的鬪爭更加有力地從新恢復起來，說他（斯米爾諾夫）在柏林與托落茨基的兒子謝多夫會過面，謝多夫受托落茨基之囑咐，給了他以新方針，這種新方針的內容就是：羣衆的鬪爭方法應當放棄，所應採用的基本的鬪爭方法便是暗殺的方法，以及所謂『反抗蘇維埃政權種種設施』的方法。

維省斯基：這是在什麼時候？

皮達可夫：我現在記不起的確的月份了，可是這是在中夏的時候。

維省斯基：那時候你在什麼地方工作？

皮達可夫：我當時在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充當全蘇聯化學工業部主任。

維省斯基：當時斯米爾諾夫又在什麼地方工作？

皮達可夫：當時斯米爾諾夫在運輸機製造業總管理處做事。

維省斯基：你說的是那一個斯米爾諾夫呢？

皮達可夫：是著名的托洛茨基份子依凡・尼基梯切・斯米爾諾夫。

維省斯基：就是那個會被審判過的斯米爾諾夫麼？

皮達可夫：是的，就是那個後來加入了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合總部的斯米爾諾夫。

維省斯基：你和他怎樣會面——還是因爲職務上的關係，還是專爲你們祕密的事情與他會面呢？

皮達可夫：我很難囘答這個問題，因爲我由于職務上的關係也與他會面過不止一次。在這多次會面中，有一次在我的辦公室內沒有別的人，他告訴我恢復托落茨基的鬬爭與托落茨基的新方針。當時斯米爾諾夫還說，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間托落茨基反對派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們在一個國家內固步自封而沒有尋找國外的援助。當時他就通知我說，謝多夫很願意與我會面，同時

他自己也勸我和謝多夫會面，因爲謝多夫有托落茨基專門託我辦的事情。

我同意與謝多夫會面。斯米爾諾夫便將我的電話號碼轉告了謝多夫，於是我們就在電話中約定會面。有一個咖啡店叫做「阿木座」，在離動物院不遠的場子上。我就到那裏去，看見謝多夫坐在一張棹子旁邊。我們兩個人在過去都是彼此很熟的。他告訴我說，他不是用他自己的名義，而是代表他的父親托落茨基來與我談話。他說，托落茨基一知道我在柏林，便堅决地叫他來找我，與我親身會面並與我商談。謝多夫說：托落茨基片刻不忘重新恢復反對斯大林領導的鬬爭，他說，這種鬬爭之所以暫時停頓，其原因一部份是由於托落茨基本人行踪不定，可是現時正在恢復這種鬬爭，所以他，——托落茨基，便把這一件事情通知我。而且托落茨基總部在當時正在組織中，或者業已組成了——這一點我現在記不清楚了；問題的中心，就是要合併一切能夠反對斯大林領導的力量；探試恢復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合組織是否可能。

謝多夫又說，他知道以湯姆斯基，布哈林與李可夫爲代表的右派也沒有放下武器，只是暫時靜待而已，因此要與他們建立必要的聯繫。

這乃是一種引言，一種探試。此後謝多夫便直接向我提出問題：『托落茨基問你，皮達可夫，是否有意參加這種鬬爭呢？』我當時同意參加。因此謝多夫不禁喜形於色。他說，托落茨基相信我們雖然在一九二八年初曾發生嫌隙，但是他總能找我做可靠的戰友。

此後謝多夫就說明新鬬爭方法的實質。他說現在談不到進行任何形式的羣衆鬬爭，及組織羣衆運動；如果我們去做什麼羣衆工作，那馬上就會遭受失敗；托落茨基堅決地抱定了方針，要用暗殺與暗害的辦法，用暴力去推翻斯大林的領導。此外謝多夫說，托落茨基注意到這種鬬爭，如果只限於一個國家範圍內，那是荒謬的，他認為我們無論如何不能不管國際問題。我們在這個鬬爭中須得到國際問題，確切點說，國家間問題之必要解決。

維省斯基：你把這次會面的經過告訴了你的同謀者什麼人麽？

皮達可夫：是的，我談過，我告訴過洛根諾夫，他當時是焦炭托拉斯的經理；我告訴過比得克爾，他當時在柏林辦事；我告訴過舍斯托夫，他當時也在煤炭業定貨委員會中；我告訴過我的祕書莫斯卡列夫，他不但是我的祕書，而且是我親信的人。

維省斯基：被告舍斯托夫，你聽到了皮達可夫的口供麽？

舍斯托夫：我聽到了。

維省斯基：當皮達可夫把他與謝多夫的談話告訴你時，他是表示他同意於謝多夫呢，或者只是像留聲機一樣，把這次談話轉達給你呢？

舍斯托夫：他當然是同意的。

維省斯基：他也勸了你，使你接受這種方針嗎？

舍斯托夫：是的。

維省斯基（再向皮達可夫問）你把與謝多夫的談話告訴舍斯托夫時，你只是簡單地傳達這次談話，還是在傳達時也表示了你的態度呢？

皮達可夫：我無論與舍斯托夫或洛根諾夫談話，都談到怎樣去實現這種指令。

維省斯基：你贊同恢復反黨和反蘇聯政府的鬬爭，居然如此迅速，這是什麼原因呢？

皮達可夫：如此迅速的原因，並不是我與謝多夫的談話，這次談話，只是一種推動而已。

維省斯基：由此可見，在談話以前你也站在原有的托落茨基的立場上麽？

皮達可夫：毫無疑義地，當時我仍舊帶有托落茨基思想的殘餘，這種殘餘，過後便日益發展了。

（皮達可夫回答維省斯基的問題，繼續供認他爲謝多夫第一次會面後，沒有經過許久，又會了第二次面，第二次會面與第一次會面一樣，也是由斯米爾諾夫佈置的。會面地點仍舊在原來的咖啡店裏。）

皮達可夫：第二次會談是很短促的，談話時間，沒有超過十分鐘至十五分鐘，或許還要少些，談話的概要如下：

謝多夫當時直截了當地說：『你，皮達可夫，懂得恢復鬬爭，是需要錢的。你是能夠交出一筆進行鬬爭所必需的經費的。』

他暗示我，按照我的職位而論，我能夠拿出一批公款，老實說，就是去偷一批公款。謝多夫當時說：要求我做的事，只有一件，就是要我儘可能地多向兩個德國公司——「波爾濟格」與「得馬格」——定貨，他，謝多夫，便與這兩個公司講妥如何由牠們那裏得到必要的數目，因爲在我方面，在定貨時不去特別計較定貨底價格。如果把這件事情明白說出來，那末，顯而易見的，就是把蘇聯要定的貨故意提高價格，而這一部分故意提高的虛價，便完全或局部地轉到托落茨基手裏，作爲做反革命工作的經費。第二次談話到這裏便結束了。

維省斯基：是誰指出這兩個公司的？

皮達可夫：謝多夫。

維省斯基：你沒有問爲什麼他正是指出這兩個公司呢？

皮達可夫：我沒有問。他說，他與這兩個公司有聯絡。

維省斯基：你也與別的公司有聯絡麽？

皮達可夫：是的，我與很多的公司有聯絡。然而謝多夫指出這兩個公司，顯然是因爲他正是與這兩個公司有聯絡。

維省斯基：你照謝多夫的話去辦了麽？

皮達可夫：完全對的。

維着斯基：你說一說你是如何去辦的？

皮達可夫：這件事情辦起來很簡單，而且我有很大的可能，於是很多的定貨就轉到這兩個公司去了。

維省斯基：許多定貨轉到這兩個公司去，或許是因爲這對於我們有好處。

皮達可夫：不是，不是因爲如此。把定貨轉到「得馬格」公司，那是容易辦到的。問題是在於價格，支付該公司的錢，比一般應出的價格要多些。

維省斯基：那就是說，因爲謝多夫與「得馬格」公司有了協定，所以你，皮達可夫，就用蘇聯國家公款多付了一些錢給這個公司，是這樣麽？

皮達可夫：當然是這樣。

維省斯基：對其他一個公司又怎樣呢？

皮達可夫：「得馬格」公司，本來就是一個貨物質量很好的公司，介紹向牠定貨，完全不要費什麽力量。至於「波爾濟格」公司，那就不得不用勸說和强制的辦法，使定貨入於該公司之手。

維省斯基：由此可見，你又把錢多付給了「波爾濟格」公司，使蘇維埃國家受到了損失，是這樣麽？

皮達可夫：是的。

維省斯基：謝多夫沒有向你說托落茨基與這些公司有協定麽？

皮達可夫：當然說過了，他一開始就說到了這一點。他說，如果我向這些公司定貨，那末，他就由這些公司

拿到錢。

維省斯基：你向什麽人談過你與謝多夫這次會面麽？

皮達可夫：這次會面是帶有極其秘密的性質，所以沒有把這次談話傳出去。

（庭上繼續詰問以後，查明皮達可夫曾利用第二次與謝多夫會面的機會來問清一些問題。如例皮達可夫詢問謝多夫所說的『反抗蘇維埃政權種種設施』究應怎樣了解。）

皮達可夫：我曾請求，要托落茨基對於這一點給我一個補充的說明。謝多夫說他已寫信給托落茨基並等候他的答覆。我告訴他在柏林還有一些托落茨基份子，如果他不能直接把答覆轉告我，那麽，在我離開柏林後，他可以經過可靠的人把答覆轉告我。我當時指出舍斯托夫。此外我又指出比得克爾與洛根諾夫二人。

維省斯基：後來你從謝多夫那裏經過舍斯多夫接到了什麽嗎？

皮達可夫：是的，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間，我已經在莫斯科。舍斯托夫，從柏林回來後，便到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我的辦公室來找我，把信轉交我。

維省斯基：舍斯托夫來見你，是爲公務而來的麽？

皮達可夫：他來見我是要把托落茨基的信轉交我，並且要與我再談談開展庫茲巴斯托落茨基組織的工作問題。

維省斯基（向被告舍斯托夫發問）：你到了皮達可夫那裏麽？

舍斯托夫：是的，我到那裏去過，這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間的事情。

維省斯基：你轉了信麽？這封信你從誰手裏得到的？

舍斯托夫：我在柏林由謝多夫手裏得到的。

維省斯基：經過了誰沒有？

舍斯托夫：沒有，我親自由謝多夫手裏得到的。

維省斯基：你在什麽地方得到這封信的？

舍斯托夫：我在預先約定的地方「巴爾梯莫爾」餐館得到這封信，這個會面地點是由謝多夫介紹與我發生關係的石瓦爾茨曼告訴我的。

維省斯基：謝多夫告訴你什麽話？

舍斯托夫：他當時只把東西交給我，他交給我的，並不是信，而是一雙皮靴——這是我們當時約好了的。

維省斯基：那末，你不是得到信件，而是得到皮靴，是不是呢？

舍斯托夫：是的，可是我知道皮靴裏有信。每隻皮靴裏都有信藏着。他說信封上都有記號。有「皮」字記號的，是給皮達可夫的，而有「摩」字記號的，則是給摩拉洛夫的。

維省斯基：你把信轉交了皮達可夫嗎？

舍斯托夫：我把有「皮」字記號的這封信交給了他。

維省斯基：另一封信呢？

舍斯托夫：另一封有「摩」字記號的信，我交給了摩拉洛夫。

維省斯基：被告摩拉洛夫，你收到了信嗎？

摩拉洛夫：收到了。

維省斯基：與皮靴一起收到的，還是單收到信呢？（聽衆發笑。）

摩拉洛夫：沒有皮靴，他單拿信給我。

維省斯基：封面上有什麼呢？

摩拉洛夫：有一個「摩」字。

維省斯基：我再沒有問題問摩拉洛夫及舍斯托夫了。（轉而問皮達可夫。）關於你自己的反蘇聯的托落茨基組織的犯罪活動，你還能說什麼呢？

皮達可夫：我收到了信，這封信的外觀，與舍斯托夫剛才所說的一樣，我拆開了信，非常驚異，我本以爲是謝多夫的信，但是信封內的信並不是謝多夫寫的，而是托落茨基寫的，信是用德文寫的，署名是『L. T.』。

維省斯基：這就是說，你經過謝多夫和舍斯托夫收到了托落茨基的信，是這樣嗎？

皮達可夫：是的。

維省斯基：信中寫的什麼呢？

皮達可夫：我記得清清楚楚，這封信是這樣開始的：『親愛的朋友，我很欣喜，你聽從了我的要求……』信中繼續講到他用簡單的話敘述出來的任務，第一個任務就是要用一切辦法去掉斯大林及其親近的助手。很明顯的，對于『用一切辦法』這句話，應當瞭解首先是要用暴力的辦法。第二，在這封信中，托落茨基指出必須聯合一切反斯大林的力量，來進行鬪爭。第三，講到必須抵抗蘇聯政府及黨的一切設施，特別是在經濟方面。

維省斯基：你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底收到這封信的嗎？

皮達可夫：是的，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底。

維省斯基：收到這封信不久以後，你又到外國去過一次，這是在那一年呢？

皮達可夫：是在一九三二年。是在一九三二年下半年，當時我同謝多夫作第三次會面。

維省斯基：從一九三一年你接到托洛茨基的信起，直到一九三二年你重到柏林止，在這一段時間內，你做了什麼呢？

皮達可夫：在這一段時間內，我從事恢復托落茨基份子的舊聯絡。我集中了注意力，主要的是在烏克蘭。當我在柏林與洛根諾夫談話時，我同他商妥要組織烏克蘭的托落茨基總部。與這一總部的聯繫

就是我的主要聯繫，如果不算後來我先經過舍斯托夫而與西西伯利亞及與摩拉洛夫發生很切實的聯繫的話。首先我們恢復了烏克蘭的聯繫。這就是洛根諾夫，葛魯丙科，科秋賓斯基及本案被告利夫什茨。我們先同洛根諾夫商妥，後來再向其餘的人商妥，由他們組織了烏克蘭四人團。

維省斯基：你同他們當中什麼人談過這件事呢？

皮達可夫：同他們四個人都談過。

維省斯基：利夫什茨也在內嗎？

皮達可夫：是的。

維省斯基：那時候利夫什茨在那裏辦事呢？

皮達可夫：是在烏克蘭，做鉄路局局長。我與他在反革命的托落茨基工作上早就有聯絡了。

維省斯基：一九三一年鉄路局局長來找你蘇聯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副主席，有什麼事呢？是不是有什麼公事上的、職務上的事情呢？

皮達可夫：沒有的，他來找我，是要直接向我問明洛根諾夫轉告他的話是否都是實在的。我對他敘述了我同謝多夫的會面，並把托落茨基的訓令，暗殺的鬬爭方法，暗害的方法，都告訴了他。

維省斯基：被告利夫什茨，你對於皮達可夫所說的與你會面這一段口供，是否認爲是實在的呢？

利夫什茨：是的，是實在的，我到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去，爲的是要調査洛根諾夫所轉達的皮達可夫的

指令是否正確。皮達可夫對我說的話，與洛根諾夫所說的一樣，他告訴我說，我們從前所採用的鬬爭方法，沒有任何効果，必需採取新的鬬爭方法，就是說要採取暗殺手段與暗害手段。

維省斯基：此後，你們還有過關於托落茨基工作的談話嗎？

利夫什茨：當然有過。

維省斯基（轉而問皮達可夫）：請你說，你第二次到柏林去的事情。

皮達可夫：在一九三二年之中，我第二次到了柏林。謝多夫知道了我到柏林，決定要同我會面，以便『替托落茨基得到必需的消息』——當時謝多夫對我說了這一句話。

當我把我所知道的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組織業已開始擴大的工作情形告訴他時，他打斷了我的說話，說他已知道這些事情，因爲他與莫斯科有直接聯繫，他要求我把外省的工作情形告訴他。

我把托落茨基份子在烏克蘭及西西伯利亞的工作情形告訴了他，把與舍斯托夫、摩拉洛夫及其當時在西西伯利亞的巴古司拉夫斯基的聯繫告訴了他。

謝多夫表示極端不滿意，他說，這並不是他不滿意，而是托落茨基不滿意，因爲事情進行得太慢，特別暗殺工作進行得太慢。他說：『你們總是在那裏從事於組織上的準備和說話，而一點具體的東西都沒有。』他繼續對我說：『你知道托落茨基的性格，他暴跳欲狂，他不能再忍耐了，他要使

得他的訓令見諸實行，可是據你們的消息看來，什麼具體的東西都沒有。』

維省斯基：你第二次在柏林很久嗎？

皮達可夫：一個半月到兩個月。那年的秋天我回到莫斯科，而與加米業夫會面，這次會面，由組織托落茨基後備總部，即後來的「托落茨基平行總部」的觀點看來，是很切要的。加米業夫在某種藉口之下到人民委員會重工業部來找我。他很明確的告訴我說，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總部業已組織。他說，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已經恢復，他當時把參加總部的一些人的姓名告訴我，而且告訴我說，他們之間曾經討論過是否要把過去大家都知道的托落茨基份子如我——皮達可夫，拉迪克，索考里尼可夫，舍列布略可夫都吸收到總部裏去，然而他們認爲不適宜。加米業夫說，他們認爲這種基本總部很有被破獲的危險，因爲一切『很不干淨的人』都加入這個總部。因此，要有後備的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總部，以備基本總部被破獲時之用。他以全權代表的資格正式徵求我的意見，問我是否願意加入這個總部。

維省斯基：他所說的是所謂後備總部嗎？

皮達可夫：是後備總部。我對加米業夫說，我同意加入後備總部。這是一九三二年秋天的事。加米業夫把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總部工作的基本方向通知了我。他說，首先用暗殺方法來推翻政權的問題，乃是基本之點。同時他就轉告關於暗害行爲的指令。其次，他通知我說，他們與右派布哈林、湯

姆斯基。李可夫建立了極密切的聯繫——不只是接洽，而是聯繫；他接着又說：『你既然同布哈林有很好的關係，你也不妨同他有相當的接洽。』我後來就辦了這件事情。

維省斯基：這就是說，你同布哈林建立了這種聯繫，是這樣嗎？

皮達可夫：是的，我當時問『我們與右派建立聯繫這究竟是什麽一回事呢？』加米業夫對于這一個問題直接說道，在我方面，一般說來，表現了政治上的孩稚氣，他說，過去的意見分歧，不能使我們分裂，因為我們有同一的目的：即推翻斯大林的領導，並放棄社會主義建設，同時相當改變經濟政策。在這一次談話中，加米業夫也講到『國家間的關係』問題，他說，如果不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發生必要的聯繫，我們便不能得到政權，因此必須維持這種聯繫。至於詳細的情形，那末他說，我，皮達可夫不是『國防問題專家』，他說在這個問題上對於拉迪克和索考里尼可夫知道得比較詳細。

維省斯基：你不是國防問題專家，這是什麽意思呢？

皮達可夫：在托洛茨基份子當中，認為我多半是經濟專家，而不是國防問題專家。

維省斯基：認定誰是國防問題專家呢？

皮可達夫：我已經說過，拉迪克和索考里尼可夫。

維省斯基：在一九三二年你同他們商量了一些什麽問題呢？

皮達可夫：在一九三二年我同拉迪克有過談話。他那時說，必需實行托落茨基以及托落茨基——季諾

維也夫聯合基本總部所採取的鬬爭方法。

在與拉迪克這次談話中，我們提出了下列的問題：在基本總部中季諾維也夫份子佔了很大的優勢，是否要提出基本總部中若干人選的變動問題。

維省斯基：怎樣變動呢？

皮達可夫：要從托落茨基份子方面找些人來加入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中去。我們得到下列的結論：關于總部成份的變動問題，現在不能提出，因爲如果提出這個問題，就要在托落茨基秘密組織中引起完全不必要的爭論。

當時我們這樣想：除了加米業夫、季諾維也夫、馬拉其科夫斯基、巴卡也夫、斯米爾諾夫、葉夫多基莫夫以及其他等等所組織的基本總部之外，有我們托落茨基的平行總部，這個平行總部，在基本總部被破獲時，要起後備總部的作用，同時牠要根據托落茨基的訓令和方針，獨立進行實際工作。雖然在這個時候，我們與季諾維也夫份子之間在方針方面已經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差異；然而當時拉迪克同我所担憂的，是奪取政權後，在經濟退卻方面，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中的季諾維也夫份子會走得太遠，因此，必須採取一種抗抵辦法。

我們當時約定，關于這個問題，無論如何要去問托落茨基。經過一些時候（這已經是一九三三年，）我有一次與拉迪克會面，他告訴我說，他已得到托落茨基的回答，托落茨基非常堅决地要

求與季諾維也夫份子保持完全一致和聯合，因爲我們與他們沒有任何分歧意見，因爲暗殺和暗害行動的立場已被接受。至關於退却問題，托落茨基寫道，拉迪克同我認爲退卻是不很大的，這種設想是錯誤的，他說退却是很大的，這就是不僅與季諾維也夫份子聯合，而且也與右派聯合的基礎。至於把我們的總部變爲平行總部，那麽，他說這會加强團集力量，並加强準備必要的暗殺和暗害行動。

在一九三三年年底，在加格萊，我同舍利布略可夫會面，那時我同他商妥，我主要的，是在烏克蘭及西西伯利亞以及在工業方面進行工作，他担任南高加索及運輸方面的工作。

我與索考里尼可夫的會面要遲得多，是在一九三五年年中，當時我們已經具體講到把後備總部或平行總部變爲行動的總部，因爲那時基本總部已被破獲，而該總部份子全體被捕和判罪。索考里尼可夫到人民委員會重工業部來找我並對我說，開始行動的時候已經到了，因爲逮捕以後工作有若干停頓。

維省斯基：因此，可以說，從一九三三年起，『平行總部』已經行動起來，是這樣麽？

皮達可夫：是的。

維省斯基：這個總部與基本總部同時行動，因此牠是平行總部，是這樣麽？

皮達可夫：是的。

維省斯基：被告拉迪克，對於皮達可夫所說的這一段口供，你能夠說什麼話呢？

拉迪克：我承認這一段口供完全是與事實相符的。

維省斯基：你們商議過要去問托落茨基關于『平行總部』的意見嗎？

拉迪克：是的，我們由基本總部成份的觀點上，由我們在政治上不信任季諾維也夫份子（雖然在我們中間建立了聯繫）的觀點上，都討論過這問題。

維省斯基：這怎麼瞭解呢？

拉迪克：我們曾深信，我們的聯合未必經得起什麼嚴重的考驗。季諾維也夫最關心的問題之一，將是排擠托落茨基份子，個人的問題將起重大的作用。加米業夫和索考里尼可夫將在我們所認爲必要的經濟退却問題上，要走得遠得多，而季諾維也夫就會倉惶失措。一方面要保持聯合底外觀，另方面却需要有自己的組織，作爲一種對抗力。

維省斯基：要進行自己的政策嗎？

拉迪克：進行自己的政策，或者在這個政策上加上自己的改正。總之，要有自己的組織。

維省斯基：爲的是要把持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總部麼？

拉迪克：如果看一看舊總部的成份就可看到，在托落茨基份子方面，那裏沒有一個是老的政治領導者。當時那裏有斯米爾諾夫，這個人與其說是一個政治領導者，不如說是一個組織者；有馬拉其科夫

斯基，他是一個兵卒是一個戰鬥員；有鉄爾·瓦加仰，他是一個宣傳員。我們對他們個人是完全相信得過的，但是我們並不認爲他們在事變關頭，能夠眞正領導。當時我們認爲這一總部，旣然已經成立，則總部中成份的任何變更，都會引起我們與季諾維也夫份子的分歧。因此，我們就企圖將後備總部變爲平行總部。當時我們決定去問托落茨基的意見。

維省斯基：什麼人寫信與托落茨基的？

拉迪克：信是我寫的。

維省斯基：你怎樣把這信轉去的？

拉迪克：我經過羅木而建立了聯繫，羅木是我的老朋友，他當時是「塔斯通訊社」駐國外的通訊員。回信也是經過羅木收到的。信被我立刻焚燬了，但是皮達可夫關於與托落茨基通信所經過的各種詳情，都完全知道。

維省斯基：這就是說，你認爲皮達可夫這一段供詞，是與事實相符的？

拉迪克：是的。

維省斯基（問舍列布略可夫）：你對皮達可夫的供詞中涉及你的那一部分，能夠說什麼話？

舍列布略可夫：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底，我的確在加格萊和皮達可夫會過面。

維省斯基：你們談些什麼？

舍列布略可夫：皮達可夫把他與謝多夫的會面和他在烏克蘭及西西伯利亞所進行的工作，對我作了一個簡短的敘述。他請我担任領導與格魯吉亞的聯繫，並担任運輸業方面的工作。

維省斯基：爲什麼與格魯吉亞托落茨基份子的聯繫，他來找你担任？

舍列布略可夫：我與格魯吉亞的托落茨基份子，有過很好的關係，例如與木梯凡尼；我常常到格魯吉亞和南高加索去。至於在運輸業中，那末，我是老運輸工作人員。

維省斯基：當時你同意了担任這種工作嗎？

舍列布略可夫：是的。

維省斯基：他同你說過，你也被列入後備總部嗎？

舍列布略可夫：是的。

維省斯基：你在這點上也同意了嗎？

舍列布略可夫：是的。

維省斯基：這就是說：你承認皮達可夫底這一段供詞是與事實相符的？

舍列布略可夫：是的。

皮達可夫：請准許我指出一點。

維省斯基：請你指出罷。

皮達可夫（向維省斯基）舍列布略可夫對你的問題的回答是不完全確切的。我與他沒有過領導者與被領導者那種相互關係。並不是我吩咐他，而他同意了，關于担任工作的事情，我們是彼此商妥的。

維省斯基：你們四人中，誰是權威者：你呢，還是舍列布略可夫？

皮達可夫（不作聲）

維省斯基：舍列布略可夫的意見如何？

舍列布略可夫：我不從分担責任的觀點來說話。從這個觀點上說來，對於總部的活動，我負完全責任，但是我應當說，在我看來，皮達可夫是個權威者。在他看來，我在某種程度內，也是權威者。

維省斯基：你會與托落茨基直接發生過關係麼？

舍列布略可夫：沒有。

維省斯基：他呢？

舍列布略可夫：他發生過關係。

維省斯基（向皮達可夫）你們在『平行總部』裏面，沒有什麼人領導其餘的人麼？

皮達可夫：是的，沒有什麼人。

維省斯基：大家都是平權的份子，每個人都對整個總部負完全責任麼？

皮達可夫：是的，每個人都對自己底部門負責。在國際問題方面，索考里尼可夫和拉迪克是權威者。在工

業與經濟方面，似乎我是一個權威者。

維省斯基：我很想知道『平行總部』的活動到底是由誰領導的。

皮達可夫：托落茨基。

維省斯基：誰代表總部而與托落茨基建立直接的聯繫呢？

皮達可夫：拉迪克，隨後我親身與托落茨基會過面。

維省斯基：這就是說，總部經過你和拉迪克而與你們犯罪行爲的基本領導人發生直接聯繫，對不對？

皮達可夫：對的。

維省斯基：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間，總部實行了什麼實際的辦法。

皮達可夫：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間，正是在烏克蘭和西西伯利亞開展組織工作和準備工作的時候，莫斯科地方組織成立較遲。當時烏拉爾的工作開展了，而且一切工作已經更進一步，去實現我上面所講的托落茨基關於應用暗害和軍事破壞方法的訓令。

維省斯基：這就是說，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間，在『平行總部』領導之下，在好些地方，例如在西西伯利亞、烏拉爾、烏克蘭，正在建立和組成托落茨基支部，是不是呢？

皮達可夫：到了這個時候，在哈爾科夫，德聶普羅皮特洛夫斯克，奧德沙和基也輔都有了托落茨基團體。

維省斯基：這就是說，總部已經有了牠自己底支部了？

皮達可夫：是的，而且牠們都已經在實際上着手實行犯罪的辦法。

維省斯基：到底是那一種辦法？

皮達可夫：在烏克蘭主要的是由洛根諾夫以及和他聯繫的團體，在焦炭工業方面進行工作。他們的工作主要的是把未曾造好的焦煤爐拿來使用，其次，又用一切方法來阻撓煤炭化學工業極重要部門的建築工程。他們把煤炭放到爐子內去的時候，並不利用燒焦炭時本來可以得到的極寶貴的產物；因此，就使大批財富喪失了價值。

維省斯基：這是在烏克蘭。在其他地方又是怎樣呢？

皮達可夫：在西西伯利亞的克梅洛沃，是由本案被告諾爾金在那裏活動，而由其總工程師卡爾采夫加以協助；後來，在一九三四年，我又派遣本案被告多羅布尼斯到那裏去加強我們的工作，因為諾爾金曾向我訴苦，說他一個人很難進行這一項工作。

維省斯基：你遣派多羅布尼斯到克梅洛沃去，是不是專門為着加強暗害工作呢？

皮達可夫：我曾給多羅布尼斯以更大的任務。當着我遣派他到西西伯利亞去的時候，（關于遣派多羅布尼斯一事，我曾與謝多夫談過，因為托洛茨基本人很知道多羅布尼斯。）我曾有兩種目的：一方面，使西西伯利亞總部的工作積極起來；另一方面，給諾爾金以必要的幫助，以便在克梅洛沃聯合廠內進行暗害工作。

維省斯基：你派他去做建設工程副主任，同時又要他去破壞建設嗎？

皮達可夫：是的，在庫茲巴斯，由舍斯托夫積極開展了暗害工作，他直接由謝多夫和我得到指示。

在烏拉爾正在組織尤林的祕密團體，這個團體到了那個時候已經和梅得尼科夫的團體，以及其他的團體有了聯繫。

維省斯基：這一切團體都在你的直接領導之下組織起來，成立起來並實現了自己的犯罪行爲嗎？

皮達可夫：當然。

維省斯基：總部中其他份子知道你們的活動究竟到了什麼程度？

皮可達夫：拉迪克和舍列布略可夫知道這些事情。至於索考里尼可夫，我後來才通知他，這已經是一九三五年的事了。

維省斯基：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間你担任什麼正式的職務呢？

皮達可夫：我任人民委員會重工業部副部長。

維省斯基：因此，你更容易利用你的聯繫來進行托落茨基的勾當嗎？

皮達可夫：是的。我承認這是我的罪惡。

審問至此，早庭宣佈閉庭。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晚庭

維省斯基：請你說你所知道的托落茨基組織所進行的具體的暗害工作吧。

皮達可夫：我已經供稱，暗害工作，曾在烏克蘭進行，主要的是在焦炭化學工業方面進行。暗害工作的內容，就是不待新建築的焦炭爐完工，就拿來使用，結果，這些爐子就很快地毀壞了，而主要的暗害工作，就是在這些工廠中，延期建設化學部份並幾乎不建設化學部份，因此，投入焦炭化學工業去的大批款項，至少一半（如果不是三分之二的話）喪失了價值。煤炭底寶貴部份，即化學部分，沒有被利用，而放到空氣中去了。另一方面，曾經設法弄壞了新的焦炭爐。

西西伯利亞的托落茨基團體，曾在煤炭工業中進行了積極的暗害工作，舍斯托夫及其團體進行了此項工作。那裏曾有人數很多的一個團體，這個團體主要的，就是設法燒毀礦井中可以做焦炭的煤。在克梅洛沃化學聯合廠中也進行了暗害工作。第一個時期的工作，就是使新建築物，延期開工動用，把經費分散在次要的建築物上去，因此，極大的設備，總是處在建築的過程中，使牠們不能開工動用。在電站中也進行了暗害工作，使整個庫茲巴斯區底電力減少。

維省斯基：諾爾金，卡爾采夫，多羅布尼斯是否知道這件事情呢？

皮達可夫：是的，他們是知道的。摩拉洛夫，以及巴古司拉夫斯基，當然也是知道的。

在烏拉爾曾經有兩個基本對象，在這兩個基本對象中集中了暗害工作。第一個對象就是冶銅工業；第二個對象，就是烏拉爾的車輪製造廠。

在冶銅工業中，首先就是降低現有冶銅工廠的生產能力。赤色烏拉爾冶銅工廠以及卡拉巴石冶銅工廠經常沒有完成生產計劃，大批偷竊工廠裏的銅，結果引起很大的損失。卡拉巴石冶銅廠的工作總是失了常態。在卡拉亭工廠中礦石精煉廠總是工作得不好，那裏也進行了暗害工作。

維省斯基：誰在那裏親身進行暗害工作呢？

皮達可夫：在基本上，這個工作是由中烏拉爾銅業總管理處處長科列加葉夫進行的。

維省斯基：他進行此項工作，是自動的，還是依照別人的指示的？

皮達可夫：一般地講起來，此項工作，都不是自動的，而是依照托落茨基底指令，其次依照我本人底指令。

在烏拉爾，當時建築巨大的冶銅工廠，即中烏拉爾冶銅建築工程，這個工廠應當使我國的產銅量大大增加。然而在這個工廠中，先有該工廠建築工程總經理尤林，後有繞里科夫，進行了暗害工作，此項工作底內容，首先就是分散經費，不把工程做到底，並一般地延擱建築工程。

我應當說，我於一九三五年春，到了這個正在建築的工廠，我當時看見暗害工作做得這樣粗笨，甚至於使任何人都能一望而知在建築工程上一定有毛病。因此，我不得不對建築工程總經理繞里科夫予以指示，叫他要謹愼一點，要耍一耍手腕，要在建築工程上表現一點努力，要開始建築，

但無論如何要設法使工程不能完成

在烏拉爾，在中烏拉爾冶銅業建築工程以及赤色烏拉爾冶銅廠中，無論在生產方面，或工人生活方面，都進行了犯罪工作，這首先就表現於我們把工人宿舍的位置，弄得不對。我們把宿舍位置在靠近工廠一兩個啓羅米突的地方，一般地講起來，依照衛生的規律，這是不容許的，因爲這種生產是有毒的生產。在另一方面，一般地延擱建築宿舍的工程，因而造成中烏拉爾冶銅業建築工程一種不堪忍受的狀況。中烏拉爾冶銅業建築工程底原來目的就是要把冶銅部分和化學部分配合起來。化學部分完全沒有建築。我曾採取了下述辦法，就是把這個化學部分分開，把這個化學部分轉交於化學工業總管理局局長拉達依查克，而在他那裏，這個化學部分就完全葬送了。工廠本身底建築工程固然進行得很慢，然而礦山的工程還要更加落後。除其他種種不計外，我親自把礦山的工程與建築工廠的工程分開，使得礦山的工程不能及時完工。

現在再講到烏拉爾的車輛製造廠，在那裏，托落茨基份子馬里亞辛，烏拉爾托落茨基團體的參加者，做建築工程的總經理。政府對於這個工廠曾經予以很大的注意，對於這個工廠撥出大批款項，以便很快完成建築該工廠的工程，因爲這一個工廠所應當製造的車輛，比所有一切車輛製造廠所製造的車輛總數還要多。馬里亞辛進行了暗害工作，其辦法如下：他首先把款項用在暫時不需要的材料設備，以及其他等等的貯存方面。我認爲到一九三六年初，那裏不動用的材料，總有

五千萬盧布之多。

其次，就是建築工程底質量。該工廠中大工程的車間，製器械的車間，以及配合車輛的總車間，其建築工程，都是有系統地被延擱了。

近來暗害工作採取了新方式。不僅工廠開工延遲了兩三年，而且馬里亞辛造成了一種不堪忍受的工作條件，造成了一種互相傾軋的情形，總之，百般阻難開工。

至於莫斯科，那麼，拉達依查克在化學工業中進行了一定的工作。

維省斯基：是否可以確切說明『一定的工作』是什麼呢？

皮達可夫：我現在就要講到這一點。在這一方面，我可以記起以下的事實：首先就是製定完全不正確的發展軍事化學工業的計劃……這裏有幾個關于軍事的問題。

審判長烏爾里赫：這一點在不公開的審訊時再說吧。

皮達可夫：其次在硫酸工業中，主要的，就是隱瞞和降低工廠底生產能力，因此，硫酸的出產量，就沒有眞正能夠生產的那樣多。

在炭酸鈉工業方面，我們國家雖然有非常多的製造蘇打的鹽和原料，而且製造蘇打的方法是很精巧的，可是在我們國家中，蘇打却很缺少。建築新蘇打工廠的工程被延擱了。

維省斯基：這是什麼原因呢？

皮達可夫：這是由於我和拉達依查克底工作。

維省斯基：究竟什麼工作呢？你有兩種工作，一種是正式的工作，其他一種是祕密的工作。

皮達可夫：我現在所說的，當然是犯罪的工作。計劃上規定要建築的新工廠，如在烏索里葉、巴斯孔查克以及其他各地，總是百般設法使之延擱了。

在淡氣工業方面，拉達依查克和普森，主要的是拉達依查克，在我直接參加之下，進行了暗害工作。在這一方面，有系統地改變建築計劃，經常延擱計劃，這樣也就使建築工程延期。

維省斯基：是故意的嗎？

皮達可夫：當然是故意的。政府雖然有了決議，但是幾個工廠根本就沒有動工建築。

維省斯基：請你說你的軍事破壞工作吧。

皮達可夫：這種工作，都是在我們的指示之下，就中也在我個人的指示之下進行的。一般的方針是給了，可是我不能具體說出，我指定了這種或那種軍事破壞工作。

維省斯基：克梅洛沃的爆炸案，難道不是得到你們的具體指示嗎？

皮達可夫：不是的，並沒有那樣具體。我曾經承認諾爾金底口供是符合事實的，而且現在也承認：我依照我所接到的托落茨基底方針，曾對諾爾金說，當戰爭爆發時，顯然應當用這種或那種方法，破壞克梅洛沃工廠，使牠不能工作。

維省斯基：你當時說的用這種或那種方法，還是說的用一定的方法呢？

皮達可夫：我現在不能切實記起了。

維省斯基：審判長同志，請你准許我對諾爾金提出幾個問題。

審判長烏爾里赫：被告諾爾金！

維省斯基：被告諾爾金，你是否記得起你與皮達可夫關于在戰爭時破壞化學聯合廠使牠不能工作的一段談話呢？

諾爾金：當時說得完全明顯，應當準備在戰爭時採用放火和爆炸的辦法使有關國防的工廠不能工作。

維省斯基：你是否記得，他在什麼時候對你說的？

諾爾金：一九三六年，在重工業部皮達可夫底辦公室內。

維省斯基：你是否記得詳細內容呢？有沒有講到人命犧牲呢？

諾爾金：我記得有下列的指示，就是一般講來，犧牲是免不了的，當進行這種或那種軍事破壞行爲時，不能不傷害工人的性命。這一種指示是有過的。

維省斯基：有沒有把工人比作猪的話呢？

諾爾金：一般說來，很難逐字逐句記起當時所說的話，然而當時說的話是非常激烈的，當時說什麼東西也不要顧忌，什麼人也不要憐惜。

維省斯基：被告諾爾金，當時有沒有講到這一類行動應歸罪於什麼人呢？

諾爾金：當時說不應由實行軍事破壞工作的人負責，而應歸罪於黨及政府底領導者。

皮達可夫：有過這種說法。

維省斯基：你們組織中的人是否與外國暗探局發生過聯繫呢？

皮達可夫：是的，發生過聯繫。應當再講到托落茨基底方針，使得事情愈加明顯。我已經供稱，我與拉迪克有很親密的直接的聯繫。拉迪克與托落茨基建立了並保持了直接聯繫，並且不止一次由托落茨基那裏得到了關于各種基本問題的相當指示。拉迪克經常把消息通知我。他一接到托落茨基底相當指令，就於當天或經過幾天到我這裏來告訴我接到了什麼指令。

維省斯基：拉迪克關于這些指令告訴你什麼話呢？

皮達可夫：關于暗殺，並沒有過專門的新指令，因爲認爲這種指令已被接受，並拿去執行了，只是屢次三番來要求和催促執行這種指令。

維省斯基：在致拉迪克的信中會提起過這件事情嗎？

皮達可夫：是提起過的。托落茨基說，我們只會說空話。

維省斯基：托落茨基要求什麼呢？

皮達可夫：他要求在暗殺方面以及在暗害工作方面，都要有一定的動作。我應當說，關于暗害工作的指

令，甚至在托落茨基份子中間，也碰到了頗爲嚴重的反抗，引起了詫異和不滿，而不是毫無阻碍的。我們曾報告托落茨基，說有這種情形。然而托落茨基對於這件事情回了一封很確定的信，說關於進行暗害工作的指令，並不是什麼偶然的東西，亦不只是他所提出的一些激烈鬭爭方法底一種，而是他的政策和他的現時方針底最重要的部份。

就在這個指令中，他提出下述的問題（這是在一九三四年年中）：就是目前，因希特勒上台執政，他的（即托落茨基的）一個國家內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立場，已經十分明顯地證明是有理的了，軍事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們——托落茨基份子——要保全自己是一種政治勢力，那我們在採取使蘇聯失敗的立場之後，不僅應當消極觀看和旁觀這種失敗，而且事先就應當積極準備這種失敗。然而要做到這一層，就應當造就幹部，而幹部並不是說空話就可以造就起來的。因此，現時就應當進行相當的暗害工作。

我記得，在這個指令中托落茨基說，要是不得到外國國家底必要幫助，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政府，既不能取得政權，也不能維持政權。因此，必須與最有侵圖謀的外國，如日本和德國這一類國家，事先有相當協定，所以他，托落茨基本人，在實行與日本政府以及德國政府發生聯繫的事情上，已經採取了相當步驟。

在這封信中，托落茨基對於我們的活動也表示不滿。他已經知道，索考里尼可夫對于某國公

使某先生底直接質問……

審判長烏爾里赫：被告皮達可夫我絕對禁止你提及外國駐莫斯科代表底姓名。如果你想關於這一問題說出供詞，你可以在不公開的審訊時說出。

皮達可夫：好的。托落茨基當時表示不滿，說索考里尼可夫沒有明白懂得托落茨基所採取的那些步驟，說索考里尼可夫沒有充分積極贊助這些步驟。後來我知道，爲着執行托落茨基底指令起見，拉迪克會與某些人晤面和談話，談話的方針是根據托落茨基底指示的。

維省斯基：與什麼人晤談？與外國人麼？

皮達可夫：簡單說來，與德國人（聽衆發笑。）

維省斯基：你從何知道這一點呢？

皮達可夫：關于拉迪克與某些人的會面和談話，是拉迪克自己告訴我的，至于索考里尼可夫，那我第一次是從托落茨基底信中知道的，後來拉迪克又把這一點告訴我，再後來，在一九三五年年中，索考里尼可夫自己也把他這一步驟告訴了我，並且將關於他證明托落茨基與日本政府所進行談判之一段話，引舉出來……

維省斯基：在你去國以前，你與拉迪克再沒有談過這個問題麼？

皮達可夫：從一九三五年年中起到一九三五年年底和一九三六年年初止，這一段時間的特點，從我們

犯罪工作的觀點上看來，就是在這一時期中，『平行總部』曾企圖由平行的變爲基本的，並企圖遵照我們從托落茨基方面接到的指令而使我們的活動積極化，因爲在這個時候，我們與索考里尼可夫、湯姆斯基見過好幾次面。總而言之，我們當時曾企圖執行基本總部所通過的決議，而這個決議曾於一九三四年由基本總部份子轉達于我們四個人：加米業夫把這個決議轉達于我與索考里尼可夫，而馬拉其科夫斯基則把這個決議轉達于拉迪克與舍列布略可夫。

維省斯基：這個時期，就是索考里尼可夫到你那裏去並對你說『行動的時候已經到了』的時期麽？

皮達可夫：是的，那時正是新時期，那個時候，我第一次與索考里尼可夫談到我們組織的狀况，談到我們有那些暗殺團，有那些托落茨基組織。我曾對索考里尼可夫大體上講到暗害工作正在相當方面進行。同時索考里尼可夫也把他所有的聯繫告訴我聽他提到查克斯·格拉得涅夫與梯月里底團體。

我記得，我們就在這次談話中，對於擴大我們的聯盟的問題曾加以很多的注意。無論索考里尼可夫，無論我，都已從加米業夫那裏知道，基本總部與右派曾有直接的組織上的聯繫。另一方面，我已經說過，我與布哈林曾有直接的聯繫，這種聯繫後來就交歸拉迪克去了。

當時我與索考里尼可夫曾討論了這一問題，並决定絕對必須設法正式確定這種關係，以便與右派共同組織推翻蘇維埃政府的工作。

當時我們講到絕對必須與右派底某個首領晤談，就是說要與李可夫、湯姆斯基或布哈林晤談，並且關於這三個人我們都曾談到，但結果是選定了湯姆斯基，因為據我們所得的消息湯姆斯基是在右派中有人數最多的和最有組織的幹部，正是他最適宜于進行這種祕密的組織工作。索考里尼可夫担任與湯姆斯基見面，並且與他見了面。

後來我與索考里尼可夫第二次見面，這好像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底，又好像是十二月初。他轉告我，湯姆斯基表示完全同意在組織上加入我們的聯盟。同時，我也把我與湯姆斯基關于這一問題的談話告訴給索考里尼可夫。湯姆斯基在與我談話中說，他認為絕對必須組織暗殺以及其他各種工作。但是他說他要和他的朋友，和李可夫與布哈林商量一下。後來他的確同他們商量了，並且代表他們三個人給了答覆。

維省斯基：除湯姆斯基外，你們還與右派中什麼人談過話？

皮達可夫：我沒有談過話。拉迪克與布哈林有聯繫。在一九三四年以前，就是說在布哈林離開人民委員會以前，我與布哈林有過聯繫。布哈林在人民委員會辦事的時候，我很容易與他見面，但當布哈林轉到了新聞報館去辦事的時候，這種聯繫就交歸拉迪克去了。拉迪克與布哈林就繼續保持了反革命的聯繫。

大約在一九三五年年底，拉迪克接到了托落茨基一封詳細的信——托落茨基底訓令。托落

茨基在這個訓令中，指出我們上台執政的可能有兩種方案。第一種方案就是在戰前上台執政的可能，第二種就是在戰時上台執政的可能。托落茨基認爲第一種方案，祇有實行他所謂集中的暗殺打擊的結果，才可以實現。他這裏所指的就是要對蘇聯共產黨與蘇維埃政府底許多領導者，當然首先是對斯大林及其最親近的助手，同時實行暗殺。

第二種方案，即在托落茨基看來比較更可靠的方案，就是蘇聯在軍事上的失敗。依托落茨基說來，戰爭是必不可免的，而且在最近期內就會爆發，首先是與德國戰爭，也許是與日本戰爭，既然如此，那就要和這些國家底政府締結相當協定，使牠們對于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上台執政表示友善態度，也就是說，要向這些國家作種種讓步，並根據預先講妥的條件而取得牠們的相當援助來維持政權。但因爲這裏很尖銳地提出了要使蘇聯失敗，要實行軍事暗害工作，要於戰時在蘇聯後方及軍隊中實行重大打擊的問題，所以就使得拉迪克和我大感不安。我們當時以爲，托落茨基之所以抱定蘇聯必然失敗的方針，多半是因爲他脫離了蘇聯實際環境和不知道具體情形，不知道蘇聯現狀，不知道紅軍實力，所以他就有了這樣的幻想。因此我和拉迪克當時就認爲必須設法與托落茨基見面。

維省斯基：被告拉迪克，你在一九三五年或更早些，是否接到了托落茨基底兩封信或更多的信？

拉迪克：第一封信是在一九三四年四月接到的，第二封信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接到的。

維省斯基：這兩封信底內容是否和皮達可夫在這裏所說的話相符合？

拉迪克：基本上是相符合的。第一封信實質上講到加速戰爭，作爲托落茨基份子上台執政之可希望的條件。第二封信詳細規定了在和平時候上台執政和戰爭時候上台執政的所謂兩種方案。在第一封信上沒有講到托落茨基所主張的那些讓步將引起什麼社會上的變動。如果去和德日勾結，那末，祇爲顧全托落茨基底情面，任何勾結當然都是不會成功的。但是托落茨基在第一封信上沒有說出讓步底綱領。在第二封信上就講到了托落茨基認爲在托落茨基份子上台執政時由於這種勾結而絕對必需採取的那種社會經濟政策。

維省斯基：這一政策底實質何在呢？

拉迪克：如果問到公式的話，那末，這一政策就是回復到資本主義，使資本主義復辟。但是這一點是被掩飾了的。根據第一種方案，就應當加強資本主義成份，講到要把大的經濟企業以租借形式交於德國人與日本人，務須以低於世界市場價格之價格供給德國以原料、糧食、脂油等。這對於國內發生什麼結果，是很明顯的。那時俄國內部私人資本底利益就會在德日租借企業資本家底週圍集中起來。而且這全部政策是與恢復個人農業部門的綱領聯繫着的：縱使不是在全部農業中，那至少是在一大部分的農業中，恢復個人農業部門。在第一種方案中，講到大大恢復資本主義成份，而在第二種方案中，就講到賠款及其結果，講到在德國人提出要求時，就把那些對於德國經濟特別有

價值的工廠交於德國人。既然托落茨基在這一層上已經完全知道這些辦法就是大規模的恢復私人商業，所以這些因素底數量上的對比關係就形成資本主義恢復的狀況。在這種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社會主義經濟只有一些殘餘，而且這種殘餘在那時候簡直成爲國家資本主義的成份。在第一封信上還沒有提出社會綱領，而在第二封信上這一個綱領已經有了。第一封信是簡短的，牠講到加速戰爭爆發的問題，第二封信則估計了國際狀況，而且講到了戰爭爆發時的策略。如果第一封信，可以算作對於使蘇聯失敗策略的一個推動，那末第二封信却提出了規定好的完滿的綱領因此第二封信就寫的比較長。第一封信祇有兩三頁，而第二封信則有八頁，是用英國的薄紙寫的，是一封內容詳細的信。

維省斯基：在這第二封信上，在這被稱爲失敗主義大綱領的信上，有沒有說平行總部上台執政時應當滿足外國的那些條件呢？

拉迪克：整個綱領都是要達到這一點。

維着斯基：條件的本身，托落茨基有沒有說出呢？

拉迪克：說出了的。

維省斯基：他是否具體講到領土的割讓呢？

拉迪克：他曾經說這大概是必要的。

維省斯基：究竟什麽東西大概是必要的呢？

拉迪克：領土的割讓大概是必要的。

維省斯基：那些領土的割讓呢？

拉迪克：假使與德國人和好，那就應當用某種形式去滿足他們的要求，去滿足他們的侵略慾望。

維省斯基：把烏克蘭給他們麽？

拉迪克：當我們讀這一封信的時候，我們曾經深信是這樣的。烏克蘭將稱爲「格特曼」㊀的烏克蘭或別的名稱，這都不要緊，總之是要滿足德國侵略烏克蘭的慾望。至於講到日本，則托落茨基曾說要把黑龍江沿岸一帶和濱海省割讓於日本。

維省斯基：被告索考里尼可夫剛才皮達可夫說到你曾同某人談話，這人底姓名，審判長曾叫他不要說出來——這些話是否合乎事實呢？

索考里尼可夫：是的，是合乎事實的。

維省斯基：你也承認這封信的內容眞是這樣的麽？

索考里尼可夫：是的，眞是這樣的。

㊀「格特曼」係烏克蘭之名稱，有國家領袖之意。一九一八年德國佔領烏克蘭時曾任司闊洛巴斯基爲全烏克蘭之「格特曼。」其後烏克蘭爲紅軍克復，司闊洛巴斯基逃往柏林。——譯者

維省斯基（問皮達可夫）請你說一說你是在什麼情形之下到國外去的？你到外國去的正式緣由是什麼，而你在那裏所幹的非正式的行爲又是什麼？

皮達可夫：我已經供稱，一九三五年年底，我與拉迪克談話時曾經提出必須設法與托落茨基見面的問題。因爲那一年我要因公赴柏林數天，所以我便約定我要設法與托落茨基見面，當時拉迪克就介紹我在柏林去見與托落茨基有聯絡的布哈爾切夫，好使後者幫助我組織這一會面。後來我到了柏林，並會見了布哈爾切夫。

維省斯基：這大約是在什麼時候？

皮達可夫：這是在十二月十日前後，是在十二月上半月。就是當天，又好像是在第二天，我就會見了布哈爾切夫，他乘着周圍無人的機會，遂轉告我，他在數天以前，就已知道我要來柏林的消息，他已將這一消息通知托落茨基，並等候着托落茨基底回信。第二天托落茨基就派了一個人來，而布哈爾切夫就領我到梯爾加爾登公園一條蔭道上去見他，我們在那裏只逗留了幾分鐘。那個人摸出托落茨基底一張小字條給我看，上面寫着下列數字：『尤·勒，帶這一字條給你的人，你完全可以信任他。』『完全』兩字還用着重點指出，因此我就完全明白托落茨基派來的這個人是他的親信者。這個人當時約我於第二天早晨在登彼部弗飛機場見面。第二天早晨，我便直接到飛機場門口，他已站在門前，便領了我進去。他事先曾將替我預備好了的護照拿出給我看。護照是德國的。過關的

一切手續都是由他去辦的，我只簽簽字而已。

我們上了飛機，飛機開了，途中沒有着陸，大約下午三點鐘的光景，降落在沃斯洛飛機塲。那裏有一輛汽車停着。我們便坐上汽車走了。大概經過三十分鐘的工夫，我們就到了一個避暑處。我們出了汽車，走進了一座陳設齊整的小屋子，那裏就遇見了從一九二八年起沒有會面過的托落茨基。那裏我與托落茨基就作了談話。

維省斯基：你們的談話延長多久？

皮達可夫：大約有兩個鐘頭。

維省斯基：請你說一說，你們談些什麼。

皮達可夫：這次談話先從我告訴消息開始。我當時把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總部所已做的事告訴他。當時托落茨基已接到拉迪克底信，所以他表示特別憤懣。在談話時他屢次打斷我的話，引用種種刻毒的字句，說我們採取調和態度和不懂得環境，例如說：『你們還在過舊式生活』以及其他各種挖苦的話，這顯然表示他的不滿。當談到暗害問題時，他便大發牢騷，用苛刻的話埋怨我們，例如說：『你們竟脫不了斯大林的臍帶，你們竟把斯大林的建設認作社會主義的建設。』

當時他就很激烈地說出自己對暗害行動的主張，他這樣的確說出這一主張，可說是第一次。他說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是不能建設成功的，又說斯大林的國家底破產是必不可免的。另一

方面，資本主義正在恢復在危機中所喪失了的元氣，正在開始鞏固起來，因此很明顯的，資本主義不能長久容忍蘇聯繼續强大，尤其是蘇聯軍事工業，及蘇聯國防能力底强大。軍事衝突是必不可免的，我們如果對於這一點抱消極態度，那托落茨基組織的一切幹部也將與斯大林的國家同歸於盡。正因爲這樣，所以他認爲暗害方法，不簡單的祗是可有可無的猛烈鬬爭手段之一，而是由托落茨基立場底實質本身中，產生出來的最必要的東西。

問題就在于托落茨基的幹部究應採取什麼立場：他們將與斯大林的國家相依爲命呢，還是將反對這一國家，並把自己組織起來去實現其他任務，去推翻蘇維埃政府，而準備另外一個政府——托落茨基的政府上台執政呢？

其次，他又說，我們托落茨基份子中間，現在有許多人還有一種幻想，以爲可以採取什麼羣衆方法，可以組織羣衆。組織羣衆鬬爭之所以不可能，首先是因爲蘇聯工人羣衆，農民羣衆，現在基本上是被國內大規模的建設所催眠着，他們把這種建設當作是社會主義建設。我們想要在這一方面活動的一切企圖，都是完全無濟于事的，這會很快地使我們遭受完全的失敗，使現在國內所有的爲數無多的托落茨基幹部歸於消滅。因此，任務是在別一方面，就是要實行眞正的國家政變，由此就得出種種策略上和鬬爭手段上的辦法。

維省斯基：而實際的一部分呢？

皮達可夫：兩者有很密切的聯繫。托落茨基當時又說，據他的意見，戰爭即在目前，他確實知道，戰爭不是經過五年，而是在很短促的時間內就要爆發。他當時直接對我說，戰爭就在一九三七年。很明顯的，這種消息不是他自己想像出來的。當時，他又講到兩種方案。至於國際環境呢，——他講到國際環境的趨勢多半是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要歸於消滅，而法西斯主義要得到勝利。如果我們打算取得政權，那末，在國際環境中實在的力量首先就是法西斯蒂，所以我們必須用這種或那種形式設法與這種力量建立聯繫，幫助這種力量，並保證這種力量對我們的友善態度，以備我們在不發生戰爭時，特別是在發生戰爭而蘇聯失敗時，上臺執政，而蘇聯在戰爭中的失敗，托落茨基認爲是不可避免的。當時他告訴我，他知道拉迪克及索考里尼可夫所進行的談判。托落茨基表示不滿，說他們不充分積極，過於小心了。我此地所說的談判，就是拉迪克和索考里尼可夫與若干外國代表所進行的談判，而這些代表底名字，審判長是禁止我說的。

托落茨基講到國際問題時，曾特別尖銳地提出準備軍事破壞工作底幹部問題。他責備我們，說我們進行軍事破壞、暗害和暗殺的工作，不充分積極。他說，他已經與法西斯的德國政府及日本政府完全商妥了下述一點，就是當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上臺執政時，該兩國政府將表示友善態度。而且他當時就附帶說明，這種友善態度，當然不是由於這些政府特別寵愛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的結果。他不過是根據于法西斯政府的實際利益，不過是根據于我們允許

在上臺執政時要替他們辦的事情。

維省斯基：允許了什麼？

皮達可夫：在這裏我應當先說明一點。當時托落茨基乂說，從這個觀點上看來，從他所進行的這些談判的觀點上看來，從他已經達到的成績的觀點上看來，加强積極的軍事破壞，暗害和暗殺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爲這可以使外國政府看見，與他們談判的，並不是用個人名義來說話的人，而是具體的實力。當時他告訴我，他與德國國社黨副主席格斯進行了長期的談判。固然，我不能說，是否有由他簽過字的條約，或者只有一種商權，不過托落茨基在向我敍述這件事情的時候，却用了一種敍述已有協定的口氣；雖然，這種協定還要經過其他一些人的手而加以正式批准，關于這些人，我在不公開審訊時再說。

如果簡略地講起來，這種協定的內容究竟是什麼呢？

第一，德國法西斯允許對於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表示友善態度並允許予以幫助，如果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能夠在戰爭時或在戰爭前取得政權的話。但因此法西斯就得到下列的報償：對于德國利益以及在一切國際政策問題上對于德國政府，都採取一般的友善態度；應當實行一定的領土割讓，而且這種領土割讓，是很具體的，其中曾講到割讓領土的掩飾形式，即「當烏克蘭民族資產階級起而自決時，不得反對這種舉動。」

維省斯基：這是什麼意思呢？

皮達可夫：這種掩飾形式，就是拉迪克在此地所說的：如果德國人要設立自己的烏克蘭傀儡政府——而且並不經過德國的總督來實行統治，或許經過烏克蘭的「格特曼」來實行統治，然而無論如何，德國人使烏克蘭『自決』——，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並不反對。實質上，這是開始分裂蘇聯。

協定的第二條，講到德國資本將採用什麼方式才能在蘇聯開發對於德國必要的原料富源。此地所講的是開採金鑛，煤油，錳，森林，肥料礦石以及其他等等。

維省斯基：在戰爭時的軍事破壞行爲又怎樣呢？

皮達可夫：這是最後一條。在武裝進犯蘇聯時，托落茨基組織在國內進行破壞工作的力量，必須與在德國法西斯領導下而行動的外力，協同動作。在蘇聯國內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組織所進行的軍事破壞和暗害工作，必須根據托落茨基的指示進行，而托落茨基的指示，必須與德國總參謀部協商。

談話將完結時，我們有下述一段談話。上臺執政，這就是說，我們必須大大往後退却，退到資本主義。托落茨基講到這一點的時候，曾經說，既然右派接受了暗害和軍事破壞的綱領，並認爲必須往後退却到資本主義，事實上我們同右派是一個綱領。當我說到索考里尼可夫與湯姆斯基談話，

說到我自己與湯姆斯基談話，以及說到我和拉迪克同布哈林有什麼聯繫時，托落茨基表示很大的滿意。他說，這不僅是策略上的辦法，不僅是與共同敵人作鬭爭的一種聯合，而且是有一定原則意義的一種聯合。

維省斯基：總之，托落茨基在一九三五年對你所說的話，比較以前對你所說的，有什麼新的東西，你在自己犯罪的活動中作爲方針的是什麼東西？

皮達可夫：新的東西就是托落茨基已充分明顯地說出：托落茨基組織，實質上變爲法西斯主義底附屬品。

維省斯基：現在我要問你關於你在暗殺工作方面的犯罪行爲。這種行爲具體的表現在那裏呢？

皮達可夫：這種行爲的表現首先就是經過西西伯利亞總部，組織了西西伯利亞的暗殺團，準備暗殺愛依赫。

維省斯基：在西西伯利亞組織了這些暗殺團，還有什麼目的呢？

皮達可夫：在西西伯利亞，曾經企圖暗殺莫洛托夫……。

維省斯基：還有呢？

皮達可夫：在烏克蘭，要暗殺科西沃爾及坡斯特舍夫。此外在烏克蘭方面，同烏克蘭托落茨基份子談過，如果必須調遣托落茨基暗殺團份子赴莫

斯科的話，那就應當照辦。

維省斯基：調到莫斯科有什麼目的呢？

皮達可夫：爲的是實現暗殺行爲。

維省斯基：暗殺誰呢？

皮達可夫：暗殺共產黨和政府的領導者：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岡諾維赤，沃羅石洛夫，鄂爾卓尼基茲。當時所講的是差不多同時實行暗殺。托落茨基關於這一點特別極力主張。

維省斯基：在南高加索方面，也是這樣嗎？

皮達可夫：是的，在南高加索方面也是這樣。

維省斯基：在南高加索方面你同誰說的呢？

皮達可夫：同木梯凡尼說的。舍列布略可夫同木梯凡尼說過，有必要時，須派送南高加索的托落茨基暗殺團份子赴莫斯科。

維省斯基（轉向舍列布略可夫）被告舍列布略可夫，你是否承認皮達可夫所說的關於你與木梯凡尼的談話，是與事實相符呢？

舍列布略可夫：是相符的。這是預定要殺葉茗夫。

維省斯基（轉問皮達可夫）這樣一來，我們已經歷數了多次暗殺行爲，而這些行爲，你也參加了準備，

對不對呢？

皮達可夫：完全對。

維省斯基：什麼人曾在莫斯科，在你直接領導之下活動呢？

皮達可夫：在我直接領導之下而活動的有尤林的暗殺團，加入這個暗殺團的就是沃斯科里多夫，多庫查葉夫，科洛斯科夫。

維省斯基：暗殺團的任務是什麼呢？

皮達可夫：暗殺斯大林與卡岡諾維赤。

維省斯基：你直接領導這件事情嗎？

皮達可夫：是的，我以總部一份子的資格，直接領導了這件事情。此外，我知道與索考里尼可夫以及與拉迪克有聯繫的暗殺團。與索考里尼可夫有聯繫的暗殺團，就是查克斯·格拉得涅夫和梯月里的暗殺團；與拉迪克有聯繫的暗殺團，就是普里果任的暗殺團。此外，我們時時想叫特列采爾到莫斯科來，因爲我們知道他與暗殺者有聯繫。

維省斯基：關于特列采爾你同誰談過嗎？

皮達可夫：我同拉迪克談過。

維省斯基：被告拉迪克請你說，你們關於特列采爾談過話麼？

拉迪克：在一九三五年七月間談過。當基羅夫被暗殺以後，我們第一次聚會時講到暗殺單個的人是沒有意思的。這不會有政治上的任何結果，只會引起組織的破獲。因此，必須切實查明是不是有力量來認眞動作，或者沒有這種力量。

維省斯基：暗殺了基羅夫同志還不夠，還要暗殺其他的人，我這樣瞭解你所說的話，是不是對呢？

拉迪克：或者應當放棄暗殺，或者認眞組織大批的暗殺行爲，這才會形成接近政權的條件。

維省斯基：我沒有問題了，我請求傳訊證人布哈爾切夫。

三・對證人布哈爾切夫之訊問

審判長烏爾里赫（向證人布哈爾切夫發問）：你就是布哈爾切夫嗎？

布哈爾切夫：是的。

審判長：你最近担任什麼職務？

布哈爾切夫：我是新聞報駐柏林的通訊員。

審判長：你是被傳來做皮達可夫，拉迪克及其他等人案件的證人的。你得照實說。

維省斯基同志：既然證人布哈爾切夫是根據你的請求傳來的，那末就請向他發問吧。

維省斯基：布哈爾切夫！你與拉迪克相識嗎？

布哈爾切夫：是的，我與他相識。

維省斯基：相識有多久啦？

布哈爾切夫：我與他相識，大約是從一九二四年起。

維省斯基：你與皮達可夫也相識嗎？

布哈爾切夫：我是在一九三五年起就和他相識的。

維省斯基：誰介紹你和他相識的？

布哈爾切夫：我與皮達可夫是這樣相識的：當他在柏林的時候，我親自去會他，並向他說出自己的姓名。可是他已經事先知道我了。

維省斯基：你是否曾因托落茨基組織的祕密工作關係而和他發生過什麼關係的呢？

布哈爾切夫：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初，我得知皮達可夫要來到柏林，經過幾天工夫，忽有顧斯塔夫·石梯列爾這樣一個人打電話給我。而我與石梯列爾的關係，是拉迪克介紹發生的。

維省斯基：爲什麼他打電話給你呢？

布哈爾切夫：他打電話給我，是約我與他相會。我們于是相會了，他是托落茨基底人。

維省斯基：你怎麼知道他是托落茨基底人呢？

布哈爾切夫：我之所以知道，是因爲當我在一九三四年五月離莫斯科的時候，拉迪克對我說，待我到柏林以後，我會收到一封信，在這封信裏，將說明已從維也納來此的一位新聞記者，應代表卡爾向我致意，這個便是托落茨基底人。

維省斯基：所謂托落茨基底人，這是什麼意思呢？

布哈爾切夫：這就是說，如果拉迪克委託我交什麼東西給托落茨基，那末，我就可以經由此人轉達。

維省斯基：關于皮達可夫怎樣呢？

布哈爾切夫：當石梯列爾打電話給我的時候，我會對他說，皮達可夫最近幾天就要來到柏林。石梯列爾就向我說道：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消息。並說：他一定把這個消息轉達托落茨基，而且托落茨基一定會想和皮達可夫見面。經過幾天以後，他又打電話給我，當我同他見面的時候，他說：托落茨基無論如何要想和皮達可夫見面，並說：在石梯列爾本人身上，有一封信或者字條要交給皮達可夫；一待皮達可夫到柏林時，他就一定要和皮達可夫會面。

當皮達可夫已抵柏林時，我特地跑去見他，並乘着他辦公室內沒有旁人時，向他說：這裏有一個托落茨基底人，很想轉交一封信給他，而且，並設法佈置使他與托落茨基見面的事情。皮達可夫當時說道，他對這一點非常高興，因爲這與他的計劃完全相合，所以他很願意去拜會托落茨基。

後來我便和石梯列爾會見，與他約定，並說皮達可夫是準備去見托落茨基，後來皮達可夫便與石梯列爾就在梯爾加爾登公園『勝利路』會見了。

維省斯基：在他們談話的時候，你是否在場呢？

布哈爾切夫：是的，我在場。後來我就離開了他們見面的地點。經過幾天以後，彷彿是臨到皮達可夫起程由柏林回莫斯科的時候，我在蘇聯駐德大使館裏碰見了皮達可夫，便問他是否會到了托落茨基。他回答道：會見了。

維省斯基（向皮達可夫發問）：你從沃斯洛回來以後，是否曾和布哈爾切夫談過話？

皮達可夫：嚴格說來，並沒有談什麼話。我只是向他說過，我到了沃斯洛，並會見了托落茨基。

維省斯基（繼續向布哈爾切夫發問）：你是否曾經知道石梯列爾究竟從何處得到了護照？他究竟從何處得到了飛機？爲什麼在德國可以這樣容易得到這些東西呢？

布哈爾切夫：當我和石梯列爾談話的時候，我曾問他，他如何取得護照。石梯列爾當時答道，『請你不要担心！我準能辦到這點，因爲我在柏林有很多的關係。』

維省斯基：什麼關係？

布哈爾切夫：他沒有向我說究竟有什麼關係。可是我當時已經明白，這就是與那些能夠辦到這些事情的人物的關係。

維省斯基：究竟是那些人物呢？

布哈爾切夫：就是德國政府機關的人物。

維省斯基：那麼，飛機呢？你是富有經驗的新聞記者，你當然知道，從一個國家飛到另外一個國家，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布哈爾切夫：當時我是明白，他，即石梯列爾能經過德國官場人物來辦到這一點。德國官場人物明明知道皮達可夫是要乘飛機去見托落茨基。他們並不是爲着石梯列爾一人的好面孔而這樣做的。

維省斯基：當時難道非有你來參與這事不行嗎？你究竟爲了什麼目的，會參加這樣的事情呢？

布哈爾切夫：我當時是托落茨基組織中的一份子。

審判長：現在宣布退庭。明日上午十一時繼續開庭。

四·對被告拉廸克之審訊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早庭

審判長：繼續開審。現在開始審訊被告拉迪克。被告拉迪克！你現在還承認你在去年十二月預審時所作的口供，確符事實嗎？

拉迪克：是的，我完全承認。

維省斯基：請你簡單說說你過去的托落茨基的活動。

拉迪克：在一九二三年黨內發生鬥爭時，我附和了托落茨基反對派，並加入其組織，參加其領導機關，一直到一九二八年正月被流放時爲止。在流放期內，我依然站在托落茨基的立場上，一直到一九二九年七月寫聲明書給蘇聯共產黨中央黨部的時候爲止，在這整個時期中，我是托落茨基組織之政治中心裏的份子。

（在拉迪克以後的供詞中可以看得清楚，他是以兩面手腕囘到黨內來的。囘到黨裏以後，他仍是採取兩面手腕進行反黨鬥爭。剛從流放地囘來以後，拉迪克很快就恢復了他自己與托落茨基組織的聯繫；關于政治方面的一切根本問題，他都依然抱着托落茨基的觀點。）

維省斯基：你究竟和那些托落茨基份子保持了聯繫呢？

拉迪克：我因爲朋友關係，與馬拉其科夫斯基有關係。因爲老朋友的關係，我與斯米爾諾夫（依·尼）有聯繫，其次，我與特列釆爾有聯繫。再其次，我與特列釆爾最親近的助手加也夫斯基有聯繫。至于我與我的老朋友——皮達可夫、普列布拉任斯基、斯米爾加、舍列布略可夫等人之聯繫，那是更不待說了。

維省斯基：這是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嗎？

拉迪克：是的，正是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還在一九三一年，我就已經過份估量了富農階級的反抗力量，被困難所嚇倒，於是我就成了敵視無產階級的勢力底代表。

維省斯基：你是什麽時候知道『聯合總部』之存在及其活動的？

拉迪克：我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間就已知道這『聯合總部』之產生。

維省斯基：從誰口中知道的？

拉迪克：首先，關于這一組織之準備的事實，我是從托落茨基於一九三二年二三月間給我的信中知道的。至關於該組織產生的事實之本身，我是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間由馬拉其科夫斯基口中知道的。

維省斯基：托落茨基當時給你的信裏寫的什麽？

拉迪克：托落茨基告訴我說，根據他所有的消息，可以得出結論說，我，拉迪克，已深信托落茨基說得有理，而且深信非實現托落茨基之要求，便沒有政治出路。其次托落茨基又寫道，因爲他深知我是一個積極活動的人，所以他相信我一定會重新加入鬭爭。

維省斯基：那末，就是說，托落茨基當時號召你去進行鬭爭嗎？

拉迪克：托落茨基在其信尾中所寫的大略如下：『你必須估計到已往時期的經驗，亦須了解你已經沒有回復原有鬭爭手段的可能。現在鬭爭已進入了新階段，而在這個階段中間之新的特點，就在於：或者是我們與蘇聯同歸于盡，或者是必須去掉現時的領導。』在這封信裏暗殺兩字雖沒有明白

說出，可是當我讀罷『去掉領導』這四字以後，我立即懂得托落茨基所想的究竟是什麽。

維省斯基：你收到這封信以後，採取了怎樣的態度呢？

拉迪克：托落茨基當時告訴我，不僅僅托落茨基份子，而且季諾維也夫份子，同樣都已决定重新進行鬬爭，并且雙方已在進行關于彼此聯合的談判。我當時並沒有對這個問題作任何囘答。因爲我當時認爲，還要作周密的考慮。大約在一九三二年九月末或十月間，我便最後决定囘到鬬爭的道路。當時，我與馬拉其科夫斯基作了一次談話，在談話中我對他說：『我已决定和你們一齊來鬬爭，』同時我問他：他們鬬爭的計劃究竟如何，以及與季諾維也夫份子實行聯合的事情已到了如何程度。

維省斯基：馬拉其科夫斯基當時怎樣囘答了你呢？

拉迪克：他完全肯定地囘答我，說鬬爭已進到了暗殺階段，而且爲了實現這個策略起見，我們已經與季諾維也夫份子聯合起來了，並且現在已着手進行準備工作。

維省斯基：什麽準備工作呢？

拉迪克：很明顯的，既然新的方針乃是暗殺，那末，準備工作的內容就是收集和造就進行暗殺的幹部。後來，馬拉其科夫斯基又對我說，這個鬬爭既是殘酷的鬬爭，而且難免有極大的犧牲，因此，我們想保存一些幹部，以備失敗時的需要，就是說，以防不幸被捕以後的需要，因此他說：『因此我們就沒有

把你們列入第一總部』他當時所指的是我以及皮達可夫，舍列布略可夫。

維省斯基：你是否曾從馬拉其科夫斯基口中知道關于準備暗殺黨及政府領袖的消息呢？

拉迪克：在一九三三年四月，馬拉其科夫斯基特來問我：我是否能給他在托落茨基份子中間物色一個相當的人，以便在列寧格拉方面組織暗殺團。

維省斯基：究竟是要暗殺誰呢？

拉迪克：當然是要暗殺基羅夫。

維省斯基：結果怎樣呢？

拉迪克：我於是就給他指定了這樣一個人。

維省斯基：這是誰呢？

拉迪克：就是普里果任。

維省斯基：這是一九三三年四月的事嗎？

拉迪克：正是。

維省斯基：基羅夫是什麼時候被刺的呢？

拉迪克：基羅夫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被刺的。

維省斯基：那末，在這個萬惡罪行未實行以前好幾個月，你，拉迪克，就已經知道托落茨基份子是準備着

刺殺基羅夫嗎？

拉迪克：馬拉其科夫斯基當時曾對我說，在列寧格拉方面季諾維也夫份子正準備着實行暗殺，於是我當時已經完全明白，他們所要刺殺的，就是基羅夫。

維省斯基：你是否曾知道季諾維也夫份子在莫斯科方面的暗殺團的領導者是誰？

拉迪克 關于這一點，我是從特列釆爾口中知道的。特列釆爾當時對我說，在季諾維也夫份子方面，担任暗殺團總領導的是巴卡也夫，而在我們托落茨基組織方面，担任總領導的便是馬拉其科夫斯基。在莫斯科方面，這種工作，是拉因果里特所領導的。

維省斯基：那末，你當時是深知這些暗殺團的活動嗎？

拉迪克：自然的，既然是總部中的份子，我是完全知道的。

維省斯基：而且你當時還知道暗殺行爲之實際上的準備麽？

拉迪克 關于實際上的準備，收集幹部、組織這些幹部、訓練這些幹部，我在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開始成立時，即已知道，因爲我也是這聯盟的一員。

維省斯基：暗殺基羅夫也是你所參與的暗殺行爲之一嗎？

拉迪克：暗殺基羅夫也是我所參與的暗殺行爲之一。

維省斯基：那末可以肯定說，你是從馬拉其科夫斯基口中得知關于暗殺消息的嗎？

拉迪克：是的。

維省斯基：那是在接到托落茨基底信之前嗎？

拉迪克：是在接到托落茨基底信之後。托落茨基底信，我是在一九三二年二月或三月間接到的。

維省斯基：如果預審時的材料是可靠的，那末就是說，一九三二年春，你是到過日內瓦麽？

拉迪克：是的。

維省斯基：你在日內瓦是否和什麽人會晤過，並說到這種問題呢？

拉迪克：我在日內瓦，只與一個托落茨基份子會晤過，那就是羅木。他當時把托落茨基底信帶給我。

維省斯基：你知道其他暗殺團的活動嗎？

拉迪克：我知道在一九三四年，在傅略得梁特領導之下，成立了暗殺團。特列采爾底助手加也夫斯基會告訴我，說有一些謹慎的人組織了一個暗殺團，這個暗殺團現在並不活動，只做其他暗殺團一旦失敗時的後備。皮達可夫曾告訴我烏克蘭總部——他指出柯秋賓斯克，葛魯丙科，好像也有洛根諾夫——成立了暗殺團，企圖刺殺烏克蘭共產黨及蘇維埃政府的領導人。關于西伯利亞方面的暗殺團，皮達可夫曾告訴我，說牠正在組織中；他好像講出了摩拉洛夫的名字。

此外，他說一個暗殺團在土拉城已經成立了，或尙在成立中……

維省斯基：皮達可夫告訴了你姓名嗎？

拉迪克：他沒有告訴我領導者的姓名，但他告訴我那個暗殺團是與季鐵特夫有關係的。此外，關于白洛布羅多夫在頓河岸的洛斯托夫方面組織暗殺團的事實，我知道的非常晚，是在一九三五年。同樣，我也知道，木梯凡尼組織了暗殺團。一九三五年我知道了季諾維也夫的暗殺團，這就是查克斯．格拉得湟夫的暗殺團；我的助手梯月里在莫斯科與這暗殺團有聯繫。

（接着國家公訴人又向被告拉迪克發了許多問題，也是關于拉迪克與暗殺團的關係。從拉迪克底回答中，可以看出他既是總部一份子，他不僅知道暗殺團的存在，而且他自己直接領導着普里果任的暗殺團，該暗殺團担負有暗殺基羅夫的任務。）

維省斯基：該暗殺團是你組織的麼？

拉迪克：是普里果任組織的。

維省斯基：他是由你派去担任此事的人嗎？

拉迪克：他是我為組織暗殺團而找到的人。我曾告訴他：『總部底任務是要在列寧格拉城內成立暗殺團；你去挑選人材並進行一切，然後報告給我罷。』

維省斯基：是誰領導普里果任這種準備工作的呢？

拉迪克：就是我拉迪克。

維省斯基：你還和誰談過暗殺問題呢？

拉迪克：我和總部份子談過，我和他們時常會見，和他們須解決某些問題。

維省斯基：你可以指出那幾個人嗎？

拉迪克：我已經指出普列布拉任斯基。現在可以指出斯米爾加，我和他作過關于一般問題的談話。

維省斯基：是否與右派集團談過呢？

拉迪克：不言而喻的，我是和布哈林有聯繫的。

維省斯基：甚至於是不言而喻！你是否可以指出你和右派發生關係的具體事實呢？

拉迪克：我只和布哈林有聯繫。直到一九三三年，我才會見過湯姆斯基，那時候，他很激烈地說到黨內情形問題。

維省斯基：你和布哈林談到些什麼東西呢？

拉迪克：我們曾再三談及暗殺問題。關于這一點，我現在可以一一陳述。第一次談話是在一九三四年六月或七月間；那時布哈林已轉到新聞報編輯部做工作。當時，我們兩人是以兩個互有聯繫的總部之份子資格談話的。我問他：『你們已在進行暗殺行爲嗎？』他答道：『是的。』我問他由誰領導暗殺工作。他指出烏格南諾夫和他自己。在談話中，他對我說必須在大學院青年中培植幹部。技術問題以及其他具體問題，則非我們當時談話之對象。馬拉其科夫斯基在遇到布哈林時，曾以該事閞

布哈林，但布哈林回答他說，「待你被委派爲一切暗殺組織之總指揮時，我們卽將一切事情詳細告訴你。」

維省斯基：你們還有些什麼談話呢？

拉迪克：後來，我們又談到基羅夫被刺事件之政治結果問題。我們當時深信，基羅夫之被刺並沒有給予此暗殺事件組織者所期望的結果。沒有給予蘇聯共產黨中央黨部以打擊，沒有引起羣衆的同情，如托落茨基份子和季諾維也夫份子所期望的那樣。反之，全國民衆更加密切地團結在聯共中央黨部周圍，同時許多季諾維也夫份子與托落茨基份子被捕。那時我們就已經覺得：根據這一事件——單個暗殺策略的結果——的經驗，我們或者是應當完全停止暗殺行動，或者就必須更進一步，進行集團的暗殺。

布哈林對我說，在他們的總部內，許多人都認爲，如果因刺殺基羅夫而未發生期望的結果就根本停止暗殺工作，那便是輕浮從事，那便是意志薄弱。反之，應該從隨便亂幹的暗殺，進而實行有計劃的、考慮周到的、認眞的、有系統的暗殺。關于這個問題，我于一九三五年七月，無論和布哈林，無論和皮達可夫，以及索考里尼可夫都談過話。

維省斯基：你當時是贊成那一種暗殺鬬爭的方式，是第一種，還是第二種呢？

拉迪克：我原來是主張舊的方式的；後來我才覺悟到這鬬爭根本就是隨便亂幹的鬬爭。後來我便主張

進行有計劃的暗殺鬬爭。

維省斯基：你決定必須採取集團暗殺方式時，你採取了些什麼步驟，以便組織這鬬爭呢？

拉迪克：我採取了些步驟。一九三五年七月，我起初向皮達可夫，後來又向索考里尼可夫發問題：我們究竟是繼續鬬爭，還是取消這個鬬爭呢？

維省斯基：他們怎樣回答呢？

拉迪克：他們回答說：『我們要繼續鬬爭。』暗殺一事向來沒有人負責指揮；因此我們當時便決定了不讓這樣的現象繼續下去。於是我們決定把特列釆爾叫來，因為我們認為在馬拉其科夫斯基被捕之後，他是最適宜于領導暗殺事件的人；同時，我們便決定與他討論他所要做的事情，並共同製定一個計劃。

維省斯基：由此可見，你事前就想把暗殺團的領導統一起來，是這樣麼？

拉迪克：是。

維省斯基：派定誰做此領導人呢？

拉迪克：派定特列釆爾。

維省斯基：你與他有聯繫麼？

拉迪克：我特地寫了一封信給特列釆爾，我不能親身到克里沃洛格城去會他。幾個月過去了，還沒有接

到特列采爾的回信；接着又發生了新的事情，卽托落茨基十二月的訓令，他把一切問題都全盤托出。這一次的問題已經不是關于計劃而已經是廣泛得多的問題了。

維省斯基：這是那一年的事？

拉迪克：這是一九三五年的事。我當時又寫信給特列采爾，措詞極嚴厲，說：『二月末，三月初，你一定要到此，』於是他囘信來說：「我就來。」

維省斯基：當你查明你們的力量與找特列采爾之時，所有這些暗殺團是否繼續存在並活動呢？

拉迪克：所有這些暗殺團都是繼續存在，繼續活動。

維省斯基：被告拉迪克！請你把你與托落茨基關於所謂外交問題的通信的內容告知法庭罷。

拉迪克：我收到有三封托落茨基的信，一封是一九三四年四月的，一封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的，一封是一九三六年一月的。在一九三四年的信內，托落茨基說：德國法西斯主義之上台執政，根本改變全世界的形勢。這就是說，戰爭是會在最近時期內爆發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況且同時遠東的局面，亦緊張起來。托落茨基深信這種戰爭會使蘇聯失敗。他寫道，這種失敗是爲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上台執政造成實在的環境，因此，照他的意見，這衝突之尖銳化，是於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有利的。托落茨基在這封信內指出他已與遠東某國及中歐某國建立了合作的關係，他已向這些國家當局公開說過，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是站在與這些國家妥協的立場

上，並且決意在經濟方面和領土方面作很大的讓步。他在信上要求我們在莫斯科利用機會向這些國家的代表證明我們實同意他的這種步驟。我隨即把此信內容告訴皮達可夫。不久，索考里尼可夫特來眞理報編輯部找我，告訴我關于他與某先生談話的內容。索考里尼可夫說：「當時，我在人民委員會外交部進行正式談判。話談完了，翻譯與祕書都走開了。一個外國的正式代表某先生忽然到了我跟前，向我問道：「你是否知道托洛茨基向敝國政府所作的提議？」我（索考里尼可夫）回答說：我知道，這是鄭重的提議與建議；而我和我的同道者都是贊同這些提議和建議的。』索考里尼可夫又說，加米業夫以前曾預告他，說會有外國代表來找他和我。

羅木於五月間出國，我便托他帶了一封信給托洛茨基，信內告訴他，已接到了他的指示信，並說我們彼此間已商妥我們這裏的步驟，不外乎證明他有與外國談判的全權。此外，在這封信中我又補說道：不僅我們大家以總部正式名義，而且我個人也贊同他力圖與外國發生聯絡的活動。

維省斯基：這是一九三四年五月間的事麽？

拉迪克：這是一九三四年五月間的事。一九三四年秋，在一次招待外賓的宴會上，我所認識的一中歐國的代表，特地坐在我身旁，並開始與我談話，他說：『我們的領袖（他說得更具體）知道托洛茨基先生想與德國接近。我們的領袖便問，托落茨基先生這種計劃究竟有什麽意義呢？或許這不過是亡命異國者，在睡不成眠時的打算罷？是否有人在他背後擁護他這種計劃呢？』

這顯然是向我問及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對這問題的態度。我就向他說，蘇聯的實際政治家是了解德蘇兩國親善之意義並甘願實行爲這種親善所必需的讓步。這個代表立刻就懂得，我既然說到蘇聯的實際的政治家，那就是說，在蘇聯是有實際的政治家以及不實際的政治家；不實際的政治家是指蘇聯政府而言，而實際的政治家，便是指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而言了。我給他的回答，意思是很明白的，就是：如果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上台執政，那末牠必實行讓步以便與他的政府以及他的政府所代表之國家親善。當我這樣回答時，我是知道我這種行爲，是蘇聯公民所不容許做的事情。

維省斯基：這都與第一封信有關麼？

拉迪克：這是第一封信的結果，但不是這封信唯一的結果。

維省斯基：一九三四年四月與十一月間你與總部其他人員曾談到與此信有關的問題麼？

拉迪克：我把這一點告知過皮達可夫，索考里尼可夫，舍列布略可夫。

維省斯基：你并且也把托落茨基此信本來的內容說給他們聽了麼？

拉迪克：我把托落茨基此信整個內容都完全精確地說給他們聽了。

維省斯基：在信裏寫着些什麼問題呢？

拉迪克：德國法西斯主義之勝利，日本侵略之加强，這些國家反蘇聯戰爭之必不可免，蘇聯戰敗之必不

可免，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爲要上臺執政就有實行讓步之必要。

維省斯基：那就是說，你們是希望趕快爆發戰爭，希望蘇聯在這次戰爭中遭受失敗麼？托落茨基信內如何寫着呢？

拉迪克：失敗是必不可免的，蘇聯的失敗，便造成我們上臺執政的環境，因此我們希望使戰爭趕快爆發。結論是：我們希望蘇聯遭受失敗。

維省斯基：你當時是贊成蘇聯失敗，還是贊成蘇聯勝利呢？

拉迪克：我在這幾年來的一切行動，都證明我是力謀使蘇聯失敗的。

維省斯基：你的一切行動都是自覺的麼？

拉迪克：我生平除了做夢以外，從來沒有做過不自覺的事情（聽衆發笑。）

維省斯基：而這可惜並不是一個夢麼？

拉迪克：可惜這不是一個夢。

維省斯基：而是醒中的眞情麼？

拉迪克：這是令人悲痛的事實。

維省斯基：這是令你們悲痛的事實。你和總部份子談過使蘇聯失敗的問題麼？

拉迪克：我們採納了這種主張以謀實現。

維省斯基：你個人以及你的同謀者對于實現這個指示，究竟在實際上做了些什麼事情？

拉迪克：我們當然是行動了的。

維省斯基（問皮達可夫）你承認你是知道托落茨基寫給拉迪克的信麼？

皮達可夫：我昨日就已供認說，這是完全合乎事實的。

維省斯基（問索考里尼可夫）我對你發同樣的問題。

索考里尼可夫：我也知道這封信。

維省斯基：你也贊成了這種立場麼？

索考里尼可夫：是的。

維省斯基（問舍列布略可夫）你也是贊成了這種使蘇聯失敗的立場麼？

舍列布略可夫：我沒有反對過。

維省斯基（向拉迪克說）你說還有第二封信——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的信。你把該信內容敍述出來吧！

拉迪克：在此以前，托落茨基在那裏，以及我們在這裏，在莫斯科，所說的，還是關于在蘇維埃國家基礎上實行經濟上的退却。而在這一封信內，便已提出根本上的變更。因爲第一，托落茨基認爲戰敗的結果，就不免要割讓土地，並且具體指定割讓烏克蘭。第二，就是關于瓜分蘇聯。第三，他從經濟方面看

來，預先看到戰敗結果，必須不僅把對資本主義國家有重要意義的工業企業租讓給外國資本，而且必須把凡資本主義國家所指定的重要經濟對象，賣給外國資本作爲私有。托落茨基預料必將要發行公債，即容許外國資本經營那些將來在形式上尙留在蘇聯國家手裏的工廠。

在農村政策方面，他完全明顯地說，必須把集體農莊解散，並主張把曳引機及其他農業機器交給個別農民，以便恢復新的富農階層。末了，他完全公開地說，必須在城市裏恢復私人資本，顯而易見的，這是說要恢復資本主義。

在政治方面，這封信關于政權問題是有新的提法。托落茨基在信內說：任何民主都是談不到的。工人階級在革命以後已過了十八年的生活，他們的口胃是極大的；而這種工人，將來一部份必須交還給私人工廠做工，一部份則應在國有工廠裏做工，而這些國有工廠，在那時候將與外國資本家發生極劇烈的競爭。這就是說，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將突然惡化。在農村中，貧農中農與富農的鬬爭將重新發生。那時候，要支持下去，就要有强固的政權。至于這一政權將採取何種形式來掩飾，那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如果你想在歷史上找個類似的例子，那末就用拿破崙第一的政權來做類似的例子，並仔細思索這個例子罷。拿破崙第一之執政，還不是恢復舊制度（到後來才恢復舊制度，）而是企圖保持革命的主要勝利品，即是保持革命中所能保持的東西。這一點乃是他在這信封上所提出的新東西。他計劃到將來局面（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只有憑靠這種局

面才能上台執政）的主人翁是法西斯主義是德國法西斯主義與別一國的——遠東的——軍閥法西斯主義。

而在實際行動的結論方面之新的地方，就是要特別把這種暗害活動與那幫助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份子抓得政權的勢力（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只有在這些勢力幫助之下才能抓得政權，）協商妥當。

在這封指示信裏，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認爲：只要我們想支持下去——那我們就必須使蘇聯的社會制度適合於法西斯的戰勝國的制度。這個所謂『適合』便是資本主義復辟的別名，而這也就是在我們接到這封指示信時，立刻覺得是異常刺眼的新東西。

維省斯基：這樣，如果把此信內容簡括起來，那它的基本點究竟是什麼呢？

拉迪克：那就是說，我們仍舊保持着一九三四年的立場，認爲蘇聯失敗是必不可免的。

維省斯基：由這裏得出什麼結論呢？

拉迪克：由這一個必不可免的失敗中所應得出的結論，就是他已把資本主義復辟問題，公開提在我們面前了。

維省斯基：這就是說，你們是把這資本主義的復辟，卽托落茨基之所謂使蘇聯社會制度適合於資本義國家的社會制度，看作你們與外國協定之必不可免的結果麼？

拉迪克：乃是蘇聯失敗必不可免的結果，乃是這一失敗之社會影響，以及以造成這失敗為基礎的協定之必不可免的結果。

維省斯基：其次呢？

拉迪克：當時在我們看來最新的東西，是第三個條件，即用他之所謂拿破崙式的政權來代替蘇維埃政權。我們當時看得很清楚，建立所謂拿破崙式的政權，就等於建立沒有我們自己的財政資本、而專替外國財政資本服務的法西斯制度。

維省斯基：第四個條件呢？

拉迪克：第四個條件就是瓜分國家領土。把烏克蘭割給德國，把濱海省及黑龍江沿岸一帶割讓給日本。

維省斯基：當時是否還說到其他的經濟讓步呢？

拉迪克：是的，我上面所說的那些決定，後來更具體化了。我們預定要償付賠款，即在許多年內繳納糧食、原料及脂油給戰勝國。其次，就是保證戰勝國在蘇聯進口方面獲得一定的份額——起初他並沒有指出數目字，後來他已說得比較具體了。所有這一切辦法，總合起來，就是使國家陷於完全奴化的地步。

維省斯基：有沒有談到庫頁島的煤油呢？

拉迪克：關于日本，我們說到，不僅要把庫頁島的煤油送給日本，而且要在日本向美國開戰時，將煤油供

給日本。同時又說到，絕對不要妨碍日本帝國主義侵佔中國。

維省斯基：關于多腦河流域諸國又怎樣呢？

拉迪克：關于多腦河流域諸國及巴爾幹半島諸國，托落茨基在自己的信內說，德國法西斯主義正謀侵略這些國家，我們對這種行動不應給以任何阻碍。這顯然是說，我們要斷絕蘇聯與捷克斯拉夫的一切關係，因爲這些關係足以保障捷克斯拉夫的安全。

維省斯基：在這信內有沒有關于必須擴大並加强暗害工作、恐怖暗殺，及軍事破壞工作的指示？

拉迪克：在這信內，這種工作是和整個綱領聯繫起來的；同時並特別指出這種工作乃是奪取政權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在說到戰爭問題時，曾特別說到托落茨基份子必須進行瓦解軍隊的工作。

維省斯基：沒有講到國防工業麼？

拉迪克：那是特別講到的。托落茨基份子在軍事工業中的軍事破壞工作，必須和那些我們將與之合作的國家方面共同商定，這就是說，必須和這些外國的總參謀部共同商定。

維省斯基（問皮達可夫）：被告皮達可夫，當你囑咐諾爾金於戰爭時放火焚燒克梅洛沃化學聯合廠時，你是不是根據所謂總方針出發的？

皮達可夫：我根據托落茨基關于「具體化」的指示出發。

維省斯基：你和索考里尼可夫的談話是在一九三五年你與托落茨基會面後，由柏林回來以後的事麼？

皮達可夫：是的。

維省斯基：這些要求是在你和托落茨基會面時共同決定的麼？

皮達可夫：那當然。

維省斯基（向拉迪克問）：關于鐵路運輸業談到沒有？

拉迪克：整個所謂具體化，都是關於戰爭的，運輸當然不能是例外。

維省斯基：被告舍列布略可夫！你記得不記得你和拉迪克關於托落茨基一九三五年的信的談話？

舍列布略可夫：記得。

維省斯基：拉迪克會否把你在運輸業方面的罪行和托落茨基的指示信聯繫起來呢？

舍列布略可夫：在我方面，這自然是有聯繫的。還在一九三四年間和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間的時候，當和那時担任人民委員會交通部副部長職務的利夫什茨交換意見時，我們就說過，在某個時期內，將會發生我們必須在運輸業方面加強暗害及軍事破壞工作的問題。

維省斯基：你和利夫什茨談過麼？

舍列布略可夫：是的，當時我們認爲，是有可能將最重要的鐵路樞紐，重要火車站，封閉起來以達到搗亂運輸業的目的。

維省斯基：關于軍事破壞工作之佈置又是怎樣呢？

舍列布略可夫：我們當時認爲必須加緊募集進行軍事破壞工作的幹部。

維省斯基：被告利夫什茨！關于這點，你有何話說呢？

利夫什茨：我完全證實這一點，我們當時的確談到應如何募集幹部，以便在戰時進行軍事破壞工作及暗害事件。

維省斯基：你那時既是人民委員會交通部副部長，而同時你又討論了如何在戰爭時破壞鐵路交通的問題麼？

利夫什茨：是的。我當時認爲，既然我們是爲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抓取政權而鬬爭，那是必須這樣辦的。

維省斯基：你曾和皮達可夫談及什麼呢？

利夫什茨：所談的就是關于托落茨基份子當時在鐵路上進行的工作，就是說，要阻礙政府改進鐵路工作命令之執行。

維省斯基：皮達可夫曾否給你直接指示和指令，要你在運輸業方面加緊暗害及軍事破壞工作呢？

利夫什茨：是給過的。

維省斯基：你接受了麼？

利夫什茨：是的。

維省斯基：你執行了麼？

利夫什茨：是的，我所能夠做到的，都執行了。

維省斯基：你進行了暗害工作麼？

利夫什茨：是的。

維省斯基：你阻擾了工作麼？

利夫什茨：是的。

（國家公訴人又轉而訊問被告拉迪克，以查明該被告對托落茨基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的信的態度和對于皮達可夫由托落茨基那裏帶來的指令的態度。）

維省斯基（問拉迪克）：托落茨基一九三五年的綱領底實質何在呢？

拉迪克：他在一九三五年所提出的問題，就是回到資本主義去。

維省斯基：到何種限度呢？

拉迪克：托落茨基所提出的是沒有限度的。對方要求多少就給多少。

維省斯基：這就是說，還是要使蘇聯失敗？

拉迪克：是的，此時，新的東西就是力謀蘇聯失敗的事情，已經與外國的指示聯繫起來了。

維省斯基：這就是說，此時，已經要和外國總參謀部直接協商，——而這是在此以前所沒有過的嗎？

拉迪克：這是以前所沒有的。

維省斯基：這件事，會逼着你去思量一番嗎？

拉迪克：不獨是這件事，而且，國內從前——一九三四年——的和以後的一般狀況，也會逼得我更加去思量一番。

維省斯基：皮達可夫曾否把他到沃斯洛去見托落茨基的事情告訴你呢？

拉迪克：皮達可夫的旅行是我們會商的結果。我們當時認為，我應當利用我接連三次收到的、往沃斯洛去向學生界做講演的邀請，若果皮達可夫當時不被差遣作公務旅行的話，那末，我既得到這個允許，就要到沃斯洛去作這一種講演，以便一定會見托落茨基。

維省斯基：那就是說，你當時是規定了出國旅行的計劃麼？

拉迪克：或者是我去，或者是皮達可夫去。

我們之間曾這樣決定，我們不能對托落茨基底指示負責。我們不能盲目式地領導人們走。我們決定要召集一次會議。皮達可夫於是就去見托落茨基。我不明白，為什麼皮達可夫在這裏沒有講到這一點，而這一點，可說是他和托落茨基談話中最重要的地方，這就是當他與托落茨基談話時，托落茨基說，若召集會議，那不是遭受失敗，便是發生分裂。皮達可夫回來後，便把他和托落茨基的談話告訴我們。那時我們就決定不管托落茨基之禁止，我們還是召集一次會議。這時候，我們大

家心裏都覺得：我們已走到盡頭了。

我們自接到指示後，會否停止自己的工作呢？沒有。工作的機輪仍然繼續輾動着。

維省斯基：結論是怎樣呢？

拉迪克：因此結論就是：在一九三五年的環境中恢復資本主義。僅僅是，單單是為着托落茨基底『好面孔，』蘇聯應當回到資本主義去。當我閱讀這些東西的時候，我覺得我簡直像坐在瘋人院中一樣。最後，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從前的問題是，我們之所以為政權而鬬爭，是因為我們相信能夠給國家保證些什麼東西，而現在我們之進行鬬爭，却為着使外國資本能在此地統治，而這外國資本等不到把政權交與我們，就早會把我們抓到手裏了。在托落茨基底指令中，說我們必須把我們的暗害工作與外國政府協商進行。這指令底意義何在呢？這指令底意義，對于我，對于一個政治組織家，是非常簡單、完全顯而易見的一回事；就是說，在我們的組織中，已有外強所委派來的代表，插足其間，我們的組織已成為外國偵探局底直接代辦機關。我們的行動已一絲一毫都不能自主了。

維省斯基：結果，你決定怎麼辦呢？

拉迪克：第一步，是要到蘇聯共產黨中央黨部去，寫一個聲明書，把所有的人都指出。可是我沒有這樣做。結果，不是我去找國家政治管理局，而是國家政治管理局跑來找我。

維省斯基：這是很漂亮的回答！

拉迪克：這是很悽慘的回答。

維省斯基：一九三四年，你是主張使蘇聯失敗麽？

拉迪克：我當時認爲失敗是必不可免的。

維省斯基：你曾否主張蘇聯失敗呢？

拉迪克：如果我能防止失敗，那我也許是要反對失敗的。

維省斯基：你認爲你是當時不能防止失敗嗎？

拉迪克：我曾認爲牠是必不可免的事實。

維省斯基：你對我的問題，回答的不對。一九三四年托落茨基給你的一切方針，你全都接受了嗎？

拉迪克：一九三四年，我接受了托落茨基底一切方針。

維省斯基：在那些方針中，有沒有力謀使蘇聯失敗的方針？

拉迪克：是的，有力謀使蘇聯失敗的方針。

維省斯基：你接受了嗎？

拉迪克：接受了。

維省斯基：這就是說，你既接受了牠，當然你也是主張蘇聯失敗的了？

拉迪克：從這一觀點…………

維省斯基：你是進行了使蘇聯趨于失敗的活動嗎？

拉迪克：是的，這是很明顯的。

維省斯基：那末就是說，你是主張使蘇聯失敗？

拉迪克：很明顯的，既然是如此，那就是說，我是進行了這樣的活動。

維省斯基：一九三四年，你認爲失敗是必不可免的。爲什麼必不可免呢？

拉迪克：我認爲蘇聯將不能自衞。

維省斯基：就是說，你認爲蘇聯軟弱無力嗎？

拉迪克：是的。

維省斯基：就是說，當時你的出發點是認爲國家軟弱無力嗎？

拉迪克：是的。

維省斯基：就是說，你根據着你所意料的所謂國家軟弱無力的前提，就接受了力謀使蘇聯失敗的方針。

拉迪克：既認爲是必不可免的，於是就接受了。

維省斯基：可是，一九三五年，你看到了國家是强有力的，看到這主張是不能奏效的嗎？

拉迪克：不是失敗不能奏效，而是失敗根本就不會有，我看到這是不實際的綱領，因此，我曾反對這以不實際的根基爲基礎的綱領。

維省斯基：因爲這是不實際的所以你反對。

拉迪克：關于別的動機，我不去說。

維省斯基：一九三五年你反對了失敗的主張，因爲你認爲牠是不實際的；對不對呢？

拉迪克：對的。

維省斯基：那末就是說，在一九三四年，你認爲牠是實際的，所以贊成；而在一九三五年，你認爲牠是不實際的，所以反對；是這樣麼？

拉迪克：是的。

維省斯基：你說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托落茨基在與皮達可夫談話中以及他的信中所提出的主張，乃是叛賣祖國的主張。

拉迪克：是的。

維省斯基：你承認你於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與某先生談話的事實，就是叛賣祖國嗎？

拉迪克：當我作這次談話時，我就已經覺悟到這是叛賣祖國，現在我對自己這次談話的估計，也還是與當時一樣。

維省斯基：認爲是叛賣祖國嗎？

拉迪克：是的。

維省斯基：你現在還是承認你自己的供詞，說你曾對某先生說：希望現政府實行一些讓步，乃是徒勞無功嗎？

拉迪克：這是我的供詞底意思。

維省斯基：你現在仍然承認你自己的這個口供確符合事實嗎？

拉迪克：是的。

維省斯基：同樣你也承認你的口供，說你曾說某國政府可以從蘇聯那些『實際政治家』方面得到讓步——確符合事實嗎？

拉迪克：是的。

維省斯基：你對某先生是否說過，你們的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甘願作這樣的讓步呢？

拉迪克：是的，我們是承認了托落茨基有進行關于此種讓步之具體內容的談判的全權。

維省斯基：我是問你，你曾以你們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名義，約許某先生以這些實際的讓步嗎？

拉迪克：是的。

維省斯基：這是叛賣祖國嗎？

拉迪克：是的。

維省斯基：在你被捕以後，曾問過你，你對黨和蘇維埃政權，是否犯了罪。你當時是怎樣回答的呢？

拉迪克：我曾回答說：沒有犯罪。

維省斯基：關于你與暗殺團其他參加者的聯繫問題，問過你沒有？你當時是怎樣回答的呢？

拉迪克：我當時是否認了的。

維省斯基：那是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的事麼？

拉迪克：是的。

維省斯基：將你和索考里尼可夫對質過嗎？

拉迪克：對質過。

維省斯基：索考里尼可夫把你揭穿了嗎？

拉迪克：是的。

維省斯基：你呢？

拉迪克：當時我從頭至尾都是否認的。

維省斯基：你否認了幾個月的工夫？

拉迪克：三個月左右。

維省斯基：有什麼可以證明，你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收到托落茨基底信後，以及與皮達可夫談話後，你

沒有接受你在此以前曾完全和無條件地接受過的方針呢？你有這類的事實可以證明嗎？

拉迪克：沒有。

維省斯基：我沒有別的問題了。

（審問至此，宣佈休息至下午六時。）

五·對證人羅木之訊問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晚庭

審判長：你的正式職務是什麼？

羅木：我曾任新聞報駐美通訊員。

維省斯基：你與被告拉迪克相識已有多久呢？

羅木：從一九二三年起。

維省斯基：你與拉迪克是因爲什麼事情而彼此發生聯繫的呢？

羅木：最初，我同他是在著作方面相識，而自一九二六年至二七年時期，我同他的聯繫就建築在共同的反黨的托落茨基工作上了。

維省斯基：你到過日內瓦嗎？

羅木：是的，我曾任「塔斯社」駐日內瓦與巴黎通訊員，駐日內瓦是從一九三〇至一九三四年。

維省斯基：我想知道你在日內瓦這一時期的情形。在日內瓦的時候，你曾與拉迪克會過面嗎？

羅木：是的，一九三二年春，當拉迪克到日內瓦的時候，我把不久以前在巴黎由謝多夫手中收到的托落茨基底信，交給了他。

維省斯基：請你講講：你是怎樣收到托落茨基底信的？你在這件事中受到什麽委托？你怎樣執行了這一委托的？

羅木：一九三一年夏，路過柏林時，遇見了普特納。普特納要我去同謝多夫會面。我與謝多夫會見了，他問我，如遇必要時，我是否願意担負與拉迪克的交通工作，我回答說同意，並把我在巴黎與日內瓦的通信處給了他。

起身赴日內瓦前數日，在巴黎由城市郵局收到一封信，信裏有謝多夫寫的一張小紙條，請我把這封信裝着的另一封信，轉給拉迪克。我就把這封信帶到日內瓦去。當與拉迪克會面時，我就交給他了。

維省斯基：拉迪克是當着你的面讀了這封信，或是背着你讀的？

羅木：他是當着我的面很快地讀了，接着就放進衣袋裏。

維省斯基：關于這封信的內容，拉迪克告訴你些什麼？

羅木：他告訴說：信裏是指令，指令裏談到與季諾維也夫份子的聯合，談到反對蘇聯共產黨領袖的鬪爭，首先是反對斯大林和沃羅希洛夫的鬥爭，應轉用暗殺手段。此後，拉迪克就起身赴莫斯科了，直至一九三二年秋，我沒有見他。

維省斯基：一九三二年秋，發生過什麼事情，你當時在什麼地方？

羅木：我當時是「塔斯社」駐日內瓦與巴黎通信員，因公事來到莫斯科，會到拉迪克，他通知我說，在執行托落茨基底指令中，托落茨基份子和季諾維也夫份子底聯合，已經組織成功，並且說他與皮達可夫沒有參加在這一總部裏。又說有組織後備總部或第二總部的意思，第二總部或後備總部中大多數要是托落茨基份子，準備于現總部萬一破壞時，可以後補。他說在這問題上，他要請求托落茨基底指示，並要由我帶信去。

維省斯基：信裏寫些什麼？你知道沒有？

羅木：知道，因爲信是交到我手裏的，然後，在一九三二年秋我起身回日內瓦前，又把牠放進一本德文書底封面裏。

維省斯基：這個任務是誰給你的？

羅木：拉迪克。赴日內瓦過柏林時，我從車站上把這本書用包裹寄出，寄到預定的地址，地址是謝多夫

我的。寄到柏林底一個郵局信箱，同時又發了一封信，說明在這本書內什麼地方放着那封信。

維省斯基：這封信謝多夫收到了？你知道嗎？

羅木：我相信是收到了，因爲在我與他第二次會面時，很明顯地看出他是收到信了。

維省基基：此後，你與謝多夫又會過面麼？

羅木：此後我與謝多夫的第二次會面在一九三三年七月。

維省斯基：你們重新會面之目的，會面地點，以及如何會面的呢？

羅木：地點是在巴黎。我從日內瓦到來，不多幾天以後，謝多夫給我打個電話，約我于蒙怕爾那斯大街咖啡館會面，謝多夫說，他想使我同托落茨基會面。過了幾天，他又給我打個電話，約在同一咖啡館相會。從那裏我們又到布樓大樹林去，樹林中會到了托落茨基。

維省斯基：這是在什麼時候？

羅木：在一九三三年七月底。

維省斯基：你這次與托落茨基會談了多久？

羅木：二十分——二十五分鐘的樣子。

維省斯基：托落茨基要同你會面，是爲的什麼？

羅木：據我所了解的說來，是爲着當面來肯定一下，我帶到莫斯科的信裏的那些指示。他的談話是從平

行總部問題開始的。他說，季諾維也夫份子佔多數的危險已經存在，如果托落茨基份子不表現出應有的積極性，則此危險就會增大。對于組織平行總部的主張，他是同意的，但同時一定要維持我們與季諾維也夫份子的聯合，這平行總部必須積極工作而不是不從事活動，必須團結一些最可靠的幹部。繼而轉到以下的問題，他說：在目前時期內，不僅是暗殺手段有重要意義，在工業中以及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實行暗害，也有同樣重要的意義。他說：在這問題上，顯然還有人表示動搖，但是應該了解，進行暗害工作時，人命的犧牲是不可免的，主要目的，是用許多暗害行動來破壞斯大林的五年計劃底威信，破壞新技術的威信，以及因此而破壞共產黨領導人底威信。托落茨基在着重指出要用盡最後的力量時，他引證了一句拉丁諺語說：『醫藥不爲功，則加以鐵刃，鐵刃不爲功，則必須火燒了。』我還記得，我當時心裏詫異，就向他問道：如果照他所說的做去，那就是破壞國家底國防能力，而同時，因希特勒之上台，現時戰爭之危險，特別是德國進犯蘇聯的危險，是異常緊張的。對這問題，我沒有得到他的詳細的答覆，但是從托落茨基底口氣中透出的意思是，正是戰爭危險底尖銳化，可以提出失敗主義問題。

接着，他給了我一本書——納維可夫・卜里波依底小說——『對馬島，』告訴我在封面裏有一封給拉迪克的信。我把這本書帶到了莫斯科，親自到拉迪克家裏當面交給他的。

維省斯基：這是在什麽時候？

羅木：這是一九三三年八月。

維省斯基：請你繼續講下去。

羅木：我把我與托落茨基的談話講給拉迪克聽了。他說大約在我休養囘來時，他可以把給托落茨基的囘信交給我。我休養囘來，從拉迪克處收到一封給托落茨基的信，要經謝多夫轉去。這封信又是那樣放在一本德文書的封面裏。

維省斯基：這是在什麼時候？

羅木：這是一九三三年九月底。這封信——應當說是裝着信的書，我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巴黎交給了謝多夫。我與謝多夫以後的一次會面是在一九三四年四月間，地點是巴黎。

維省斯基：爲着什麼事？

羅木：他給我打電話說要和我會面。我們在布樓大樹林中會面，我通知他說我不久要到美國去，因此我對于交通問題，將無法幫助他。他說這很可惜，接着，他旣知道我不久就要赴莫斯科，就托我向拉迪克代索一個關于工作情形以及各組織底活動的詳細報告。

維省斯基：你履行了這個委託麽？

羅木：是的，履行了。我把這一委托轉告了拉迪克，並于一九三四年五月，起程赴美前，他把信當面交給我，信仍是那樣放在書裏，據我記得，那是一本英俄技術詞典。據他說，信裏是聯合總部與平行總部關

于擴展政治工作及破壞工作的報告。』這封信，正確些說是裝信的書，我在巴黎交給了謝多夫。

維省斯基：這就是你所轉遞的一切信件嗎？

羅木：是的。一共由雙方轉遞了五封信。

維省斯基：你同謝多夫關于你被任赴美問題的談話，有怎樣的內容呢？

羅木：謝多夫對我說，因我被任赴美之故，托洛茨基要我替他做一件事，就是遇有蘇美兩國間發生什麼可注意的事件時，我應當報告給他。當我問爲什麼他這樣注意這個問題時，謝多夫回答說：『這是由托洛茨基之務使蘇聯失敗的方針出發的。因爲德日攻蘇的戰爭爆發日期，在某種程度內，要以蘇美關係如何爲轉移。因此，這不能不引起托洛茨基底注意。』

維省斯基：換句話說，你經由謝多夫而收到一個委托，要你根據托洛茨基底方針，按托洛茨基底路線把蘇美關係報告給他？

羅木：是的，根據他底使蘇聯失敗的立塲。

維省斯基：這就是說，你做新聞報底通信員時，是兼任了托洛茨基底特派通信員，是不是呢？

羅木：是的。我是同意了把一切爲托洛茨基所注意的消息，報告給托洛茨基。

六・對被告索考里尼可夫之審訊

維省斯基：被告索考里尼可夫！請你說一說你與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合暗殺總部的關係。

索考里尼可夫（以下簡稱索考——譯者）：我曾知道聯合總部的成份，知道他們暗殺的方針，知道還在一九三二年秋天，聯合總部就已經決定準備暗殺斯大林和基羅夫。我曾知道，巴卡也夫是被委託集中所有與聯合總部各暗殺團的聯繫；我曾知道，所有莫斯科的暗殺團都是由拉因果里特所統率的。

維省斯基：你是在什麼時候和皮達可夫、拉迪克討論過關于你們平行總部的實際工作問題？

索考：我在平行總部的工作，是一九三五年夏天開始的。在此以前，我的工作只是限于執行關于和某一國的外交代表進行談判的委託。

維省斯基：在什麼時候，你和這某一外國的代表進行了談話呢？

索考：這是一九三四年四月中旬。

維省斯基：在一九三四年，你是否曾經和什麼人進行過關于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的使蘇聯失敗方針的談話呢？

索考：一九三四年初，我曾與加米業夫作過談話，在這個談話中，加米業夫告訴我關于托落茨基和他加米業夫本人的使蘇聯失敗的觀點。從這個談話中所得到的具體結論之一，就是加米業夫預先告訴我說，會有人來訪問我。

維省斯基：誰會來訪問你呢？

索考：某一國的外交代表。

維省斯基：加米業夫是否對你說過，因爲什麽問題會有人來訪問你？

索考：是的，他對我說過。來訪問我的人，是要我來證明托落茨基在國外所進行的談判，並不是他一個人的意思，而眞正是代表一個組織，而托落茨基正是這一個組織的代表。

維省斯基：後來果然有人來向你提這樣的問題嗎？

索考：是的，這是在四月中旬，在與某一國代表作正式談話以後（我因爲職務的關係，時常與這個代表會見，）我們的談話是在這個正式談話以後，當翻譯員已到別的房間去的時候進行的。當我送這個代表出門的時候，他問道：我是否知道托落茨基曾向他的政府提出了幾個提議。我當時便證明說：這個我完全知道。其次，他又問道：這些提議是否是鄭重的提議。我又證明說：這是鄭重的提議。他問：我的說話，是否只是我個人的意見。我說，這不僅是我的意見，而且是我的朋友們共同的意見。

我當時完全明白這個代表的問題：該國政府確已得到了托落茨基的提議：設法證明托落茨

基對該國政府曾經提出之各種提議，的確是我們整個組織所知道的，而且托落茨基的確是有全權進行這樣的談判。

維省斯基：你當時是担任什麼正式職務呢？

索考：我當時是担任人民委員會外交部副部長。

維省斯基：你曾經把你與這外國代表的談話的內容告訴他人麼？

索考：大約經過一月以後，我就已經把這個談話的消息，告訴了拉迪克，後來又告訴皮達可夫。一九三五年七月拉迪克告訴我，說托落茨基對我表示不滿，因爲他認爲我執行這個委託的時候，只是形式上的，就是說我僅只是證明了托落茨基進行談判的全權，而並沒有在實質上證明托落茨基底提議，沒有擁護這些提議，沒有將這些提議來實行鼓動。

一九三五年夏天，在季諾維也夫份子以及一部份托落茨基份子被捕以後幾個月的時候，我便知道我已被指定充任平行總部的一員，我當時認爲，我自己應當和總部其他份子發生聯繫。首先我並不是與皮達可夫接洽，而是大約在此三個星期或一個月以前，與拉迪克會面。我當時和拉迪克所討論的問題是關于如何執行暗殺的方針，如何組織這個暗殺的事宜。然後我們又討論了一切綱領性質的問題。

維省斯基：究竟是那些問題，請你舉幾個例。

索考：這些綱領的問題，是與國際形勢的變化有關。我在此地應補說的，就是我曾知道聯合總部份子與右派所進行的談判。

維省斯基：是與右派中那一些人，請具體說。

索考：我知道，加米業夫曾和布哈林及李可夫進行了談判，而季諾維也夫以及其他一個人（現在記不清楚）曾與湯姆斯基及烏格南諾夫進行了談判。

他們在這些談判中，完全證實雙方關于一切基本的綱領問題，彼此都是一致；雙方的策略方針，彼此都是一致。例如，右派也是採用暗殺手段的鬬爭方法的。但是，右派並沒有加入我們的聯盟。他們說他們同意我們的一切，但同時，他們却想保存自己單獨的組織，保存自己的總部，而只是想與聯合總部保持聯繫。

至于談到綱領的方針，那麼還在一九三二年時，托落茨基份子，季諾維也夫份子，以及右派份子，就已在大體上一致同意以前的右派綱領，即所謂留金綱領。這個綱領，大部分正是表現了這三個集團在一九三二年就已共同抱定了的綱領方針。至于講到這一綱領之以後的發揮，那麼，總部領導份子曾認爲我國革命，既處于孤立的地位，便不能以社會主義革命的姿態維持下去；並認爲托洛茨基的超帝國主義論，以及與此同源的布哈林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原來是正確的。我們當時認爲，法西斯主義，乃是最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牠正獲得勝利，征服歐洲，並扼住我國的咽喉。因此，

最好是同牠妥協，最好是向牠實行某種讓步，就是說要從社會主義退到資本主義……

維省斯基：在皮達可夫由國外回來以後，你是否與他談過話？

索考：是的，我同他談過話，這是一九三六年正月。皮達可夫當時告訴我，說托落茨基已與格斯進行過談判。在這個談判中，格斯以全權代表資格，提出了各種要求，這些要求，不僅與德國利益有關，而且與其他某一國利益有關。皮達可夫轉告我，說據他的了解，托落茨基的意思，是說他已進行過關于許多問題的談判，而且關于這些問題，雙方已得到相當的協定。自然，他們預定這個協定草案，並會提到官場中去，而不使其成爲僅僅他們兩人個人的協定。當時，無論是皮達可夫或者我，知道這個協定這樣廣泛而完備的內容以後，當然是不免發生動搖。這裏，連各種各樣的壞東西，都湊成一團了；雖然這說來是令人痛心的。我們當然懂得，問題並不在于我們主觀的願望之好壞，我們當時既然是以政治家的眼光來觀察問題，我們就應當解決政治性質的問題。如果我們竟變爲德國法西斯主義的附庸，而德國法西斯主義利用了我們之後將把我們當作破布一樣拋棄我們，那我們就處于必歸滅亡的境遇，暴露自己卑鄙萬分，一文不值的面目。

維省斯基：難道曾經想過：你們除了被法西斯蒂利用並將被他們像破布一樣拋棄以外，還會有其他的命運嗎？

索考：當然，如果我們曾經只是指望這樣的結局，那我們當時就應當取消我們的托落茨基——季諾維

也夫聯盟了。

維省斯基：你們曾經指望你們能夠保持某種獨立性嗎？

索考：我現在是從當時的觀點說話的。當時我們認爲我們還有某些希望。究竟我們所指望的是什麼呢？我們指望的就是國際矛盾的表演。我們當時認爲，比方說，德國法西斯主義要想在蘇聯建立完全的統治，是不可能的，因爲他會遇到其他帝國主義競爭者的反對；因此，就會發生某些國際的衝突，因此，我們可以憑藉其他不願使法西斯主義趨于鞏固的勢力。

我們當時認爲，在我們國內，我們能夠憑藉某些階層，不過我應當說，我們當時知道，在我們自己的綱領中，我們必須主張恢復資本主義制度，提出資本主義的綱領。因爲只有在那時候，我們才能憑藉國內某些階層……

維省斯基：請你具體說，你們在國內所指望倚靠的，究竟是那些社會力量？是工人階級嗎？

索考：不是。

維省斯基：是集體農民嗎？

索考：當然不是。

維省斯基：究竟是誰呢？

索考：老實說，我們所指望的是農民資產階級的份子！……

維省斯基：是指望依靠富農，富農的小小殘餘嗎？

索考：正是如此。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的方針，正是要使這些小小富農殘餘，能夠擴大。當然，我重說一句，我們勾結法西斯主義，以圖實現取得政權的政綱，本來就是要在蘇聯造成極大的社會關係的變動，並造成擁護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政府的勢力。

維省斯基：究竟是向那一方面的變動呢？

索考：是向恢復資本主義方面的變動。凡屬希望恢復資本主義和同情這種方針的份子，自然會滿意于這種政策，並擁護我們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可是我要說明，這個前途，是比乾脆變爲德國法西斯主義附庸的前途好不了多少。可是，這個前途，是要想使我們的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能夠在國內維持政權，當然，又是要在各階級中間運用手腕，以依靠甲種勢力反對乙種勢力。

維省斯基：總括說，究竟你們當時認爲取得政權的道路，是要經過那些階段呢？

索考：我們取得政權的道路，是要逐漸恢復資本主義成份，這些成份，將排擠社會主義成份，並在某種範圍內取而代之。

維省斯基：那麼關于侵略國呢？

索考：我們是主張與他們妥協，以便在戰爭過程中以及在蘇聯戰敗後，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

之政府能夠上臺執政。

維省斯基：那麼，我在公訴書中所說：『平行總部所抱定之主要任務，即爲藉暴力推翻蘇維埃政府，以期改變蘇聯現存之社會及國家制度……』——這種說法，是否正確呢？

索考：是正確的。

維省斯基：其次，我在公訴書中說『托落茨基以及遵照托落茨基指示而行動之托落茨基平行總部，曾力圖憑藉外國助力以奪取政權，以謀達到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關係之目的』——這種說法，是否正確呢？

索考：是正確的。

維省斯基：你已經說過，你們當時認爲必須憑藉國內居民中某些社會階層；你說富農就是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之支柱。這種說法，是否正確呢？

索考：是的，我所說的正是這種勢力，這勢力因爲從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之政府方面獲得一定的利益，當然是非常願意保持這個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底政權。

維省斯基：除此以外，你們還曾經指望那些份子呢？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在自己鬭爭中所指望的，只限于本身力量，或者還指望到糾合國內其他的反蘇維埃的份子呢？

索考：當然是如此，這正是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所規定的經濟政策中之必然的結果。自然而

然的，既然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是主張給外國資本以許多租讓，並主張把個別工廠租給外國資本家經營，並計算到——至少是在第一個時期——要解散一部分集體農莊，那麼，很明顯的，這不僅僅會造成直接的大資本主義份子，而且會形成小資本主義的階級，小商人，小資產階級，這些小資產階級，很願意保持這種統治，並幫助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

維省斯基：你們的社會經濟計劃既然如此，那麼，你們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對于工業化政策的態度，又是怎樣呢？

索考：我們是反對工業化政策的。我們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認爲工業化的政策必須退縮，一部分的企業必須交給承租的資本家。

維省斯基：那麼，這就是說你們是想拒絕工業化政策嗎？

索考：正是。

維省斯基：那麼，關于集體化政策呢？

索考：我們曾打算要撤棄現時的集體化政策，取消這個政策。

維省斯基：這是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所規定的社會經濟設施之一嗎？

索考：我覺得，關于這一點我已說了。這是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之社會經濟計劃的一部分。因此，我們也認爲我們必須撤棄直接建設無階級社會的方針。

維省斯基：那麼，就是要恢復社會中的階級對立形勢嗎？

索考：恢復資本主義，這本來也就是恢復階級對立形勢。

維省斯基：那麼，現在我們且把問題弄得完全明白罷：你是認爲所有這些設施的總合便是資本主義復辟的綱領麼？

索考：這是從右派的綱領中所必然和一定要得出的結論，簡單說來，所謂右派的綱領，正是向後退却，或資本主義復辟的綱領。

維省斯基：你是否和道，你們托落茨基的組織吸收托落茨基組織以外的反蘇維埃的份子來參加你們的托落茨基反蘇維埃的罪行呢？

索考：皮達可夫曾告訴我說，托落茨基在關于加緊暗害工作的指令中，曾經指出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底暗害工作團應與其他反革命團體發生聯繫。

維省斯基：究竟與那些團體發生聯繫呢？

索考：我知道得不很詳細。不過我知道是和其他進行同樣暗害工作的反革命團體發生聯繫。在指令上曾經指出，必須要在專門家中間找得以前的暗害的組織。

維省斯基：是不是就是要在以前曾在工業黨活動時期，及沙哈亭案時期活動過的暗害份子中找到這樣的組織呢？

索考：正是。

審判長：被告索考里尼可夫，請你說，在一九三五到一九三六年這時期中，你們究竟是與那些暗殺團有過聯繫？

索考：在一九三五年，提月里曾跑來見我，並告訴我說，他和查克斯·格拉得涅夫的暗殺團有關係。提月里請我給他關于這個暗殺團今後活動的指示。

審判長：這個暗殺團曾準備暗殺何人呢？

索考：提月里當時對我說，他們的任務是要準備暗殺斯大林。

審判長：既然這樣，那麼，查克斯·格拉得涅夫暗殺團既然曾向你請教，是否可以說這個暗殺團是在你直接領導之下進行工作呢？

索考：我並沒有指導該暗殺團的行動工作，我只是直接批准了該暗殺團應繼續進行工作的意見。

審判長：你曾有多少次，並在什麼時候與查克斯·格拉得涅夫暗殺團的代表作過談話呢？

索考：是在一九三六年初，一九三六年春。

審判長：那麼，這就是說，在一九三六年春天，當你『動搖不定』的時期，你還與準備向斯大林同志施行暗殺的那個暗殺團的活動有直接關係嗎？

索考：我是與提月里有直接聯繫，而提月里又與查克斯·格拉得涅夫暗殺團有直接聯繫。至于提月里

是否是這個暗殺團的團員，我可不知道。

審判長：你是否曾經知道在一九三四年準備刺殺基羅夫同志的事實呢？你是否曾經知道，曾準備並實行刺殺了基羅夫同志的那個暗殺總部的份子呢？

索考：在一九三四年秋，或一九三四年夏末，——現在記不清楚了——我知道在列寧格拉方面是準備着刺殺基羅夫，至于究竟由誰來實行這個暗殺，我當時却沒有知道。關于這件事情的詳細情形，並沒有人告知我。可是在一九三二年時，我聞知了列寧格拉總部的成份。

審判長：你曾經供認說：你曾經知道在列寧格拉有暗殺總部的存在，並且知道在這個總部中間有勒溫、考托倫諾夫、曼得里斯坦，及其他等人參加。你承認你自己的口供是合乎事實嗎？

索考：是的，我承認我自己的這個口供是合乎事實。的確在一九三二年的時候，我已知道這點。

審判長：你是否曾經知道，直接領導刺殺基羅夫同志的準備工作的人，正是巴卡也夫呢？

索考：關于這一點，並沒有人直接對我說過，可是我曾經知道巴卡也夫是被委託來領導這個暗殺的準備工作的。

審判長：你與拉因果里特的暗殺活動有多少關係呢？

索考：拉因果里特曾領導莫斯科方面的各暗殺團。我雖與他再三見面，可是他關于自己的工作完全沒有對我說過。關于他所担任的工作，我是從加米業夫口中聽到的。

審判長：拉因果里特與你的關係，豈不是比他與加米業夫的關係更密切嗎？

索考：可是他並未曾把他自己的活動告訴我。

七·對被告舍列布略可夫之審訊

維省斯基：請你說說，什麼時候你重新恢復了自己的反蘇聯的罪惡活動的？

舍列布略可夫（以下簡稱舍列——譯者）：一九三二年秋。馬拉其科夫斯基到我這裏來，告訴我說，建立了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指出參加這個總部的人名，而且當時就告訴我說，該總部決定組織後備總部，以備該總部被破獲時之用。

維省斯基：你對於這個主張採取了什麼態度呢？

舍列：這對于我並不是什麼意外的事情。我雖然離開了托落茨基反革命的活動，並且於一九二九年我曾遞交悔過申明書，然而我仍舊保留有反革命的情緒。

維省斯基：一九二九年你遞交悔過申明書，你實際上仍舊還是一個托落茨基份子嗎？

舍列：是的，在心中我依然是一個托落茨基份子……一九三三年秋，我在加格萊遇到皮達可夫，當時他對我說：應當積極參加托落茨基組織的工作。他在工業中進行暗害工作，他準備在運輸業中也開

展暗害工作。我本是老運輸業工作者，我保存有這一方面的聯繫；我沒有反對皮達可夫底主張，於是就担負了這一部分工作。除此以外，我還担任經過木梯凡尼而與格魯吉亞的托落茨基份子發生聯繫並領導其工作。

在一九三四年，或者也許在一九三三年末，我到莫斯科後，到了人民委員會交通部，在那裏看見了阿爾諾里多夫。我於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知道他的。他表示决意在運輸方面担任實行和領導暗害工作。我與他就在那裏規定了這種暗害工作底綱領。我與他提出了完全明白而具體的任務：就是破壞運輸工作，減少每晝夜之裝載量，其方法就是增加往來空車之數量，不增加車箱車頭之原來就太低的駛行速度標準，不完全利用車頭底曳引力以及其他等等。在一九三四年，依照皮達可夫底委託，利夫什茨到道路運輸中央管理局我這裏來，利夫什茨當時是南方鉄路局局長。我告訴了他我與阿爾諾里多夫所談的一番話。他告訴我說，他在南路上有自己的副局長趙林，趙林能夠進行這個工作。在一九三四年，我還吸引了托姆斯克鉄路局局長米洛諾夫來在鉄路運輸上進行暗害工作。米洛諾夫乃是我于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在人民委員會交通部中認識的。他也同意參加暗害工作。一九三四年，我得到消息，說在人民委員會交通部工作的富夫倫斯基以及莫斯科——頓巴斯鐵路局的副局長葉姆沙諾夫也被吸收來做暗害工作，同時還有克尼亞節夫也是組織中的一份子。

一九三五年，當卡岡諾維赤來掌管交通時，我害怕我們的團體有被破獲的可能，阿爾諾里多夫安慰我說，在運輸業中，暗害工作，用這一種『工作標準額』掩飾得好，這種『工作標準額的限度』在運輸業中已為大家所公認。結果，『工作標準額的限度』雖然已被大家所公認，然而卡岡諾維赤却揭破了所有這一切。阿爾諾里多夫不僅本人進行了這個工作，並且還得到『工作標準額限度』理論家底幫助，而且在這些理論家當中，不僅只有托落茨基組織底份子。他是與他們有聯繫的，不過他沒有把他們的名字告訴我。

卡岡諾維赤揭破了『限度論者』以後，把阿爾諾里多夫撤了職。當時阿爾諾里多夫說，利夫什茨要做人民委員會交通部副部長，並提議把運輸業中的一切聯繫轉交於利夫什茨。

運輸業中暗害工作的情形，簡單說來，就是如此。

一九三四年木梯凡尼來到莫斯科，並表示願意與我及皮達可夫見面。有一天，工作的日子，辦公完結之後，我們就到特維爾斯加亞街，在郵電總局對面一家小飯館裏，進行談話。木梯凡尼告訴我說，工作正在開展着，當地總部的人選已經擬定，並請我們加以批准。當地總部中有三個人，即木梯凡尼、卡夫塔拉捷以及米沙·沃庫查瓦，我們是知道的，還有兩個人，即企赫拉捷和基克納捷·尼科，無論我或皮達可夫都是不知道的。木梯凡尼極力介紹這兩個人，說他們都是老托落茨基份子而且是很勇敢的人，並請我們加以信任。我們並沒有表示反對，這樣我們就批准了當地總部。

當時有人提出暗殺伯里亞的問題，然而我和皮達可夫不贊成這種事情，我們認爲實行暗殺伯里亞，這可以破壞實行暗殺斯大林的事情。我們向他提議：如果有力量的話，就請擔任準備暗殺斯大林，同時也不要中止準備暗殺伯里亞。

維省斯基：不中止嗎？

舍列：不中止。暗殺伯里亞的事件，我們認爲無論如何不應在實行暗殺斯大林以前舉行。

維省斯基：這樣看來，木梯凡尼是提議實現一個暗殺事件，而你們却提議實行兩個暗殺事件；我的這種瞭解是否對呢？

舍列：是的。一九三五年，我又與皮達可夫會面，認爲還要準備一個暗殺事件，卽暗殺葉若夫。我們會給木梯凡尼一種指示，叫他設法與阿美尼亞共和國的大石拿克黨份子，阿則倍疆共和國的摩沙瓦梯黨份子，以及喬治亞共和國的孟塞維克黨實行聯合。㊀

維省斯基：他們在執行你們這個決定時，究竟做了一些什麼具體工作呢？

舍列：一九三五年末，木梯凡尼告訴我說他與大石拿克份子及摩沙瓦梯份子只是有了聯繫，而與孟塞維克份子却已訂了協約。他與孟塞維克所訂立之協約，是以在南高加索一帶一切優權給予喬治

㊀：「大石拿克黨」是阿美尼亞民族黨，其政綱與俄國社會革命黨甚爲接近。後來他們變爲法西斯主義的一個小團體，從事於種種陰謀行爲。「摩沙瓦梯黨」爲阿則倍疆之反革命黨。

亞為根本條件。

維省斯基：喬治亞對阿美尼亞及阿則倍疆具有左右一切的影響嗎？

舍列：是的，牠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牠在南高加索起着領導的作用。

維省斯基（向利夫什茨發問）對於舍列布略可夫口供中關于他與你的聯繫的那一部分，你是否有不同的話說呢？舍列布略可夫所說的話，是否確符事實呢？

利夫什茨：是確符事實的。

審判長：被告舍列布略可夫！請你說，一九三五年，皮達可夫是否對你說過必須擴大運輸業方面的暗害組織呢？

舍列：並不是皮達可夫，而是利夫什茨對我說過這種話，當他說這話時，他以皮達可夫的話為根據的。

審判長：在這一次談話中，利夫什茨指出你的工作在軍事動員前夜的時期有特別的意義。在你的口供裏，你說：『我與利夫什茨交談，而得出以下的結論，就是除了中央及地方的組織，在第一個時期，應當極力紊亂和模糊運輸業方面的工作以外，還應當設法在軍事動員開始時，就能立刻抓住最重要的鐵道樞紐，在那裏阻塞鐵路交通，搗亂運輸業，降低鐵道樞紐之通車能力。』你是否承認這是確符事實呢？

舍列：是確符事實的。

審判長：被告利夫什茨！你是否承認舍列布略可夫關于這個問題，的確與你作過談話呢？

利夫什茨：我完全承認。他的確與我作過這種談話。

審判長：被告皮達可夫，你是否承認你當眞給了利夫什茨以這一種指示呢？

皮達可夫：是的，當然給了這一種指示。

審判長：辯護人是否有問題要問？

辯護人：沒有問題。

審判長：宣佈退庭。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時繼續開庭。

八・對證人洛根諸夫之訊問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五日早庭

法庭進行訊問證人洛根諸夫——前「焦炭托拉司」的總經理。

維省斯基：關於皮達可夫底托落茨基組織祕密活動，你知道些什麼呢？

洛根諸夫：我與皮達可夫相遇於一九二八年初。當時我被開除出黨，並派往上烏丁斯克。我與利夫什茨及克魯丙科同行。我們在莫斯科到皮達可夫那裏去，爲的是要得到指示，我們究竟怎樣辦。皮達可

夫指示我們說，很明顯的，在最近時間內應當寫兩面手腕的聲明書，聲明退出反對派，以便重新回到黨裏來，以便有可能在自己的週圍重新團結托落茨基幹部，來繼續作反黨的鬬爭。

維省斯基：你是否依照了皮達可夫底規勸而寫了兩面手腕的聲明書呢？

洛根諾夫：是的。我們曾與皮達可夫約定，如果鬬爭帶着遲遲不決的性質，那末，他本人將寫退出反對派的聲明書，這就是我們應當在當地寫這種聲明書的信號。我們就這樣辦了，即當皮達可夫公佈了聲明書時，我以及克魯丙科和利夫什茨也在當地寫了聲明書，說我們贊同皮達可夫的聲明書，因此就被恢復了黨籍。

維省斯基（問皮達可夫）：你承認證人的這些口供是眞實的嗎？

皮達可夫：我當時並沒有兩面手腕的目的，然而我對於黨既然沒有說出自己的同夥——隱藏的托落茨基份子——，既然我在黨內問題上，關於處罰反對派的問題也在內，還有與黨分歧的意見。……

維省斯基：這一點你講過了。

皮達可夫：在這個意義上我沒有完全講出。

維省斯基：就在這個意義上你的行爲也是兩面手腕的行爲嗎？

皮達可夫：是的。

維省斯基（問洛根諾夫）：我要問一問清楚，當時是否有過關于兩面手腕的話。洛根諾夫，你是否承認

洛根諾夫：眞有這種話？

維省斯基：眞有過這種話。

洛根諾夫：你在國外時，曾與皮達可夫會面過嗎？

維省斯基：我在國外時與皮達可夫會過許多次面。有一次會面時，皮達可夫很注意他以前很熟悉的托落茨基份子，如科秋賓斯基和利夫什茨底情緒究竟怎樣。當時皮達可夫向我提出應當從新恢復托落茨基組織的問題。在下一次會面時，皮達可夫說，從今以後，基本的鬭爭形式應當是暗殺行爲；同時皮達可夫說，這不是他個人的觀點，而是托落茨基的觀點。

洛根諾夫：皮達可夫對你說過，要暗殺什麼人呢？

維省斯基：是的，皮達可夫曾指示我說，首先要暗殺斯大林。在以後幾次會面時，皮達可夫告訴我說，據托落茨基的指示，應當使全部這種鬭爭有一定的組織性。皮達可夫提議在烏克蘭建立托落茨基派的總部，參加這種總部的，應當是科秋賓斯基，克魯丙科，利夫什茨和我。

洛根諾夫：這是那一年？

維省斯基：這大約是一九三一年夏天。

洛根諾夫：一九三一年以後，你是否與皮達可夫會過面，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時候，會面的目的是什麼，談

話的內容是什麼？

洛根諾夫：一九三一年以後，在一九三二年末，我與皮達可夫會面。我告訴皮達可夫說，烏克蘭的總部已經成立，參加這個總部的，就是皮達可夫所擬定的人選，我們已經在烏克蘭着手祕密工作。當時皮達可夫對我說，依照托落茨基底指令，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事實上已經實現，該聯盟的基本主要的就是暗殺，在莫斯科工作已頗擴大。他提議在烏克蘭也應當由暗殺的空話，轉而採取實際的行動。

維省斯基：你是否知道皮達可夫於一九三二年又到外國去過呢？

洛根諾夫：是的，我於一九三四年與皮達可夫會面時，曾知道這件事情。皮達可夫用托落茨基的名義，轉告我許多新的立場。他表示不滿，說我們的暗殺行動只限於一般的空話。皮達可夫說，基本的注意點正是暗殺，一個實際行動的人要比許多廣泛的組織寶貴得多。除此以外，皮達可夫當時說，目前蘇聯共產黨中央黨部底威信以及對於中央黨部政策的信任心，在國內已經非常增高，因此托落茨基很堅決地要求努力開展工作去破壞斯大林政策底威信。

在一九三五年夏初，皮達可夫曾向我提出問題，問我們是否眞正準備好了暗殺行動。我說，是的，我們——烏克蘭的總部曾挑選了許多人，這些人都同意做暗殺的實際行動者。這種人已經有了，只待總部方面的信號。皮達可夫說，目前托落茨基的平行總部準備着同時發動的暗殺行動。他

當時曾指出，應當完全切實地準備暗殺斯大林。莫洛托夫、沃羅希洛夫、卡岡諾維赤，而在烏克蘭暗殺科西沃爾和坡斯特舍夫。我當時回答說，我們的基本的暗殺實行者，已被指定在烏克蘭擔任暗殺行動，除了有些個別的人可以叫到莫斯科去。

維省斯基：他們人數很多嗎？

洛根諾夫：在奧德沙，在克魯丙科的領導之下，組織了一個團體，以卡拉石尼科夫為首，準備暗殺斯大林；在德涅普爾彼得洛夫斯克，壽科夫領導之下的一個團體準備暗殺沃羅希洛夫。在這次會面時，皮達可夫說，目前應當在破壞重工業的工作方面大大活動。

維省斯基：在這一方面皮達可夫告訴你要做什麼事情呢？

洛根諾夫：他指出，基本的注意力應當集中在焦炭——化學工業底化學部分，因為他有國防的意義。因此，皮達可夫說，應當用一切方法去破壞化學工業。我們實行延擱化學工業新工廠底建築和開工。我們協同『焦炭化學設備』托辣斯總經理亞科夫斯基對於新建築工程採用了下述辦法：就是使化學廠的開工比焦炭爐之開工，遲一兩年。我們對於馬里烏普里工廠就採用了這種辦法。在這個工廠中焦炭爐開工時，完全沒有一個附屬的部門，就是說，沒有一個焦炭貯藏所，既然沒有這種貯藏所，就不能出產質量很好的焦炭，又沒有附屬的作坊，化學實驗室及其他等等。在新葉諾基也輔焦炭——化學工廠中以及在克里瓦洛格工廠中，也實現了許多暗害的辦法。

在郭爾洛夫斯基工廠中也進行了這一類的暗害辦法。在舊葉諾基也輔清煤工廠建築時，也設法阻撓了洗煤間的建築工程。

維省斯基：你是否與皮達可夫談過他又到國外去的事情呢？

洛根諾夫：皮達可夫說，他於一九三五年又到過國外去。皮達可夫對我說，托落茨基重述以下的指令，就是要比現時愈加堅決地去與外國人，與駐在蘇聯的法西斯蒂建立聯繫。同時皮達可夫對我說，托落茨基與德國法西斯蒂組織有完全切實的關於共同反蘇聯的協約，同時與日本的當局也有這種協約。

維省斯基：有什麼條件？

洛根諾夫：他說：應當割讓遠東和烏克蘭的廣袤領土，他說我們現在就應當用一切方法來促成蘇聯的失敗。

維省斯基：什麼時候他對你說過這一點呢？

洛根諾夫：一九三六年年初他對我說過這一點。

維省斯基：在這個時期，皮達可夫沒有對你講過關於召集會議的話嗎？

洛根諾夫：沒有講過。

維省斯基（問皮達可夫）：你曾經說，接到了托落茨基的指令以後，你要召集人來開會，仔細想一想究

竟以後怎樣辦。關於這一點，你是否與總部中什麼人講過呢？

皮達可夫：關於這一點，我與拉迪克和索考里尼可夫講過。我們擬定首先總部聚會一下，同時要請湯姆斯基來參加。在總部開會以後，才召集外省組織者（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來開會。

維省斯基：你決定只召集少數人來開會，這是否由於你認爲問題過於嚴重呢？

皮達可夫：我與拉迪克及索考里尼可夫之間曾經談過這一點。我與拉迪克都懂得，在托落茨基組織底積極份子面前提出這種問題，一定會引起討論和爭論，而且多半會引起分裂：因此決定很少數的人來集會。

維省斯基（問洛根諾夫）現在請你講拉達依查克。在犯罪行動上你怎樣與他聯繫起來，你們結合起來的緣由是什麼？

洛根諾夫：因爲拉達依查克知道焦煤化學工業很清楚，所以我告訴過他，說我們擬定了什麼辦法。

維省斯基：犯罪的辦法嗎？

洛根諾夫：是的，我們在犯罪行爲中有共同的交點。當提出與法西斯組織建立聯繫的問題時，我對拉達依查克說，他應當與格拉舍接洽，我本人並不認識格拉舍，然而由莫斯卡列夫那裏聽說過格拉舍的名字。

維省斯基：關於與格拉舍以及外國偵探局底探子發生聯繫，你曾對拉達依查克說了什麼話呢？

洛根諾夫：我當時說，在我們面前擺着與外國偵探局建立聯繫的任務。

維省斯基：拉達依查克對於你的話，採取了什麼態度呢？

洛根諾夫：這個時候，拉達依查克正在找門路，要與外國偵探機關發生聯繫，我就告訴他格拉舍的門路。

維省斯基（問拉達依查克）：你與洛根諾夫是否有過這一番談話呢？

拉達依查克：是的，有過這一番談話。洛根諾夫告訴我說，有皮達可夫方面來的這種指令。過了不久，我也由皮達可夫方面得到了指令。

維省斯基：被告皮達可夫！你是否承認這種口供是實在的呢？

皮達可夫：在基本上是實在的。

維省斯基：洛根諾夫說拉達依查克與他商量怎樣找得到門路，以便與德國偵探機關的探子建立聯繫，拉達依查克說這是你叫他幹的，拉達依查克底這種話是否說得對呢？

皮達可夫：是對的。

維省斯基（問洛根諾夫）除了與拉達依查克這一番說話而外，你們還有什麼關於具體的犯罪行的談話呢？

洛根諾夫：我與拉達依查克還有過關於焦炭化學工業中進行暗害工作的談話。

維省斯基：你是否知道關於利夫什茨犯罪工作的事實呢？

洛根諾夫：一九三一年夏末或秋初，我由柏林回來以後，與利夫什茨會面，並轉告他我在柏林由皮達可夫方面得到的指令。我告訴利夫什茨說皮達可夫建立了烏克蘭的托落茨基組織，利夫什茨也被列入這個組織。

在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在烏克蘭托落茨基秘密組織中，我和利夫什茨共同進行了工作。我知道利夫什茨在哈爾可夫在鐵路上已經開始進行的什麽工作。我也知道利夫什茨勾引來參加托落茨基秘密組織的人。利夫什茨同意於暗殺的立場。一九三三年，他離開烏克蘭的時候，暗殺的實際工作，我們還沒有着手。在一九三六年初，我又與利夫什茨見面，由他那裏知道他在鐵路上工作得頗爲順手，他不僅與我在烏克蘭所知道的人有聯繫，而且與其他的人發生了許多聯繫。

維省斯基（問利夫什茨）：對於證人洛根諾夫底口供，你沒有什麽意見麽？

利夫什茨：沒有意見。

審判長：辯護人對於證人是否有問題？

孔莫多夫（問洛根諾夫）：你與拉達依查克關於格拉舍所說的話，是在那一年呢？

洛根諾夫：是在一九三四年下半年。

孔莫多夫：你所講的暗殺行爲，如郭爾洛夫斯基工廠中的暗害行爲，是在那一次說話以前嗎？

洛根諾夫：這是在一九三五年。

維省斯基（問拉達依查克）　在與洛根諾夫談話之後，你後來就與格拉舍發生了聯繫嗎？

拉達依查克：　是的。

維省斯基：　這樣一來，格拉舍能夠與德國偵探局底探子發生聯繫的話，已經證明是實在的了？

拉達依查克：　已經證明是實在的。

審判長：　諸被告是否有問題？

諸被告：　沒有問題。

九・對被告巴古司拉夫斯基之審訊

審判長：　被告巴古司拉夫斯基，你承認在預審時所說的供詞，是合乎事實嗎？

巴古司拉夫斯基（以下簡稱巴古司——譯者）：　是的，是合乎事實的。

維省斯基：　請你說一說，你在西伯利亞所進行的托落茨基組織的犯罪活動，表現在什麼地方？

巴古司：　我在西伯利亞的活動，是從一九二八年二月初開始的，當時我被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開除黨籍，後來到了西伯利亞的新西比爾斯克去做工作。在新西比爾斯克，當時曾有幾個積極的過去著名的托落茨基份子。那裏有摩拉洛夫，克羅里，蘇梅茨基，蘇爾諾夫。此外在巴爾諾烏里，又有索司諾

夫斯基，在米努辛斯克又有斯米爾加，過了不久，拉迪克也到了托姆斯克。

一九二八年二月底，我從索司諾夫斯基那裏接到托落茨基的訓令，說要組織西伯利亞托落茨基祕密總部。當時給予這一總部的任務，可概括如下：第一，要儘量保全西伯利亞那些沒有受到國家機關方面取締，或黨方面處罰（即開除黨籍等等處罰）的托落茨基幹部；第二，要統一和領導西伯利亞各地托落茨基份子的祕密活動；第三，要散佈祕密文件，首先是在被放逐的托落茨基份子集中的地點；第四，要設法給被放逐於西伯利亞的托落茨基份子以物質上的幫助。

這一總部是由下列的人組成的：摩拉洛夫——他是總部的領導者，我——巴古司拉夫斯基，蘇梅茨基，克羅里，蘇爾諾夫，索司諾夫斯基，白洛布羅多夫，後來拉迪克到後，就把他加入進去。

維省斯基：這一點告訴了拉迪克沒有？

巴古司：告訴了的。不過日常的非原則性的問題，當時是由常居於新西比爾斯克的那些總部份子解決，但是帶有原則性的問題，則是設法與那些不在新西比爾斯克而在西伯利亞其他區域的總部份子商量妥當後解決的。

（公訴人維省斯基向巴古司拉夫斯基問道，當時西伯利亞總部曾與莫斯科什麼人有聯繫。巴古司供稱，在一九二八年與額里清發生聯繫，而在一九三〇、三一、三二年，則與斯米爾諾夫有聯繫。）

維省斯基：你與皮達可夫會面是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

巴古司：在一九三二年初月份記不清楚了，大概是在二月裏，會面地點是在人民委員會重工業部皮達可夫辦公室內。

維省斯基：以後各年你們會過面沒有？

巴古司：會過面。

維省斯基：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

巴古司：一次是在一九三三年，地點仍在人民委員會重工業部，一次是在一九三四年，地點則在皮達可夫家裏。

維省斯基：你在一九三二、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各年曾與皮達可夫會過面，你現在記不記得談些什麼話？

巴古司：在一九三二年，皮達可夫告訴我說，他，斯米爾諾夫，舍斯托夫，這三個人與謝多夫在柏林會面過數次。他告訴我說，在會面時接到了托落茨基的訓令，這一訓令要使托落茨基份子底工作走上別一軌道，就是說要使用暗殺的手段——實行暗殺共產黨與政府的領導人之行為——成為主要的工作方法。其次，這一訓令指定我們的任務，就是要設法在蘇聯的經濟上各方面引起各種各樣的困難。

皮達可夫所說的關于暗殺行動的這一指示，不很使我奇怪，因為我在一九三一年底，從斯米爾諾夫口中就已知道這一點了。說到這裏，我就應當說一說組織新的西伯利亞總部的事情。這也

是一九三二年的事。

維省斯基：那是怎麼一回事呢？

巴古司：這件事情發生的情形如下。在一九二九年，斯米爾諾夫曾將托落茨基的訓命轉告我們，在此項訓令中說，不要放下武器，不要解除思想上的武裝，只須在組織上解除武裝，聲明停止小組織的工作，回到黨內來，並且要在自己的聲明書上在可能範圍內保持托落茨基的舊有的某些思想。我與斯米爾諾夫當時就這樣辦了。後來接到了我所說的托落茨基的新訓令——這一訓令中的關于暗殺的一部分，是由斯米爾諾夫轉達給我的，而關於其他的一部分則是由皮達可夫轉達給我的，——於是就發生了以某種形式來重新成立西伯利亞托落茨基總部的問題。斯米爾諾夫當時直接說道，這一總部應由摩拉洛夫這個領導者，我——巴古司拉夫斯基，蘇梅茨基三人組成，而這三個人都是舊有托落茨基總部底份子，所以在工作上前後就保持了聯繫。

後來，在一九三四年，又推舉了多羅布尼斯加入西伯利亞總部。

一九三二年的工作，主要的就是恢復已經失去的聯繫和準備組織暗殺行動，而且總部的領導者摩拉洛夫曾親自擔負直接領導暗殺工作之責任。

同時，我親自設法尋找可能來實現訓令的第二部分，就要設法造成種種所謂困難來妨碍蘇維埃政府及黨底經濟政策之實施。因為我在職務上曾與西伯利亞的經濟工作人員有聯繫，所以

這一工作就使我擔任。

那時庫茲巴斯冶金工廠的建築正在大事擴展中。因此在工業方面，暗害工作就應當在庫茲巴斯方面進行，並同時也應在運輸業中進行。

皮達可夫在給我指示要我設法造成種種困難以阻碍黨及政府底經濟政策之實施時，曾告訴我說，在庫茲巴斯有一個他所知道的人——舍斯托夫在那裏工作，又說舍斯托夫已接到訓令要開始在庫茲巴斯煤礦工業，以及最重要的建築工程上實行暗害工作。

我一回到新西比爾斯克，就把這一段話告訴了摩拉洛夫。他也承認的確有過這種訓令，並叫我着手在運輸業中進行暗害工作。我當時就開始了這一工作。就在一九三二年，我從摩拉洛夫方面知道在新西比爾斯克已經組織了由霍多拉捷領導的暗殺團，並且這一暗殺團得到摩拉洛夫底囑咐，要準備在得到相當指示時實行暗殺蘇聯共產黨西伯利亞特區委員會書記愛依赫。除了我這裏所提到的這一暗殺團，即霍多拉捷所領導的暗殺團以外，在一九三三年摩拉洛夫告訴我說：庫茲巴斯也組織了暗殺團，準備暗殺共產黨的領導者，因為黨的領導者有時是到庫茲巴斯來的。摩拉洛夫又告訴我，第一個暗殺團的領導者霍多拉捷已經派了他手下人尼古拉·依凡諾夫到莫斯科去實行暗殺斯大林。在一九三三年，我曾在沃姆斯克鐵路上組織了一些托落茨基組織的支部。

維省斯基：具體的說，到底爲着什麼目的？

巴古司：爲着實現我們在運輸業方面所預定的一切辦法。在一九三三年年底，我曾與沃姆斯克鐵路上這一組織的領導者裴納省談過話，他告訴我，在沃姆斯克鐵路某幾個機車房內佈置了暗害工作，並且最注意機車方面的暗害工作。至于講到托姆斯克鐵路，那末，在一九三三年那裏就已組織了一個團體，其領導者爲沃別塔列爾，在這個團體內還有日特可夫（他是托姆斯克鐵路機務處機車部主任）及埃得曼（他是總工程師。）沃別塔列爾告訴我，在托姆斯克鐵路上同樣也佈置了暗害工作。

維省斯基：沃別塔列爾到底是個什麼人？

巴古司：他是鐵路建築處主任。他曾對我說，在那一些機車房裏已經組織了托落茨基的下層支部，那裏所進行的暗害工作，主要的也是在機車方面。

至一九三四年，西伯利亞總部的工作，其中也包括我的工作，遂轉上新的軌道。一九三四年，我曾與皮達可夫作第二次談話，這次談話的地點是在皮達可夫家裏。當時皮達可夫認爲我們的工作完全不能令人滿意，于是便提出了一些任務，這些任務雖然並不是新的，但是都說出新的名稱。在一九三四年，在我們的談話中，就第一次的很響亮的說出了『暗害』的字眼。當時皮達可夫看到我因爲斯米爾諾夫以及其他許多人於一九三三年被捕（我們這次談話是在一九三四年初），

似乎表示相當的消極情緒，於是便說到：必須擴展工作，何況從托落茨基方面已接到信件與訓令。托落茨基責備我們毫無動作，而且當時他指出，這差不多是對他的——托落茨基的訓令怠工。

維省斯基：你在一九三四年根據這些訓令是否做了些事情呢？

巴古司：我從我與西伯利亞總部份子摩拉洛夫和蘇梅茨基的數次晤談中，知道多羅布尼斯會與諾爾金發生了聯繫，知道有很大一部分的技師和工程師已被我們吸收過來，並知道這一工作已經在那裏開展了。

至於講到由我親自領導的在運輸業方面的工作，那麼在一九三四年，就大大增加了列車碰撞和出軌的事件，這種事件是由日特可夫實行的。在一九三四年，機車破壞而不能工作的數量與百分數也大大增加了。末了，在一九三四年，在建築新鐵路（愛依赫——索科爾鐵路也在內）的過程中，我們的暗害工作特別做得多。

一九三四年，我又知道除了我剛才所說的那些暗殺團——由霍多拉捷與舍斯托夫所領導的暗殺團以外，摩拉洛夫曾託付了一個國營農莊底經理庫得路舍夫實行暗殺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因爲莫洛托夫要來到西伯利亞，而且要到這一國營農莊來視察。這一點是由摩拉洛夫告訴我的。

維省斯基：什麼人準備了這一次暗殺行動？

巴古司：庫得略舍夫，他是受了摩拉洛夫的囑咐的。

維省斯基（問摩拉洛夫）被告摩拉洛夫，是否有過這件事？

摩拉洛夫：囑咐並不是給庫得略舍夫，而是給舍斯托夫與霍多拉捷的。

維省斯基（問舍斯托夫）摩拉洛夫供稱他曾經囑咐你組織暗殺莫洛托夫的事件，這是否合乎事實？

舍斯托夫：是合乎事實的。

維省斯基（問巴古司）被告巴古司拉夫斯基，請你說明一下吧。

巴古司：在準備暗殺行為時，曾經設法要使這種暗殺行為，不至於集中一個地點。舍斯托夫曾受到囑咐，要在莫洛托夫來到庫茲巴斯時，實行暗殺莫洛托夫，而這件事情確是由被告阿爾諾里特進行了。但這一件事情同時又囑咐了庫得略舍夫去進行。我可以說，這是事實，因為庫得略舍夫親自告訴過我。舍斯托夫組織暗殺團時，採用了以下的方法：就是要使這些暗殺團無論在庫茲巴斯那個地點，都能實行暗殺，同時在國營農莊中也準備這種暗殺……。

維省斯基：庫得略舍夫從什麼人那裏得到了這種囑咐的呢？

巴古司：從摩拉洛夫那裏。

維省斯基：關於舍斯托夫準備暗殺莫洛托夫的事情，你從什麼人口中知道的？

巴古司：從摩拉洛夫口中知道的，

維省斯基：日特可夫準備暗殺什麼人呢？

巴古司：日特可夫準備暗殺卡岡諾維赤，不過這是以後的事，是一九三五年的事。

維省斯基：除了日特可夫以外，還有誰準備暗殺卡岡諾維赤呢？

巴古司：還有舍斯托夫。他準備了暗殺團，以便當某些政府委員，其中也包括卡岡諾維赤，來到西伯利亞時，實行暗殺。

維省斯基：別爾曼特準備了暗殺行爲，你知道不知道？

巴古司：是的，但是別爾曼特當時是在莫斯科。

維省斯基：請你答覆，別爾曼特是否準備了暗殺行爲？

巴古司：是準備了的。

維省斯基：這一點是從什麼人那裏知道的？

巴古司：別爾曼特自己告訴我的。

（從巴古司拉夫斯基以後答覆公訴人所發的各種問題中，查明巴古司拉夫斯基從一九二八年起，就已知道別爾曼特是托落茨基祕密組織的一份子。）

維省斯基：你從一九二八年起就已知道別爾曼特是托落茨基祕密組織的一份子。你當時知道不知道別爾曼特藏有武器呢？

巴古司：他告訴我了這一點。

維省斯基：當時有沒有提起過要他把這種武器送到西伯利亞去給你們那裏呢？

巴古司：有過特別的指示，要他把這種武器送到西西伯利亞去。後來他把這武器帶去了，但是他於一九三六年八月間被捕了，這種武器也沒收了。而我叫他做這件事情，是在一九三六年七月間。

維省斯基：爲什麼你在預審時隱瞞了這一點，沒有說出來？

巴古司：我並沒有隱瞞。我在供詞中有過這一點。

維省斯基：你當時就直認不諱了嗎？

巴古司拉夫斯基：不，不是當時，但是很快。

維省斯基：起初你不肯供出任何供詞，但後來都供認了。或許這是由於監禁你的什麼特殊條件所致，又或許是因爲你受到什麼壓迫？

巴古司：不是的。

維省斯基：或許人家叫你繼續說出供詞，答應你說，如果你繼續說出供詞，就會減輕你的罪，——是不是這樣？

巴古司：不是的。

維省斯基：那麼，那是由於你本人的主張，而完全自願地誠懇地作了這種供詞嗎？

巴古司：完全對的。要是法庭許可，我就把這種動機說出來。

維省斯基：你，巴古司拉夫斯基是個老托落茨基份子，在十幾年以來，你都是站在托落茨基的立場上，反對黨，反對蘇維埃政權，一直到被捕的那一天你還進行了自己這一種反蘇聯的托落茨基組織的活動，你現在作出口供，揭穿一些人的面目，解除自己的武裝等等，試問動機何在，原因何在呢？

巴古司：原因何在呢？我這裏應當公開的向法庭說，在最近幾年來，就是說在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及一九三六年，我所作的犯罪行爲，不僅使我感覺不安，而且使我感覺難受。

說到這裏，我要指出托落茨基組織內部那種完全不堪忍受的和不堪設想的腐敗情形，這是我不能不步步感覺到的。老實說，有很多事情我祇在審判過程中才知道，過去我是完全不知道的，拉迪克在這裏供認，說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的聯盟還未正式結成的時候，他們就已開始担憂，說怕在這聯盟內誰會上誰的當。我不能不向法庭承認，這些話眞是令我聽了作嘔。

第二，我們在當地工作，絕對沒有知道有人在我們背後將我們的國家拍賣給外國資本家。當我接到公訴書時，我就局部的知道了這一點，但是一切底蘊，我祇是在法庭上聽了皮達可夫與拉迪克的供詞以後才完全明白。

維省斯基：皮達可夫與拉迪克在你面前隱瞞了這些事情麼？

巴古司：他們已在這裏供認，他們特別是把一九三五年年底托落茨基底最後一個訓令隱瞞起來，沒有

告訴什麼人，也沒有告訴我。

當然，就是他們不告訴，我自己也應當了解這會弄到何種結局，至少要了解我們國家的每個工人與集體農民所了解的東西。我們既然主張社會主義在一國內不能建成的觀點，既然走上了暗殺和暗害的道路，我們自然會應當明白，如果不想建設社會主義，那麼我們究竟想建設什麼？豈不是祇有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嗎？

維省斯基：但這一點你到什麼時候才明白了的？

巴古司：問的對，我正要說這一點。當我被捕的時候，我曾感覺得自己正在深淵旁邊走，而且知道一定墜入這一深淵。在我未供認的八天以內，我就已完全明白已經到了應當作罷的時候。當然，我明白這一點未免太遲了。……我們所幹的一切事情豈不是都是很可惡的，就拿這種萬惡的軍事破壞工作來說，我已經令人作嘔了。俗話說『魚爛先爛魚頭，』我們本應當斬去這一魚頭，但我們却沒有這樣做。我們進行了暗害工作，進行了軍事破壞行爲，來促進我們蘇聯的失敗。我犯了罪。

十．對被告多羅布尼斯之審訊

審判長：被告多羅布尼斯，你是否承認你在預審時，及你在新西比爾斯克向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庭所供

述的口供呢？

多羅布尼斯（以下簡稱多羅——譯者：）我承認。

維省斯基：巴古司拉夫斯基供承你是西西伯利亞托落茨基總部的參加人，你承認這是確符事實麼？

多羅：自一九三四年七月末開始，庫茲巴斯全區所有的暗害工作與軍事破壞工作，都交給我負責指揮了。

維省斯基：在這時候以前，你是否參加過祕密的托落茨基份子在一九二七年後的犯罪行爲呢？

多羅：一九二九年我被恢復黨籍，而自一九三二年初，我卽重新進行托落茨基組織的活動。我當時曾有好幾點疑問，這些疑問便成了我此後犯罪行爲的泉源。斯米爾諾夫知道我的情緒，便找我談話，會談到有恢復托落茨基反革命工作之必要，又談到托落茨基關於改用恐怖暗殺手段的策略的新指示。我當時贊同了斯米爾諾夫的這種立場。

斯米爾諾夫說要我與皮達可夫發生聯繫，並說皮達可夫會比較更詳細告述我。因爲我在一九三二年出差很久，所以到一九三三年二月間才與皮達可夫發生聯繫。當我一到中亞細亞做工時，便按照皮達可夫的指示，在中亞細亞與斯米爾加及沙伏諾娃維持聯繫，而斯米爾加通知我說，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組織和開展暗殺團，以便一到總部要用時，便能將其調赴莫斯科。一九三三年，我在中亞細亞住了整整的一年；到一九三四年五月，我乃離開那裏，因爲托落茨基總部决定把

我調到西西伯利亞。因爲皮達可夫有辦法按照工業方面的路線把我調動，所以這件事情就完全容易解決了。

維省斯基：那就是說，皮達可夫利用其職位上的權力把你調到他所需要的地方去麽？

多羅：當然，這是顯而易見的。一九三四年我動身赴西西伯利亞前，曾在皮達可夫辦公室與他作了一次談話，皮達可夫向我着重而肯定地說，我必須到西西伯利亞去，以便加强那裏托落茨基反革命的活動。同時又提出了完全新穎的任務：不僅要實行暗殺，而且要實行暗害工作與軍事破壞工作。他再三的說，必須努力而堅決進行工作，無論採取什麽手段都可以。一切手段都是必須的，都是好的，這是托落茨基的指示，托落茨基總部是贊同這種指示的。

皮達可夫還說，必須吸收過去暗害份子當中的專門家，及帶有反革命情緒的人來參加這個工作，又說我在西西伯利亞必須與舍斯托夫、列沃諾夫及佛拉基米爾・考西沃爾發生聯繫。

皮達可夫只是以國內問題來說明軍事破壞工作與暗害工作之必要。無論在當時或以後再次會面時，他都完全沒有說到新的方針，沒有說到托落茨基與某些外國所締結的協定，以及得到總部的承認。他對我一句話也沒有說到關於瓜分蘇聯等事的協定與勾結。他指示我必須與西西伯利亞總部發生聯繫；當我以克梅洛沃聯合廠建築工程副經理的資格到克梅洛沃履任時，我便順路與西西伯利亞總部負責人摩拉洛夫談了一次話。摩拉洛夫向我說他自己直接領導暗殺的

工作，並創立了霍多拉捷與舍斯托夫等人的暗殺團，在托姆斯克也有暗殺團，主要的是在高級學校內。摩拉洛夫又說，他還兼指揮西西伯利亞農業中的暗殺工作，他的最親近的助手之一便是麥也爾倩科，在運輸方面的暗害工作是由巴古司拉夫斯基担任進行，而我就注意庫茲巴斯方面的工作。

我當時問了摩拉洛夫，拉科夫斯基對於這個總部的態度如何？摩拉洛夫回答說：拉科夫斯基，在他未離開以前，雖不是西西伯利亞總部的份子，但他與總部有直接的聯繫，而且詳細知道新的策略，知道托落茨基關於暗殺與軍事破壞工作的新指示。

維省斯基：你在克梅洛沃與當地托落茨基份子發生了聯繫麼？

多羅，我在克梅洛沃力求獲得黨與蘇維埃各機關的信任，以便減少對我發生的猜疑和不信任態度，然後開始募集人力。一九三五年三月，我被皮達可夫召去向他報告我在庫茲巴斯，特別是在克梅洛沃化學聯合廠的暗害工作與軍事破壞工作。皮達可夫告訴我說，該聯合廠建築工程總經理諾爾金已照他的指令在克梅洛沃化學聯合廠開展了很大的暗害工作，總工程師卡爾采夫亦從事于這種工作。皮達可夫在這次談話中又說到托落茨基要求最努力向前猛攻的工作，而且着重說明必須不惜採取一切手段。

我返克梅洛沃以後，便與諾爾金發生聯繫，我們把工作開展起來。諾爾金向我說，他對暗害工

作已有計劃，不過不是書面的。我當時並沒有反對這個計劃，況且這個計劃有幾點已經大部分實現了。

維省斯基：你如何知道了這個計劃，這個計劃內容是怎麼樣的？

多羅：這個計劃是諾爾金製定的，曾得到皮達可夫的同意。在這個計劃中暗害工作任務之一，便是把經費耗費於次要的設施。第二，便是阻滯建築工程，使重要工程不能按政府所規定的期限動工經營。

維省斯基：主要地是關於帶有國防意義的企業麼？

多羅：是的。其次，常常把計劃改了又改，同時又拖延與設計機關的結賬，因此計劃圖案得來很遲。這當然就阻滯建築工程的速度與行程。

在焦煤化學工廠已開工的企業中，我們曾故意把好幾處地方做得不完備，因此這就大大影響了工廠的工作，降低了生產品的質量，使焦煤帶有很大的濕氣與灰質。雖然焦煤化學工廠的工人力謀改善工作，但是因爲那裏進行了暗害工作的緣故，就沒有把工作改善成功。此外，還故意引起失險多次。有兩次失險是非常嚴重的。在這兩次失險中，雖然沒有工人死亡，但有幾個工人却受了重傷。

維省斯基：後來又怎麼樣？

多羅：照總部的指示，我亦要與舍斯托夫發生聯繫。一九三五年秋，舍斯托夫來克梅洛沃會我。在這次會

面時，舍斯托夫告訴我，他已擬定了破壞開煤井的建築工作，降低煤炭產量的辦法，此外還有其他許多辦法。他並且向我建議，在克梅洛沃礦山利用過去的暗害份子皮舍霍諾夫來做暗害工作。舍斯托夫顯然是不能兼顧克梅洛沃礦山的工作。因此，我不能不直接來幹這件事情，我又與中央礦井副井長（後升為井長）諾斯科夫及蘇炳和庫洛夫發生了聯繫，並在他們幫助之下進行了暗害工作。

維省斯基：諾斯科夫，蘇炳與庫洛夫——這就是那些曾在克梅洛沃審判案中受審的人麼？

多羅：是的。在一次談話中，諾斯科夫向我申述，皮舍霍諾夫曾告訴他，說他已把德國工程師石梯克林格吸收到組織中來做暗害工作了。

維省斯基：那個人就是克梅洛沃案中的石梯克林格麼？

多羅：是的。我向諾斯科夫回答說，這很好。於是在克梅洛沃煤礦中，也把工作開展起來了。一九三五年七月，諾斯科夫向我報告說，他已把炸毀由他所指揮之中央煤井的事情準備好了。我對這事情，是批准了。

維省斯基：你們討論過，應在什麼條件下實行炸燬的問題麼？

多羅：諾斯科夫說，這種暗害的辦法，如散放毒氣於煤井中，是會引起炸裂的，而且要傷害許多人命。我說，這算什麼，就是如此，也是要幹的。這樣幹去，甚至還有好處，因為這可以引起工人的憤恨，並有可能

引起工人對我們方面的同情。

維省斯基：那就是說，你不僅批准了諾斯科夫這個計劃——炸燬礦井，而且批准了在直接犧牲工人性命的條件下實行炸燬礦井麽？

多羅：我問過諾斯科夫，是否能避免傷害人命而進行這種暗害工作呢？他說這是不可能的。此後，我便說，在這裏，是根本用不着憐惜的，這樣幹是必要的。

維省斯基：你究竟怎樣解釋了這一點呢？

多羅：我說……我說要……我已經說過要這樣幹，這甚至於……如果甚至于這會引起人命犧牲，而人命犧牲會引起工人的憤恨，這是對於我們有利的。

維省斯基：可是這並不如你剛才在這裏所企圖說的那樣哩。你剛才在這裏說，你問過諾斯科夫：能不能不傷害人命也行呢？而實際上，照你的話推論起來，就可見你不但沒有反對傷害人命，你反而認爲引起人命犧牲愈多，則對于你們愈有利。

多羅：是的，就是這樣吧！大概是如此……

維省斯基：自然我懂得，你在這裏當着人民面前，是覺得不便於把這點說出來。雖然這樣的事說出來是不方便，但是這是要說出來的。有什麽辦法呢？你豈不是說過，根本就用不着怕傷害人命嗎？

多羅布尼斯：我說過。

維省斯基：這就是說，如果這種暗害工作會炸死工人，就讓工人被炸死罷！你豈不是鼓勵了諾斯科夫麽？

多羅：是的。

維省斯基：你鼓勵了炸死工人，甚至還說了炸死工人愈多愈好麽？我是這樣的了解你，對麽？

多羅：是的。

維省斯基：後來這次炸燬行動是實行了麽？

多羅：我在八月六日就被捕了。而炸燬是在九月廿三日實行的。

維省斯基：但是你批准了這次炸燬行動麽？

多羅：我是在七月底或七月中批准的。

維省斯基：由此可見，你之被捕，並未妨碍實現炸井的計劃，因爲諾斯科夫還留在礦井中，是麽？

多羅：是。

維省斯基：可是本來是可以制止麽？

多羅：制止麽？當然本來是可以。

維省斯基：誰能制止呢？

多羅：我能制止。

維省斯基：你沒有制止麽？

多羅：我沒有制止。

維省斯基：炸了麼？

多羅：是的。

維省斯基：雖然你已被拘禁，而炸燬畢竟還是實現了麼？

多羅：是的。

審判長：被告多羅布尼斯！關於如果這種軍事破壞工作及暗害工作被揭露以後，究竟應把這種行爲推到誰人頭上的問題，你曾如何教諸斯科夫做呢？

多羅：把全部罪過都推到非黨員的專門家頭上。

審判長：那怕他們完全與此無關，也是要推到他們頭上麼？

多羅：當然是如此。

審問至此，二十五日早庭宣佈退庭。

十一．對被告摩拉洛夫之審訊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五日晚庭

維省斯基：請你說你參加西伯利亞托落茨基祕密總部的經過情形。

摩拉洛夫（以下簡稱摩拉——譯者） 在一九三一年初，當我因公被派到莫斯科時，我會見了斯米爾諾夫。他告訴了我關於他在國外與謝多夫會晤的情形，以及托落茨基的新方針，這種方針就是對共產黨與政府領袖施行暗殺。斯米爾諾夫勸我恢復我們西伯利亞的總部，該總部要由我們兩人所知道的那些於一九二九年重新入黨的人組織之；當時他指定了兩個人，即蘇梅茨基與巴古司拉夫斯基。該總部的第一個任務，就是集合托落茨基份子，並組織大規模的暗殺行動。我到了新西比爾斯克後即設法與蘇梅茨基和巴古司拉夫斯基見了面，轉告了他們斯米爾諾夫的建議和我視爲應該作的事情。他們也同意我的意見，當即由這些人作主幹，而開始了西伯利亞反革命的托落茨基總部的工作。我作領導人，蘇梅茨基負集合幹部的責任，主要的是在高級學校青年中間物色。我囑咐了托落茨基份子霍多拉捷組織暗殺團。他在一九三二年就把暗殺團組織成功了。暗殺的對象就是蘇聯共產黨邊委書記愛依赫。

一九三二年舍斯托夫來到新西比爾斯克，帶來了謝多夫一封信。在表面上看來，這封信的話是很平常的。但在實際上，却不是這樣一回事。當我們用一種化學品——安體皮林——加以塗刷後，就顯出了托落茨基關于採用暗殺手段的訓令。該信證明斯米爾諾夫所說的話是符合於事實的。

在一九三二年，我又收到了一封謝多夫給我的信，那封信是宰得曼——一個托落茨基信徒

的工程師——帶給我的。該信催促我們暗殺斯大林、沃羅希洛夫、卡岡諾維赤、基羅夫的工作。

一九三三年，我又收到謝多夫的一封信，內稱㈠『老頭子是滿意于我們的活動。』一九三四年，我與皮達可夫有了來往，把我們的活動告訴了他。皮達可夫告訴我，說我們已與右派合作。開始我很驚異，爲什麼右派採納了我們的暗殺和暗害的方針，爲什麼右派也有他們的由湯姆斯基、李可夫、布哈林組成的總部。這個消息之所以使我驚異，因爲第一，我把他們看作機會主義者；第二，我把他們當作怯懦之徒，不能進行猛烈的行動。（聽衆驚動。）皮達可夫告訴我說，右派已經改變態度了。當時我知道了後備總部的份子是皮達可夫、拉迪克、索考里尼可夫、舍列布略可夫。

至於組織暗殺團及其活動，那末，霍多拉捷在我直接領導之下，在新西比爾斯克組織了第一個暗殺團，團裏有三四個人。其次在托姆斯克的暗殺團是由卡石金（工專校長）和尼古拉葉夫（他的助教）組成的。我與他們會過面，曾給予他們以指示，並贊同了他們等到愛依赫來時暗殺愛依赫的計劃。舍斯托夫在普羅科比也夫斯克，和昂熱爾克組織了暗殺團。在普洛科比也夫斯克，我們曾於一九三四年企圖暗殺莫洛托夫，但未成功。所以在實際上，在西西伯利亞的暗殺行爲沒有一個實現。

維省斯基：沒有成功嗎?

摩拉：是的，沒有成功。

維省斯基：準備過嗎？

摩拉：準備過。

維省斯基：沒有成功的緣故，是因爲你們放棄了暗殺，還是由於客觀的情形？

摩拉：並沒有放棄暗殺，只是沒有成功。

維省斯基：請你把怎樣去準備暗殺莫洛托夫同志的情形詳細講一講。你委托了何人？誰去組織了那個工作？

摩拉：我委托了舍斯托夫。他告訴我，他已經有一個準備好的暗殺團，領導這個團體的人，好像是徹列浦杏。他說他已經準備好了一個汽車夫，這個汽車夫情願犧牲自己的生命去害死莫洛托夫，但到了最後一分鐘，汽車夫胆怯了，他不敢冒險去犧牲自己的生命，結果，莫洛托夫的生命得以保全。

維省斯基：暗殺企圖本身的情節如何呢？

摩拉：應當把汽車開到溝渠中去。在這種情形下，汽車由於慣性的關係就會倒翻過來，汽車就要打碎，而人……

維省斯基：讓我問舍斯托夫一下。被告舍斯托夫，你是否承認摩拉洛夫這一段話是合乎事實呢？

舍斯托夫：是的，我還記得別的事情。當一九三三年六月初，我告訴摩拉洛夫說，鄂爾卓尼基茲將要到庫茲巴斯來，我當時由摩拉洛夫那裏得到訓示，要實行暗殺鄂爾卓尼基茲。

維省斯基：你得到了摩拉洛夫關於準備暗殺的直接指示以後，你在實際上作了些什麼事情呢？

舍斯托夫：當我知道了莫洛托夫快要到來，我就命令徹列浦杏立即去到普洛科比也夫斯克，以便親身指導暗殺莫洛托夫的工作。他當即照辦了。他後來通知我，他已囑咐阿爾諾里特去進行這種暗殺。暗殺計劃是決定用開翻汽車的辦法來實現，並選擇了兩個適當地點。第一個地點，就是第五號礦井旁邊，在礦務局那個方向。要是誰知道普洛科比也夫斯克，誰就知道這個地點。第二個地點，是在工人宿舍與第三號礦井之間。那裏並不像摩拉洛夫所說的話一樣是什麼溝渠，而是一個十五米突深的深谷。

維省斯基：十五個米突深的『溝渠!』好深的『溝渠，』誰選擇了這個地方？

舍斯托夫：我和徹列浦杏。

維省斯基：誰把那些地方告訴了暗殺的實行者？

舍斯托夫：徹列浦杏告訴了實行者。他告訴我說，他已經辦到，叫阿爾諾里特去開汽車。

維省斯基：當時阿爾諾里特是什麼人？

舍斯托夫：當時阿爾諾里特是汽車房的總管。他是一個熟練的汽車夫。而且徹列浦杏告訴我，說他甚至準備了補救的辦法，這種補救的辦法就是：倘若阿爾諾里特膽怯不敢冒險，那末第二個載重汽車將由對面開來，衝擊輕汽車的側面，使兩者都陷入深谷。

阿爾諾里特眞正駕駛了莫洛托夫所乘的汽車，把車轉向深谷，這樣就使載重汽車的司機者看錯了，該載重汽車的司機者以爲阿爾諾里特已開入深谷，便開着車飛跑過去了。事實上，他雖然把車轉向深谷，可是他轉得不充分堅決，所以後面的衞隊簡直可以用手把前面的汽車拉住。莫洛托夫和車上其他的人以及阿爾諾里特均由覆車中出來。這就是當時徹列浦杏對我說的情形。我們與徹列浦杏一塊把這件事分析了一下，結果認爲阿爾諾里特沒有加足煤氣，同時扭轉汽車，扭轉得不充分。

維省斯基：讓我問一下阿爾諾里特，你聽了舍斯托夫的供詞嗎？他的供詞是否正確呢？

阿爾諾里特：在技術方面說得不十分淸楚……

維省斯基：但主要的那是事實嗎？

阿爾諾里特：是的，那是事實。

審判長：再訊問被告摩拉洛夫罷！

摩拉：讓我關於舍斯托夫的供詞說幾句話。我不想與舍斯托夫辯論，是溝渠或是深谷……

維省斯基：你親自到了溝渠所在的地方嗎？

摩拉：不，我沒有到過該地。

維省斯基：如果你沒有看見過那個地方，那末你就不能爭辯。

摩　拉：我並不想來爭辯。我要講第二件事情，即舍斯托夫所講的關於一九三三年暗殺鄂爾卓尼基茲的企圖。我鄭重聲明，那是舍斯托夫的虛構，我從來沒有給予過這樣的指示。

維省斯基：讓我問舍斯托夫。被告舍斯托夫，你聽見了嗎？摩拉洛夫否認你的供詞？

舍斯托夫：我極堅决的堅持我的供詞。我告訴了他，我在普洛科比也夫斯克的暗殺團已準備好。摩拉洛夫的方針，我很準確的轉告了徹列浦杏，他曾依照這種方針行事。後來徹列浦杏告訴我，說暗殺之所以沒有實現，只是因爲該暗殺團本來應該在焦炭井內用手槍打，但是該暗殺團動搖了，害怕了；同時鄂爾卓尼基茲又沒有坐汽車。

維省斯基：請你講一講，在基羅夫被暗殺後，你和皮達可夫會過面嗎？

摩　拉：會過面。

維省斯基：沒有關於基羅夫被暗殺的談話嗎？

摩　拉：有過這種談話。我們講到這件事給予一般人的印像，講到訓令畢竟已在執行：一個人已經被去掉了。

維省斯基：一個人已經被去掉了！皮達可夫沒有說，現在要輪到其他的人嗎？

摩　拉：我證明是說了的。

維省斯基：你們有沒有講過，只一殺個人，而其餘的還存下，這種暗殺是沒有結果的，所以應當一齊動作，

這種話是不是講過呢？

摩拉：我和皮達可夫都感覺到，像社會革命黨那種遊擊方法是不適用的。應當作到這種程度，就是要一下子引起驚慌失措的現象。使得黨的上級機關驚慌和失措，我們把這種辦法看作是登台執政的方法之一。

維省斯基：什麽原因使你這樣激烈地去反對蘇維埃政權，竟至於組織暗殺行爲呢？

摩拉：我的墮落，應當從我簽字於反黨的第一個文件之時算起，這就是一九二三年之四十六人的聲明書。從那時起，我的罪惡就開始了。後來我加入了托落茨基組織，直到我被開除了黨籍，放逐於西伯利亞，那時我當然替自己也替人家抱不平而發生一種怨恨。

維省斯基：我很願知道，爲什麽你決定給眞實的供詞呢？當我研究預審材料時，我覺得你在許多次訊問中，都否認了你的祕密工作。對不對？

摩拉：是的，直到十二月五日爲止。共計有八個月。

維省斯基：爲什麽你到最後決定了給眞實的供詞，並給了這種供詞呢？請你說明你的動機，爲什麽你決定把一切都供出呢？——如果你眞是已經把一切都供出了的話？

摩拉：我想，有三個原因使我否認一切。一個是政治的，是很嚴重的，兩個是完全帶個人性質的。先由最不重要的即我個人性質說起。我是一個極其暴燥易怒的人。這是第一個原因，所以當時把我監禁起

來，我非常憤恨不平。

維省斯基： 當時把你監禁起來，你不高興嗎？

摩拉： 不高興。第二個原因也是帶個人性質的。那就是我對托落茨基的戀慕。當時我認爲由道德的觀點上看來，背叛托落茨基是不容許的，雖然我不以暗殺和破壞的訓令爲然。我時常受良心的責備，我認爲這種訓令是不對的。這裏也有友誼的關係，也有政治上的着想第三個原因，你們知道，凡事都有過火的地方。我曾經這樣想：如果我繼續做托落茨基的信徒，而其餘的人已經脫離了——有些人誠懇的脫離了，其他一些人不誠懇的脫離了——但無論如何他們已不是反革命底旗幟了，而我呢，却要做這種英雄……如果我依然做托落茨基信徒，那末，我就會成爲反革命的旗幟。這令我非常驚懼。同時我親眼看見了幹部的增長，看見了工業、國民經濟的發展……我不是一個瞎子，也不是一個幻想者。

當時已快到第八個月了，我才對我自己說應當去服從國家的利益，爲了這個國家我奮鬪了二十三年，爲了這個國家，我曾在三次革命中積極戰鬪，那個時候我的生命幾十次都是繫於一髮。我怎樣可以依然如故，並繼續和加深這種罪惡呢？我的名字將成爲那些還站在反革命隊伍中的人底旗幟。這對於我是有決定意義的，我就自己告訴自己說：好吧，我去供出一切實情。我不知道，你對於我的答詞是否滿意？

維省斯基：一切都很明白，我沒有別的問題了、

審判長：辯護人沒有問題嗎？

辯護人：沒有。

十二·對被告舍斯托夫之審訊

維省斯基：被告舍斯托夫，儘可能的簡單地說一說你的犯罪活動罷！

舍斯托夫（以下簡稱舍斯——譯者）我的犯罪活動，是在一九二三年底開始的。那時我是莫斯科礦學研究院工人學校的學生。我積極地擁護了托落茨基的立場。

一九二四年秋季，在一次黨員大會上，我第一次欺騙了黨，說我放棄了托落茨基主義。一九二五年底，我又重新開始積極與黨作鬬爭。那時派我管理祕密印刷所。我印刷了托落茨基的刊物。

一九三〇年我在新西比爾斯克工作，而在一九三一年我因公赴莫斯科。大概在二月底我知道有大批經理要到柏林去那時我是東方煤礦托拉斯管理處的委員，我就請求管理處的主席幫助我赴柏林去我那時已經聽到說這一批人將由皮達可夫帶領。准許了我出國，五月初，我到了德國。

講到這里，必須關於從前的事情說兩句話。在一九二六年，我與托落茨基本人會面了幾次。同年我又會過皮達可夫。

總之，在五月初或五月中，我在柏林，在皮達可夫的辦公室裏，只有我和他兩個人，關於事務談話完後，我問他以下的問題：『你的登在報上的聲明書，怎樣了解呢？這是否眞正脫離托落茨基主義的結果，還是被迫而採用的步驟呢？』

皮達可夫問我，你有沒有讀到柏林出賣的最近的刊物呢？我說：我希望讀一讀。至於我所提出的問題，那麼皮達可夫勸我同斯米爾諾夫去談。

我就這樣去做。經過兩天，我同斯米爾諾夫會面。

斯米爾諾夫那時告訴我以下的話：現時蘇聯的環境已大大改變了。你自己應當懂得，公開鬬爭是不可能的。現在托洛茨基份子的任務在於得到黨的信任，那時再用兩倍三倍的力量去重新進攻。斯米爾諾夫勸我同謝多夫去詳細談談最近新的方針。我表示願意。

我同謝多夫會面時，我問他我們的領袖托落茨基想些什麼，他問我們托落茨基份子提出些什麼具體任務。謝多夫開始說，不要袖手旁觀，必須用一切力量和辦法，採取積極政策以破壞斯大林的領導和政策的信用。其次，謝多夫說，他父親認定唯一正確的道路，——困難的，但是可靠的道路，這就是以暗殺的方法，用暴力來去掉斯大林和政府的領導者。他看見我接受了他的說話，便轉

而談到別的題目。他問我德國公司的經理中我是否知道什麼人，例如得伊里曼。我說，我記得這個名字，這是『弗列伊里黑——克留普費爾——得伊里曼』公司的經理。這個公司是根據條約在技術上幫助庫茲巴斯開礦的。謝多夫說：『我勸你同這一公司發生聯繫，並與得伊里曼先生認識認識。』我問他為什麼要發生連繫。他說，這一公司幫助着送信到蘇聯去。我那時告訴他：『你勸我同這一公司勾結麼？』他說：『這有什麼可怕呢？你要懂得，他們既然替我們作了事，那為什麼我們不能替他們作些事，給些消息與他們呢？』

我說：『你簡直要我做偵探！』他兩肩一聳而說道：『你用不着說這種話，在鬬爭中像你這樣多所顧忌而提出問題是不對的。』

在七月十日左右，我會到了斯米爾諾夫，他直接問道：『你的情緒怎麼樣？』我說：我沒有個人的情緒，我總是唯命是聽，如同我們的領袖托落茨基所教訓的一樣。當時我就問他：『謝多夫叫我同「弗列伊里黑——克留普費爾——得伊里曼」公司連繫起來，這個公司是在庫茲巴斯進行偵探和軍事破壞工作的。』斯米爾諾夫說：『你不要說這樣響亮的話吧，什麼偵探，什麼軍事破壞。』他說：『如果使德國的軍事破壞者來參加這個工作。你認為有什麼可怕呢？』他向我解釋，別的道路是沒有的。我就同意了與該公司發生聯繫。

維省斯基：你得到了什麼指示，你怎樣去執行這些指示呢？

舍斯：我在回國之前，與該公司經理得伊里曼及副經理科黑會了面。

維省斯基：你們的談話內容怎樣呢？

舍斯：與該公司領導人的談話內容如下：第一，約定經過該公司在庫茲巴斯工作的代表傳達偵探的消息，並約定與托落茨基份子一起共同組織暗害和軍事破壞的工作，約定該公司在自己方面也幫助我們。

維省斯基：得依里曼有沒有說他們用什麼方法來幫助你們？

舍斯：他說他們已經有自己的人……

維省斯基：在什麼地方？

舍斯：在庫茲巴斯。他還說，他們能夠根據我們組織的要求，再派人來。而托落茨基的組織應儘量幫助這些軍事破壞者。同時，這一公司擔任兩方面中間的聯繫：一方面是在蘇聯的托落茨基組織，我也在內……

維省斯基：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

舍斯：另一方面是謝多夫。當時約定這個公司必須好好地把有『阿略沙』名字的信交給我，同樣轉交我的回信；他們必須儘量幫助托落茨基份子得到政權，而我們將與該公司訂立關於開礦設計以及大批定購各種設備的條約。當時他們告訴我說，他們在庫茲巴斯有他們的偵探，名司托羅依洛

夫，並且說我到那里可以與這個司托羅依洛夫發生聯繫。

維省斯基：當時在庫茲巴斯工作的司托羅依洛夫怎樣竟做了得伊里曼的偵探，關於這一點，你沒有問到麼？

舍斯：在這以前，司托羅依洛夫在德國住了很久。

維省斯基：這就是說，談話是很開誠佈公的。

舍斯：是的，談話是很爽直的。

維省斯基：以後怎樣呢？

舍斯：以後我就着手進行具體工作。我開始勾引司托羅依洛夫工程師。我到他家裏直接對他說，我知道他與『弗列伊里黑——克留普費里——得伊里曼』公司有聯繫，因此我直接告訴他，不要停止工作，必須重新開始積極進行破壞的工作。勾引一個司托羅依洛夫，對於我並不重要，而重要的是勾引他的同道。我知道他在好些工程師中間有很大的威信，我毫不懷疑他們在反革命工作方面也與他有聯繫。我預告他說：你不要以爲可以向國家政治管理局去告我的密，我在西西伯利亞邊區有充分的信用，如果你去告密，誰也不會相信你的。如果我去告發你的工作，那你就要立即被捕。司托羅依洛夫驚惶失措，並說道。明天回答你。在第二天，司托羅依洛夫說他同意參加我們的組織。我叫司托羅依洛夫擬定暗害工作的計劃，其方針如下：

(一)阻碍新的礦井建設並阻碍正在進行的改造舊礦井的工程；

(二)設法把新礦井中以及改造的礦井中的建設工作，加以不正確的組織，使得新建築物只能局部地開工動用而不能一齊開工；我們的用意，就是要使計劃上所規定的生產能力，延期實現；

(三)實行一種不正確的挖煤辦法，使得煤炭受到最大的損失，同時使礦井中發生火災；

(四)設法阻碍和延擱煤井中新採掘地段底準備工作以便不僅使庫茲巴斯的礦業受到重大打擊，而且使西伯利亞及烏拉爾的冶金業也受到重大的打擊；

(五)設法阻碍和延擱準備工作，以便造成清除工作與準備工作中間不相配合的情形；

(六)採用愈加有效的辦法去加強破壞機械，特別是挖煤和運煤的機械。我們採用這些辦法的用意，不僅是要破壞挖煤計劃，而且是要引起工人的憤恨；

(七)對於生產突擊運動實行怠工，最後一時期，對於斯塔漢諾夫運動實行怠工，欺侮工人。司托羅依洛夫把計劃給我看，我就批准了這個計劃。

維省斯基：你們馬上就着手實行這一計劃麼？

舍斯：是的。

維省斯基(向司托羅依洛夫發問：)被告司托羅依洛夫，我要查明舍斯托夫所供認的這部份口供是否實在。你在德國很久麼？

司托羅依洛夫（以下簡稱司托——譯者）：一年多。

維省斯基：你在那里怎樣被人勾引了去的呢？

司托：不是『得依里曼』公司，而是維司鐵爾工程師勾引了我。他是一個著名的工程師，他在社會上很有地位。他告訴我說，他與某些政界及工業界都有聯繫，他勾引了我。

維省斯基：要你做什麼事呢？

司托：要我替德國進行暗害破壞工作。

維省斯基：替那一個機關呢？德國有各種機關，老實說來，你曾與德國暗探局有了聯繫嗎？

司托：是的。

維省斯基：這與『得伊里曼』公司又有什麼關係呢？

司托：『得依里曼』公司也知道我。

維省斯基：知道你呢？還是勾引你呢？

司托：不是勾引我，勾引我的是維司鐵爾。但是顯然的，『得依里曼』公司知道維司鐵爾工程師勾引了我。

維省斯基：舍斯托夫從國外到庫茲巴斯，他眞正到了你家里來要你同他們一起做暗害工作麼？

司托：是的。現在要講到舍斯托夫到我家里來的情形。我當時很詫異，向他提出下述問題：我與他們托落

茨基份子所實行的黨內工作相距很遠，我不懂得我一個非黨的工程師，如何能夠與托落茨基組織發生什末聯繫。他回答我說，這一問題，即黨內工作問題，是過去的階段，現在托落茨基份子和德國人在他面前所提出的任務與在我面前所提出的任務一樣。什麼區別也沒有。

維省斯基：這就說服了你麼？

司托：不是的，說服了我的，並不是這一點。說服我的，就是我知道他的性格……

維省斯基：什麼性格？

司托：他眞正會把我交給國家政治管理局，我簡直害怕。

維省斯基：他用恐怖手段來擒獲你麼？（聽衆發笑。）

司托：他用了所謂突如其來的辦法。（聽衆發笑。）他指出了那個在他未來之前我曾予以若干幫助的公司。

維省斯基：你曾在這個公司的掌握中麼？你怎麼掉入他的掌握中去的呢？

司托：我掉入他的掌握中去，是由於兩個德國人的介紹：一個是伯爾格，另一個是得伊里曼。這兩個人可說包圍了我。他們所用的辦法如下：伯爾格曾責備我說，當外國專門家被請去參觀礦井時，我進行了共產主義的鼓動。

維省斯基：你眞正進行了共產主義的鼓動麼？

司托：沒有的。我們會被絕對禁止在國外參加任何政治工作。但是伯爾格說，我在兩次專門家被請去參觀時作了政治鼓動。我記得有一次專家被請去參觀時，還來了兩個德國便衣警察。然而我失愼的地方，主要的，就是在九月間在參觀『瓦里拉姆』公司（該公司製造堅硬的合金與克魯伯廠有相當關係）時我一面吃早飯，一面與伯爾格有不正當的談話。我與他並沒有講到反革命的話。然而他看見我完全同意五年計劃，我完全同意我國所進行的一切辦法，他說：『你這樣說，因爲你年青，我過去住在俄國十五年，很知道那邊的情緒和情形。如果讀了托落茨基先生的書，那你就會說另外一種話。』我現在承認，我那時就讀了托落茨基所著的我的生活一書。後來有一次與伯爾格會面，他忽然問我：『那本書你讀過了沒有？』我說，讀過了。

有一次我到魯爾區域去，得伊里曼老頭子，他的兒子以及『額伊克托爾』公司派來的工程師名叫別格曼，到我的旅館來看我。當時的談話內容如下：他們說，我們俄國人，我司托羅依洛夫也在內，完全不看重德國人的款待，德國人讓我們到各地方去參觀，研究等等，但是我們却並不感謝，俄國的定貨都轉向英美去定。他們要求我在技術雜誌上並對蘇聯商務代表竭力介紹他們的製造品。我回答說，這不能由我作主。結果，他們簡直威脅我說：我們知道你在蘇聯接收了一些人，而這些人却是我們的代表。我說我不知道這件事。他們指出某人某人。我知道這是事實。我實在接收了他們。他們又說：『我們知道你進行共產主義的鼓動。』我說：這完全不對。

他們提出二者必取其一的問題說：『或者我們禁止你到任何地方去參觀，或者當你到什麽地方去的時候，我們逮捕你入獄。讓你們的商務代表來替你奔走，但是他們是不會爲着你而不惜發生衝突的。……

後來他們又講到『歸根到底，我們的公司是很好的。如果你替我們介紹，那末，這並不引起什麽嫌疑。』因此我後來就幫助了他們。……

維省斯基：雖然如此，但這並不足以使你做暗探局底偵探。

司托：自然這是不夠的。我做了偵探是在一九三一年四月間。我現在所說的話，則是一九三〇年十月底或十一月初的事情。

維省斯基：請你說吧，你怎樣做偵探。

司托：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底我回莫斯科參加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常會，因爲我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候補委員。我到了我父母所在的集體農莊中：我當時認爲實行集體化的辦法是不正確的。認爲無論如何那時所實行的速度是不正確的。我那時想，蘇聯工業化的速度及範圍也太大了。我發生動搖，發生懷疑……

開過會以後，我又到德國去。我那時願意留在德國。

維省斯基：你願意留在德國，你同誰說過這件事情沒有呢？

司托：我不僅說過而且寫過申明書。

維省斯基：寫過什麼申明書，寫給誰？

司托：寫給維司鐵爾。我在申明書上寫道，我決定不回蘇聯，願意留在德國，與他們一起努力工作，並執行他們的囑咐。

維省斯基：這叫做什麼呢？

司托：這叫做背叛祖國。

維省斯基：背叛祖國！你這個俄國人啊！你這個蘇維埃公民啊！你的申明書落在什麼人手裏，落在維司鉄爾手裏嗎？

司托：維司鐵爾說，我已是他們的手中物了，如果我不執行他們的個別委托和囑咐，那末就要把我交給蘇維埃政權機關，並把我親筆寫的申明書交給這些機關。因此我同意了維司鐵爾，就是說做了叛徒。

維省斯基：結局就是如此。請坐罷。可以繼續訊問舍斯托夫麼？

審判長：請吧！

維省斯基：你的偵探工作怎樣呢？

舍斯：在一九三二年底，在新西比爾斯克我會到了司托羅依洛夫，他告訴我說，有一大批德國新的專門

家——軍事破壞工作者到來。

維省斯基：說出他們的姓名罷。

舍斯：在普洛科比也夫斯克，我與舍別斯托、弗洛連及卡恩三人發生聯繫。在一九三四年，我已經做另外一個礦區的總管，在那裏我與石頓發生了聯繫。

維省斯基：你經過誰而與巴烏姆加爾特聶爾發生聯繫呢？

舍斯：我由司托羅依洛夫那裏知道了這個人。

維省斯基：總之，歸根到底，司托羅依洛夫是禍根。舍別斯托經過司托羅依洛夫而與卡恩聯繫——又經過司托羅依洛夫而與巴烏姆加爾特聶爾聯繫——又經過司托羅依洛夫而與其他的人聯繫等等。一切都是經過司托羅依洛夫麽？

舍斯：對的。

維省斯基：請讓我問司托羅依洛夫。被告司托羅依洛夫，這是對的麽？

司托羅依洛夫：是對的。

維省斯基（問舍斯托夫）這樣說來，你有不少的同夥了？

舍斯：舍別斯托要求我給他一覽圖，以便註明重要的建築物和機器，去開始進行軍事破壞工作，我把一覽圖給了他。他利用這張一覽圖，在普洛科比也夫斯克區域實行軍事破壞工作。這就是企圖爆炸

第五號礦井的升降機和礦井。他放置了炸藥、爆炸管及引線，只要把引線燒着，立卽發生爆炸。但未曾發生爆炸，只是因爲在礦井中及升降機下安放炸藥時，不知一個什麼人在那裏走動，所以妨礙了這件事。到了第二天夜晚，工人打掃升降機，發現了炸藥，把炸藥搬走了。

維省斯基：以後還有什麼事情呢？

舍斯：依照我的指示，在技術員卡恩的幫助之下，由一個貯藏炸藥的地方偸出了炸藥，並埋在地下，把那個地方作爲自己的祕密的炸藥貯藏所。在一九三四年，這個貯藏所爆炸了。礦工的孩子們在貯藏所不遠的地方玩，大概孩子們掘地，觸動了炸藥，所以發生了大爆炸。

維省斯基：孩子們怎樣呢？

舍斯：炸死了。

維省斯基：你沒有說爲什麼偸炸藥？也是爲着上述那種爆炸麼？

舍斯：（默不做聲）

維省斯基：準備炸礦井麼？

舍斯：完全對的。在一九三三年五月舍別斯托根據德國暗探局及我的指示，曾企圖放火燒庫玆巴斯的電站。

維省斯基：放火的企圖表現在那裏呢？

舍斯：我從舍別斯托那裏確實知道電站中放了火。

維省斯基：這就是說，並不是企圖，而是眞正放火？

舍斯：是的，眞正放火。其次，我從弗洛連那裏又知道他在一九三四年秋季燒了九號礦井底屯煤所。

維省斯基：你自己的破壞工作又怎樣呢？用暗害的辦法裝置了礦井中的設備以及其他等等後又怎樣呢？

舍斯：我現在來說一說。這是很大的一部份。在普洛科比也夫斯克礦區中實行了一種暗害的掘煤辦法。本來煤的損失僅百分之十五至二十，而實行了這種辦法以後，煤的損失就超過百分之五十以上。第二，由於這種事實，到一九二五年年底，在普洛科比也夫斯克礦區中，地底煤炭焚燒的事件約達六十次左右。

維省斯基：這種犯罪工作，誰幫助你幹的呢？

舍斯：司托羅依洛夫幫助我。普洛科比也夫斯克礦區的總管沃夫相尼科夫及總工程師馬依華爾幫助我。我在他們幫助之下，不及時地實行掘深礦牀，例如在莫洛托夫礦井中；而且從一九三三年起，就故意閉塞了焦炭礦井中的第一百層礦苗；而在馬聶伊赫礦井及五——六號礦井中則延期掘深礦牀，一直延遲到兩年之久。其次，在普洛科比也夫斯克煤區中我親自計劃開掘第七及第八號兩個大礦井，故意把這兩個礦井位置在煤苗不好的地方，這兩個礦井我事前就知道，後來掘煤時，一定

有極大的不順利的事件。這是故意做的。在第五及第六號礦井中。在裝置設備、裝置礦井中電站及其他機械的時候，曾做了很大的破壞工作。這都是我勾引來的工程師石聶伊得爾及其幫手們做的。

維省斯基：這就是全部暗害工作麼？

舍斯：在昂熱爾克第五號礦井中延擱了兩年才開始掘煤。在第九號——第十五號礦井中也進行了這樣大的暗害工作。在列寧礦區，以及昂熱爾克——蘇靜斯克礦區中，對於正在工作的機械也進行了大的破壞工作，因爲這個緣故，這兩個礦區在五年之內都沒有完成計劃。末了在一切礦區中，即普洛科比也夫斯克，昂熱爾克以及列寧礦區，對於斯塔漢諾夫運動均實行怠工。有過指令要引起工人的忿怒。工人因種種阻碍總要對礦井中的領導者痛罵幾百聲才能達到工作的地點。造成不能做工的條件。不僅不能用斯塔漢諾夫的工作方法，而且不能用通常的方法進行經常的工作。

維省斯基：還有兩個問題。第一，除了你所說的這些犯罪行爲以外，你有無眞正土匪的犯罪行爲呢？例如偸盜和行兇殺人。

舍斯：行兇殺人的事是有過的。

維省斯基：這並不是什麼恐怖，而正是隨便行兇殺人麽？

舍斯：我記起，在普洛科比也夫斯克的暗殺團曾經殺死工程師巴亞爾石諾夫。

維省斯基：爲什麼殺他呢？

舍斯：根據我的指示殺死他的。他曾告訴我說，在建築礦井的工作上有人搗鬼，請我注意。那時工程師和技術人員都信任我。巴亞爾石諾夫本人是過去頓巴斯暗害份子，但是他在這個礦井中却很誠懇地工作。

維省斯基：他請你注意，把你當作一個有威信的領導者麼？

舍斯：是的。他要我注意這一點。我對他說，我知道了，謝謝他，並對他說：『我去告訴相當的人，你暫且不必對別人說。』後來我就叫徹列浦杏來，並囑咐他殺死巴亞爾石諾夫。他就辦了這件事。（聽衆驚動。）

維省斯基：殺死了巴亞爾石諾夫麼？

舍斯：是的。

維省斯基：把忠實的工程師殺了麼？

舍斯：是的。

維省斯基：第二個問題，偸盜的情形又怎樣呢？

舍斯：搶過昂熱爾克銀行。這是根據我的指示，在我參加之下偸盜的。

維省斯基：這件事情的經過情形怎樣呢？

舍斯：在一九三四年間，我勾引了國家銀行昂熱爾克——蘇諍斯克區的分行經理非谷林，而非谷林又

勾引了錢款收發主任索洛明加入組織，他們兩個人由錢庫中盜竊了十六萬四千盧布給我，作爲我們組織的經費。

維省斯基：你怎樣辦呢？

舍斯：我這樣分配了這筆錢：留下大約三萬個盧布，作爲昂熱爾克組織，暗殺團（即舒馬黑爾和費多托夫底暗殺團）以及其他的用度。給了摩拉洛夫四萬個盧布，作爲他屬下組織之用，他又向我要了三萬盧布給克梅洛沃的組織。這就是說，摩拉洛夫拿了七萬盧布去。其餘的錢，我給了普洛科比也夫斯克的組織，即給了徹列浦杏，大約一萬五千盧布，並給了沃夫相尼科夫大約三萬個盧布。

維省斯基：誰監督了這筆錢的用途呢？

舍斯：我信任這些人。

維省斯基：當然，因爲這是國家的錢呀！我沒有別的問題了。

二十五日晚庭審訊至此結束。

十三．對被告司托羅依洛夫之審訊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早庭

審判長：被告司托羅依洛夫！你承認你在預審時，以及最高法院軍事庭在去年十一月出差審判時所作的口供，確符事實麼？

司托羅依洛夫（以下簡稱司托——譯者）：是的。

維省斯基：你現在能不能給你昨天的口供以什麼補充？

司托：我曾經被委派留德兩年，並在德國擔任蘇聯商務代辦處技術科礦業部主任工程師的職務。事情之逐漸開始，是由於同德國人伯爾格認識。伯爾格善操俄語，因為在革命以前，他曾在俄國彼得堡居留十五年至二十年之久。伯爾格是許多機關的情報員。我與柏爾格曾經談到我們蘇聯建設的問題。伯爾格曾勸我閱讀托落茨基所著的一本書，關於這點，我昨日已說過了。

當我在蘇聯時（這是一九三〇年十一月末或十二月初），這位伯爾格也在莫斯科，他當時特地打電話給我，懇切請我到他寓所去會他。我當時沒有去，於是他便請我給他寫一張明信片，說明我究竟什麼時候返德國去，我於是就寫了明信片。我返德國以後，曾會見伯爾格多次；在有一次談話中，他說，在蘇聯，人們已經知道我給『瓦里拉姆』和『愛克果夫』兩公司的某些幫助，在第二次的談話中，他還補充說，大約有人在祕密監視我，而且在蘇聯，人們已經知道我的反蘇聯的談話，因此我必須留在德國。

一九三一年三月末，因伯爾格之介紹，我與維司鐵爾發生了聯繫，以便請他幫助我能到捷克

和法國去，查明關於開採豐富煤層的問題。維司鐵爾對我說：『這個我可以替你辦到，可是因爲你不是德國人，所以一定要書面的證據，證明你是我們的人，並且不會使我吃虧。』於是我就給了這樣一個文件，在這一個文件中我已經說我同意不再回蘇聯，而留在德國與他們一塊兒工作，並執行他們一切囑咐。經過三四天以後（這是四月二號），我就特地跑到阿爾姆司特拉舍街，大約是第二層第五十九號房間會他。維司鐵爾當時對我說：『無論是留你在德國也好，無論是幫助你到法國和捷克去考察也好，都是根本辦不到的。』老實說，我當時覺得非常吃驚，並且說這簡直太不誠實了。他回答說：『這裏並沒有絲毫不誠實的地方，你既已親自寫了聲明書，因此你應當執行我們的囑咐，因爲你，司托羅依洛夫先生，已經承擔這個義務。』他當時高聲說，他現在說話，本不是他個人的意見，而是代表政界說話。該政界能夠，或因爲我進行了所謂某種煽動，可以把我監禁在德國監獄內，或者是藉口於我寫的聲明書，把我交給蘇聯的監獄。我於是就表示同意執行維司鉄爾的指示。說句老實話，就是同意做叛徒。在同一談話中，他又說，我的最近的任務，就是要幫助德國專門家，尤其是幫助那些在蘇聯以暗號——『謹代表維司鐵爾致敬意』——來會我的工程師，那時我應竭力幫忙，把他們安插在蘇聯擔任一定職務，幫助他們進行工作，不要注意他們所作的技術上的缺點。

其次，他說我應當設法阻礙蘇聯採煤工業之發展，老實說，這就是實行暗害工作的指令。

四月十一日，我接到電報，該電報要我回蘇聯工作。在新西比爾斯克，我最初是被任命爲合理化及研究工作管理局的副局長而在一九三二年，便被任命爲該局的正局長。大約經過兩個月以後，就有一些德國工程師，以暗號來找我，至一九三四年末爲止，曾來訪我的有以下六人：左梅勒格爾，午爾姆，包烏姆加爾特聶爾，馬阿斯，哈烏額爾，弗列沙。後來我知道了，所有這些人，都是特別派來的偵探，所有這些人，都派了最重要的工程職務。

在八月間，其中有一個人，引起了一個關於德國一個官場人物的談話……一九三一年初，他對我說，這位官場人物知道我，經過一個半月，大約是一九三一年四月，他又說這位官場人物給我致意，並請我不要忘記我自願擔任的義務，於是在我的週圍又形成第二圈套。這個官場人物的指令，與維司鐵爾的指令並無多大差別，這好像是一個督促的表示。

我給維司鐵爾送了三次消息報告，在每次的回答中，我都得到相當的指令。

維省斯基：你得到什麼指令呢？

司托：是反革命的、破壞工作的指令。我的第一個消息報告，是在一九三二年正月，是經過工程師弗列沙轉達的。在這個消息報告裏，我所報告的，是關於庫茲巴斯的大規模的建設計劃。這個報告，實際上是偵探性質的報告。在同年八月，弗列沙從德國來蘇聯，並告訴我，維司鐵爾要我糾合反革命的專門家來建立暗害的組織。一九三三年，我經過左梅勒格爾報告維司鐵爾說，我已經開始建立這樣

的組織。

一九三四年，大約是六月，適逢左梅勒格爾回德休假，我又經過他報告維司鐵爾關於以下的消息：第一，已有多少蘇聯本國的專門家被吸來參加反革命的組織；第二，有那些礦山已經成立了這種組織。在報告中，我又說，各礦井之開工和經營，已日益是照暗害方法來進行。他們在回答中間，指出必須進而採取暗害的、軍事破壞的堅決行動。至於說到那個官場人物，那末所有他的指示，基本上都是關於人力的安插和佈置，例如工程師石梯克林格，因爲這個官場人物的堅決要求，才被我派到和介紹到克梅洛沃，以便與當地反革命組織發生聯繫。

當時我接到這樣的警告，就是我無論如何不要反對這種純粹奸細的辦法之實行。

審判長：被告司托羅依洛夫，你是想說到那個曾被你在新西比爾斯克審案中指出過的外國官場人物底行動麼？

司托：是的。我正想說到這個外國官場人物。

審判長：請你注意在法庭審判時，你不應當隨便說出外國官場人物的姓名，外國機關的名稱及外國代表的姓名。

司托：好了。因爲這個官場人物的堅決要求，我便進行了煽動蘇聯和外國工人反對蘇聯政府（因爲國家公訴人的請求，法庭的一個小日記本拿出給被告司托羅依洛夫看。在這個小日記本裏，寫着伯

爾格遊歷蘇聯時寓居莫斯科的電話號碼。司托羅依洛夫承認說：這是他的小日記本，而這個電話號碼是他自己寫上的。）

（維省斯基同志請法庭把『沙沃依』旅館所給的字據，一併列入案卷中。在這個字據中，證明伯爾格是德國人，是商人，從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一號至十五號曾在該旅館寓居，伯爾格當時之住房電話號碼，與司托羅依洛夫小日記本上的號碼相符。維省斯基同志請法庭把司托羅依洛夫的小日記簿也併入案卷中，在小日記簿上，司托羅依洛夫記載有他和維司鐵爾、伯爾格、左梅勒格爾三人的接見和談話的情形，並說到維司鐵爾的信。）

維省斯基（對司托羅依洛夫說：）現在請你說你的暗害的軍事破壞的活動吧！

司托：關於這一點舍斯托夫昨天已經說出，而且他也不能不說出，因為暗害工作及破壞工作的計劃，是我同他共同製定的，他是以西西伯利亞托落茨基總部代表資格參加製定這個計劃的。

這工作的內容怎樣呢？外國工程師舍別斯托曾企圖實行破壞第五、六號礦井中的展壓機；曾再三設法從中央管理處偷出各種機械之圖案和圖形，這種機械是正在生產工作中試驗，而且都是我們蘇聯自己的發明，這就是掘煤汽鑽，探礦機等等。其次，又決定燒毀電站。結果據左梅勒格爾對我說，機器房裏的間壁果然是被焚毀了。其次五、六號礦井裏的隧道，被我們故意設備得這樣，以致於完全沒有方法執行電機的轉運。此外，又提出了所謂『舍弗阿』的方法，這方法之所以叫做

『舍弗阿』是以此種方法之發明人——舍別斯托、弗列沙、阿塔的姓名第一個字母拼成的。這種方法，能使煤的產量損失百分之八十。

我們又曾試圖停止普洛科比也夫斯克煤井地下層的一切工作。地面碾平機之設計，也是做得很壞的。

在『焦煤井』方面，我們把汽壓重機基礎和廠屋基礎連接在一起，結果，所有的牆壁時刻發生震動，簡直有隨時傾覆的危險。

在魯希莫維奇礦井方面，工程師威別爾故意阻塞發現底下煤層的通道，結果便減少了焦煤之產量。在兩年過程中，工程師哈烏額爾故意忽略英美機械之位置，專門只從事於德廠機械之仿製圖案工作，希望蘇聯將向德國公司購買這些機械。弗列沙曾多方破壞庫拉科夫工廠所產一切裝置品之威信，故意造成一種必須從國外購買電汽機械的空氣。

我不說所有曾在我們這裏工作的七十個德國工程師，都是暗害工作的軍事破壞工作者。決不可這樣說。進行這種工作的，乃是我上面所指的六個人以及舍斯托夫在供詞中所指出的人。其次，還有曾在『北井』工作的石梯克林格。

我現在要說說我們的設計工作。關於這方面的工作，是由托落茨基份子威爾石科夫指導的，可是此中詳情，我也曾知道。當時每一個煤井的設計工作，都佈置得這樣，彷彿每個地段，都屬於私

有主人，而絲毫未估計到彼此的交通，電站位置等等，結果礦井雖然陸續動工，可是生產工作始終不能進行。

維省斯基：你們把克梅洛沃礦山弄成怎樣地步呢？

司托：一九三五年，我曾經最後到過該處一次，我當時是被該礦山的經理處叫去的，因為當地社會的和黨的組織，已開始懷疑在那裏所做的工作。在我到那裏時，礦山的情形已經很壞了。礦井裏面的工作場所弄得非常仄狹低矮，簡直無法實行採煤工作。轉運機及電車也無法經常運送撐支的木料，故意不注意煤層的比重，通氣管完全破壞了。煤井第二層方面的基本建築工作，完全沒有進行，這樣的工作情況，我是從未看見過的，這完全是皮舍霍諾夫暗害團所作暗害工作的結果。我當時曾不得不勸他不要如此明幹，勸他停止這樣露骨的行動。可是我這種指示，他並沒有實行。當我問他為什麼沒有採取任何辦法來執行我的指示，何況我這個指示不僅是以反革命組織領導者的名義，而且是以主任工程師（聽衆發笑）的資格發下的。那時他就回答道：他已經和我的代理人安得列也夫——建築工作的主任——說過，結果他們共同決定了不要改善礦山的情況，而且認為我是不會反對這點的。

維省斯基：那麼你的意思，是說他們做的太過火了？

司托：是的，他們的確做得太過火了。

審判長：本法庭允准國家公訴人的請求：把「沙沃依」旅館經理所送呈之關於外國人伯爾格曾於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一日至十五日在該旅館寄居的字據，併入本案案卷中。此字據已由該旅館經理簽字蓋章。

同樣，本法庭允准國家公訴人之請求：把德國之住址及電話號碼簿（第七版第二卷）併入本案案卷中，因在此住址及電話號碼簿裏，註明有維司鐵爾底柏林住址，此住址適與司托羅依洛夫小日記本上所寫明的地址相符。

（國家公訴人請求法庭，將莫斯科省蘇維埃執行委員會行政科外事部，關於工程師維司鐵爾、柏爾格、弗列沙、舍別斯托四人進蘇聯境及居留蘇聯境內地點的入境記登表，一同併入本案案卷中。其次，法庭依據維省斯基同志之請求，將二十個外國人之像片，拿出給司托羅依洛夫來看。司托羅依洛夫把這些像片一一看完以後，認知了四個工程師——維司鐵爾、柏爾格、弗列沙及舍斯別托——中每一人之像片。

法庭宣佈說，這四個由司托羅依洛夫所認知之像片，是與上述入境登記表上所有像片，完全相符。

舍斯托夫看罷法庭給他看的像片以後，認知了弗列沙與舍別斯托兩人之相片。

法庭宣佈說，由舍斯托夫所認知之弗列沙與舍別斯托兩人的相片，同樣是與該入境登記表

上所有相片完全相符。）

十四．對被告諾爾金之審訊

審判長：現在來訊問被告諾爾金。被告諾爾金！你是否承認你在今年正月間所作的口供是符合事實的？

諾爾金：是符合事實的

維省斯基：你曾在克梅洛沃担任什麼職務？

諾爾金：擔任克梅洛沃聯合廠建築工程總經理的職務。

維省斯基：誰派你到那邊去擔任這一職務的？

諾爾金：皮達可夫。

維省斯基：爲着什麼目的呢？

諾爾金：到一九三三年我明白，派我到克梅洛沃去的基本目的，就是要我在最重要的具有重大國防意義的化學工廠內進行破壞工作。這是我從一九三三年皮達可夫給我的那些指示中知道的，因爲我是托落茨基組織中的人，而皮達可夫是直接領導我的工作的。

維省斯基：皮達可夫當時對你說了些什麽話呢？

諾爾金：大體上說來，是要設法阻滯這一聯合廠的建築工程，以便破壞國家的力量，是要投下較多的資本而同時獲得較少的效果，並且要把資本不投在建築主要的部門，而投在建築次要的部門。

維省斯基：就是說要使這種資本不起作用麽？

諾爾金：是的。

維省斯基：當時有沒有講到那些具有國防意義的各種機械之動員準備性呢？

諾爾金：我承認我所已經供認的話是符合事實的。這一化學工廠是具有國防的意義。既然一部份資金是被抽去了，自然就削弱了有國防意義的部門。當時我們工作底基本方法曾決定如下：設法時常改變工程的設計，主要的是藉口於增加生產能力或實行合理化；設法延擱設計工作，延緩建築工程。

維省斯基：所有這些方針都是皮達可夫給你的麽？

諾爾金：是的。

維省斯基：在那一年給的？

諾爾金：在一九三三年。

維省斯基：你被任命爲克梅洛沃聯合廠建築工程總經理是在什麽時候？

諾爾金：是在一九三二年。

維省斯基：在任命你的時候，皮達可夫是否與你談過你和他所參加的那個犯罪組織呢？

諾爾金：在那個時候以前，我就被吸收在這一組織內了。

維省斯基：那末，你到克梅洛沃去的時候，是帶着你早從皮達可夫方面得到的舊方針去的麼？你從皮達可夫方面得到這種方針，究竟是在什麼時候呢？

諾爾金：我認爲我是在一九三一年正式加入托落茨基組織的。我在那時候就得到了托落茨基組織底一切基本方針。

內容最具體的一次談話是在一九三三年談的，在那次談話中，就規定了我在克梅洛沃聯合廠建築工程方面的具體任務。以後我們又談過我們共同活動的事情，其中應當指出的，就是在一九三五年年中作過一次談話，更明顯地給了我加強破壞工作的方針。其次，就是在不久以前，在我被捕不久以前，又作過一次談話，那時我得到了要在戰時實行爆炸和放火的指示。

維省斯基：你當時同拉達依查克有沒有什麼聯繫呢？

諾爾金：我當時同拉達依查克沒有直接的聯繫。但後來我却知道了，拉達依查克是自家人。

維省斯基：你怎麼知道的，爲什麼知道的？

諾爾金：我得到了拉達依查克的一個指示，這一指示的目的和原先向我提出的完全相同，不過策略是

另樣的。我所說的是在右岸所建築的工廠。我們當時曾想用普通方法延滯這一工廠的建築。而拉達依查克却提議用另外的方法，但是要採用他的方法，就須要炸毀地基，須要有重大的修改。總之，這樣辦法只能惹起人們的注意，但決不會有什麽效果。我當時曾作過抗議，但結果得到指示，說必須聽從拉達依查克，因爲他是自家人。

維省斯基：你在暗害工作方面究竟做了些什麽具體的事情？

諾爾金：主要的結果是，具有國防意義的那些最重要的工程被拖延了。庫茲巴斯電力供給屢次被破壞的事實，亦是很重要的結果。

維省斯基：關於軍事破壞行爲，你有什麽話要說？

諾爾金：在一九三五年我得到皮達可夫底指示，要注意基本的環節，以便不致分散力量而能得到最大的效果。

因此我就想出以爆炸方法破壞我們水電廠的計劃。而在一九三六年二月間，就發生了三次爆炸事件。

維省斯基：當時技術監督機關有沒有警告過你們，說你這樣幹，可以引起危險的爆炸？

諾爾金：警告過。

維省斯基：例如是否有波諾馬列夫和莫諾索維切曾向你們警告過這一點？

諾爾金：莫諾索維切這人我已經記不得了，但波諾馬列夫這人我是知道的。他是水電廠部份的主任。

維省斯基：你當時是否知道，一九三六年正月二十六日，波諾馬列夫曾經寫了一張條子給汽鍋部份主任（維省斯基同志將條子的內容讀出），其中警告說，磨碎某些煤炭的辦法是很危險的，可以引起毀壞機器的大爆炸和人命的犧牲。

諾爾金：這一文件我是看見了的。

維省斯基：這樣看來，有人曾警告過你，說如果採用這種供給煤的辦法，就有爆炸的危險，又說你所採取的預防辦法是不夠的，是不是這樣呢？

諾爾金：這一張條子不是寫給我而是寫給水電廠廠長的，同時預防辦法也不是我採取的，而是波諾馬列夫採取的。

維省斯基：我知道這一點。但是你諾爾金——克梅洛沃聯合廠建築工程總經理，不是也接到這樣一張字條：『茲附上汽鍋部份主任波諾馬列夫交給我的關於燒某些煤炭對電廠有危險的呈文：……因爲你關於燒煤事給了口頭上的命令，而我又根據這一命令給了汽鍋部份主任以與原有書面命令相抵觸的命令，同時又因爲磨碎某些煤炭會引起毀壞機器的爆炸，所以我特請求你下令停止供給這種煤炭。』有過這樣的事麽？

諾爾金：是的，有過的。

維省斯基：你當時是否知道，一九三六年正月卅一日，勞動視察員曾經通知這位汽鍋部份主任——波諾馬列夫，說根據勞動法第一百四十八條之規定，『……特再責成執行在各調查記錄中所已指出的關於停止燒這種煤以防爆炸之指示……』並說這一指示『務須立卽履行。』這豈不也是事實麽？

諾爾金：是事實；而這次爆炸便是我親自實行的基本的軍事破壞事件。

維省斯基：你對你們秘密組織底暗殺行動是否曾有什麽關係？

諾爾金：我當時知道這種工作是在進行。

維省斯基：你當時關於暗殺行動究竟知道了些什麽？

諾爾金：我當時知道基羅夫之被謀害，乃是被組織所實行的暗殺行爲。我當時也知道，托落茨基組織是預定並準備其他許多暗殺行爲來謀害黨和政府底領導者。關於這些問題，我當時所知道的便是如此。

維省斯基：你最近曾在黨內擔任了什麽職務？

諾爾金：我曾是黨底邊委委員和市委常務局委員。

維省斯基：而同時你又是反蘇聯的，進行暗殺、軍事破壞、偵探和暗害工作的托落茨基秘密組織中的人麽？

諾爾金：是的。

維省斯基：是否有過這樣的事情，就是你利用自己身任黨邊委委員之職，給了自己秘密組織中的人以相當的幫助？

諾爾金：凡是我在邊委內所得到的對於托落茨基組織及其個別份子有危險的消息，我自然立刻轉達或加以注意。

（國家公訴人問被告諾爾金，爲什麼他在被捕以後並沒有立刻承認自己的罪行，諾爾金答道在這一點上，皮達可夫關於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總部案的文章給了他以很大的影響。）

維省斯基：你所指的是眞理報上發表的那篇文章麼？

諾爾金：我所指的是那篇皮達可夫大呼『非常委員會工作人員，你們工作得眞好眞好』的文章。我當時對這一篇文章只能這樣了解，就是這篇文章給了一個暗號，要我們儘量設法遵守『不供』的指令。我當時這樣想着，既然這樣，那末皮達可夫是有繼續鬥爭的方法的。雖然在我被捕時，甚至在被捕以前，我已經明白鬬爭已無希望了，但我在被捕以後很長的時間內，終究還是沒有供認。

維省斯基：後來爲什麼不這樣幹了呢？

諾爾金：因爲一切都有盡頭的。

維省斯基：也許人家壓迫了你麼？

諾爾金：人家訊問了我，揭穿了我的罪行，並且還用對質的方法訊問。

維省斯基：你的監禁條件怎樣呢？

諾爾金：很好。你所問的是不是他人的壓迫呢？

維省斯基：正是。

諾爾金：任何的壓迫都沒有。

維省斯基：可以不給囚犯以飯吃，不讓囚犯睡覺——這樣的事實我們從資本主義監獄史上可以看到。
可以不給他香煙抽。

諾爾金：如果是講這一點，那根本就沒有這樣的事。

維省斯基：向你提出的證據是否充分有力呢？向你提出的證據是否起了作用呢？

諾爾金：我明白了鬬爭已無希望，且明白了必須說出本案全部眞相，這當然是起了作用的。

（審判長問被告諾爾金，托落茨基總部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時間中曾打算用什麼方法奪取政權，並打算指靠那些國內和國外的力量。被告諾爾金供稱，基本的方法是暗殺、暗害和軍事破壞，以及吸收外資並用租讓等等辦法給予外資以種種優待。至於講到國內的力量，那托落茨基總部所打算依靠的，首先就是富農份子。此外，在與皮達可夫的談話中，曾討論了關於利用外資，首先是利用德國力量的問題。

審判長：最後一個問題。當皮達可夫在一九三六年七月間叫你想一想，怎麼可以組織化學聯合廠之爆炸時，你不是表示擔憂，說還會死傷工人的生命麼？

諾爾金：在供詞中有這一點，並且這種擔憂的話我不只說過一次，而說過多次。

維省斯基：皮達可夫當時怎樣答覆你呢？

諾爾金：皮達可夫當時答道，人命的犧牲是必不可免的。而且他還說了一句話：『你還可憐他們麼？』這句話我在昨天已經供認了。

十五．對證人石頓之訊問

（石頓用德國話說出供詞）

審判長：證人石頓，你的名字和父系名叫什麼？

石頓：我的名字是阿列克斯，父名米海依洛維切。

審判長：你應當對於被告舍斯托夫的案子說出供詞。你最近以來在蘇聯什麼地方工作呢？

石頓：在列寧斯克。我是在電汽站的設備工作上做監工主任。

維省斯基（向翻譯員）：請你問一問證人石頓，他是否知道舍斯托夫？

石頓（經過翻譯員）我於一九三四年認識舍斯托夫。

維省斯基：從那個時候起，你常常與他相遇嗎？

石頓：我與舍斯托夫相遇過好幾次。

維省斯基：你常常與舍斯托夫會面嗎？

石頓：常常會面。

維省斯基：是在那幾年之內呢？

石頓：在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有一次在一九三六年。

維省斯基：我請證人石頓證明他所知道的舍斯托夫，是否就是這個人。

審判長（用手指着舍斯托夫）：證人石頓請你看這個被告人。

維省斯基：就是這個舍斯托夫嗎？

石頓：是的。

維省斯基（向舍斯托夫發問）：你所講的石頓就是這個人嗎？

舍斯托夫：是的，這就是石頓·阿列克謝依·米海依洛維切。

維省斯基：爲什麼阿列克謝依·米海依洛維切呢？

舍斯托夫：在昂熱爾卡他們大家都是這樣稱呼他：「阿列克謝依·米海依洛維切。」

維省斯基：關於舍斯托夫的犯罪行爲，你知道些什麼呢？你是否知道舍斯托夫所做的犯罪行爲呢？

石頓：舍斯托夫曾請我代他做軍事破壞方面的工作。

維省斯基：在什麼情形之下，有什麼緣由他向你提出這樣的提議呢？

石頓：首先我應當說我與德國工程師所進行的工作，這些德國工程師，還在舍斯托夫以前，就與我在這方面做過工作。

維省斯基：請你說吧。

石頓：第一次我與工程師午爾姆談過這一種工作。

維省斯基：『談過這一種工作，』究竟談的是什麼呢？

石頓：談的是參加軍事破壞工作。我們指的是工廠中的停工，拆毀和損毀機器，不正確地安放電管。我可否講到午爾姆進行這種工作的全部歷史呢？講到人們怎樣吸收我來做這個工作呢？

審判長解釋：證人石頓，不能在公開的審訊會議上指出正式外國機關，也不能指出這些機關中工作人員的姓名。

（國家公訴人維省斯基同志請審判長向證人石頓解釋，證人可以在不公開的審訊會議上指出這些機關的人員。）

（審判長就解釋了這一點。）

（石頓繼續自己的口供：）

一九三二年工程師午爾姆和左梅勒格爾來到。工程師午爾姆來到我的住宅，以德國人的資格來會德國人，並在這種藉口之下，我們就彼此認識了。工程師午爾姆說，我們來到蘇聯，並不是來幫助布爾塞維克的。我們來到此地，是來幫助德國國家，幫助德國公司的。他說，無論如何應當損壞那些由德國輸入的機器，以便可以再輸入新機器。

因此，無論如何必須設法損壞機器，但損壞的方法，不要使人們想是機器的質量不好，而要歸罪於俄國工人不會使用。因此要先損壞俄國造的機器。

他對我說，這是每個德國人底責任，誰不做這件事情，誰就沒有權利做德國人。

同時，也在一九三二年，又來了工程師弗列沙。他問我，我是否進行了這種暗害工作。我告訴他說，沒有進行。當時他就把我叫做怯懦者和德國叛徒。

維省斯基：這是誰？

石頓：工程師弗列沙。他給了我直接的指示，叫我就開始工作，而且我應當與礦山經理舍斯托夫和弗洛連發生聯繫，這兩個人日內就要到昂熱爾克來。他告訴我說，他與最近時常到德國的許多外國工程師有聯繫，說牠與這些外國工程師建立了聯繫，並聽到由德國來到蘇聯的他的熟人說，德國無論如何要恢復牠舊日的勢力，我們這些住在蘇聯的德國人，應當進行暗害工作來幫助德國……

我們應當用這種暗害工作來削弱蘇聯的力量。他指示我要進行實際工作，就是要破壞蘇聯的動力工業，要破壞我所工作的那個地方的動力部門，即破壞蓄電器，破壞電車頭，這樣就使地底下的運輸歸於停頓，使礦井被水淹沒。弗列沙回答我的問題時說：他由與德國很接近的人那裏得到指示，如果暗害工作被人識破，這個人會加以幫助。

維省斯基：當時這個人是在蘇聯嗎？

石頓：是的。

維省斯基：這個人是否居正式的職位？

石頓：是的。此外，弗列沙勸我加入共產黨，以便我有更大的可能去做各種工作，這樣就可以加强暗害工作。

維省斯基：你是否採取了什麼步驟來企圖加入共產黨呢？

石頓：是的。弗列沙勸我去找舍斯托夫。

維省斯基：你是否找過舍斯托夫呢？得到了什麼結果呢？

石頓：我到舍斯托夫那裏去過，舍斯托夫給我一張表，爲的是叫我塡起來。

維省斯基：出身履歷表嗎？

石頓：是的，是出身履歷表。

維省斯基：你塡了表嗎？

石頓：我塡了。

維省斯基：你把塡的表交給了什麼人？

石頓：我把這張表交給了黨組長。

維省斯基：後來有什麼結果呢？

石頓：我沒有被接收入黨，因爲這個時候開始淸黨了。

維省斯基（問舍斯托夫）被告舍斯托夫，你與石頓是否有過這一回事，你想把他拉入黨嗎？

舍斯托夫：我幫助過他。

維省斯基：你當時是否知道石頓是個什麼人？

舍斯托夫：是的，我知道。

維省斯基（問石頓）：以後怎樣？

石頓：在這次見面時，舍斯托夫向我提議：我無論如何應當淹沒幾個礦井，並阻礙煤炭的開採。我同意做這件事情。舍斯托夫對我說，組織中的人不夠用。我問什麼組織，他回答我說，主要的是關於托落茨基組織。

維省斯基：你是否與舍斯托夫談過話，講到他需要外國人，因爲蘇聯的人不夠用？

石頓：他講過，他在礦井中有工程師，這些工程師很忠實地作工，他不能利用他們來達到此項目的。

維省斯基：因此，他很高興，因爲你同意了他的提議，是不是呢？

石頓：是的，我不得不負擔此項工作。弗洛連對我的提議，與弗列沙對我的提議一樣。弗洛連本人已實行了一些暗害工作，並準備在五——七號礦井中實行大爆炸，在那裏他與俄國的托落茨基份子有聯繫。弗洛連所準備的爆炸，究竟爲什麼沒有實現，我不得而知，但是我知道弗洛連大大參加了礦井中的暗害工作。

維省斯基：你是否知道弗洛連和弗列沙是什麼人？

石頓：不知道，他們並沒有公開告訴我他們屬於什麼黨派，然而我從他們談話中，深信他們是法西斯蒂。

維省斯基：他們曾否與駐在蘇聯境內的正式人員發生聯繫呢？

石頓：關於弗洛連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弗列沙，他曾與駐在蘇聯的正式人員發生聯繫。

維省斯基：這個正式人員是否與德國偵探機關有聯繫呢？

石頓：我從前總是設想弗列沙和弗洛連所接到的指令，都是他們由德國接到的。只是在最後一次談話中，弗列沙對我說，這些指令，都是由現時駐在蘇聯的一個正式人員那裏拿來的。

維省斯基：這個正式人員是外國人嗎？

石頓：這個人是替德國工作的。

維省斯基：是正式替德國工作嗎？
石頓：他是正式人員並正式工作的。
二十六日早庭審訊至此庭長宣告退庭。

十六．對被告阿爾諾里特之審訊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晚庭

維省斯基：被告阿爾諾里特！你的眞姓是什麼？
阿爾諾里特（以下簡稱阿爾——譯者）：瓦西里也夫。
維省斯基：名字呢？
阿爾：瓦連亭．瓦西里也維切。
維省斯基：爲什麼你自稱爲瓦連亭．沃里佛立多維切？
阿爾：那是這麼一回事。我在加入美國國籍的時候，就在護照上寫做了愛卯．沃里弗立多……
維省斯基：你是美國公民還是蘇聯公民？
阿爾：現在是蘇聯公民。

維省斯基：到美國去的時候，是蘇聯公民呢，還是美國公民

阿爾：到那裏時，我是芬蘭公民。

維省斯基：這樣說來，你在美國時，是取名爲瓦連亭·沃里弗多維切？

阿爾：是的。

維省斯基：爲什麼呢？

阿爾：因爲那時候我帶的護照上，名字是愛卯，父親的名字是沃里弗立多。

維省斯基：這是該護照原主的名字嗎？

阿爾：正是被我把護照拿來的那個人底名字。

維省斯基：就是說，你是拿別人的護照到美國去的？當你剛降生時，你姓什麼呢？

阿爾：從我入校讀書的時候起，我就姓瓦西里也夫。

維省斯基：這也許是不大方便，但我必須要問一問，你是在什麼地方生的，父親的姓是什麼？

阿爾：我生在列寧格拉，父親是姓葉菲莫夫。

維省斯基：母親何姓呢？

阿爾：母親姓依萬諾瓦。

維省斯基：爲什麼你恰巧姓瓦西里也夫，而不姓什麼彼得羅夫呢？

阿爾：因爲我受洗禮時的義父，是瓦西里也夫。

維省斯基：你生在什麼地方？

阿爾：我生在列寧格拉。

維省斯基：你在什麼地方的學校裏念過書呢？

阿爾：我住過三年國民小學，四年城市學校，這是在芬蘭底維波爾格城。

維省斯基：你是怎樣跑到芬蘭去了的呢？

阿爾：在我還只十個月的時候，母親因沒有力量養活我，就把我送到外祖父家裏，外祖父是維波爾格一個教堂底更夫。此後我又回到列寧格拉。

維省斯基：在列寧格拉住了多久？

阿爾：兩年。

維省斯基：以後又到那裏去了？

阿爾：又到芬蘭維波爾格去了。

維省斯基：找外祖父去了麼？

阿爾：外祖父已經死了，落到舅父家，開始在傢具工廠作工。

維省斯基：你那時還姓瓦西里也夫嗎？

阿爾：是的。

維省斯基：在舅父家裏住了多久？

阿爾：不久，接着就到黑里新哥佛爾斯去了。

維省斯基：爲什麽到黑里新哥佛爾斯去了？

阿爾：因爲要到大工廠去作工，想多賺幾個錢。

維省斯基：你在那裏作什麽工呢？

阿爾：在傢具工廠作工。

維省斯基：以後呢？

阿爾：以後我又想到德國去。

維省斯基：爲什麽？

阿爾：想到外國去發財享福。

維省斯基：你怎樣作成功的呢？

阿爾：非常簡單，同一個伙伴商量好，他剛弄好出國護照，但他沒有去，就把護照給我了。

維省斯基：他姓什麽呢？

阿爾：他姓卡爾·拉斯克。

維省斯基：用拉斯克的姓名，你到那裏去了呢？

阿爾：在一隻輪船上當了個學徒。跑到漢堡，在那裏的汽車房裏做了三四個月工。但我自幼就幻想到美國去……

維省斯基：以後呢？

阿爾：我就起程到荷蘭的羅特爾去了，但是沒有走到國境。警察把我抓住了，接着便把我解回俄國。我又跑到維波爾格。

維省斯基：此時，你還都是用拉斯克這個姓名麽？

阿爾：都是拉斯克。

維省斯基：這是在那一年？

阿爾：這是在一九一三年初。在維波爾格作工到一九一四年，以後就到黑里新哥佛爾斯去，用瓦西里也夫的名字進了舍維亞波爾格海港拉斯克這個姓名暫時收到腰包裏了。（聽衆發笑）

維省斯基：啊！你把拉斯克放進腰包裏；於是瓦西里也夫又出現於維波爾格了？此次用瓦西里也夫這個姓名，在維波爾格住了很久嗎？

阿爾：我在這裏作工，到一九一四年初，以後，就到黑里新哥佛爾斯去了。當戰爭開始時，我聽說不久要去當兵，我就想一定要離開芬蘭。懷裏裝着拉斯克底護照，我就起身赴瑞典，從那裏又跑到挪威了。

維省斯基：以後又怎樣呢？

阿爾：以後，我跑上一隻瑞典船，航行到英國，然後我們又回到斯托哥爾姆。

維省斯基：這是在什麼時候？

阿爾：這是在一九一五年初。從那裏，我又想到維波爾格去找舅父。坐了一隻漁船來到維波爾格。舅父和我說，要去當兵。立刻就照瓦西里也夫這個姓名把證書發給我了。拿着這個證書，我就去報名，招兵處收留了我，並派到駐紮於列寧格拉之馬姜·歐沙特地方的亞力山大第三軍營中去。這裏，我住了一個半月，當兵的玩意兒，我不大喜歡（聽衆發笑）並且我根本就不高興打仗，因此，就從軍隊裏逃出來，又到黑里新哥佛爾斯去了。這時候，看到兵不是好當的，我就決定根本離開去。但是，在黑里新哥佛爾新，我却因開小差被捕了，又被解到列寧格拉。在列寧格拉過堂後，按軍法判了我六個月的拘役。六個月的拘期滿後，我就隨第一批部隊，開到前線上去，開到里加附近的斯陶茨曼斯果夫鎮去。這裏，我得了肺炎症，在前線上大約只有一個月，就調到後方去了。

維省斯基：爲什麼你在預審時和現在說的不同呢？

阿爾：要知道，我生平中的變故這樣多，我很難一一記清呢。（聽衆發笑。）

維省斯基：你究竟是病了，還是開小差了？

阿爾：不是開小差，先是病了，落到前方醫院，接着便轉到皮列亞斯拉夫——扎列斯基醫院，從醫院又跑

到下新城。在這裏住了兩星期後，適逢萊多維亞營出示招兵。我一聽見這消息，便報名投入尤里也夫城的萊多維亞營了。

維省斯基：你進了萊多維亞營，難道你是萊多維亞人嗎？

阿爾：因爲我又起了逃出軍隊的念頭，因此，就設法一步一步靠近彼得堡方面來。

維省斯基：到那裏去，是以兵士資格嗎？

阿爾：是的。

維省斯基：穿的也是軍裝？

阿爾：是的，還帶有排副肩章哩。

維省斯基：你怎樣就弄到了排副官銜了呢？

阿爾：這肩章是在路上自己縫上的。

維省斯基：那個萊多維亞營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阿爾：萊多維亞第二營開到尤里也夫城，這裏我被派爲教官，教練新兵。

維省斯基：這是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

阿爾：這是一九一五年底，或一九一六年初。

維省斯基：以後又怎樣呢？

阿爾：八月間，我得到了休假，就到芬蘭去了。

維省斯基：從芬蘭又開到那裏去了？

阿爾：在這裏，我換了姓名，換了愛卯．屈里平寧就到明斯克去了。

維省斯基：怎麼領到護照的呢？

阿爾：我與這個同伴很熟悉。

維省斯基：這又怎樣呢？

阿爾：跑進他們的教堂裏，拿出了這人的證書，說我需要一張生辰表。

維省斯基：得到他本人的同意嗎？

阿爾：他沒有知道。

維省斯基：你是騙來的證書麼？

阿爾：是騙來的。

維省斯基：你拿着這個護照跑到那裏去了呢？

阿爾：跑到明斯克當翻譯員。又作過統計處的書記，以後便到海參崴去了。

維省斯基：你是怎樣跑到海參崴去的呢？

阿爾：是用軍人免費車票跑去的。

維省斯基：從那裏弄到的？

阿爾：在西路司令部拿了幾張。

維省斯基：是偷的嗎？

阿爾：是偷的。由海參崴被雇用爲『士拉』船上的火伕，經堪察加開到日本，又開回海參崴來。以後，又從海參崴跑到阿爾漢格里斯克。

維省斯基：以後，又做些什麼？

阿爾：以後便跑到美國輪船上做工，隨船到達紐約。

維省斯基：頂着什麼姓名去的？

阿爾：愛卯・屈里平寧。

維省斯基：在紐約開始做什麼？

阿爾：在紐約住了幾天，我就投到軍隊裏去了，投到美國軍隊裏了。

維省斯基：爲什麼？

阿爾：因爲把我招去了。

維省斯基：什麼資格？

阿爾：當新兵。

維省斯基：在那裏幹了多久？

阿爾：整整一年。

維省斯基：用的什麼姓名呢？

阿爾：愛卯·屈里平寧。在軍隊收容我的時候，當時就改成了美國國籍。

維省斯基：沒經你的同意麼？

阿爾：我同意的。就在那時候，我就把姓名改成瓦連亭。阿爾諾里特。

維省斯基：在軍隊裏幹了一年，以後又到那裏去了呢？

阿爾：退伍了，想跑囘芬蘭去。

維省斯基：囘芬蘭來了嗎？

阿爾：沒有跑囘芬蘭，而是飄流到南美洲去了。

維省斯基：怎樣飄流到那裏去了呢？偶然的嗎？

阿爾：我在『公爵』船上，找到管帆的工作，這樣就跑到南美洲的布愛諾斯——愛列斯地方。以後又在一隻美國輪船上找到工作，跑到蘇格蘭；一九二四年正月，又從那裏跑到紐約去；接着我又重新混進軍隊了。

維省斯基：你在那裏坐過監獄嗎？

阿爾：坐過。

維省斯基：多久？

阿爾：五六個月。

維省斯基：什麼原因？

阿爾：因爲有偸竊公產的嫌疑。

維省斯基：你在軍隊裏幹了多少年呢？

阿爾：自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三年。後來，我就跑到加里佛尼亞省的洛斯·安日洛斯去了。在那裏，我認識了幾個俄國伙伴，他們都是『技術幫助蘇聯協會』會員，我也參加了該會的工作，並且決定回到俄國來。

維省斯基：就是說，你決定了也要用技術來幫助蘇俄嗎？

阿爾：是的。

維省斯基：你怎樣幫助的呢？

阿爾：我便到克梅洛沃來了。

維省斯基：你沒有做過『馬鬆會』㊀會員麼？

㊀「馬鬆會」係一種祕密會社的組織。

阿爾：做過。

維省斯基：你是怎麼加入『馬鬆會』的呢？

阿爾：當我在美國的時候，寫了一個請求書，就加入『馬鬆會』了。

維省斯基：爲什麼正是加入『馬鬆會』而不加入什麼別的會呢？

阿爾：想鑽到上層社會去。（聽衆發笑。）

維省斯基：你加入『技術幫助蘇聯協會』時，就已經是『馬鬆會』會員嗎？『馬鬆會』對你加入該協會，沒有什麼幫助嗎？

阿爾：沒有。

維省斯基：當你加入這協會時，你說過你是『馬鬆會』會員嗎？

阿爾：沒有說；我隱瞞了這件事情。

維省斯基：你加入蘇聯共產黨，是從美國來到的時候嗎？

阿爾：我是一九二三年入黨的。

維省斯基：這時候你仍然是『馬鬆會』會員嗎？

阿爾：是的，但我對任何人都沒有說過。

維省斯基：好罷！你沒有因爲這件事而受過黨底處分嗎？

阿爾：我經過了三次的清黨。

維省斯基：順利嗎？

阿爾：順利的，東添西補，弄的還好，只是履歷弄得亂七八糟。

維省斯基：沒有因爲進行反蘇維埃的煽動……

阿爾：這是一九三〇年，在庫茲聶茨克。

維省斯基：受過處分，還是被開除黨籍了？

阿爾：幾乎是被開除黨籍；工作被撤銷了。

維省斯基：在美國時，你沒有同共產黨發生關係嗎？

阿爾：有過關係，一九一九年，曾參加共產黨底工作。

維省斯基：同時也是『馬鬆會』會員嗎？

阿爾：同時也是『馬鬆會』會員。

維省斯基：你什麽時候同托落茨基份子勾結起來的？

阿爾：一九三二年。

維省斯基：同什麽人？

阿爾：當然在普洛科比也夫斯克作工時，經理人是舍斯托夫。這裏，我第一次與托落茨基份子勾結。

維省斯基：你同他談過什麼托落茨基組織的勾當嗎？

阿爾：同他認識之後，常常到他的辦公室去，他問我因爲什麼被撤銷了庫茲聶茨克建築工程中的工作。

維省斯基：你因爲什麼被撤銷了工作呢？

阿爾：是因爲在外國專門家中做了反蘇聯的宣傳。

維省斯基：他曉得這回事？

阿爾：曉得。他也曉得我參加反黨組織，參加『馬鬆會。』他知道我是芬蘭人，也知道我曾再三改名換姓。

維省斯基：什麼時候他把他的犯罪計劃以及其罪行，都詳告了你。

阿爾：我常常到他的辦公室去。他說過：『我本來早就能把你送到相當機關去，但是，我不想這樣做，因爲我想你可以做我們組織裏的一個很好的份子。』

維省斯基：以後呢？

阿爾：後來他說，我們打算在最近將來就推翻現在的領導者。

維省斯基：以後呢？

阿爾：他又說領導者很有到我們這區裏來的可能，說我們的主要任務，是要準備向政府領導者施行暗殺。

維省斯基：又怎樣呢？

阿爾：以後，他對我說：『我已把你考察了三個月之久，認爲你是果敢堅決的一個人，因此你應担任實行暗殺行爲的責任。爲着這個目的，我把你介紹給徹列浦杳。』接着，他就把我介紹給徹列浦杳，並對他說：『這就是幫你幹事情的人手。』……

維省斯基：你準備了一些什麼行爲呢？

阿爾：指給兩個行凶的地點：一個是三號礦井，另一個是八號礦井。

維省斯基：請你講下去罷。爲什麼你忽然不作聲了？什麼時候組織的暗殺行爲，要暗殺什麼人？

阿爾：第一次暗殺行爲，是在一九三四年年初，更準確點說是在春天。

維省斯基：暗殺什麼人？

阿爾：暗殺鄂爾卓尼基茲。

維省斯基：具體情形怎樣呢？

阿爾：具體情形是這樣，徹列浦杳具體通知我說：『明天鄂爾卓尼基茲要來。看吧，你要不顧一切地實行這暗殺行爲。』

維省斯基：怎樣呢？

阿爾：這個提議我接受了。第二天我就把汽車開出來，因爲我旣是汽車房的總管，又是黨員，所以一點也沒有人懷疑我。我於是就把汽車開到火車站；接着，鄂爾卓尼基茲、愛依赫和魯希莫維亦便坐上我

的汽車了，我把他們送到德僑區，從那裏，他們又叫我開到太爾崗，當我們開到山上時，他們又叫在山上停留一下，以便看看普洛科比也夫斯克的全景。以後，又到七、八、九、三號聯合井停留一下。徹列浦杏已經預先告訴我說，那裏一切都準備好了：『在那裏，你會看見一個障礙物，在這障礙物處，你就要實行翻車了。』於是，在下山時，我就開得滿快，一點鐘七八十公里的速度，約在一個半公里的前面，我果然看見一個障礙物。我立刻就想到這就是我要實行翻車的地方了，我因爲不知這究竟是個怎樣地方，我也就不知道我自己的命運……因此，我就減低了速度，很快就停住了，本來應該一直開去的，我却繞到左邊橋上去了。

維省斯基：沒下决心？

阿爾：沒有能夠這樣做。

維省斯基：沒有能夠做，且沒下决心麼？這乃是我們的萬幸。第二次呢？

阿爾：一個早晨，徹列浦杏到我的賬房來說：『今天莫洛托夫要來了；切不要再放過去。』我說我並沒有放過他，他說：『我知道你是怎樣沒放過的。』這裏，我就明白是有人在祕密監視我。我回答說一定幹。我於是就把汽車備好，開到礦井收發處。要實行翻車的地方，我知道得很詳細：從三號礦井上去。那裏有一個轉灣處，轉灣處有一個不是舍斯托夫說的深谷，而是我們所說的懸崖——在大路旁邊，深有八個或十個米突，大約是九十度的角度。當時把車開到火車站時，車上坐了莫洛托夫，黨區委

書記庫爾岡諾夫和邊疆執委主席格略精斯基……告訴我要從少共街到工人住區去。我開了車。當我從大道開上汽車路的時候，突然有一輛汽車迎面飛來。時間緊急，不容細想，我應該實行暗殺行爲了。再抬頭一看，迎面又飛來第二輛車。這時候，我明白了，原來是徹列浦杏不相信我了，所以又派來第二輛車。我沒來得及多想，但是我害怕了。我趕緊往旁邊開去，開向深谷去，正在這時候，格略精斯基一把把我抓住，說：『你幹什麼？』

維省斯基：這時候是什麼東西阻止了你？

阿爾：這是懦怯心理阻止了我。

審判長：辯護人卡玆納切也夫同志有問題要問。

卡玆納切也夫（向阿爾問）：我請你確定一下，你參加托落茨基組織，究竟有多久，從何時起，到何時止？

阿爾：自一九三二年起，到一九三四年年底止。

卡玆納切也夫：當托落茨基組織囑咐你實行暗殺行爲的命令時，是否曾恐嚇你說，如果你不執行，則你的性命就會難保呢？

阿爾：當我接到這種命令時，我就已經覺得很害怕，如果我不執行這命令，他們就會猜疑我爲一個靠不住的東西，就會消滅我。

卡玆納切也夫：就是說，你是怕人家報復嗎？

阿爾：是的。

卡茲納切也夫：有沒有什麼人對你作過什麼威脅呢？

阿爾：徹列浦杳和舍斯托夫雖然沒有明說，但總是說過，如果你叛變，那我們就要幹掉你、

卡茲納切也夫：請准許我順便問一問被告舍斯托夫。你承認阿爾諾里特對於這一部分事情的說明，確符事實嗎？

舍斯托夫：是符合事實的。我可以證實說，我們對阿爾諾里特的過去醜史，曾加以暗示的威脅。

卡茲納切也夫（問阿爾）：當你被吸收到托落茨基組織時，你對他們的綱領，曾大概知道一點沒有？

阿爾：他們使我相信了，托落茨基組織是有力量的，牠會奪得政權，而當牠奪得政權時，我是一定能享得一份的。

十七．對被告利夫什茨之審訊

維省斯基：被告利夫什茨，你說一說，你是什麼時候恢復托落茨基份子犯罪的秘密活動的？

利夫什茨（以下簡稱利夫——譯者）：在一九三二年初，當洛根諾夫從柏林回來時，那時他告訴我他與皮達可夫會了面，把從皮達可夫那裏得到的新方針告訴了我。

維省斯基：你當時對這件事的度態怎樣呢？

利夫：我未曾具體回答洛根諾夫，但告訴他，我要去見皮達可夫，以便從他那裏問知一切。一九三二年下半年，我會到皮達可夫，他當時所告訴我的，其實是和洛根諾夫所告訴過我的一樣。

維省斯基：說到暗殺麼？

利夫：說到暗殺，也說到破壞工作。同他談話以後，我便同意恢復積極活動。

維省斯基：你那時担任什麼職務呢？

利夫：南方鉄路局局長。

維省斯基：後來怎麼樣呢？

利夫：後來我到哈爾可夫時，便把這點通知了自己的代理人趙林。

維省斯基：你爲什麼向他作這類的談話呢？

利夫：我知道他是一個暗藏的托落茨基份子，因此，我告訴了他。我同皮達可夫談話時，曾商妥先從妨礙運煤——使不能全部載運開始。

維省斯基：那就是說，你先從破壞裝載計劃開始麼？

利夫：是的。我們那時車輛缺少，在一般運輸上已不完全夠用。此外，我還使運煤的車輛故意不載足，且把車輛用來載運次要的東西。

維省斯基：你得到了什麼結果呢？

利夫：因爲這樣，煤就堆積在礦井裏。從莫斯科時常派出調查委員會到我那裏去，迫令我們載運這些煤。我們運了。但後來又堆積起來了。

維省斯基：在什麼時期開始這樣做的呢？

利夫：在一九三三年冬季的時期內。在一九三三年年底我會到了皮達可夫，把鉄路上所做的事情告訴他。而他則告訴我關于聯合總部之存在，以及關于後備總部，即所謂『平行總部』之存在。他又告訴我說，鉄路運輸方面的反革命暗害工作是由總部份子舍列布略可夫負責領導的，說我必須與他發生聯繫。

維省斯基：你與舍列布略可夫發生了聯繫麽？

利夫：發生了聯繫，這是在一九三三年年底，或一九三四年年初。我把我在南方鐵路上所進行的工作告訴了他。那時我已經是北高加索鐵路局局長。舍列布略可夫那時告訴我說，他已把阿爾諾里多夫，米洛諾夫，吸收到運輸業方面來做暗害工作。他還提到洛增茨維格及米爾斯基。他又說，阿爾諾里多夫根據舍列布略可夫的指示，在車務處方面進行暗害工作。並告訴我說，他與阿爾諾里多夫討論過關于破壞轉運計劃的問題。後來，阿爾諾里多夫就進行了破壞車箱的工作。恰好那時正在籌劃建設四個修理廠的問題。阿爾諾里多夫就虛擬計劃，規定每個修車工廠

建築費自一千五百萬至二千萬盧布，一年半內可以建築完結，可以動工經營。但結果，四個工廠，每個廠都花費五千萬盧布，建造了幾乎三年。

維省斯基：故意拖延的麼？

利夫：是的。在這次談話中，舍列布略可夫提議在我工作的北高加索鐵路上，破壞春季播種運動所有煤油之供給計劃；我們未做這件事，因爲煤油供給計劃是在非常嚴密監督之下執行的。

維省斯基：曾經企圖做這件事麼？

利夫：同舍列布略可夫談話時，我告訴他說，這件事情很困難，實際上什麼都不能做，此種煤油供給工作，由勞動國防局特派員監督執行的。我們在北高加索鐵路上所做的，便是少送些車輛到頓業茨克鐵路及東南鐵路上去運煤。在北高加索鐵路上我吸收了幾個人來工作，裏面有一個人叫做科洛可爾金，他曾任羅斯托夫車務處政治部主任，後來，他曾先後担任北高加索鉄路政治部的副主任及正主任。

維省斯基：你同科洛可爾金，除暗害工作外，沒有談到別的目的或任務麼？

利夫：我與科洛可爾金什麼都談過。後來，我被調到莫斯科，到莫斯科至庫爾斯克的鉄路上任事。任事不久，就被任爲人民委員會交通部副部長。

維省斯基：做人民委員會交通部副部長的時候，你與托落茨基組織的聯繫以及你的暗害行動都繼續

着嗎？

利夫：是的。到莫斯科後，我與皮達可夫會面，談到現在在交通方面，卡岡諾維赤連一點點小小妨礙工作的東西都能注意到。皮達可夫主張加緊暗害工作，因爲卡岡諾維赤到人民委員會交通部僅僅幾個月，運輸業就已經日高千丈了。同時，皮達可夫要我再和舍列布略可夫會面，商量我們如何應付。我與舍列布略可夫談了話，舍列布略可夫提出基本任務，即要破壞卡岡諾維赤改良鐵路工作命令之執行。他解釋說，我們之所以要這樣做，是因爲鐵路乃全國主要命脈。接着，舍列布略可夫又說，他與阿爾諾里多夫、米洛諾夫、葉姆沙諾夫等的關係，並未中斷。他叫他們與我發生聯繫。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這些人便同我發生了聯繫，同時他們沒有與舍列布略可夫失掉聯繫。一九三五年與米洛諾夫、米爾斯基、富夫倫斯基，一九三六年與洛增茨維格都相繼發生了聯繫。他們從舍列布略可夫處已經得到指示，我又重覆告訴他們要破壞第一八三號命令，規定了改良鐵路工作的基本辦法的命令。

維省斯基：你提出了什麼任務？

利夫：妨礙與阻礙鐵路運輸工作。

維省斯基：你做了這些事？你的人民委員會交通部副部長的職位沒有妨礙着你？

利夫：是有妨礙的，但我總是做了。

維省斯基：你是背叛了你對國家的義務麼？

利夫：如果我沒有背叛，那我就不會到被告席上來了。

維省斯基：你同克尼亞節夫有過什麼關係？

利夫：在未講到克尼亞節夫問題以前，我想報告法庭下面一件事：在預審時，我否認了……（稍停）否認了非常可恥的事情之一……

維省斯基：什麼事？

利夫：偵探工作問題。

維省斯基：你現想要說什麼呢？

利夫：因此，我也否認了與被告屠洛克的聯繫。雖然這是最深重的罪孽，是叛賣祖國，但我終究還是要從頭至尾，完完全全說給法庭。我願報告法庭，克尼亞節夫及屠洛克與某外國政府特派偵探的這種聯繫，我當時是知道的……

維省斯基：在什麼時期中你曉得這種聯繫的？

利夫：從一九三五年直到被捕時為止。但這還不夠，我還經克尼亞節夫的請求給了他，幾種消息，以便轉交……

維省斯基：這時候你是……

利夫：人民委員會交通部副部長。

維省斯基：請你說，你怎樣同克尼亞節夫發生聯繫的？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情形之下，因爲什麼緣故，用什麼方式發生聯繫的？

利夫：我已經從舍列布略可夫處聽說過克尼亞節夫，知道他是個祕密的托落茨基份子，參加烏拉爾托落茨基組織。在鉄路局長會議時，現在已不記得是他找我，還是我找他，那時我們談了一些關于南烏拉爾路線上工作的事。

維省斯基：他的工作是什麼呢？

利夫：他在鉄路上組織翻車事件，進行暗害陰謀、軍事破壞工作。他說他在那裏組織了翻車事件。

維省斯基：鉄路上托落茨基底其他份子，也組織了翻車事件？

利夫：大概也組織了。

維省斯基：爲什麼『大概？』你本人是否給過組織翻車事件的指示？

利夫：給過。

維省斯基：你是否給過克尼亞節夫組織翻車事件的指示？

利夫：給過。

維省斯基：你竟不惜傷害人命麼？

利夫：是的。

維省斯基：你同克尼亞節夫組織翻車事件時，他當時和你說過，他與某國偵探局有聯繫嗎？

利夫：說過。

維省斯基：他沒有說過，該偵探局要求他——克尼亞節夫組織翻車事件？

利夫：我現在已不記得了。或許是說過的。

維省斯基：審判長，請允許我問克尼亞節夫幾個問題。被告克尼亞節夫，你同利夫什茨是在什麽時候作過談話呢？

克尼亞節夫：一九三五年八月。

維省斯基：談到組織翻車事件麽？

克尼亞節夫：最初就談到這一點。

維省斯基：當時你的職務是什麽？

克尼亞節夫：鐵路局局長。

維省斯基：你，身爲鐵路局局長，竟與你的上司會面而談怎樣組織翻車事件麽？

克尼亞節夫：一點不錯。

維省斯基：那麽你，克尼亞節夫，當時已經被日本偵探局勾引去做偵探了嗎？

克尼亞節夫：我是從一九三四年九月被勾引去的。

維省斯基：從一九三四年九月起，你在日本偵探局担負什麼職務？

克尼亞節夫：我同日本人有聯繫。

維省斯基：關于這一點，你和利夫什茨說過沒有？他知道麼？

克尼亞節夫：說過。當我同利夫什茨會面時，我向他說過，在軍事破壞工作方面日本人與托落茨基份子底方針是相符合的。但是日本人還要求得到祕密消息，這是我當時無論如何都莫明其妙的。

維省斯基：利夫什茨怎麼囘答你的？

克尼亞節夫：他說，托落茨基組織在進行反斯大林領導的鬬爭時所處的環境，乃是這樣，不僅要進行軍事破壞工作，而且要與外國當局發生聯繫。因此，如果此種聯繫能給這種鬬爭以幫助，那麼，自然便應當維持這種聯繫。日本人所要求的祕密消息，當然首先是爲着軍事目的。我告訴了利夫什茨，日本人到底要些什麼秘密消息。利夫什茨答道，托落茨基組織既與外國政府發生關係，則爲維持與日本人的關係計，這些消息是要給的。此次談話之內容，就是這樣。

維省斯基：這樣看來，利夫什茨是批准了你同日本暗探局的聯繫，並把這件事和你在托落茨基組織中所負的任務配合起來，而且你就在這一方面繼續你的活動，是不是？

克尼亞節夫：是的。

維省斯基：請允許我問一問被告屠洛克。關于日本偵探局發生聯繫的事情，你曉得些什麽？

屠洛克：我與日本偵探局發生聯繫，是當我一九三四年在前彼爾姆鐵路，即現在之卡岡諾維赤鐵路任事的時候。我接到了具體的行動指示。關于這一點，我曾與馬里亞辛商量清楚，我關于自己所作的托落茨基工作，也是馬里亞辛做報告的。

維省斯基：同克尼亞節夫有什麽聯繫呢？

屠洛克：他告訴我說，他與日本偵探局發生聯繫，我也把自己的事告訴了他。

維省斯基：你曉得不曉得利夫什茨也知道這囘事呢？

屠洛克：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我到利夫什茨那裏去談過話。我當時與日本偵探局已有聯繫。他囘答說，不應該斷絕這種聯繫，而應該爲托落茨基組織計，保留這種聯繫。

維省斯基：被告利夫什茨！你承認克尼亞節夫和屠洛克在這問題上的口供是對的麽？

利夫：大體上是對的。

維省斯基：雖然，你在預審時是否認了？

利夫：我已向法庭申明過爲什麽否認了。

維省斯基：你說一說，你從克尼亞節夫處知道他和日本偵探局的聯繫以後，你同他作過什麽談話嗎？關于與偵探局的聯繫問題，你給過他指示嗎？

利夫：我已說過，不僅是有過聯繫，而且於一九三六年，他還問我替日本偵探局向我要求秘密消息。我便給了他一些消息。

維省斯基：你知道不知道，日本偵探局因爲收到你們所給的消息，曾向你們付過金錢呢？

利夫：沒有知道。

維省斯基：可不可以問問屠洛克？被告屠洛克！你曉得不曉得日本偵探局爲這些消息付過錢？

屠洛克：不。爲了這些材料，牠沒有付錢給我們，可是一般說來，爲進行托落茨基組織的軍事破壞工作，我們是收到過金錢的。

維省斯基：從誰手上收到的？

屠洛克：從日本偵探局方面。（聽衆驚動。）

維省斯基：你是什麽時候收到這批錢呢？

屠洛克：一九三四年正月，收到三萬五千盧布。

維省斯基：錢用在什麽地方？

屠洛克：二萬盧布留作本組織用，一萬五千交給克尼亞節夫的組織了。

維省斯基：交給什麽人呢？

屠洛克：一九三四年五月，交給克尼亞節夫本人的。

維省斯基：克尼亞節夫！對不對？

克尼亞節夫：對的，我收到了。

維省斯基：被告利夫什茨！請你說一說，關于托落茨基份子底暗殺行動，你曉得些什麽？

利夫：準備暗殺斯大林、科西沃爾和坡斯特舍夫，是我知道的，其餘的不曉得。

維省斯基：誰對你說的？

利夫：皮達可夫、舍列布略可夫和洛根諾夫。

維省斯基：你是什麽時候知道的？

利夫：一九三三與一九三五年。一九三三年我曾知道準備向坡斯特舍夫及科西沃爾施行暗殺的事情，一九三五年我曾知道準備向斯大林施行暗殺的事情。

維省斯基：你知道那些直接領導準備向科西沃爾及坡斯特舍夫施行暗殺的人麽？你曉得一九三五年直接領導準備向斯大林施行暗殺的人麽？

利夫：我知道的，不是應直接執行此事的人，而是組織此事的人。

維省斯基：我沒有問題了。

審判長：被告利夫什茨！請你說一說，在那些你說到過的托落茨基組織參加者中，你給過什麽人關于組織翻車事件的直接指示？

利夫：克尼亞節夫，葉姆沙諾夫，阿爾諾里多夫，屠洛克，富夫倫斯基，洛增茨維格。

審判長：你是否承認，舍列布略可夫的確同你談到要在戰前動員時期進行軍事破壞工作，以阻礙軍隊運輸？

利夫：是的。

審判長：克尼亞節夫是否報告過你，說他在一個車站上造成一次撞車事件，以及此次撞車結果，紅軍戰士死者二十九名，傷者二十九名呢？

利夫：是的，關于這事實，我是曉得的。

維省斯基：被告利夫什茨！你既然在今天的審訊中，誠懇地補充承認了偵探罪，就是說，你整個地承認了公訴書向你提出的罪狀，也許你還願意關于暗殺問題，給些更詳細的說明吧？例如洛根諾夫是否和你更具體地說過怎樣準備了和什麼人準備暗殺科西沃爾和坡斯特舍夫的事呢？

利夫：他沒有具體說，我沒有知道。

維省斯基：我再請你回憶一下。你曉得不曉得節基葉夫斯基這個人？

利夫：曉得。

維省斯基：你知道不知道節基葉夫斯基也與暗殺團體有聯繫？

利夫：節基葉夫斯基與洛根諾夫有聯繫。

維省斯基：你當時知道洛根諾夫是從事於暗殺行為之準備麽！

利夫：知道。

維省斯基：你知道節基葉夫斯基與洛根諾夫有聯繫麽？

利夫：知道。

維省斯基：這沒有使你猜想到，節基葉夫斯基與洛根諾夫正因為共同準備暗殺行為而彼此發生聯繫的麽？

利夫：沒有。

維省斯基：好的。關于格列波夫·阿維洛夫呢？你沒有知道他是從事於準備暗殺行動麽？

利夫：格列波夫·阿維洛夫對我說過這點。

維省斯基：他準備暗殺行為，是要暗殺什麽人？

利夫：是要暗殺斯大林。

維省斯基：我想，問題已經清楚了。

審判長：宣佈退庭，一月二十七日上午十一時繼續開庭。

十八．對被告克尼亞節夫之審訊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早庭

審判長：辯護人對被告利夫什茨有問題麽？

辯護人布拉烏德（向利夫什茨問：）你第一次與克尼亞節夫談到他對日本偵探機關的關係時，你說出了告訴你這件事情的那些人的姓名沒有？

利夫什茨：沒有。

布拉烏德：你沒說出是皮達可夫麽？

利夫什茨：沒有說。

布拉烏德（向克尼亞節夫發問：）利夫什茨是否向你說過，這個消息是從皮達可夫那裏得來的呢？

克尼亞節夫（以下簡稱克尼——譯者）：我確切記得當我與利夫什茨會面時，他已知道我與托落茨基組織的聯繫及我與日本人的關係，這是皮達可夫告訴他的。

維省斯基：被告克尼亞節夫，你是從什麽時候開始做反革命活動的呢？

克尼：從一九三四年四月起。在這時以前，我從來沒有加入過托落茨基組織，可是我還在一九三〇年、一

九三一年時，對於工業化、農業集體化及運輸業工作問題就發生了動搖。因爲這種動搖，我就墮落到那些與托落茨基思想相同的觀點了。

維省斯基（向克尼發問）你曾參加過運輸業方面的軍事破壞工作與暗害工作麼？

克尼：我參加過。

維省斯基：這種工作表現在什麼地方？

克尼：即是在於組織翻車事件，破壞軌道，破壞車頭；我們所抱定的目的，是在於破壞烏拉爾工業特別是冶金工業的工作。托落茨基份子在南烏拉爾鐵路上破壞了修理鐵路的計劃，本來應把所撥付的經費用來進行整段整段的改造鐵路，而我們却分別修理每公里的鐵路，把這批經費零零碎碎用掉了。

這樣一來，這批經費就沒有得到必須的效果，而鐵路還是壞下去了。這是爲着達到造成很多翻車事件的目的。

第二種破壞工作，便是搗亂車頭的修理工作與破壞對於車頭的照料，以便使車頭結果成爲無用之物。一九三五年，破壞工作所有這種種手段均被利夫什茨所批准。同時利夫什茨向我說，現在要從一般的破壞工作進而組織引起人命死傷的翻車事件。我當時就向利夫什茨問：難道我們托落茨基份子要反對工人階級，反對一般人民而不分皂白麼？利夫什茨說，現在與斯大林的鬬爭

是很劇烈的，因此，我們現在應當設法使黨的領導在人民的眼中完全喪失威信，憑靠這樣對人民許多次打擊以引起人民對斯大林、對政府的憎恨，使人民發生一種覺得一切都應歸罪於政府的印象。

（克尼隨後又供稱：至一九三五年八月，在南烏拉爾鐵路上（他當時是那裏的鐵路局長）由於勒溫（車務處副處長）、多爾馬托夫（工務處長）、波切卡列夫（車務稽查）、謝爾巴科夫（機車科長）的幫助，他領導成立了在茲拉多烏斯特、蘇米哈、庫爾岡、烏法、列科茲列夫等處托落茨基秘密的組織。）

克尼（繼續說）：當我從莫斯科返來之後，向勒溫、波切卡列夫、謝爾巴科夫、多爾馬托夫告訴我與利夫什茨會面的經過。當時勒溫便說，這件事情可以要蘇米哈車站站長馬爾克維奇幫助佈置。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就把五〇四號兵車翻車的事情佈置好了。

維省斯基：據調查記錄是兵車五〇四號。這次翻車的調查記錄是你擬就的麼？

克尼：是我。

維省斯基：你在這個記錄上記上了眞相麼？

克尼：給了不確實的說明，說了假話。我隱瞞了這次翻車事件是托落茨基組織所造成的。

維省斯基：當時有什麼條件幫助你隱瞞了這件事情的眞相？

克尼：我記得我當時在庫爾岡。我聽到說在蘇米哈站火車出了事。我當時卽乘特別快車赴蘇米哈站，首先就去調查火車遇險的地點。當我到了那裏，該站副站長瓦加諾夫就來見了我，向我暗示這件事情是馬爾克維奇幹的。我馬上就明白這是我們的組織所造成的事件。這件事情是由當時在進站道叉值班的轉轍長科列斯尼科夫親手佈置的。他吩咐值班的學徒邱金諾娃把第十四號進站道叉上的轉轍機轉到已有列車停站的軌道上。因爲這個學徒不懂得轉轍的道理，所以她就按照這種吩咐進行了。一個老的熟練的轉轍夫，原來站在眞是這列車所要經過的進站道叉上值班，當時却被科列斯尼科夫派去收拾路燈的玻璃了。

維省斯基：誰留在進站道叉上呢？

克尼：在這進站道叉上誰也沒有。結果，以每小時四十至四十五公里速度行駛的兵車；便開入第八號軌道，而在這軌道上，正有運載礦石的列車停佔着。

維省斯基：死傷了多少人？

克尼：紅軍戰士死二十九人，傷也是二十九人。

維省斯基：傷者還是重傷或是輕傷？

克尼：我現在說不出來。

維省斯基：你不記得：這二十九個受傷的紅軍戰士都已成了很殘廢的人麼？

克尼：有十五個人成了很殘廢的。

維省斯基：這些重傷究竟傷在何處？

克尼：他們是手斷頭破……

維省斯基：這就是由於你和你們的夥伴們的『恩賜？』

克尼：是。

維省斯基：你知道，這次翻車的預備工作是如何組織起來的，人力如何佈置，翻車事件本身又是如何佈置的呢？

克尼：事情是這樣的，車站值日員萊科夫接到徹略賓斯基行車調度員關於兵車開來的通知以後，便向轉轍長科列斯尼科夫說：『去準備接車！』

維省斯基：萊科夫究竟是怎樣說的呢？

克尼：萊科夫說，兵車正在路上開來，我們應當把這次撞車事情做好。因此你該這樣預備道叉方向，使『轉轍方向準備得不對。』

維省斯基：他不是更簡單地說過——『要把這次列車翻過來麼？』（克尼亞節夫默而不答）你記不起來麼？

克尼：我不記得。

維省斯基：讓我來叫你記得罷！（於是維省斯基把下述一段念出來）『在離蘇米哈車站兩三站路程時，該站值班員萊科夫曾接到徹路賓斯基車站值日員關於第五〇四號列車向蘇米哈站開來的通知。萊科夫接到這個通知後，旋即通知馬爾克維奇說，兵車正在路上開來，現在我們就開始動手罷！此後，萊科夫便把轉轍長科列斯尼科夫叫到自己面前，說兵車正在路上開來，我們必須把牠翻過來。』

他並不是說『去準備接車，』而是說得直截了當，精確和具體：『把列車翻過來。』因此這是直截了當的指使——準備傷害大批人命。你們當時利用誰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呢？

克尼：利用了轉轍夫學徒邱金諾娃。

維省斯基：她也是陰謀份子當中的一個麼？

克尼：不是。

維省斯基：那就是說，你挑選了完全與你們組織無關的人來做工具。她到鐵路上做工才不久麼？

克尼：總共只有兩個禮拜。

維省斯基：看看，你們就派這位兩個星期的學徒去接兵車。按照路規說來，容許這樣辦麼？

克尼：不容許。

維省斯基：可是究竟爲什麼可以這樣違犯路規呢？不是因爲這車站上的管理人員與托落茨基組織有

克尼：關係麽？
克尼：完全對。

（按照維省斯基的請求，法庭把蘇米哈站翻車（這次翻車毀壞了一輛車頭，八輛車箱，壓死紅軍戰士二十九人，傷二十九人）的證明書併入本案案卷。）

審判員雷赤科夫：在你加入托落茨基組織以前，日本偵探機關，曾企圖吸收你爲探子麽？

克尼：對的。這是一九三一年的事。當時有一批日本專門家在我那裏做工作，但是我堅決拒絕了。

雷赤科夫：你把這件事情報告了相當機關麽？

克尼：我沒有報告。

雷赤科夫：而在一九三一年後，你與那勾引你的人通過信麽？

克尼：我沒有寫過信給他，但是我接過他兩三封信。

雷赤科夫：照屠洛克在預審時的供詞看來，他因爲知道你是日本偵探機關的探子，於是就把你勾引到托落茨基組織中去是否如此呢？

克尼：他沒有說過我是日本偵探機關的探子，但是他知道我那次談話，並且屠洛克自己曾向我說過，說這個人曾向他說必須注意到我。

雷赤科夫（問屠洛克）：當你在一九三四年勾引克尼入夥時，你知道他與日本偵探機關的關係麽？

屠洛克：我知道在一九三〇年他在喀山鐵路上做工作，而一批日本專門家也在那裏做工——就是在這個時候，他們進行了這次談判。

審判員雷赤科夫（向克尼問）：你個人曾把什麼探報給過日本偵探機關呢？給過含有軍事動員性質的消息？

克尼：給過。

雷赤科夫：是關於一條鐵路的消息麼？

克尼：是關於南烏拉爾鐵道，彼爾姆鐵道，後貝加爾湖鐵道，烏蘇里鐵道與東西比利亞鐵道的消息。

雷赤科夫：托落茨基組織在你指揮之下進行了幾次翻車事件？

克尼：我們直接準備的翻車事件有十三次至十五次之多。

雷赤科夫：你在破壞軌道方面做了些什麼具體工作？

克尼：減弱了路基所鋪的沙石，因此軌道下陷。結果，鐵軌就被斷裂。

雷赤科夫：結果就是翻車麼？

克尼：由於這種原因曾翻車數次，如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亞與諾站與烏斯基加達瓦站之間的翻車，一九三六年二月間葉琴諾維爾站與伯爾豕烏斯站之間的翻車。

維省斯基：在那裏也是傷害了八命麼？

克尼：在車手當中有人喪命。

雷赤科夫：總車手及車手都遇害了麼？

克尼：是的。

雷赤科夫：在破壞車頭方面如何進行了暗害工作？

克尼：在庫爾岡機廠，曾開進數輛「佛德」式的大車頭。管理方面的人利用機廠對於這些車頭不甚熟悉的弱點，就故意在臨時修理時不給以好好的照料，並且往往強迫司機把修理不全的車頭開出去。曾經做到這樣的地步，把幾乎所有的測水器都破壞了。由於這樣放任的結果，於是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在羅沙站與瓦爾加石站之間，便發生汽鍋炸裂之事。據我記得，傷害了副司機與火夫的性命，而司機便炸到三十公尺之外。車頭完全成了廢物。這一切破壞的暗害工作在庫爾岡機廠，是由尼科拉也夫，安得列也夫，斯達羅斯與莫吉洛夫幹的，在茲拉托司特機廠，是由車頭修理匠蘇米幹的。

雷赤科夫：黨與政府把精良的車頭交付給鐵路使用，可是你們托落茨基份子却故意損壞這些車頭，使之成爲廢物麼？

克尼：是的。

辯護人布拉烏德：請你講講你是如何被勾引去替日本偵探機關服務的。

克尼：我在四月加入了托落茨基組織，但是九月才與日本偵探機關建立了聯繫。在九月裏，H先生來到徹略賓斯基，委托一個我所不認識的人向我傳達說，現在與日本的聯繫，不是個人的行爲，而是出自我所參加的組織的鬬爭手段。我曾問過這個不認識的人，這究竟是些什麼任務呢？他把屠洛克相同的話向我一一列舉出來了，這就是破壞軌道，進行翻車，破壞車頭，搗亂工業。而且據我記得，他第一次向我說，他們很想得到關於一九三四年過了多少軍用車到遠東去的統計消息。

布拉烏德：是否向你說過：日本偵探機關會揭露你已加入托落茨基組織的事實麼？

克尼：說過。

布拉烏德：你向法庭報告過，當屠洛克勾引你加入托落茨基組織時，他曾以揭露你與日本偵探機關的關係來要挾你麼？

克尼：我報告過。

布拉烏德：你在與H先生這個代表談話之後，還與H先生本人會過面麼？

克尼：在一九三五年四月我接到H先生一封信，信上說將要到倫敦去担任外交工作，當他經過斯威爾德洛夫斯克時，請我去會他，結果，我會了他。我在火車上他的房位內會見了他。這個H先生在談話中間我說，他深知我與托落茨基組織的聯繫，現在，托落茨基組織在日方幫助之下，在蘇聯進行工作。我們——如他所說——是彼此互相幫助的，自然，我所請求你辦的一切事情，不外是報答我們

所給與托落茨基組織的幫助而已。他又向我說，破壞工作實不能令日本方面滿意。必須轉而進行軍事破壞工作，特別是要破壞開向遠東的軍用列車，以便挫折紅軍的士氣。實在說，H先生所發揮的這些方針，過後又由利夫什茨所認准了。

布拉烏德：這樣看來，你是按日本偵探機關以及利夫什茨——人民委員會交通部副部長的指使而造成翻車事件麼？

克尼：是的。

維省斯基：我想再訊到翻車案。你在這裏舉出好多次翻車事件。一九三六年二月七日葉琴諾維爾站，伯爾家烏斯站之間的翻車，是按照你的吩咐而造成的麼？

克尼：是的。

維省斯基：赤斯塔亞·邱木略克站的翻車也是你指使幹的麼？

克尼：是的。

維省斯基：羅沙站與瓦爾加石站之間的翻車，也是你吩咐幹的麼？

克尼：是的，我已說過。

維省斯基：抓去了眞正的犯人麼，或者是由別的什麼人來替罪呢？

克尼：沒有，好像曾抓住了車所尼科拉也夫。

維省斯基：審判了他麼？

克尼：審判了。

維省斯基：他有罪麼？

克尼：沒有罪。

維省斯基：他們會把罪推到司機費多羅夫頭上麼？

克尼：會推到他的身上。

維省斯基：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八日在邱木略克站會佈置第九一〇號列車翻車事件，這也是由你指使的麼？

克尼：是的。

維省斯基：那就是說，可以得出下述的結論，你不但組織了翻車事件，而且還利用了鐵路局長的地位編造了明知不確的文件，來蒙混偵查機關與法庭之視聽。對麼？

克尼：完全對。

維省斯基：在一九三五年與一九三六年你們直接所造成的幾次翻車，總共害死了六十三人的性命，並傷了一百五十四人，對麼？你承認這些數目是實在的麼？

克尼：我承認是實在的。

（根據國家公訴人維省斯基之請求，乃將克尼在一九三六年八月所接到的H先生的信的照像片給克尼看。克尼看了這個照像片後，便承認眞是從他在一九三六年八月所接到H先生的親筆信照下來的像片。

此外維省斯基還把歸入本案案卷中一封載明十二月十五日寫給克尼的原信念了幾段。這封信也交給被告克尼看，他承認這封信是H先生寫的。他——克尼——是在一九三一年從H先生方面接到的。）

維省斯基：這封信曾在你手中保存麼？

克尼：是的。

維省斯基：這樣，我們現在就可以認爲不僅根據你的供詞和屠洛克的供詞，而且根據現在我們手中所有的憑證，證實了你與H先生的活動。

就是這些老爺們給了你在戰爭發生時的行動方針麼？

克尼：是的。

維省斯基：這些方針的內容是怎麼樣呢？

克尼：是放火燒燬軍用倉庫，放火燒燬軍用列車供給處。據我記得，十月間在我那裏與H先生談話時，他堅持要求說，『我們的任務不在於放火燒燬而已，于必要時甚至還要在預備裝載軍隊的車輛中

放毒——

維省斯基：用什麼毒素？

克尼：用化學毒菌。

維省斯基：施放毒素以後，便滿載士兵，使其一概中毒，生病死亡麼？

克尼：對的。

維省斯基：他允許過，在需要時他就立刻給你這種毒菌麼？

克尼：允許過。

維省斯基：他與你談話提到戰爭發生問題，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克尼：據他手中的材料來說，日本與蘇聯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

維省斯基：什麼時候會發生呢？

克尼：在最短時間內。

維省斯基：昨日你承認過，你經過屠洛克收到日本偵探機關一萬五千個盧布麼？

克尼：我承認過。

（然後被告克尼便供述他如何把這一萬五千盧布分給托落茨基組織中的份子——多爾馬托夫，勒温，謝爾巴科夫，波切卡列夫等。）

維省斯基：H先生與你談話，曾說——『你給我如此如此消息，』而這種消息乃是偵探性質的消息，他沒說要給錢麼？

克尼：他向我說：須知我們日本是很幫助托落茨基組織的。

維省斯基：由此可見，你們這種工作到底是得了錢麼？

克尼：是的。

十九・對被告屠洛克之審訊

審判長：被告屠洛克，什麼時候，誰勾引你加入反蘇聯的托落茨基組織呢？

屠洛克：一九三四年由烏拉爾車輛製造廠建築工程總經理馬里亞辛勾引我加入的。

審判長：給了你什麼任務呢？

屠洛克：建立托落茨基份子以及其他能夠幫助反黨和反政府鬭爭的份子之組織，以便在彼爾姆鐵路及南烏拉爾鐵路上組織破壞工作。

審判長：你那時担任什麼職務呢？

屠洛克：車務處副處長。

審判長：在最近幾年中，你在托落茨基組織方面做了些什麼工作？

屠洛克：我勾引了阿列克辛，布爾拉科夫，梅依葉爾松及多里馬托夫加入托落茨基組織。

審判長：你從誰那裏直接得到托落茨基份子反蘇聯的破壞工作的指示呢？

屠洛克：我從馬里亞辛那裏得到的。一九三五年三月皮達可夫來到斯威爾德洛夫斯克，他告訴我，暗害的軍事破壞工作，的確是他叫我們幹的，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四日，我到了莫斯科，到人民委員會交通部參加審定新行車表的委員會。九月十五日，利夫什茨叫我到他那裏去，並對我說：現在暗害與軍事破壞工作，就是要設法破壞新的行車表。行車表破壞後，不僅使運輸工作惡化，而且要影響工人的工資，並使卡岡諾維赤底領導喪失信用。

審判長：利夫什茨是否把具體的組織撞車和出軌的指示給了你呢？

屠洛克：是的。他說假使能夠組織有人命犧牲的撞車和出軌，那是很好的。

審判長：你沒有問爲什麼一定要有人命犧牲呢？

屠洛克：我沒有問，因爲馬里亞辛已經更詳細地對我說過這件事情，他所說的理由，就是務須引起對政府的仇恨。

審判長：你們的托落茨基份子組織了幾次撞車和出軌呢？

屠洛克：我知道的大約有四十次。

審判長：在那一個時期內呢？

屠洛克：從一九三四年年底起到我被捕時爲止。

審判長：有人命犧牲嗎？

屠洛克：有人命犧牲的。主要的是貨車上服務人員，此外客車上也有。

審判長：傷害了幾多人呢？

屠洛克：死者一人，重傷者五人，輕傷者十五人。

審判長：你們的托落茨基反革命團體準備過暗殺行爲嗎？

屠洛克：準備過。一九三四年秋季，莫洛托夫應乘車經過斯威爾德洛夫斯克；當時與馬拉其科夫斯基有聯繫的托落茨基份子——布爾拉科夫親自準備了暗殺莫洛托夫的行爲，但暗殺沒有成功。我從布爾拉科夫口中又知道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他曾準備暗殺卡岡諾維赤。他請一個日本偵探叫米赫特科的來做這種暗殺行爲的實行者。

審判長：你曾供認你與日本偵探H先生、U先生、『喬治·依萬諾維切』建立了聯繫，你現在是否承認確有其事？

屠洛克：我承認確有其事。

審判長：你替日本暗探局做了工作，你得了多少錢呢？

屠洛克：一九三五年二月，給了我三萬五千盧布。

維省斯基：你說到撞車和出軌，你說死一人，重傷五人；輕傷多少人呢？

屠洛克：十五人。

維省斯基：這是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的事情嗎？

屠洛克：是的，是在斯威爾德洛夫斯克的客車站與斯威爾德洛夫斯克的掛車站之間。

維省斯基：這是依照你們的指示而進行的嗎？

屠洛克：鐵路段長彼羅，及鐵路技師包坡夫依照我們的指示幹的。

維省斯基：一九三六年三月間，在斯威爾德洛夫斯克的客車站與斯威爾德洛夫斯克的掛車站之間七五六號列車之翻車，傷害人命，也是依照你們的指示幹的嗎？

屠洛克：依照我們的指示幹的。

維省斯基：你也誣害過無辜的人，把罪名推在他們身上嗎？

屠洛克：（靜默很久）

維省斯基：你回想一下一九三五年九月三十日，在蒙濟諾車站，九三〇號列車的案件。

屠洛克：是的，我記起了。那裏值班站長熱爾諾夫想利用轉轍女工開亞金娜婭的無經驗。

維省斯基：想把罪名推在她身上？

屠洛克：想把罪名推在她身上，但是沒有成功。

二十．對被告拉達依查克之審訊

法庭開始審訊被告拉達依查克——前化學工業總管理處處長。

維省斯基提出了許多問題，來問明拉達依查克履歷上的幾件事。例如十月二號審訊時，拉達依查克供稱他是德國人，說德國語是他的鄉土語，但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二年以及後來他所填寫的履歷表中，他寫的是波蘭人，說波蘭語是他的鄉土語。

維省斯基：你加入共產黨時，你隱瞞你是德國人嗎？

拉達依查克（以下簡稱拉達——譯者）：是的。

維省斯基：你所塡的履歷表中有什麽不正確的地方嗎？

拉達：履歷表中還有一點不正確。在履歷表中我曾塡寫我自己從一九一五年開始服務於革命，其實這不是事實。

維省斯基：在履歷表中，你爲什麽塡寫你是鼓動員，從俘虜收容所中逃跑三次，領導過三次罷工，作過五金工人工會的秘書等等。你這樣塡寫有什麽目的呢？在偵查時你曾供認說「我要使自己有革命的

功勞，而這種功勞實際上是沒有的，」這是眞話嗎？

拉達：是眞話。

維省斯基：在一九三六年二月間你担任什麼職務呢？

拉達：化學工業總管理處處長。

維省斯基：你知道克拉皮夫斯基是甚麼人嗎？

拉達：知道的，這是我在瓦尼省國民經濟部担任副主席時的一個同事。

維省斯基：克拉皮夫斯基當時担任什麼職務呢？

拉達：他是供給科的主任。

維省斯基：他私下做些什麼事呢？

拉達：他轉賣國家財產，做投機生意。

維省斯基：簡單說，他偸竊了國家財產，是這樣嗎？

拉達，是的，確是這樣的。

維省斯基：你是省國民經濟部的副主席，你爲什麼要這個偸竊國庫的騙子在那裏作工呢？

拉達：（默而不答）

維省斯基：你在錢財上與他有什麼關係嗎？

拉達：（說話聲音極低）有關係的，我住在他家中。

維省斯基：不是住在他家中，而是靠他的錢養活。

拉達：也可以這樣說。

維省斯基：這就是說，你承認你担任國民經濟部副主席時，你包庇了克拉皮夫斯基的刑事的犯罪行爲，因爲他同你分贓。這樣說對的嗎？

拉達：也許不十分恰當，但基本意思的確如此。

維省斯基：現在說你的托落茨基組織的活動罷。

拉達。我積極進行托落茨基組織的工作，是從一九三四年開始的。

維省斯基：誰把你勾引入托落茨基組織的呢？

拉達：皮達可夫。在一九三四年年初，我與皮達可夫作第一次談話，當實行一九三四年的工作計劃時，我就在製定計劃中實行暗害辦法，從此我就開始了積極的暗害工作。

維省斯基：你與偵探工作有無聯繫呢？

拉達：有聯繫的。

維省斯基：經過誰呢？

拉達：經過普森及格拉舍。

維省斯基（轉問普森：）被告普森，拉達經過你而與外國偵探方面發生聯繫，這是眞的嗎？

普森：經過我發生聯繫，同時直接也發生聯繫。

維省斯基：最後一點他沒有供出。（轉問格拉舍：）被告格拉舍：拉達經過你與德國偵探局的探子發生聯繫嗎？

格拉舍：是的，他與德國偵探局的探子發生了聯繫。

維省斯基：這種聯繫內容是什麼呢？

格拉舍：把關於化學工業工作的秘密消息和材料轉交他們。

維省斯基（轉問拉達：）這樣一來，你會經把你在你職務上所有的秘密的材料交給了德國偵探局，是不是呢？

拉達：是的。

維斯省基：你知道有暗殺組織嗎？

拉達：我從皮達可夫口中知道了托落茨基的方針。

維省斯基：依照這種方針，要暗殺誰呢？

拉達：要殺黨和政府的領袖。

維省斯基：你的軍事破壞工作表現在那裏呢？

拉達：依照我給普森的指令，在郭爾洛夫斯基工廠實行了三次軍事破壞，在聶夫斯基工廠實行了一次軍事破壞，在沃斯克列辛斯基化學聯合廠實行了一次軍事破壞。

維省斯基：在郭爾洛夫斯基工廠亞硝酸銨分廠裏的中和部有過不幸事件嗎？

拉達：有過。

維省斯基：什麼不幸事件呢？

拉達：實行過爆炸。爆炸後，整個工廠和分廠停工好幾天。炸死工人三名。

維省斯基：你知道他們的名字嗎？

拉達：忘記了。

維省斯基：我告訴你吧：第一個是庫爾金·列翁尼德·費多羅維赤，二十歲，青年團團員，生產突擊隊員，斯塔漢諾夫工作者；第二個是莫斯鐵茨·尼古拉伊·依凡諾維赤，他是一個鉎工；第三個是斯特列里尼科娃·依林娜·葉郭羅夫娜，她二十二歲，是一個管濾斗的女工。誰殺死這三個人的呢？

拉達：我們。

維省斯基：就是你這個化學工業總管理處處長嗎？（拉達默而不言。）第二次破壞工作是在什麼時候呢？

拉達：第二次是折斷預備汽管，沒有引起人命犧牲。而工廠的工作，則在幾天之內時常停頓。

維省斯基：第三次呢？
拉達：第三次是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爆炸空汽房，爆炸結果，一個空汽房不能工作。
維省斯基：炸死了什麽人？
拉達：好像炸死了兩個工人。
維省斯基：記不起嗎？我告訴你，第一個是魯聶夫・依凡葉郭羅維赤，他是生產突擊隊員，分廠中最好的管理儀器的工人；第二個是尤丁・烏拉迪米爾・昂德列葉維赤，二十六歲，是托姆斯基工業專門學校的最高級學生，是在生產中實習的。記起了嗎？
拉達：對的。
維省斯基：在沃斯克列辛斯基化學聯合廠中，是依照你們的囑咐而實行了軍事破壞行爲嗎？
拉達：是的。
維省斯基：那裏傷害了人命嗎？
拉達：沒有。
維省斯基：難道沒有燒死工人十七名，燒傷十五名嗎？
拉達：總檢察長！這與這次破壞工作無關。
維省斯基：我們現在來考查一下。這次放火是什麽時候？

拉達：是一九三六年。

維省斯基：是在八月一日的夜裏嗎？

拉達：是的。

維省斯基：放火是你組織的嗎？

拉達：不是的。我曾經供認在一九三四年四五月間，依照我的指示而實行了軍事破壞工作，使一個製酸分廠不能工作。

維省斯基：這就是說，曾經有過兩次軍事破壞：一次是依照你的指示破壞了一個製酸分廠，另一次是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夜間放火，是不是呢？

拉達：是的。

維省斯基：火燒過後，你命令立刻進行清除工作，雖然這對於工人的生命是有危險的。的確這樣嗎？

拉達：是的，我這樣要求過。

維省斯基：倒了牆，你知道嗎？

拉達：一開始我就當場領導了一切工作。……

維省斯基：壓死了十七名工人，對不對？

拉達：對的。

維省斯基：十五名工人受傷，對不對？
拉達：對的。
維省斯基：你這樣領導了清除工作，以致於十七名工人被壓死，十五名工人受傷，是不是這樣呢？
拉達：（默而不答）
維省斯基：誰要你作偵探工作呢？
拉達：皮達可夫：

一月二十七日晚庭

維省斯基：我有問題問拉達：在暗殺及軍事破壞工作方面，誰與你直接發生聯繫的呢？
拉達：卡濟尼茨基，尤石克維切，郭洛萬諾夫，托多爾斯基。
維省斯基：你知道倫茨嗎？
拉達：我知道倫茨是一個外國公司的電汽匠，後來又知道他是與德國偵探局有聯繫的暗害團中的一份子。
維省斯基：你還知道誰呢？
拉達：還知道……梅伊葉羅維特茨。
維省斯基：他也是德國偵探局的探子嗎？

拉達：是的。

維省斯基：我要把各種人的許多照片給拉達看，以便他認出梅伊葉羅維特茨來。照片並沒有任何字跡和記號，看他在這些照片中是不是認得出梅伊葉羅維特茨的照片。請把這些照片遞給拉達吧。

（法庭司務長把照片遞給拉達看。）

拉達：這就是梅伊葉羅維特茨。

審判長：我證明被告拉達認出梅伊葉羅維特茨的這張照片，是與貼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發給德國國籍的梅伊葉羅維特茨（帕維爾）的外國人居留證上面的照片，完全一樣的。這張外國人居留證保存在莫斯科省執行委員會主席團行政科外事股的入境登記案卷內。

二十一．對被告格拉舍之審訊

維省斯基：你第一次到俄國來是在什麼時候？

格拉舍：一九〇九年。

維省斯基：從什麼地方來的？

格拉舍：從捷克斯拉夫來。

維省斯基：來到那一個城市？

格拉舍：到庫班省，葉伊斯克城。

維省斯基：那時候你是那國的國籍？

格拉舍：奧匈國籍？

維省斯基：當時你有什麼職業？

格拉舍：我是以法文教員的資格來的，後來又做德文教員。在葉伊斯克城中等學校授課，兼私人教員。我在葉伊斯克城住到一九一七年年底。一九一七年五月加入了布爾塞維克黨。

維省斯基：在那個時候，你又是那國的國籍呢？

格拉舍：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初，我在葉伊斯克城入了俄國國籍。

維省斯基：當時，你認自己是那一國的公民？

格拉舍：我認自己是俄國公民。

維省斯基：一九一八年呢？

格拉舍：也是俄國公民。

維省斯基：而一九一九年呢？

格拉舍：一九一九年，我認自己是捷克斯拉夫國人。

維省斯基：這就是說，你是匈奧公民，入了俄國國籍，後來又宣稱自己是捷克斯拉夫國人。對不對？

格拉舍：對的。一九一九年我就到捷克斯拉夫去了。

維省斯基：怎樣回來呢？

格拉舍：我從那裏，冒充前俄國俘虜回來的。

維省斯基：對於這一點怎樣瞭解呢？

格拉舍：我是混在一部份前俄國俘虜裏面，從捷克斯拉夫回到俄國來的。

維省斯基：就是說，你冒充在捷克斯拉夫做俘虜，並回到了俄國來，是不是呢？

格拉舍：是的。

維省斯基：這是在那一年？

格拉舍：一九二〇年底或一九二一年初。

維省斯基：一九二一年，你住在什麼地方？

格拉舍：在莫斯科。

維省斯基：用的是什麼護照？

格拉舍：一九二三年，我領得了勞動證。

維省斯基：算作那國國民？

格拉舍：算作蘇俄公民。

維省斯基：爲什麼你的勞動證上寫着，你生在庫班省？你眞是在庫班省生的嗎？

格拉舍：不是。

維省斯基：什麼時候生的？

格拉舍：一八八六年。

維省斯基：那麼，爲什麼護照上寫的是一八八〇年生？是你自己說的嗎？

格拉舍：是的。

維省斯基：你的基本職業是什麼？

格拉舍：我作了七八年教員。

維省斯基：這是你的基本職業嗎？

格拉舍：不是，以後停止了這個職業，去做新聞記者，再次，又作經濟學家。

維省斯基：『在捷克做俘虜』時，你的職業是什麼呢？

格拉舍：在捷克的證書上，寫的是教員。

維省斯基：俄國證據、是新聞記者嗎？

格拉舍：是的。

維省斯基：這就是說，你的職業也是到處不同的。

格拉舍：（默而不言。）

維省斯基：講一講關於你的托落茨基主義思想。

格拉舍：我與托落茨基主義向來沒有任何關係。

維斯這基：向來沒有任何關係麼？

格拉舍：由於做偵探與暗害工作，我才同牠發生關係。

維省斯基：原來如此?!這就是說，你是由做偵探而走向托落茨基主義，並不是由相信托落茨基主義而做偵探的？既然如此，你最好向法庭說一說，你怎樣做了偵探局底探子。替什麼偵探局做探子？

格拉舍：替德國偵探局。

維省斯基：原來如此?!這是在那一年？

格拉舍：這是在一九三二年。

維省斯基：一九三二年以前，你曾在什麼地方工作過，是在那些機關裏？

格拉舍：一九三二年以前，當我已到俄國的時候，最初在人民委員會教育部辦事。

維省斯基：什麼職務？

格拉舍：我在新聞部，充當『統一教育彙刊』底編輯員。以後在共產國際做捷克斯拉夫語的翻譯員。

維省斯基：當你到人民委員會教育部辦事時，你已經與偵探組織有了聯繫麽？

格拉舍：是的。

維省斯基：到共產國際辦事時，已經與偵偵組織有了聯繫麽？

格拉舍：是的。

維省斯基：但是你方才說，你只從一九三二年底才做偵探局的探子。我問你一個直捷了當的問題：一九二〇年你到蘇俄來的目的，就是做偵探嗎？

格拉舍：是的，一點不錯。（聽衆驚動。）

維省斯基：因此，你冒充俘虜回國，這樣更容易實現你的目的麽？

格拉舍：是的。

維省斯基：現在完全明白了。你與德國偵探局完全勾結起來，是在那一年？

格拉舍：我與德國偵探局聯繫是在一九三二年。

維省斯基：在這以前呢，同那國偵探局勾結呢？

格拉舍：這以前，同捷克斯拉夫偵探局。

維省斯基：這樣說來，你的基本職業是什麽呢？

格拉舍：我想，似乎用不着回答了……

維省斯基：同答是需要的。你說你是教員，而你並不是教員；你說你是經濟學家，而你又不是經濟學家；你又改口說你是新聞記者，可是，現在我覺得你的職業是別的。是什麼呢？

格拉舍：是偵探。

維省斯基：這就完了！你同德國偵探局底什麼人有聯繫？

格拉舍：德國偵探局裏，我同梅伊葉羅維特茨有聯繫，關於這個人，在法庭上已經有人講過了。

維省斯基：爲便於進行審訊起見，我請把這些照片給被告格拉舍看一看，看他是不是認出他的存來。

審判長：被告格拉舍，給你這十張照片。在這些照片裏，有沒有梅伊葉羅維特茨底照片？

（法庭司務長把照片給被告格拉舍看，格拉舍翻閱之後，在其中一張照片上註了字。）

維省斯基：再沒有別的相識了？請再給他看一看，或者還有相識的！

（被告格拉舍翻閱照片，又在一張照片上註了字。）

維省斯基：你又找到什麼人了？

格拉舍：我又認出『林得』公司底電汽匠倫茨。

維省斯基：他是個什麼人？

格拉舍：他也是德國偵探局底探子。

維省斯基：你同他發生過聯繫麼？

格拉舍：是的，我介紹過他到唐保夫城『少共』工廠作工。

維省斯基：做什麼工作？

格拉舍：我依照梅伊葉羅維特茨底囑咐，把倫茨介紹到那裏去做德國偵探局底探子，去搜集機密消息並做軍事破壞工作。

維省斯基：而你做什麼呢？

格拉舍：只在這件事情上或是一般地說？如果是一般地說來，那我也是應當替梅伊葉羅維特茨收集秘密消息的。

維省斯基：你收集了嗎？

格拉舍：各種以外國專門家名義在各種工廠中工作的德國偵探交給我的秘密材料，我都轉交去了。

維省斯基：另一方面，還從什麼地方收到秘密材料呢？

格拉舍：從拉達依查克那裏。

維省斯基：你與拉達依查克來往聯繫時，你是以托落茨基主義者的資格，還是以偵探的資格呢？

格拉舍：我是以偵探的資格同他來往的。

維省斯基：你在當時，已經是托落茨基份子嗎？

格拉舍：不是，我沒有做過托落茨基份子。

維省斯基：然而附和了托落茨基主義，是不是呢？

格拉舍：我認為托落茨基主義是一些信仰配合而成的東西，而我旣然是一個探子，就不應該有這一類信仰。（聽衆發笑。）

維省斯基：這就是說，你同拉達依查克的結合，簡單地只是同偵探的結合？

格拉舍：是的。我曾以為在這種事情上，主要的是物質上的利益，是金錢。

維省斯基：你難道為了這種事情而領得了錢嗎？

格拉舍：領到了，從梅伊葉羅維特茨處領到的。我從他那裏一次領到了三百馬克。他說他照約定地址還寄去了五百馬克。然而我沒有接到消息，證明錢眞正匯到了。

維省斯基：他沒有給你的親人寄錢去嗎？

格拉舍：是的，我把在捷克斯拉夫的親人底通信處給了他。

維省斯基：你這位親人叫什麼名字呢？

格拉舍：普羅哈斯科。

維省斯基：費格列爾是否寄了錢？

格拉舍：也寄了，他把錢給了我的母親。

維省斯基：你的母親就這樣收到了多少錢？

格拉舍：大約七八千捷克斯拉夫的『克龍。』

維省斯基：以後，你拒絕勾引你去作德國偵探局底探子嗎？

格拉舍：是的。

維省斯基：在莫斯科，你與托落茨基份子有過聯繫嗎？

格拉舍：與工程師文費里特有過聯繫。

維省斯基：還同誰呢？

格拉舍：還同龍得和尼里森。

維省斯基：你把你的屋子給過什麼人利用去進行秘密活動呢？

格拉舍：文費里特用這個屋子做秘密會面的地址。文費里特在這個屋子裏住過。他關照過我說，有各種人要到這裏來，叫我把他們送到他那裏去；如果他到別的地方去的話，就請我幫助他們。

維省斯基：他們要求你什麼東西沒有？

格拉舍：有過這樣的事：一九三五年，大約是九月間，一個丹麥鐵路上辦事的人，冒充旅行者，給我送來了文費里特寫的一張字條，並且說他要找皮達可夫，說他有一封信要給皮達可夫，請我領他去見皮達可夫。

維省斯基：你怎樣辦呢？

格拉舍：我記得這是一天早晨，我到人民委員會重工業部去辦事，把他領了去並告訴了他要怎樣領入門證，怎樣到皮達可夫底辦公室裏去。

維省斯基：你替拉達依查克組織過什麼非法的秘密的約會沒有？

格拉舍：我組織了拉達依查克與梅伊葉羅維特茨的會面，這是在拉達依查克底辦公室裏。

維省斯基（問拉達依查克）：你記得由格拉舍幫忙而與梅伊葉羅維特茨會面嗎？你們談了些什麼？

拉達依查克：梅伊葉羅維特茨已經受到格拉舍相當的指導，問我是否可以看一看新建設底草案，我告訴他說可以，並且說，他可以由格拉舍處得到必要的材料。這樣，談話就終結了。同時我也就告訴了格拉舍，叫他把必要的材料給梅伊葉羅維特茨。

維省斯基（問格拉舍）你參加過什麼軍事破壞行動沒有？

格拉舍：我親身沒有參加過，但我知道一個德國專門家瓦伊諾夫似乎就是別列茲尼科夫斯基化學聯合廠不幸事件的主謀者。

維省斯基：爲什麼你知道這件事情？

格拉舍：我知道在這件事情發生以後，他非常驚慌地回到莫斯科來，並請我把他送到國外去，愈快愈好。

維省斯基：你照辦了沒有？

格拉舍：我照辦了。

維省斯基：我沒有問題了。

審判長：法庭證明：格拉舍認爲是梅伊葉羅維特茨的那張照片，和莫斯科省執行委員會主席團行政科外事股入境登記文卷內的照片，以及執照上的照片，完全一樣。

二十二・對被告普森之審訊

維省斯基：你承認自己犯了什麽罪？

普森：我承認自己犯了下述的罪：我於一九三四年初被拉達依查克勾引入托落茨基組織，我參加了這個組織，一直到我被捕時爲止，我曾經依照拉達依查克給我的指令在郭爾洛夫斯基工廠裏，實現了三次破壞行爲，在設計方面，參加了暗害工作，而且依照拉達依查克的囑咐，把三個秘密文件轉交了德國探子——電汽匠倫茨。

維省斯基：你還勾引各種人加入托落茨基組織，這難道不是也犯了罪嗎？被你勾引來做爆炸工作的人當中，你能夠指出什麽人呢？

普森：郭爾洛夫斯基化學工廠底技術經理工程師唐木……。

孔莫多夫：我有問題問普森。在郭爾洛夫斯基工廠的軍事破壞行爲是什麼時候實行的？

普森：一九三五年十一月。

孔莫多夫：一九三六年你是否實行過什麽暗害或軍事破壞行爲？

普森：沒有，自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起，一件違法性質的行爲也沒有實行過。我用盡了種種方法，離開了化學工業總管理處底工作，並到格魯吉亞去了。

孔莫多夫：到了新的地方，你沒有利用工作地位去秘密活動嗎？

普森：相反的，我努力把工作儘量做好，以便清洗犯罪的汚點。

孔莫多夫：你是在訊問時認罪的，還是寫了聲明書認罪的？

普森：在沒有向我提出證據和種種問題之前，我就請求給我紙筆，並寫了一個聲明書與人民委員會內務部部長葉若夫，在聲明書中承認了一切罪過。

孔莫多夫：我再沒有問題了。

維省斯基（問普森）：你替德國偵探局做偵探的工作，做了多久？

普森：從一九三四年底或一九三五年初起，至一九三五年中止。

維省斯基：此後，因爲什麽緣故而中止了？

普森：沒有得到任何實際的囑咐，因爲與我發生聯繫的人——倫茨走了。

維省斯基：就是說，你停止了你的行動，並不是內心有所愧悔，而是因爲沒有得到實際的囑咐，是不是呢？

普森：是的。

維省斯基：在沒有把你拘捕到內務部以前，你沒有向任何人聲明過，說你心中悔罪嗎？

普森：我並沒有向任何人聲明過。

維省斯基：就是說，你給葉若夫的聲明書，是在你被捕以後，而不是在你被捕以前寫的。

普森：是的。

維省斯基：既然你自己沒有來，又沒有寫聲明書，那麽，其餘的就沒有任何意義。

普森：完全對的。

維省斯基：我再沒有問題了。

二十三·對證人唐木之訊問

維省斯基：你怎樣曉得普森底犯罪行爲呢？

唐木：他底反蘇聯的情緒，我是知道的。

維省斯基：從何知道呢？

唐木：從他的一切談話以及個別辭句中，都可以看出。

維省斯基：他曾是黨員麼？

唐木：是的。

維省斯基：你呢？

唐木：我不在黨。

維省斯基：你不是黨員，忽然看出黨員說反蘇聯的話嗎？

唐木：是的。有一次我到莫斯科來，這是在一九三四年二月，爲了工廠的事，我到了化學工業總管理處去找他，在那裏，他向我提出具體的建議，說要做軍事破壞工作。我同意了。

維省斯基：他給了你一些任務嗎？這些任務你全執行了麼？

唐木：是的，執行了。

維省斯基：是不是能夠認爲普森於一九三五年全年，都站在軍事破壞工作立場上呢？你以爲何如？

唐木：我想，是的。

維省斯基：普森所指示的軍事破壞工作，是在你直接領導之下實現的麼？

唐木：是的。

維省斯基：什麼人實行這種工作？

唐木：實行這種工作的，是阿西諾夫斯基，哈列相夫，得捡切，克魯居里尼茨基。

審判長：審問被告已經完結傳訊證人也已經完結，沒有補充的問題嗎？

維省斯基：我有問題要問皮達可夫。被告皮達可夫，請你說，你曾經坐飛機到挪威去會過托落茨基嗎？你是否知道飛機着陸在那一個飛機場上？

皮達可夫：在沃斯洛附近。

維省斯基：當飛機在這個飛機場上着陸時，不曾遇到任何困難和阻止麽？

皮達可夫：我實在說不出。我被這一次反常的飛行弄得心慌意亂，所以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維省斯基：你是否承認你的確落在沃斯洛附近的飛機場上？

皮達可夫：是在沃斯洛附近。這是我記得的。

維省斯基：我沒有別的問題了。我對法庭有下述的請求：我曾注意到這件事情，因此我曾請人民委員會外交部給我一張證明書，因爲我並且想從這一方面來查明皮達可夫底供詞，是否是眞實的。結果我收到了正式證明書，請歸入本案文件中去。（讀證明書）

『外交人民委員部領事科以下列消息通知蘇聯總檢查長：據蘇聯駐挪威大使底正式通告，沃斯洛附近赫列爾飛機場，遵照國際公法，全年均接受外國飛機，在各季的幾個月內，飛機起落也是可能的。』

（轉問皮達可夫：）這是在十二月嗎？

皮達可夫：正是在十二月。

維省斯基：請歸入本案文卷中去。現在有問題問被告拉迪克。

審判長：請吧。

維省斯基：被告拉迪克，某某人來到過莫斯科郊外你的夏季別墅嗎？

拉迪克：我已經供稱：一九三五年夏，還是那個中歐國家底那個外交代表到我那裏去，這個代表於一九三四年與我談話時進行了第一次探試。

維省斯基：他到你那裏去並與你談話，是否有第三者在場，或者只有你們兩個人？

拉迪克：不。當時布哈林也在那裏。我們在月台上坐着，當汽車到來的時候，我隔窗看見我已認識的那位先生，另外還有兩個不認識的人。他到我家裏來，事先並沒有任何通知，因此，我很詫異。他開始解釋他來的原因，說他那裏來了兩個人，這兩個人對於我一定是有興趣的：一個是尼克格斯堡大學底教授，另一個是該國某省某要人底顧問。他說這兩個人對於我應當是有興趣的，因爲克尼格斯堡對於俄國採取與羅增別爾格不同的態度，因爲普魯士懼怕波蘭，不相信波蘭，所以普魯士比較願意與蘇聯發生積極的關係。

我聽了他這種開場白，因爲我們已經決定，在此地同這些代表們，除了我已經說過的，只證明

托落茨基的代表資格外，不進行任何談判，又因爲我們不能對他解釋原因，所以我就只有一個辦法：我出乎他們意料之外地來向他們開玩笑。開始了種族問題上的論戰。那時，這些代表們看到我們大概不願意和他們進行他們特地來進行的談判，於是就走了。

這次拜會有了此後的結果。或者是這位外交代表不能明瞭爲什麼這樣款待他，或者站在他背後的人要來考察這究竟是什麼意思，考察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與該國間的關係是否發生什麼變化。經過了幾個月以後，大約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一次照例接見外賓的宴會時，該國的軍事代表，走到我跟前來……

審判長：你不要說出人名與國名。

拉迪克：他就開始訴說兩國間空氣完全改變了。他說了頭幾句話之後，就說在托落茨基先生的時候，兩國軍隊間有了比較好的關係。隨後，他說，托落茨基依然保持他自己的舊觀點，認爲蘇聯與德國間的友誼是必要的。在他這許多說話以後，他就開始逼迫我，認定我是從前實行拉怕爾條約路線的人。我就用我答覆他第一次探試的那句話來回答了他，我當時說，蘇聯底實際政治家知道蘇聯和德國友誼底意義，並決定實行這種友誼所必要的讓步。他回答說，大家終究應當聚會一下，大家一起來詳盡地具體地談一談接近的方法。

我對他說，遇有適當機會，我很高興同他聚談一個晚上。第二次這一番談話，使我感覺到下述

幾種可能：德國軍界企圖把托落茨基與德國相當集團間業已開始的關係，奪在自己手裏，或者是要考察那種業已進行的談判是否有實際內容。也許是要考察我們是否知道托落茨基的具體提議。

維省斯基：你同皮達可夫或別的人是否談過有爆發可能的戰爭何時會到來？

拉迪克：當皮達可夫由沃斯洛回來的時候，我曾由國際政治觀點上向他提出許多問題。他告訴我說：第一，托落茨基對他說，戰爭不用經過五年，只須經過一年，至多經過兩年，就要爆發。戰爭在一九三七年就要爆發。當時我就問皮達可夫：『托落茨基對你說這些話，是根據他自己的假定麽？』皮達可夫回答說：『不是的，托落茨基說這些話，是根據與格斯以及其他與他有聯繫的德國官場中人的談話。』這就是說，這是指定完全具體時間的一道訓令。我問他：這種戰爭是否單是進攻蘇聯的戰爭？皮可達夫對于這個問題回答說，托落茨基是一般地講到一九三七年的戰爭，並沒有把進攻蘇聯與一般的情勢分開。我問皮達可夫，托落茨基怎樣具體想像事變底發展呢？皮達可夫答覆我說：托落茨基說過：德國底戰爭準備，已經完結了，現在的問題就是用外交上的辦法來保障德國。這須要一年的工夫。又說，這些外交政策底目的，第一，就是要使英國守中立，第二，就是德國要去與法國商妥，或者就是德國依靠着日益發展的法西斯運動——這一運動會削弱法國底民主政府——，在對于德國便利的情況之下，用敏捷的突擊，去擊破法國，使法國在長期內不能作戰，德國就利用

這個時期用集中的力量來進攻蘇聯。這是皮達可夫所通知的第二個事實。

托落茨基與皮達可夫談話中的第三件事，就是德國要求向巴爾幹半島各國及多腦河流域各國進展完全自由。這也是切要的事實。

維省斯基（問皮達可夫）：這都是你說過的麽？你是否承認這是與事實相符呢？

皮達可夫：是的，拉迪克說得一點不錯。一切都是完全對的。

（此後，審判長烏爾里赫就問鑑定人，對于法庭所提出的問題他們是否可以作結論。

鑑定人——莫諾索維赤，列庫斯和坡克洛夫斯基等對于被告諾爾金及多羅布尼斯在克梅洛沃聯合廠建築區，被告舍斯托夫及司托羅依洛夫在庫茲巴斯煤礦中，以及被告拉達依查克和普森在郭爾洛夫斯基淡素肥料工廠中所進行的軍事破壞和暗害行爲有關係的各種問題，做結論。鑑定的結果，業已證明所發生之不幸事件都由于惡意暗害的緣故，並查明被告等所進行的暗害工作和軍事破壞行爲使蘇維埃國家受了重大損失。

鑑定人做了結論之後，審判長宣佈：

下次將根據蘇俄刑事訴訟法第十九條在不公開法庭上審訊。

下次公開審訊定於一月二十八日下午四時舉行。）

二十四・不公開的審訊

一月二十七日晚，於公開審訊完畢後，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庭舉行不公開的審訊。

在這次審訊中，鑑定人列庫斯及普克洛夫斯基兩人，對於經由法庭批定而不應在公開審訊中討論之諸問題，作出鑑定詞。

其次，證人石頓關於他自己與一外國正式代表之聯繫作出供詞。

被告皮達可夫、索考里尼可夫、拉迪克均被訊問到，他們曾如何遵照托落茨基關於加速反蘇聯戰爭，協助外國侵略國戰勝蘇聯以及瓜分蘇聯領土之方針，而與外國正式代表建立聯繫，並實行談判、根據法庭對被告拉迪克及索考里尼可夫的審訊，以及根據他們對相當物證的承認，已查明被告拉迪克及索考里尼可夫曾與之談判的外國代表之姓名、來歷及職位。

根據法庭對被告拉達依查克、克尼亞節夫、屠洛克、格拉舍、舍斯托夫、及司托羅依洛夫的審訊，業已查明，他們在遵照外國偵探局之囑咐，以及遵照托落茨基總部之囑咐，依據托落茨基之方針而在蘇聯進行之偵探及軍事破壞工作方面，與外國偵探局偵探是有何種具體的聯繫。

根據法庭對被告的審訊，以及宣佈相當物證和被告完全承認此種物證之結果，業已查明在公開審

訊時曾一再提及而未宣佈姓名的K先生，H先生，及其他等人之姓名及職位。

在這次不公開的審訊中，被告皮達可夫及拉達依查克尚被訊問到他們在國防企業中所進行的犯罪暗害活動情形。

二十五．國家公訴人——蘇聯總檢察長維省斯基的公訴詞

本審案之特點

諸位審判員同志，蘇聯最高法院諸位委員同志！當我現在履行我對于本案的最後責任時，我不能不首先就說一說本審案底一些極重要的特點。

據我看來，這些特點首先就在于這次審案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對托·落·茨基·陰·謀·家·罪·惡·活·動·做·一·總·結，這些陰謀家已經在多年以內，有系統地，採用最可惡最可恥的鬬爭方法，以反對蘇維埃制度，反對蘇維埃國家，反對蘇維埃政權和我們的黨。這次審案是對于這些人反對國家和反對黨的鬬爭，做一總結。這些人還在很久以前，當我們的偉大導師和蘇維埃國家的組織者——列寧在世時，就已開始這種鬬爭；這些人當列寧在世時反對列寧，而在列寧逝世以後，就反對列寧底英明學生、列寧遺教底忠實奉行者、列寧事業底繼承者——斯大林。

本審案底特點還在于，正是這次審案，如同探照燈的光線一樣，照出托落茨基祕密工作最陰暗的地方，最秘密的地方，最可惡的地方。

這次審案揭露了並證明了，托落茨基匪徒，過去和現在，都是以怎樣頑强的態度，用多麼陰毒的手段，用如何為慣賊所獨具的技倆，來進行反蘇聯的鬬爭；他們在進行這種鬬爭時，是如何不惜採用一切手段——無論陰謀暗害也吧，無論軍事破壞也吧，無論偵探事業也吧，無論恐怖暗殺也吧，無論背叛祖國也吧，他們都是一律採用的。

幾個月前，當所謂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暗殺總部底份子，也是在這個大廳上，也是在這些被告席上坐着被審的時候，當最高法院軍事庭審判那些罪犯的時候——當時，我們每一個人，看到那些罪犯所犯的那種可怕的罪惡，都不能不毛髮聳然和極端厭惡。

當時，我國每一個有天良的人，全世界各國每一個有天良的人，都不能不說：

這眞是無限深沉的墮落！

這眞是極端的道德腐化和政治腐化！

這眞是死有餘辜的罪惡！

當時，我們祖國每一個純潔子弟都以為這種可惡的罪惡不會重演了。這種深深墮落的人，這種無恥出賣我們的人，在我們國家中再沒有了。

然而現在我們又發生不久以前所發生過的感覺！現在，又有如此可怕的，駭人聽聞的罪惡，駭人聽聞的背叛，駭人聽聞的賣國罪行，呈現于我們的眼前，這使我們的意識，又不能不驚惶警戒，忿怒無已。

在這次審案上，諸被告本人已經承認自己的罪惡在這次審案上，與所謂托。落·茨·基·平·行·總·部·的領導者——被告皮達可夫、索考里尼可夫、拉迪克、舍列布略可夫一同坐在被告席上的，還有摩拉洛夫、多羅布尼斯、巴古司拉夫斯基、利夫什茨這一類著名的托落茨基份子在這次審案上，與這些托落茨基份子一同坐在被告席上的，還有普通的偵探和間諜——拉達依查克、舍斯托夫、司托羅依洛夫、格拉舍；——這次審案證明這些老爺們已墮落到怎樣的地步，證明這早已變成國際法西斯主義最惡毒前鋒的反革命托落茨基主義，已永遠陷入如何汚濁不的堪深淵。

這次審案揭露了托落茨基主義秘密罪行之一切內幕，揭露了他們的血腥策略，賣國策略之全部秘密。這次審案又一次表明了托落茨基主義底眞面目，表明了牠是工農大衆底老仇敵，社會主義底老仇敵，資本主義底馴服走狗。

這次審案再一次表明了托落茨基及其助手究竟是効勞于什麽人，托落茨基主義在事實上、在實際上究竟是一個什麽東西。

這些人所犯的罪惡，已經在此地，在這個大廳上，在法庭面前，在全國人面前，在全世界面前，一一暴露了。

他們的罪惡行爲究竟是有利于什麼人呢？他們這樣行動，究竟爲了什麼目的；爲了什麼觀點爲了什麼立場或綱領呢？末了，他們爲什麼做了賣國賊，做了社會主義事業底叛徒，國際勤勞大衆底叛徒呢？

據我看起來，這次審案已經完完全全回答了所有這些問題，已經明白而確切地回答了他們爲什麼和怎樣墮落到這種地步的問題。

這次審案，如同從末尾回頭開演的電影片子一樣，使我們回想起並揭露出托落茨基份子和托落茨基主義整個歷史道路底一切基本階段，托落茨基主義費了三十餘年準備的工夫，結果已完全變爲法西斯主義底衝擊隊，變爲法西斯警察底分部。

被告本人已經供認他們曾替什麼人効勞。可是關于這一點，他們自己的事業，他們的卑鄙齷齪和血腥的罪行，還說明得更其明白些。

許多年前，我們的黨，工人階級，我國全體人民，就已經推翻了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的綱領，認爲這種綱領是反蘇維埃、反社會主義的綱領。我國人民曾把托落茨基逐出境外，他的同夥，曾被開除出黨，因爲他們是工人階級事業和社會主義底叛徒。托落茨基和季諾維也夫曾被擊破，然而他們並不甘心，並沒有放下自己的武器。

于是，托落茨基份子便秘密起來，戴上假面具，裝着已經悔過和已經解除武裝的樣子。他們遵照托落茨基、皮達可夫以及他們其他領導者底指示，實行兩面手段的政策，假裝起來，重新混入黨內，重新混入蘇

維埃機關，而其中有些人甚至鑽得國家的要職，他們暫且把自己原有的托落茨基的反蘇維埃的器具，連同軍械、密碼、暗號、聯繫以及自己的幹部一起，隱藏在自己的秘密房子裏；關于這一點，現在已經明白證實了。

起初，他們在黨內成立人數很少的反黨的小組織，繼而日益採用激烈的反黨鬪爭方法；在他們被逐出黨以後，就成為一切反蘇維埃的團體和派別底主要喉舌，結果就變為法西斯蒂底前鋒，並依照外國偵探機關底直接指示而行動。

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合總部底審案，已經揭穿托落茨基匪夥與德國暗探局及法西斯蒂的聯繫。本次審案，更加揭穿了這一點。本次審案給了證據確鑿的材料，再一次證實和確定了這些聯繫；完全證實了並根據訴訟證明手續而完全確定了托落茨基主義底賣國作用，完全證實和確定了托落茨基主義已經完全無條件地投入了敵人底營壘，已經變為國社黨保衛隊（「SS」）和德國暗探局（Gestapo）底分部。

托洛茨基份子，托落茨基主義，已經走到自己的盡頭了。托落茨基份子在其可恥而又可悲的整個歷史過程中，都是力謀打擊而且實在打擊了社會革命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底最要害的和最險要的地方。皮達可夫在此地所講的，他由托落茨基那裏得到的指令——『用最嚴重的手段去打擊最要害的地方』——這種指令，乃是托落茨基份子對待蘇維埃政權，對待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向來的立場。

在蘇聯社會主義最後勝利的時期，托落茨基份子所進行的反蘇維埃政權的鬬爭，更是特別積極，特別堅決，特別頑强，特別堅持了。而這是完全自然的。我們並不是沒有克服很大困難而就獲得社會主義這種最後勝利的。所有這些困難，以及我們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所遇到的困難（尤其是在鄉村中）曾經鼓舞了秘密活動的托落茨基份子及季諾維也夫份子，他們更蠢然動作起來了，運用自己的觸角，企圖根據托落茨基的指令來打擊我們最要害的地方。

已被無產階級專政所消滅之剝削階級底殘餘及其走狗，旣感覺到自己必歸滅亡的境遇，就進而採取與蘇維埃政權作鬬爭底新策略、新形式、新方針。關于這種新策略、新形式及新方針，被告人在這裏已經充分詳盡地向法庭供認了。

敵視無產階級專政的階級之變本加厲的反抗，就鼓舞了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匪夥的精神；同時，蘇聯過圍至今還存在的資本主義包圍局面，也鼓舞了並唆使了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匪夥危害蘇聯的罪行。

國際反革命勢力，因指望蘇聯的後方將日益削弱，更加速了武裝干涉的準備。大家都知道，武裝干涉者每年都是準備進攻蘇聯的。反革命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集團底殘餘，當時知道，在我們國家內與他們同時動作的，還有其他的力謀恢復資本主義的份子，其他的資本主義走狗的隊伍，『工業黨』，康特拉鐵葉夫的『勞動農民黨』——卽富農黨，『孟塞維克駐蘇聯局』所有這些組織底活動，當時都在最

高法庭上審判過了，所有這些組織之爲暗害者的組織和軍事破壞工作者的團體，當時已被揭破了；這些組織曾歡迎托落茨基反對我們黨的鬬爭，反對蘇維埃的鬬爭，他們知道，托落茨基份子眞正是與他們同類的，而且更加卑汚無恥的，力謀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徒輩。

在我們國家中恢復資本主義，這究竟是什麽一回事呢？一九三二年，托落茨基匪徒加强與各種反革命的、反蘇維埃的團體的聯合，他們與右傾反對派聯繫起來，共同進行反黨的、反蘇維埃政權的鬬爭。這種聯繫之眞正的內容，已由斯大林同志在我們黨第十六次和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揭破了；斯大林指出，反革命的托落茨基份子及季諾維也夫份子之所以與『不帶假面具的投降派』聯合起來，就是因爲他們雙方都是力圖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當時，斯大林把這種綱領叫做可鄙的懦夫和投降者底綱領，企圖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的反革命綱領。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三一年就已經指出『新』貨色的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反革命組織底眞正實質，在今天看起來，斯大林同志這一個指示之有偉大的歷史意義，是特別顯而易見的。斯大林同志曾在他自己致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的信中寫道：

『事實上，托落茨基主義乃是反革命資產階級在其進行反共產主義、反蘇維埃政權、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鬬爭中的先鋒隊。』

當時，斯大林既已把托落茨基主義痛斥爲反革命資產階級底先鋒隊，反革命資產階級那時正是由

托落茨基份子手中得到精神上的、策略上的和組織上的武器，來進行反對布爾塞維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鬪爭。

根據這次審案的情形，可以特別明白看出，這一個指示是有何等偉大的歷史意義。根據這次審案的情形，可以特別明白看出秘密的反蘇維埃的團體底作用，這些團體乃是各種反蘇維埃情緒、反蘇維埃企圖之主要橋樑及核心，乃是蘇維埃底敵人企圖運用來穿破蘇維埃國家底銅牆鐵壁、企圖打破已由我們築成的社會主義堡壘的工具。

托落茨基匪徒之成爲這種反蘇聯的法西斯勢力底先鋒隊，這完全不是偶然的。托落茨基主義之進而採取反蘇聯的秘密活動，牠之變爲法西斯蒂底走狗——這不過是牠那歷史發展之直接的結果。

托落茨基團體之變爲依照外國偵探機關和侵略國總參謀部底指示而行動的軍事破壞工作者和暗殺者的團體，這不過是托落茨基主義數十年來反工人階級、反黨、反列寧和反列寧主義鬪爭之直接的結果。托落茨基主義自最初產生之日起，就進行牠那種可惡的鬪爭而走上牠自己的道路；托落茨基主義在現時也還是站在這條道路上，牠沿着這條道路愈走愈遠，每況愈下。牠在進行罪惡鬪爭中所表現的仇恨和惡意，是沒有止境的。托落茨基整個政治活動的歷史，徹頭徹尾都是叛賣工人階級事業，叛賣社會主義事業的歷史。

大家都知道，一九〇四年托落茨基出版了一本最卑汚下賤的小册子，名爲『我們的政治任務。』這

本小册子滿紙都是用卑鄙齷齪的辭句，來誣衊我們的偉大導師，國際無產階級的領袖——列寧，來攻擊列寧關于布爾塞維克勝利、勞動者勝利、社會主義勝利道路的學說。托落茨基在這本小册子裏，口噴毒液，侮辱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底思想。他企圖用這種毒液來毒害無產階級，企圖使無產階級離開不調和的階級鬬爭底道路。他毀謗無產階級，毀謗無產階級革命，毀謗布爾塞維主義，毀謗列寧，並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底英雄羅白斯比爾底名字——『馬爾西米里昂』來稱呼列寧，他想這樣來糟塌國際無產階級底偉大領袖。

當時，這位老爺竟然把列寧叫做工人運動中反動派底領袖，由此可見這位老爺之卑鄙齷齪和政治上無恥，已達到如何的地步。當列寧和斯大林選拔優秀份子的時候，當列寧和斯大林領導反專制政體、反沙皇制度、反資產階級的政治鬬爭，以教育這些優秀份子的時候，當列寧和斯大林把這些優秀份子團結成爲布爾塞維克黨底核心的時候，而叛徒托落茨基極力糾合資本主義走狗底統一戰線，來進行反對無產階級事業的鬬爭。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托落茨基也與後來他所組織的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一樣，組織了所謂『八月聯盟』，參加這個聯盟的，就是資本底走狗，孟塞維克，以及由布爾塞維克黨開除出去的份子，腐化墮落的智識份子，和工人運動中的廢物。斯大林關于這個聯盟曾寫道：『大家都知道，這個由破布亂巾所綴成的「黨」所抱的目的，就是要破壞布爾塞維克黨。』

列寧當時寫道：這個聯盟是『以無原則性，虛僞和空話爲基礎的。』當時，托落茨基及其助手用滔滔

不絕的齷齪語句來回答，誣衊列寧及布爾塞維克，稱之爲『野蠻的，』『教門式的狂暴的』亞洲人。列寧關于托落茨基寫道：『這種東西之特點，就在于他們是俄國工人運動還沒有覺醒時的已往歷史時代和已往歷史階段底殘餘……』他在二十年前就預告了黨和工人階級要提防這種『東西』——列寧當時正是把托落茨基叫做『東西』。列寧在一篇對那種藉高呼統一之名行破壞統一之實者的批評的論文中寫道：『應當使年輕工人好好知道，他們所接觸的是個什麼人。』

這次審案能幫助千百萬年輕工農，世界各國勞動者，明確認識這些人眞正是些什麼人。當時，卑鄙的托落茨基聯盟，當然未能破壞布爾塞維克黨，然而托落茨基份子，甚至在該『聯盟』失敗以後，也沒有中止其利用一切機會來攻擊布爾塞克黨的活動。在俄國工人運動史上，從一九〇三年起至革命前夜的整個時期中，都充滿了托落茨基及托落茨基份子反對當時俄國日益加强和日益發展的大衆革命情緒的鬭爭，反對列寧和反對列寧黨的鬭爭。

一九一五年，托落茨基極力反對列寧關于社會主義可以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學說；可見，他在二十餘年以前就已完全投降資本主義了。

托落茨基依次効勞于經濟主義，孟塞維主義，取消主義，考茨基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民族沙文主義，來反對列寧；如同他目前効勞于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來反對蘇聯一樣。

正如斯大林同志當時所說一樣，托落茨基份子結果早已變爲蛻化派和齊爾米多爾派底巢穴和淵

藪了。托落茨基份子這種變化是不是偶然的呢？托落茨基在革命以後，混入我們黨的隊伍，然而隨卽弄翻了，並墮落到反革命的立場，結果被逐出我國境外，被逐出蘇聯，這是不是偶然的呢？托落茨基主義早已變爲資本主義復辟運動底衝擊隊，這是不是偶然的呢？

這並不是偶然的，因爲托落茨基主義從最初產生之日起，就已經朝着這個方向走了。這並不是偶然的，因爲遠在十月革命以前，托落茨基及其朋友就反對列寧並反對列寧的黨，如同現在他們反對斯大林並反對列寧——斯大林的黨一樣。

斯大林同志底預言完全證實了。托落茨基主義眞正已變成一切敵對社會主義的力量底中心集合點，變成普通匪徒、偵探和暗殺者底隊伍，這一匪夥已完全把自己交給外國偵探機關去支配，完全變成資本主義底走狗，變成要在我國恢復資本主義的匪徒。

在此地，在法庭上，已被非常完滿和明顯地揭發出來了的，正是托落茨基主義這一種卑污的實質。他們之所以走到了可恥的結局，正是因爲他們數十年來都是沿着這條道路走的，因爲他們向來就讚美資本主義，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底成功，不相信社會主義底勝利。正因爲如此，所以他們結果就抱定了十足的資本主義復辟的綱領；所以他們就走到了背叛祖國和出賣祖國的地步。

一九二二年時，托落茨基主義就已向着這一方面走，當時托落茨基主張准許我們的工業企業，托辣斯，把我們的財產——生產工具也在內——抵押給私人資本家，以便得到當時蘇維埃國家眞正需要的

借款。

托落茨基底這個主張當時就已經是一個要恢復資本家政權的步驟，要把資本家、財政大王、工廠主重新變爲我國工廠和製造廠底主人翁，並斷送我國工人已經在蘇維埃政權下獲得的權利。當時，這些老爺們硬說，蘇聯經濟『日益與資本主義經濟接合起來』就是說，日益變爲世界資本主義底附屬品。他們硬說，『我們始終都要處在世界經濟底監督之下，』就是說，他們所斷言的，正是資本主義豺狼所夢想的事情。

斯大林同志當時就揭穿了托落茨基主義這種陰謀暗害的立場，他說：

『資本主義的監督，這首先就是財政上的監督……而財政上的監督，這就是在我們國家內設立大的資本主義銀行底分行，這就是創辦所謂「女兒」銀行。』斯大林接着又說：『難道在我們國家內有這種銀行嗎？當然是沒有的。不僅沒有，而且只要有蘇維埃政權存在，那是永遠也不會有這種銀行的。』

托落茨基份子以及這些坐在被告席上的人，當時所說的、所夢想的、所要求的資本主義監督，這就是資本家支配我們祖國，支配我們市場的權利。斯大林說過，『最後，資本主義的監督，就是政治的監督，就是要消滅我國政治獨立性，就是要把我國法律適應于國際資本主義經濟利益和口味。』這就是托落茨基以及現在坐在這被告席上的，反蘇聯的『托落茨基總部』中一部分人——『總部』頭領所曾經朝思

幕想的資本主義監督之實質，

斯大林在揭露這一種主張底反蘇維埃實質時，曾高聲說道：

『既然你們所講的是這一種眞正的資本主義監督……那末，我就應當說，在我們國家內，是沒有這種監督的，而且只要我們的無產階級存在，只要我們有無產階級專政，那是永遠也不會有這種監督的。』

由此可見，他們之所以把爲準備資本主義復辟而鬬爭的任務和爲反無產階級專政而鬬爭的任務如此密切聯繫起來，並不是偶然的。

這些人由主張造成資本主義監督的立場開始，一直引伸到赤裸裸的資本主義復闢的綱領，以至於公開聯合資本家來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以謀實現這一綱領而鬬爭，這難道是偶然的嗎？

大家都知道，托落茨基份子的領袖，在我們鬬爭每一個急轉的關頭，在我們社會革命每一個急劇高漲時期，照例都是落到我們的敵人營壘中，落到戰壘的另一方面。

他們既否認我國革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既否認在我們國家內有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可能，于是就決定了和預定了他們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所採取之仇恨的態度。

然而，這並未曾妨礙托落茨基份子假冒社會主義的名義來掩飾自己，正好像這末曾妨礙，而且現時也沒有妨碍社會主義底許多敵人假冒這種名義來掩飾自己一樣。

這樣的事情，在歷史上是數見不鮮的。大家都知道，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這些社會主義死敵始終都是用社會主義名義來掩飾自己的，然而並沒有妨礙他們忠順服役于資產階級、地主、白黨的將軍們的。我們記得，參加烏克蘭白黨波特留得政府的孟塞維克曾怎樣請求了威廉第二的軍隊來佔領烏克蘭，他們怎樣出賣了烏克蘭人民底自由與榮譽！

我們記得，武裝干涉者曾如何在社會革命黨查依科夫斯基政府招牌之下，在阿爾漢格里斯克一帶橫行霸道！

我們記得，所謂『社會主義的』『立憲會議委員會政府，』曾如何使高爾察克獲得政權！

我們記得，孟塞維克的饒爾達尼葉政府，曾如何忠實効勞于外國武裝干涉者！

所有這些老爺們，都是把自己叫做社會主義者，所有他們都是用社會主義名義來掩飾自己的；然而大家都知道，在社會主義死敵中，是從來也沒有，而且現在也沒有比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更一貫、更殘忍、更凶惡地反對社會主義的人了。

托落茨基和托落茨基份子，向來就是工人運動中的資本主義的走狗。現在他們，已變爲法西斯主義底前鋒，已變爲法西斯主義底衝擊隊了。

在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時期，他們就已走上進行公開反蘇維埃的、已經應受刑事處分的罪行的道路。他們曾把，至少是曾力圖把自己反對我們黨的領導、反對蘇維埃政府的鬭爭，搬移到街上去。當

時正是蘇維埃國家生活困難而複雜的時期。這正是由恢復時期過渡到以高等技術爲基礎來改造我國工業農業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內，不會不有一些嚴重的困難，而這些困難，便是當時我國經濟中資本主義成份與社會主義成份間鬭爭複雜情形之反映。

當時，『反對派聯盟，』所謂『新反對派，』這個由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業夫所領導，而爲幾乎所有這些坐在被告席上的被告皮達可夫、拉迪克、舍列布略可夫、索考里尼可夫、摩拉洛夫、多羅布尼斯、巴古司拉夫斯基所參加的「反對派聯盟，」企圖利用上述的困難，來再度嘗試打擊蘇維埃國家底背脊，而且企圖盡量厲害地實行這一個打擊。

一九二六年的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乃是會集中自己鬭爭的火力，反對我國社會主義底事業，而擁護資本主義的聯盟。從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份子，在虛假的、有時候在表面上似乎是『左的』關于『超工業化』以及其他等等的辭句掩飾之下，提出了破壞工農聯盟、破壞蘇維埃國家基礎的主張。他們曾要求加緊搾取農民，要求用掠奪農民和使農民破產的辦法來得到所謂『社會主義的原始積累，』他們所提出的一些要求，是要打破城市和鄉村的聯絡，因而破壞眞正工業化的可能。在實質上講起來，這也是同樣的軍事破壞和暗害的辦法。在實質上講起來，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暗害及軍事破壞辦法，與目前的暗害及軍事　壞辦法之間，所差者只是形式而已。在那個時候，『反對派聯盟』同樣是企圖破壞工農聯盟，爲着這個目的，他們當時便提出一些似乎是『左的』

而實際上則是反革命的主張，他們這種鬭爭形式，是爲的要適應當時階級鬭爭底條件。這也是一種以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反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爲目標的軍事破壞工作，爆炸行動。當時的反對派所提出的這種主張，不過是反蘇維埃國家鬭爭之特殊的、適合于當時歷史環境的形式而已。經過了十年之後，我們却看見他們已走上進行直接軍事破壞工作的道路，進行直接暗害工作的道路，進行直接爆炸工作的道路。然而他們現時所採取的形式，已經猛烈得多，已經適合于新條件，適合于我們與資本主義份子殘餘作殘酷階級鬭爭底條件了。

當時，所謂「新反對派」之把托落茨基這一個「超工業化主義者，」與索考里尼可夫這一個十年前就反對工業化而現在依然反對工業化的人，結合起來，這并不是偶然的。實際說來，「新反對派」當時所主張的一定的政治和社會經濟綱領，乃是這樣一個綱領，這個綱領，結果一定不可免要消滅無產階級專政，于是，就必可不免地要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制度。

審判員同志們，我們現時在本法庭上，在托落茨基秘密組織頭領底供詞中，聽到他們承認說，他們眞正由托落茨基那裏得到了要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的方針，接受了這種方針，并且爲着實現這種方針而進行了暗害的、軍事破壞的、偵探的工作。當我們聽了他們這種自供的時候，也許會發生這樣一個問題，而且有個別的人，的確發生這樣一個問題，就是：「這些人在許多年曾爲社會主義而進行了鬭爭，這一些人曾冒稱自己爲布爾塞維克，列寧主義者，怎樣可以控告說他們犯了這種駭人聽聞的大罪呢？這不是證明

我們向他們提出了不符事實的罪名嗎？這不是證明我們向這些人所提出的罪名，照他們過去社會主義的、革命的、布爾塞維克的整個活動底實質看起來，是不能加在他們身上的嗎？」

我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對本案被告者提出的罪名，就是說他們曾眞正採用各種最可惡和喪盡天良的方法，以圖使我們的國家回到資本主義束縛之下。我們對這班老爺提出的罪名，就是說他們乃是社會主義底叛徒。我們用來證明這種罪名的理由，不僅是他們目前所做的事情——這是罪名底具體對象——，而且我們說，他們墮落底歷史，在他們組織所謂「平行」總部，組織這個萬惡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支部好久以前，就開始了。這裏是有機的聯繫。這裏是有歷史的聯繫。而且僅就我上面所說的事實看來，已足毫無疑義地證明國家檢察局向本案被告人提出的基本罪名，說他們企圖在我們國家內恢復已于十九年前被推翻的資本主義制度，乃是完全有根據的，是證據確鑿的；而正因爲這個罪名是證據確鑿的，所以坐在此地的犯人，便被我國以及全世界一切純潔勞動者，一切純潔人士永遠釘在羞恥柱上而遺臭萬年和永遠被人咒詛了。

由一九二六年的政綱，由反蘇維埃的遊行示威，由秘密的印刷所，由他們當時就已實行的與白黨軍官們的勾結，到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六年的軍事破壞工作、偵探工作、暗殺行爲、叛賣祖國，這中間實在只差一步。而他們已把這一步走過了！

由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的實例中，由季諾維也夫、加米業夫、斯米爾諾夫、馬拉其科夫斯基、

鐵爾瓦加印以及其他等等底政治命運中，我們已經看見了這一點，他們這班人，已經以外國偵探局僱傭走狗這一個遺臭萬年的罪名而被處死刑了。

現時，我們由本案被告者命運的實例中，又看見這一點，這些被告人中間大多數人，多年以來，無論在十月革命以前，以及在十月革命以後，都進行了反列寧，反列寧主義，反列寧——斯大林黨，反我國社會主設的鬪爭義建。

皮達可夫、拉迪克、索考里尼可夫、舍列布路可夫、多羅布尼斯、摩拉洛夫、利夫什茨、巴古司拉夫斯基、舍斯托夫，所有這班人，都在許多年內進行了反社會主義事業，反列寧——斯大林事業的鬪爭。

這些老爺們當時就已力圖『打斷我們黨底神經中樞』，正如同斯大林當時所說一樣；同時他們也就是力圖打斷蘇維埃政權底神經中樞，而關于所謂蘇聯必歸滅亡的喊聲，在所有一切反革命的烏鴉們口中是未嘗頃刻停止的。

這些老爺們在進行其反蘇維埃政權的鬪爭中已墮落得這樣卑下，以至於任何人任何時候都沒有墮落到的地步了。

列寧早已預先見到本案被告人當時所走的道路，必不可免地要達到他們現在已經達到的這種可恥的結局；而且凡是走上這班人所已走過的道路的人，都是必不可免地要達到這種可恥結局的。在我們黨——當時還叫做俄國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根據列寧提議所通過的決議中，已經有過最嚴厲

的警告，說在蘇維埃制度下，凡是堅持自己的小組織行爲和堅持自己錯誤的人，必然要滾入工人階級底敵人營壘，滾入白黨和帝國主義者營壘。而這些老爺們已經用自己的整個行動，把這一個歷史預言，完全證實了。

他們曾怎樣反對列甯

『平行總部』各份子之已往的政治歷史是怎樣的呢？皮達可夫、拉迪克、舍列布略可夫與索考里尼可夫、巴古司拉夫斯基，曾於多年以內養成自己仇視蘇維埃制度、仇視社會主義的意識。他們曾善于掩飾，曾善于掩藏他們自己眞正的思想和觀點，一味陽奉陰違，一味實行欺騙；關于這一點，他們現在也是自認不諱了。其中有些人，說他們自己在某些時期也曾一再離開托落茨基主義；對于這一點是很難相信的。我們知道，本案被告人所有一切活動，向來都是很一貫的。皮達可夫、拉迪克、多羅布尼斯、舍列布略可夫、巴古司拉夫斯基這一班人，簡直可以說是托落茨基主義中『勞苦功高的』人物。這班人總是多方掩飾自己的眞面目，極力裝假，專事欺騙，既欺騙自己的同夥，又欺騙他人。只有在皮達可夫、拉迪克這班最無原則和窮極無聊的傢伙，這班利用自己在蘇維埃國家機關之要職以進行其卑鄙齷齪，萬惡罪行的份子所養成的隊伍中，才能有拉達依查克、克尼亞節夫、舍斯托夫、阿爾諾里特、司托羅依洛夫、格拉舍這班投機冒險的份子，插足其間，並成爲托落茨基組織中的積極份子。

諸位審判員同志！你們在這裏已看見了這些老爺，聽了他們的說話，審查了他們的行爲，例如拉達依

查克，他又好像是德國的偵探，又好像是波蘭的偵探，可是他之爲偵探是沒有絲毫疑義的，而他既是偵探，他當然就是狡黠、撞騙和撒謊的人了。這個人，照他自己的說話，有舊的履歷，也有新的履歷；這個人，因環境之不同，而隨時假造和改變自己的履歷書；這個人，當他自己做瓦樂尼省的國民經濟部副主席的時候，不僅是掩護自己手下的一個人搶掠、偷竊和投機的活動，而且和他一塊進行營私舞弊的勾當。據他自己說：他曾經是靠這一個强盜，這一個侵吞公款的投機者養活的。而這一個有如此卑汚品性——這些品性是已爲本次預審及審判所揭露——的拉達依查克，便成了幫助皮達可夫担任化學工業事務的最親信的助手，你們看，這是如何出色的化學專家啊！（聽衆發笑。）

當皮達可夫挑選自己人的時候，他知道他所挑選的是什麼人。簡直可以說，善於打獵的人，是很容易找到野獸的。拉達依查克於是就鑽得要職了。他在這裏閉口不談那些推動他幹這種勾當的動機，不像阿爾諾里特那樣隨便直說，阿爾諾里特在這裏已經承認，他之所以進行犯罪的勾當，是因爲他『力圖接近上流社會的心理』使他寢食不安的緣故。（聽衆發笑。）關於這一點，拉達依查克却閉口不談。他當然比阿爾諾里特狡猾些。他知道，多說不如少說，少說不如不說。而這個人格如此惡劣的拉達依查克，公然能夠鑽營得了要職，以至于成了化學工業總管理局局長！你們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這是多麼重要的職務，這就是我國整個化學工業總管理局的局長！

卽使皮達可夫沒有其他的罪惡，單就皮達可夫竟容許這個人稍許接近我們的化學工業這一點說

來，那麽，他已經就應當受到最嚴厲的處分了。拉達依查克，這個老奸巨猾的暗害家，旣担任化學工業總局局長的職務，便乘機大顯其身手，拼命進行其犯罪的行爲，爆炸和毀滅我國人民之勞動果實，傷害和殘殺人命。

又比方拿多羅布尼斯來說吧，這是一個老托落茨基主義職業家，這是一個以『引起人命犧牲愈多愈好』爲原則以殘害工人的能手。又比方拿日本的偵探克尼亞節夫來說吧。他所造成的翻車事件，有數十次之多。又比方拿利夫什茨來說吧。他一方面是曾任人民委員會交通部副部長，同時又是幫皮達可夫在運輸業方面進行罪惡勾當的助手。在這班匪徒看來，這樣『兼任職務』乃是他們的家常便飯！最後，拿托落茨基底『衞兵』摩拉洛夫來說吧。他是托落茨基最忠順、最老的『副官』之一，他同樣也承認自己是一個暗害者和軍事破壞者。還有阿爾諾里特，他又姓『伊萬諾夫』，又姓『瓦西里也夫』，又姓『拉斯克』，又姓『屈里平寧』，除此以外，究竟還有其他的怎樣的姓名，我們還不知道哩。這一個老奸巨猾的投機家，這一個『經驗豐富』的騙子和野心家，也成了托落茨基親信的人物！而且是坐在第一把交椅的匪徒。又比方拿格拉舍這個人來說吧，他不僅是一個老奸巨猾的人，而且至少是有三種國籍，他自己說，自己的主要職業是做奸細，當他說這話時，他說得眞響亮，雖然『做奸細』這幾個字，聽來是並不怎樣入耳，他同時還補充說，他旣然担任奸細職務，那末照他自己的職業說來，就不能講什麽信仰不信仰了……。（聽衆發笑。）

簡略說來，這就是已在法庭面前，在全國面前，在全世界面前醜態畢露的這班人底面目。這就是『平行總部』自己根據托落茨基指示所組織的幹部，這個『平行總部』把這些幹部糾合起來，培養出來並發動起來進行托落茨基組織的鬪爭，以反對蘇維埃的政權和蘇維埃的國家。

當我們說到這些幹部的時候，我們當然應特別說到他們的頭領，說到他們的魁首。我們首先當然要從皮達可夫說起，因為除托落茨基而外，皮達可夫便是這匪徒裏的第一個魁首了。皮達可夫並不是托落茨基組織中間的一個偶然的人物。皮達可夫，這一個直至最近還極力暗藏而且善于暗藏的托落茨基主義者，向來就是，而且現在依然是列寧主義底老仇敵，我們黨的敵人和蘇維埃政權底敵人。且來考察一考察皮達可夫底政治道路吧。

在一九一五年的時候，在關於民族自決權的問題上，在關於這一個對于決定布爾塞維主義的立場有極重大原則意義的問題上，他曾與布哈林一起提出反列寧的主張，並且順便辱罵列寧為『民族自決權思想的迷信家。』

在一九一六年，他又以『基也輔斯基』這個假姓名，以托落茨基主義之十足的思想家資格，反對列寧。當時，他企圖證明社會變革（即他所謂『社會過程』）只能是打破資產階級國家的國界，打破一切國家界碑的世界各國無產階級聯合的行動。在表面上看起來，這種立場是『左』到極端的，而實際上卻完全是托落茨基主義的立場。在這裏，皮達可夫完全是重複托落茨基之所謂社會主義不能在一個國家

裏而建成的觀點。他這種言論，是反對列寧的。列寧當時就已揭破皮達可夫這種言論之反馬克思主義的性質。而在那時，列寧就說，皮達可夫這篇文章是一篇能給『我們的方向和我們的黨以嚴重打擊』的論文，列寧說，皮達可夫這篇論文，能從我們黨的內部，從我黨本身隊伍中間破壞我們黨底名聲，能『把我們黨變成冒牌馬克思主義之代表。』

一九一七年皮達可夫又出來反對列寧關于民族自决權的提綱。他說這個權利是一個『毫無內容的權利，』他說這一權利，只能夠把革命鬬爭引入迷途。同時，他發表言論反對社會主義有在一國建成的可能。在一九一七年的時候，皮達可夫是反對列寧的四月提綱的。

在一九一八年時，皮達可夫又起來反對列寧。這正是我國工農在極複雜困難條件下，手執武器，進行英勇鬬爭，以擁護自己國家的獨立的年份，當時，正如列寧所說，我們第一遭『進到革命底沸點。』當時，列寧號召，『最好是來忍受和熬過極大的民族的和國家的恥辱和艱難，可是一定要始終站在自己的崗位上，依然爲社會主義的隊伍，這個隊伍因爲客觀事變的結果，暫時與整個社會主義軍隊隔絕，因此不得不暫時等候一下別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援助。』

當時皮達可夫和拉迪克的立場，是反對這個主張的，是反對列寧的。他們這些所謂『左派』共產主義者，甚至于寧願喪失蘇維埃政權；還在一九一八年，當這些老爺們尚盤踞在莫斯科黨委常務局內時，就已經說蘇維埃政權已變成有名無實的概念，那怕就是以喪失蘇維埃政權爲代價，都必須破壞布列斯特

和議。而其實正如斯大林所說，布列斯特和約的簽訂，這正是列寧戰略之模範。由于實行這一個戰略的結果，我們就能養精蓄銳，以打敗鄧尼金與高爾察克的匪徒。

還在當時，皮達可夫、拉迪克及其同伴的思想和行動，就已經是和『克隆斯塔特亂黨』一樣，正好像謝仁斯基後來給與托落茨基份子和季諾維也夫份子的深刻中肯的稱呼一樣。皮達可夫和拉迪克是未嘗愛惜蘇維埃政權的，他們當時竟如此囂張地反對列寧，以至于說要撤消當時人民委員會而以所謂『左』派份子所組成的人民委員會代替之。在一九一八年時，在蘇維埃國家命運萬分危急的時候，這一個皮達可夫及其同伴竟與社會革命黨人實行談判，以期共同準備反革命的政變，逮捕列寧，而由皮達可夫取得政府領導的地位——那人民委員會主席的地位。還在當時，這些政治野心家，就力圖用逮捕列寧的方法，舉行政變的方法，以達到取得政權的目的。

那麼，他們現在所幹的又是什麼呢？他們現在所幹的，就是要用推翻蘇維埃政權的方法，用暗殺我們黨及蘇維埃國家的領導者斯大林及其戰友的方法，來達到同一目的，即恢復資本主義的目的，爲要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力圖藉助于外國武裝干涉的侵略國的槍桿，多方實行暗殺、軍事破壞、偵探、暗害及一切萬惡的賣國罪行。這裏的歷史繼承關係，是顯而易見的。在我國萬分危急的布列斯特和議時期，皮達可夫同托落茨基一塊反對列寧。當我們黨在非常艱難的情况之下，過渡到新經濟政策的時候，皮達可夫又和托落茨基一起反對列寧。皮達可夫和托落茨基一起，反對了列寧關於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計劃，反對已

在我們的領袖和導師斯大林英明領導之下見諸實現的國家工業化和集體化。

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六年，一九一七年，一九一八年，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三年，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在這十多年中，皮達可夫始終都是擁護托落茨基底立場進行公開的鬬爭，反對列寧，反對我們黨的總路線，反對蘇維埃國家。

由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六年，在這第二個十年內，皮達可夫又是繼續不斷地進行這種鬬爭，而且這時期他所進行的鬬爭，已經是秘密的、地下的鬬爭，同樣是反對蘇維埃國家和我們黨；在這時期內，他有系統地和不放鬆地進行了這個鬬爭，一直到人贓俱獲，罪惡概被證實的時候，並以叛徒及賣國賊資格交由本法庭審判的時候爲止！

這就是皮達可夫和他的面目。

在我以上關于皮達可夫所說的話中，有很多的話，在說到被告拉迪克的時候，也可以引來重說。無論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後，拉迪克都曾多次出臺反對列寧。一九二六年，在共產主義學院的討論會上，拉迪克曾以譏笑態度，對待關于在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理論，把這個理論叫作要在一縣以內，甚至在一條街道以內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把這種思想叫做石特靈作品中之主人公的思想。

關于這個問題，斯大林曾寫道：

『拉迪克以這種卑鄙齷齪的自由主義的譏笑態度，來對待關于在一國以內建設社會主義社

會的思想，這還不是完全與列寧主義脫離關係是什麼呢？』

拉迪克，是最著名的托落茨基主義者之一，而且公道說來，他是具有聰敏的托落茨基主義者之一，他是最頑強的托落茨基主義者之一。當列寧在世時，他曾經很激烈地反對列寧，而在列寧死後，他又很激烈地反對斯大林。他的社會危險性之大，他的政治危險性之大，是與他的聰敏成正比例的。他是一個不可救藥的人。他是反蘇維埃的托落茨基總部中間的『外交大臣。』他遵照托落茨基之委托，與某些外國人物進行『外交』談判，或如他自己所說那樣，他是『證明』托落茨基之全權代表資格。他經常經過自己的『外交信差』羅木與托落茨基通信，并從托落茨基那裏領受他們在此地所傲然自稱的『指令。』他是托落茨基所最親信的人物之一。

現在來說索考里尼可夫。在一九一八年時，他也是反對列寧的。在同一年內，因爲發生一個政治衝突，他甚至以辭職要挾列寧。在一九二一年，他曾簽字擁護布哈林反對列寧的職工會政綱。在一九二四年，他又簽字擁護『山洞的政綱，』即在克斯洛渥斯基附近山洞裏製訂的『政綱。』一九二五年，索考里尼可夫曾侮辱蘇維埃的國家，說我國的對外貿易，我國的國內商務企業，乃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企業。他說，我們的國家銀行，同樣也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企業，我們的貨幣制度，是完全以資本主義經濟的原則爲基礎的。好一個資本主義經濟政策的辯護人和思想家呀！

斯大林在當時曾指出：索考里尼可夫是主張我國道威斯化的人。索考里尼可夫是十足的主張保存

我國經濟落後狀況的人，就是說，他主張由資本主義國家來奴役我們的國家，主張『把我們的國家變爲資本主義系統的附庸。』你們看得淸楚，索考里尼可夫直到今天，還絲毫沒有離開這個立場哩。

一九二五年，當索考里尼可夫担任人民委員會財政部部長職務的時候，他曾抱怨和侮辱我們黨和蘇維埃政府，說黨和蘇維埃政府妨害他擁護無產階級專政和反對富農，妨礙他壓倒富農。而現在索考里尼可夫却不得不向全世界承認說托落茨基『總部』——而他正是該『總部』頭領之一——所指望的正是富農，正確些說，已經是富農的殘餘了。他在本法庭上自供道：『我們當時是明白，在我們自己的綱領中，我們必須主張囘復到資本主義，而提出恢復資本主義的政綱，因爲只有那個時候，我們才可以在國內憑藉某些階層。』

問題：請你具體說，你們在國內所指望倚靠的，究竟是那些社會力量？是工人階級嗎？

索考里尼可夫：不是！

問題：是集體農民嗎？

索考里尼可夫：當然不是。

問題：究竟是誰呢？

索考里尼可夫：老實說，我們所指望的，是農民資產階級的份子……。

問題：是指望依靠富農，富農的小小殘餘嗎？

索考里尼可夫：正是如此。

你們看，索考里尼可夫是走到了赤裸裸的富農的綱領，走到了赤裸裸的擁護富農利益的立場，走到了他自己墮落道路的盡頭了。由索考里尼可夫的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的立場，過渡到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六年托落茨基總部的綱領；——這種過渡是完全自然的。

現在，關於這個反蘇維埃的托落茨基總部中的第四個人物舍列布略可夫說兩句話。他在一九二〇年關於職工會問題爭論時期，曾簽字擁護布哈林的綱領。他是一九二三年的反對派之積極參加者。他是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的反對派之積極參加者；實際上，正如他這次在法庭上所自供的一樣，他從來沒有同托落茨基主義脫離過關係。當然他是有一切根據來擔任這個反蘇維埃的托落茨基總部中的領導位置。

我們知道，摩拉洛夫、多羅布尼斯、巴古司拉夫斯基、利夫什茨，也是老托落茨基主義者，我們知道，他們曾進行多年鬥爭，反對列寧，反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很明顯的，這班人之參加反蘇維埃的托落茨基秘密工作，這班人之參加托落茨基暗害及破壞工作，以及托落茨基暗殺團，他們之叛賣祖國，乃是他們所有過去一切托落茨基主義活動所準備而成的直接結果，乃是他們多年反蘇聯及反蘇聯人民鬥爭之直接結果，關於這一點，被告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認。他們進行了長期的、頑強的和卑鄙齷齪的鬭爭，反對社會主義。現在他們已經是人贓俱獲了，他們的假面具已被揭破無餘了，他們之爲人民公敵，他們之爲卑鄙齷

齪的、已成爲外國偵探局走狗的寥寥無幾的匪徒，已被完全揭破了。

不是政黨，而是罪犯的匪幫

這些老爺們在本法庭上，企圖把自己認作是一個政黨。皮達可夫在本法庭上，說到自己的同謀者的時候，竟稱之爲一個「政派」，說自己的「政派」對聯盟內的季諾維也夫的這部份人，表示「政治上的不信任。」他說「自己的組織」是個政治的組織；甚至於說什麼「自己的，」爲托落茨基所想進行的政策。拉迪克說到自己的同謀者的時候，也是把他們當作政治的領導者。當被告皮達可夫說到自己在與托落茨基親自談話中，從托落茨基方面所得到的罪惡的暗害工作的要求時，他把這要求當作是托落茨基政策底組成部份。

拉迪克在本法庭上，也是以傲然自大的口氣說了話，他是所謂「實際的政治家」之一；這些所謂『實際政治家』，的確實實在在叛賣了祖國，向敵人約許了實實在在的和領土的割讓。拉迪克甚至于在說到這些平常的刑事性質的暗害勾當的時候，也企圖以傲然自大的口吻，描寫得好像是什麼政治的東西。正月廿四號，拉迪克在本法庭上說：「當時，很明顯的，人們是問我關于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的態度，我當時便對他說，蘇聯的實際的政治家，是了解德蘇兩國親善之意義，並決意作一切爲這種親善所必要的讓步。這個代表立刻就懂得，既然我說實際的政治家；那麼，就是說在蘇聯是有實際的政治家和非實際的政治家：所謂不實際的政治家，這就是蘇聯政府；而實際的政治家，這便是托落茨基——季諾維也

夫聯盟了。』你們看，這些所謂實際的政治家，現在已經坐在這裏，看而守他們的……總共不過三個紅軍兵士哩！（聽衆發笑。）不難相信，所有這些傲然自大的口吻，實際上不過是他們那種舊習慣之反映而已。不難相信，這完全不是什麼政黨，而是一夥刑事犯。他們與那黑夜行凶打刼的盜匪並沒有絲毫差別，就是對他們客氣一點說，也沒有什麼多大的差別。

這並不是什麼政黨。這乃是一夥罪犯，乃是外國偵探局之十足的走狗。當我們直接問皮達可夫：『你們組織內的份子是否與外國偵探局有聯繫？』的時候，皮達可夫回答說：『是的，是有聯繫。』他接着便供認這種聯繫會怎樣根據托落茨基底指示建立起來。同時拉迪克——即所謂『平行總部』底『外交』專家，也證實了這點。利夫什茨、克尼亞節夫、舍斯托夫以及其他幾個被告人，這些外國偵探局的直接走狗，對于這一點，也同樣供認不諱。你們看，這就是這班人底本來面目。這班人想把自己看作是一個『政治力量』，而實際上他們却不是一個什麼政黨，而是一夥偵探、盜匪、暗殺者、軍事破壞者。

這一匪股底根源，並不在我國民衆裏面，這班匪夥正是懼怕民衆，好像老鼠怕貓一樣。這班匪徒，正是在民衆面前掩藏自己的鬼臉，掩藏自己的獠牙，掩藏自己的血爪。這班匪徒的根源，是在外國偵探局底暗室裏。他們被外國偵探局所收買，所豢養；他們因爲自己的忠順的服役，領取外國偵探局的金錢。你們在這裏，已經看見了這些在外國偵探局正式服務和非正式服務的警察、密探和軍事偵探。

皮達可夫硬要自己的幫手相信必須進行爆炸及軍事破壞工作，特別是要造成人命的犧牲。多羅布

尼斯則極力證明對于托落茨基匪徒，『引起的人命犧牲越大越好。』舍斯托夫則進行暗殺；利夫什茨、克尼亞節夫、屠洛克，則組織翻車事件。拉迪克則從事于所謂『外交，』而這個所謂『外交』底內容，正好似利夫什茨、克尼亞節夫組織翻車事件一樣，拉迪克同樣是想推翻社會主義事業，給外國敵人——侵略國打開門戶。你們看，他們每一個人都是已在這個萬惡的血腥泥潭裏面弄得汚穢不堪了。請你們仔細看吧，他們早已經是與外國偵探打成一片了；他們這班匪徒已被外國偵探用援助的約許所收買，而且還有人簡直是被外國偵探用現金所收買了。

他們炸毀礦井，放火焚燒車間，設法撞破列車，傷害、殺死我國好幾百個優秀子弟。郭爾洛夫斯基化學工廠底八百工人，在眞理報上公佈了軍事破壞工作者在這個工廠中所暗中傷害的優秀的斯塔漢諾夫工作者的名字。請看這些犧牲生命的人底名單吧：魯聶夫——斯塔漢諾夫工作者，生于一九〇二年；尤丁——富有天才的工程師，生于一九一三年；庫爾金——共產主義青年團員，斯塔漢諾夫工作者，二十三歲；斯特列里尼科娃——女突擊隊員，生于一九一三年；莫西葉茨——突擊隊員，生于一九一三年。這些都是被他們殺死的人。受傷的在十八以上。他們害死了馬克西孟科，馬克西孟科是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完成生產標準率百分之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他們殺死了聶米杏，聶米杏是一個好的突擊隊員，他犧牲了十天的假期，到『中央礦井』中掘煤的地方去工作，在那裏他們暗中監視了他，並把他殺死了；他們殺死了拉寧，拉寧是國內戰爭的參加者，老礦工；以及其他等等。

諸位審判員同志：殺害上述那些人的凶手，就坐在此地，就坐在你們面前…………。

舍斯托夫組織了盜刼銀行的搶案，舍斯托夫組織了慘殺工程師巴亞爾石諾夫的盜殺案，因爲他覺得這個工程師能揭破他們的罪行。

阿爾諾里特是國際的流氓，他大概到了世界上所有的國家，而且他到處都留下自己的盜騙痕跡。他在明斯克假造了證據。他曾在美國軍隊裏當兵，並被捕入獄，入獄的原因，據他自己承認，是由于侵吞公款嫌疑。我認爲如果這個人一旦接近公款，那末，這種公款是不免要遭殃的。（聽衆發笑。）這個人，在美國曾企圖經過『馬鬆會』爬上『上流社會』；他同樣又企圖經過托落茨基組織，在罪該萬死的舍斯托夫這樣一個教師巧妙指導之下，爬上他暗中思慕的政權！

，這是十足的土匪、强盜、僞造證據者、軍事破壞工作者、偵探、殺人兇手的匪夥！只有中世紀的由意大利卿相、流氓以及盜賊所組成的卡莫拉秘密團體，才能與這個殺人放火的兇手及强盜匪夥相比擬。這就是這些道德淪亡和人格掃地的老爺們之面目。這些老爺們已喪盡任何的廉恥，甚至在他們的同夥面前，在自己面前也不知道有什麼廉恥了。

這些人已把拆毀鐵軌，使列車互相碰撞等等勾當，看作自己的家常便飯了。這些人已把在礦井中施放毒氣，把十來個或幾十個工人送到中毒的礦井裏去的罪行，看作自己的家常便飯了。在他們看來，暗殺忠實工作的工程師，這根本就算不得什麼。在他們看來，放火焚燒工廠，炸毀那些有小孩子到那裏遊玩的

地點，根本就不算得什麼。

好一個政黨！如果這是一個政黨的話，那末，牠就不會在羣衆面前隱瞞自己的綱領。眞正的政黨是不隱瞞自己的綱領的，是不隱瞞自己的政見的。布爾塞維克——這個眞正的政黨，這個最眞實而最高尙的政黨——是從來沒有躲避過羣衆，從來沒有隱藏過自己的綱領的。

在俄國革命最初時期，列寧就已經在自己的著作裏說過：革命的社會民主黨認爲，公開宣傳黨的思想，公開說明黨的目的，公開對羣衆宣傳黨的綱領上的、策略上的和組織上的觀點和原則，是有極大的意義。列寧斯大林底黨之所以長成、強固，並成爲強大的力量，正是因爲他總是依靠着羣衆，總是與羣衆有着極密切的聯繫。眞正的政黨之標誌，就在于此。眞正的政黨不僅不向羣衆隱瞞自己的觀點，而且盡一切可能在羣衆中間廣播自己的觀點。而他們妄自稱呼的這一個『政黨』無論過去，以及現在，都是害怕向人民說出實情，說出自己的綱領的。

爲什麼呢？因爲他們的觀點，他們的綱領，爲我國人民所一致痛恨，正好像資本主義的束縛，正好像那爲這些老爺們所力圖恢復和加在我國人民頭上的資本主義壓迫之爲我國人民所一致痛恨一樣；因爲他們已變成脫離人民的一小夥叛徒，一小夥罪犯，而率領這一小夥匪徒的，就是他們的頭目托落茨基、副頭目皮達可夫和拉迪克以及其他的土匪『頭兒』。這並不是蘇聯國家裏生長的產物，而是外國來的東西；而且在蘇維埃土地上無論如何也不能生長、不能繁榮的東西！

這些老爺們在這裏說什麼這個『政黨』（老實講起來這不是一個『政黨，』而是一夥罪犯）與日本和德國法西斯勢力訂立了什麼協約；——這種話，聽來是很奇怪的。皮達可夫、拉迪克和索考里尼可夫，像煞有介事的樣子敍說托落茨基與德日兩國已經訂立或者已經商妥的『協約。』這些老爺們，像煞有介事的樣子，敍說他們會指望利用這些國家。可是，怎樣能夠認眞講這樣的話呢，因爲這個與日德法西斯主義『訂約』的所謂『平行總部』本身，是與豺狼『訂約』的馴羊，毫無二致哩。

什麼協約！你們倒不如老實說吧：『你們已完全投降於你們的征服者。』這當然不是協約，而是完全投降于你們的征服者。

聽了皮達可夫和拉迪克底話，也許會覺得這眞正是一種什麼協約。拉迪克在自己口供裏說：他寫給托落茨基一封信，『在這封信裏，我告訴托落茨基說，他的指令已經收到了，并且說我們中間業已商妥就是我們在這裏只限于認准他與外國進行談判的全權資格。此外，我又補充說道：關于他力圖與外國發生聯繫的問題，不僅我們以總部資格正式贊同，而且我個人也是極表贊同的。』

請你們看，拉迪克與皮達可夫『認准』托落茨基與外國進行談判的『全權資格。』然而這還不是主要的。『總部』贊同這種談判，這也不是主要的。主要的乃是我，卡爾·拉迪克，『聯盟』『總部』的外交總長，個人極力贊同托落茨基——這個『聯盟』內閣總理——力圖與外國發生聯繫。這當然是很可笑的，如果皮達可夫和拉迪克底命運不是這樣可悲的話。然而凡是沒有完全喪失頭腦的人，凡是有一點

點判斷力的人，都會明白，皮達可夫與托落茨基及拉迪克所說的協約，并不是什麼協約，而是稍加掩飾的投降，乃是托落茨基向自己的征服者搖尾乞憐的投降；這乃是賣身契，作這樣的協定，就等于一個人投入狠口，却安慰自己說，這狠並不如何兇惡，也許不會把我吞吃的。

說到這個『協約』時，我不覺聯想到克雷洛夫一篇寓言——獅子尋食。在這篇寓言中說道：有一次，狗、獅子、以及狠與狐狸四個，共同訂立了一個協約，『共同歃血爲盟，』『同去捕捉野獸。結果，狐狸捕獲了一只鹿；于是就開始實行瓜分。此時，『訂約諸方』之一方便說道：『這一部分，按條約應歸我有；第二部分，毫無疑義的也應歸我有，因爲我是個獅子；第三部分也是我的，因爲我比你們大家都要強有力些；至于第四部分呢，那末，只要你們那一個敢于伸爪去動一下，誰就立刻要落得死命一條。』（聽衆發笑。）

諸被告老爺們——德日法西斯主義部下的軍官老爺們！這種『盟約』很像你們的協約。你們的情形也是如此，所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你們的協約中，你們的獅子（按俄語『Lev』——『獅子，』乃托落茨基之名字，）不過是一隻走狗而已。因此，我就斷定說，這裏所說的，不是什麼政黨，而是一夥罪犯，而是一夥道德淪亡、人格掃地、既喪盡天良又喪盡理性的匪徒。

道德淪亡，人格掃地。

當我們在這法庭上聽了這般人的供詞以後，難道還能有絲毫懷疑的餘地，以爲他們不是一些眞正和完全腐化墮落、人格掃地的匪徒嗎?!當然是不會有絲毫懷疑餘地的。

當蘇聯人民在我們黨領導之下，努力鞏固其新的社會主義陣地時，我們的敵人——而本案被告，就正是這敵人底先鋒隊——却一步一步地，用毒辣手段，設法衝破我們的勝利的戰線，而繞道到我們背後，從後方來打擊我們。外國偵探機關不放鬆手，而努力活動着，他們設法在我國內部找尋同盟者，找尋助手，而且可惜得很，他們竟能找着了，固然，他們是在已經腐化墮落的、仇恨蘇維埃制度的人們中間，而且如現在所已經完全確實證明了的，首先是在托落茨基匪徒中間找到他們的同盟者，找到他們的幫手。

為什麼正在托落茨基匪徒中間，外國偵探機關找到自己的走狗呢？因為托落茨基匪徒過去和現在的一切行動，都已證明他們絕對敵視蘇維埃制度，他們決意為資本主義效勞，而且他們之為資本主義效勞，不是迫于威脅，而是出于他們的自願——他們已經證明他們不顧一切，不惜採取最卑賤的鬬爭手段來從事活動。

斯大林同志在我們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會議上就已着重指出，托落茨基主義者以及他們當時所組織的聯盟之特點，正在于他們『在手段方面，無所不用；在政治方面，毫無原則。』托落茨基主義者這一種在政治鬬爭方面不惜採取任何手段的特點，現在已經超過任何界限，已經達到駭人聽聞的程度，已經擴大千百倍了。

皮達可夫和拉迪克當時關于他們的同謀者——最卑鄙無恥的叛徒，暗殺了基羅夫同志的那班真正的匪徒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業夫所寫的文章，豈不是證明他們腐化墮落已達極點嗎！當時，拉迪克和皮

達可夫在自己的文章裏，裝着打抱不平的正人君子的樣子，要求槍决自己的同盟者，同道者，同謀者——他們這一種行爲，豈不是表示他們已經無恥到極點，已經喪失最後一點天良，喪失最後一點道德觀念嗎？

你們要知道這般老爺們底卑鄙齷齪的面目麽？那請你們讀一讀他們的文章就是了，這些文章，從發表于我們報上的時候到今天，總共還只有幾個月光景哩。

請看拉迪克在一九三五年第三期布爾塞維克雜誌上的揭露吧，——你們以爲他是揭露什麽呢？他原來是揭露季諾維也夫以及季諾維也夫『政派』——他正是這樣說的——所有頭目們的兩面手段哩。幹這種事情的專門家——拉迪克，這裏表現了他對這事情所具有的淵博的見識。他在這文章裏，態度自若，滔滔不絕地解釋何謂兩面手段！

現在讓我來引證拉迪克關于什麽是兩面手段——那拉迪克自己的兩面手段！——這問題所說的話罷。拉迪克寫道：

『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之過去的頭目們，既墮落到了反革命的地步，于是便採用了武裝干涉者的偵探、爆炸者和暗害份子所採用的這一種方法。兩面手段便成了便利他們向無產階級大本營實行襲擊的掩飾工具了。』

我們知道：遠在拉迪克寫這篇文章很久以前，拉迪克就已知道如何在準備用毒辣手段暗殺基羅夫了。我們知道，拉迪克老早就是與暗殺基羅夫的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業夫共同密謀，互相勾結的；而基羅夫

之死，正是拉迪克自己以及現在同他並排坐着的他的朋友們所早已預定的。

當時，拉迪克爲要消滅他本人參與這一萬惡罪行的痕跡，便假意談論那些已被揭露而交由法律處置的兩面派，說什麼法律『是知道應如何處置那些企圖搖動無產階級革命基礎的人的。』

是的，被告拉迪克，你說得對！蘇維埃法律的確知道應如何處置你以及你的朋友等這類的兩面派和叛徒。

在審判季諾維也夫、加米業夫等的前夜，在審判這般犯反蘇聯罪的賣國賊的前夜，拉迪克曾寫了什麼呢？當時他關于『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法西斯匪夥及其匪首托落茨基』（這是他自己的話）寫道：『從審判該案件的法堂上，傳出爛屍的臭氣；』並大聲疾呼道：『消滅這種毒物！能應當消滅的這種毒物，並不是什麼因貪求功名而犯了滔天大罪的人物，而是法西斯主義的走狗，這些毒物竟不惜幫助大戰的爆發，便利法西斯主義底勝利，以便從法西斯主義手上至少能得到一點政權的影子。』

拉迪克當時就是這樣寫的。拉迪克當時以爲他這些話是對加米業夫與季諾維也夫寫的。這眞是一個小小的失算！這一次審案將糾正拉迪克這一個錯誤；拉迪克這些話原來是對自己寫的！

當時，拉迪克玩弄兩面手腕，裝腔作勢寫道：一九二八年托落茨基曾如何引誘他拉迪克逃往國外，他拉迪克又是如何『因想到自己會在資產階級國家保護之下從事反蘇聯活動而心胆俱寒，結果便拒絕逃往國外。』據拉迪克說，在一九二九年，托落茨基曾叫托落茨基份子布留姆金組織偸運刊物到蘇聯的

事情，因此派了他的兒子謝多夫來到拉迪克所住的旅館，委托拉迪克進行搶刼蘇聯商務代辦處，以搶得的款子去供托落茨基反蘇聯活動之用。『托落茨基在一九二九年曾準備實行這種搶刼，而到一九三一年，便進而準備暗殺，幷直接委托同他有十八年交情的兩個人——斯米爾諾夫與馬拉其科夫斯基担任此事情。斯米爾諾夫與馬拉其科夫斯基既舉起武器以圖謀害斯大林和謀害黨，既將給予他們的信任踐踏乾淨，于是他們便落入深淵，墮落到了一提起他們的名字就不能不令人深惡痛絕的地步。』

諸位審判員同志！當時，拉迪克還沒有受審，還沒有坐在被告席上。而且這還不是一九三六年，甚至也不是一九三五年，而是一九二九年。但拉迪克當時就已承認，托落茨基曾委托他組織搶刼蘇聯商務代辦處的事情。當時拉迪克還沒有被捕，他還沒有被非常委員會、國家政治管理局或人民委員會內務部抓起來，他還沒有受到審問員或檢察長審訊的麻煩，他當時還是一個新聞記者，還到處自由地大抽其煙斗，噴出的煙還不僅用去掩蔽與他對談者的眼睛。但他在那時寫了些什麼呢？他寫道：他受到托落茨基底委托，要進行搶刼蘇聯商務代辦處的事情，以搶得的款子去供托落茨基反蘇聯活動之用。我覺得這種可靠的自供，這種在輿論面前作的自供，這種不是在被告席上而在蘇聯刊物上發表的自供，是不能不相信的。你們看，歷史又重演了。當現在人們告訴我們，說托落茨基在一九三五年曾勸導皮達可夫，正確些說，不是勸導，而是委托皮達可夫要他在『得馬格』與『波爾濟格』公司協助之下進行盜竊蘇聯金錢的勾當，又說謝多夫也爲着這種目的而與『得伊里曼』公司聯繫，——我們從這裏就看到，歷史又重演了！

再講下去吧，拉迪克當時寫道：『托落茨基在一九二九年曾準備實行搶刼，而到一九三一年，他便進而準備暗殺，并直接委托同他有十八年交情的兩個人——斯米爾諾夫與馬拉其科夫斯基進行此事』——當時我們以爲拉迪克這種話是根據正式的審察所得的文件而來的。殊不知拉迪克當時所寫的字樣，原來就是拉迪克本人以此事同謀者之一的資格所作的解釋；好似立法者本人所作的法律解釋條例一樣。其次他又寫道：『斯米爾諾夫與馬拉其科夫斯基落入了深淵，墮落到了一提起他們的名字就不能不令人深惡痛絕的地步。』試問拉迪克是否寫過這樣的話？是寫過的。咳！是寫過的！拉迪克當時裝腔作勢，裝着悔過自新的樣子，似乎他把一切話都誠懇說出了。當時，他憤激怒罵，賭咒發誓，滿口懺悔……。這是出于天良麼？不是的，他是在那里撒謊騙人哩！他提起托落茨基在一九二九年準備搶刼蘇聯商務代辦處的故事，他假裝自己說了良心話。其實不然，他是撒了謊，他只是假裝說出眞話的樣子，他當時咒罵一下自己的朋友，是爲着轉移人們的視線，使人們不去懷疑他，以便如他在這裏所說的那樣，『不致倒霉。』但是他畢竟還是『倒了霉』。當時，他採用了慣賊的法門。當時，他之所以高喊『捉賊！』是爲着他自己能逃出法網。這正是慣用『倒霉，』『做掉』這類話的慣賊底法門。拉迪克想用甘言巧語，諉過謝罪。他想踏在自己的朋友們和同謀者屍首上面，從那當時已使他陷到頭頸的血汚的陷穽裏爬將出來。他故意假裝着動人的神情，高呼道：『無產階級法庭將給這夥死有餘辜、罪不容誅的血腥兇手以應有的判決。這班人既舉起武器來暗害無產階級所愛戴的領袖，就應以自己的頭顱來贖自己的滔天大罪。這匪夥及其齷齪勾當底

主要組織者托落茨基，已被歷史釘在羞恥柱上了。他是逃不了國際無產階級底裁判的。』

拉迪克，你可記得，你當時豈不是說過，這班人，這樣的人應以自己的頭顱來贖自己的大罪麼？拉迪克當時寫道：『這一匪夥底主要組織者托落茨基，已被歷史釘在羞恥柱上了，他是逃不了國際無產階級底裁判的。』這話說得對。叛徒們是逃不了國際無產階級底判決的，正好逃似不了蘇聯法庭——偉大工農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庭底裁判一樣！

皮達可夫怎麼樣呢？皮達可夫關于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合暗殺總部之破獲也在報上發表了文章。皮達可夫關于該總部卑污的反革命活動亦表示大發雷霆，他當時寫道：這種反革命活動徹頭徹尾都是由臭不可聞的兩面手段，陰險狡詐，欺騙撒謊的手段來進行的。現在皮達可夫用什麼話來詛咒他本人的人格墮落，詛咒他本人的『臭不可聞的兩面手段，陰險狡詐，欺騙撒謊的手段？』皮達可夫現在是否找得到這些話，如果找得到，那這些話究竟有何價值，誰會相信呢！

皮達可夫當時寫道：『我竟找不到字眼來把我的忿怒與憎恨完全形容出來。這些人連最後一點的人性都喪失無餘了。他們應當被剷除，爲因這種毒物能敗壞蘇維埃國家新鮮清潔的空氣，因爲這一種危險毒物能傷害我們的領袖而且已經傷害了我國最優秀人物之一，可愛的同志和領導者——基羅夫。』

皮達可夫當時在已被他殺害的基羅夫遺體面前痛哭流涕，號淘不已。『在我們社會主義已得勝利的國家內的敵人是陰險狡猾的』——皮達可夫當時在鏡子面前這樣寫着。是『隨機應變的，』——皮

達可夫在鏡子面前這樣修飾着。『是裝腔作勢的，』——皮達可夫這樣寫着，同時暗裏自問道：我皮達可夫自己也裝得夠靈巧吧！是『撒謊騙人的，』——皮達可夫這樣寫着，同時暗裏自問道：環境如此，不撒謊又有什麼辦法呢？『是設法掃除自己的痕跡的』……『是力圖博得人家的信任的』……

當時，皮達可夫爲要掃除自己犯罪的血跡，便寫道，『我們中間的很多人，我也在其內，由于自己的疏忽、大意，不注意自己週圍的人，便不知不覺幫助了這般匪徒犯罪的勾當。』手腕耍得眞妙呵！原來是皮達可夫底警惕性不夠哩！（聽衆發笑。）原來皮達可夫底過錯，是在于警惕性不夠哩！這又是刑事犯底老法門。當人家告發他犯了行兇殺人的搶刧罪時，他就承認只犯盜刧罪，當人家告發他犯了打門穿壁的竊盜罪時，他便承認只犯竊盜罪；當人家告發他犯了竊盜罪時，他至多也不過承認只犯隱藏或購買贓物罪。

這本是慣賊的老法門。皮達可夫因爲恐怕被破獲被揭露，于是就在報上發表文章，痛罵敵人，連自己也不加憫惜。『唉，你這「疏忽成性的」皮達可夫，你竟看不見你週圍所發生的事情。』但是這並不是在你週圍發生的事，而是你自己幹的事哩！

皮達可夫當時寫道：『幸虧人民委員會內務部的機關破獲了這夥匪徒。』你說得對，這的確是一樁幸事。謝謝人民委員會內務部的機關，謝謝他們終于把你們這一夥匪徒拿獲了！（聽衆發笑。）皮達可夫當時寫道：『幸虧已有可能剷除這夥匪徒了。』被告皮達可夫，你說得對，幸虧已有可能剷除。不僅已有可能，而且必須加以剷除。皮達可夫當時寫道：『這是人民委員會內務部諸工作人員之光榮及榮譽。』被告

皮達可夫在你口裏說出這樣的話，這簡直是褻瀆我們光榮的人民委員會內務部諸工作人員之尊嚴哩！

皮達可夫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所寫的這些話是對誰寫的？是對他自己寫的。皮達可夫眞有『先見之明』哩！

皮達可夫與拉迪克底這些文章究竟證明什麼呢？這些文章豈不是證明這班人已是道德淪亡，人格掃地，墮落達于極點嗎？這是已經腐朽不堪的活屍，這是一些不僅喪盡廉恥而且已喪盡理性的小人，這是一些打算攻打蘇維埃國家的小嘍囉，下賤的政治騙子，小政客，大强盜。

反蘇聯的托落茨基總部底綱領

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合總部及其要人曾拚命企圖證明他們沒有任何政治綱領要求，說他們只有『赤裸裸的抓取政權的慾望。』這是撒謊。這是想欺騙輿論。如果沒有什麼綱領，沒有規定鬬爭目的、任務及手段的綱領，便不能有奪取政權的鬥爭。我們當時就沒有相信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合暗殺總部沒有什麼綱領，我們當時就已知道，他們是竭力隱瞞着這個綱領，而實際上他們也如這個托落茨基暗殺總部一樣，是有自己的綱領的。這個綱領的實質，就是赤裸裸地認爲必須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索考里尼可夫已供認，這實質上就是舊的、反蘇維埃的、留金的綱領。這的確是事實。索考里尼可夫說道：

『至於講到綱領的方針，那末還在一九三二年時，托落茨基份子、季諾維也夫份子、右派份子，就在大體上一致同意了以前的右派綱領。這就是所謂留金的綱領；這個綱領，大部份正表現了這三集

團還在一九三二年即已共同抱定的綱領方針。

『至於講到這一綱領以後的發揮，那末總部領導份子曾認爲，我國革命既處於孤立地位，便不能以社會主義革命的資格維持下去，並認爲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論以及與此同源的布哈林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原來是正確的。我們當時認爲，法西斯主義乃是最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牠正在獲得勝利，征服歐洲，並扼住我國的咽喉。因此最好是同牠妥協，最好是向牠實行某種讓步，就是說要從社會主義退到資本主義。』

但是怎樣『妥協』呢？法西斯主義是否情願『妥協』呢？法西斯主義豈不是寧願不作任何妥協而一意孤行，好像現在牠在全世界欺小凌弱，橫行霸道一樣麼？拉迪克說：『當時很明顯的，那時主宰全局的主人翁自然是法西斯主義——一方面是德國法西斯主義，另一方面是遠東某一國家底軍閥法西斯主義。』

關於這一點，他們的老師托洛茨基當然懂得也不比他們壞；關於這一點，整個托洛茨基總部都是懂得的。他們是自覺地這樣幹的。這便是他們『出色』綱領底第二項。

第三項，就是關於挑撥戰爭和力圖使蘇聯遭受失敗的問題。

第四項，就是關於戰爭失敗之結果問題：他們不僅要把對帝國主義國家有重大意義的工業企業租讓給外國資本，而且要把帝國主義國家所指定的一些重要的經濟對象賣給外國資本作爲私有；這就是

向外國借貸如拉迪克所說過的那種外債，就是讓外國資本自由投資於那些將來在形式上尚留在蘇聯國家手裏的工廠。

第五項，就是他們所說的土地問題。『平行』總部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法很簡單，簡直是像法摩索夫之解決文化問題一樣——『把所有一切書籍都付之一炬。』他們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法便是如此：把無產階級革命底勝利品付之一炬，就是說，解散集體農莊，取消國營農莊，將曳引機以及其他複雜農業機器交給個體農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他們在這裏已經直言不諱地說過：『為的是要恢復新的富農制度。』是不是『新的』呢？也許簡直就是『舊的』吧？

第六個問題，就是關於民主的問題。拉迪克在自己的口供裏，已經說明，托洛茨基關於這一個問題，給他寫了些什麼；我們必須知道這一點，因為這有很重大的意義，尤其在現時，因為現時，我國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民主，已經達到登峯造極的發展，這一發展的表現便是我國人民不久以前所通過與批准的斯大林憲法。關於民主的問題，在托洛茨基的綱領上是怎樣提法的呢？曾經接到其老師來信的拉迪克，關於民主問題是怎樣說的呢？

『托洛茨基在其信上說道（我摘引拉迪克底供詞：）「任何民主，都是談不到的。工人階級在革命以後已過了十八年的生活（到現在已經是十九年了——維省斯基註，）他們的口胃是極大的……。」』

這是對的工人階級底口胃的確是極大的，以至於能把任何敵人吞下去，而且已經吞過不止一次了。

接着拉迪克又說道：

『……而這種工人將來一部份應交還給私人工廠做工，一部份則應在國有工廠內做工，而這些國有工廠在那時將與外國資本發生最劇烈的競爭。因此，工人階級底生活狀況將突然惡化。』

而在農村裏怎麼樣呢？

『在農村裏，貧農與中農反對富農的鬥爭將重新發生。那時候，要支持下去，就要有强固的政權，至於這一政權將採取何種形式來遮掩，那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如果你想在歷史上找個類似的例子，那末就舉拿破崙第一底政權來做類似的例子，並仔細思索這個例子吧。』

拉迪克大概是把這一點很仔細地思索過了。

最後，第七個問題，就是對外政策底綱領，瓜分國家領土問題：『把烏克蘭割讓給德國，把濱海省及黑龍江沿岸一帶割讓給日本。』以後，我們又問過拉迪克，他們還决定實行什麼其他經濟上的讓步呢？

拉迪克當時回答道：是的，我上面所說的那些决定，後來更其具體化了。我們預定要償付賠款，即要在許多年內繳納糧食、原料及脂油給戰勝國。其次就是保證戰勝國在蘇聯進口方面獲得一定的份額——起初，他並沒有指出數目字，後來，他已說得比較具體了。所有這一切辦法，總合起來，就是使國家陷於完全奴化的地步。

我問道：會否說到庫頁島煤油的問題呢？

拉迪克回答道：關於日本，我們說到，不僅要把庫頁島的煤油送給日本，而且要在日本向美國開戰時，給日本供給煤油。同時又說到，絕對不要妨碍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中國領土。

我問道：那末，關於多腦河流域諸國問題又是怎樣呢？

拉迪克回答道：關於多腦河流域諸國和巴爾幹半島諸國，托洛茨基在自己的信內說，德國法西斯主義正謀侵略這些國家，我們對這種行動，不應給以任何的阻礙。這顯然是說要斷絕蘇聯與捷克斯拉夫的一切關係，因爲這些關係足以保障捷克斯拉夫的安全。

這就是托洛茨基總部所謂綱領中的七個基本問題；其目的，就是要用暴力手段推翻蘇維埃政權，以改變蘇聯現存之社會與國家制度，在蘇聯恢復資產階級底統治；同時，力圖給民主以打擊，給和平事業以打擊，給主持和平的諸民主國家以打擊，這樣來替殘暴的法西斯式的帝國主義侵略國，忠實効勞。

由工人階級底利益，由農民底利益，由和平事業底利益，由蘇聯人民底利益看來，這一綱領底意義究竟何在呢？

這一個綱領底意義就是要恢復舊制度，消滅工農底一切勝利品，消滅社會主義底勝利，消滅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是沒有剝削現象，沒有剝削階級的制度，就是沒有商人、廠主，沒有貧窮、失業的制度，就是以工農爲主人翁的制度，就是消滅了所有一切剝削階級的制度，在這一制度中，所剩下

的只有工人階級、農民、智識份子。

托落茨基份子是看不慣這種現象的。他們想改變蘇聯現存的社會制度。他們想消滅因社會主義勝利而變成了完全新的階級，變成了蘇聯工人階級的那個工人階級，想把這個工人階級回復到他們在十月革命以前所處的地位，回復到爲資本主義鎖鏈所束縛的奴隸的地位。

由我國工人底利益和全世界各國工人底利益看來，托落茨基匪徒之力謀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的綱領，其意義就是如此。

我們蘇聯的農民，乃是新的集體農民，他們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民完全不同。在資本主義國家，農民過着貧窮的、半飢半飽的或完全饑餓的生活。他們，像一盤散沙，散佈於全國各地，如斯大林同志所說：

『他們各自在自己的小莊稼上，用落後的技術耕種土地，這些小生產者，就是私有制度的奴隸，就是被地主、富農、商人、投機者、高利貸者等等所任意剝削的對象。』

斯大林同志在蘇聯第八次（非常）全國代表大會上說道：

『這樣的農民，在我國已經沒有了。……在我國已經沒有剝削農民的地主和富農商人和高利貸者了。因此，我國的農民，是擺脫了剝削的農民。……由此可見，蘇維埃的農民，乃是完全新的農民，這樣的農民，是人類史上所未曾有的。』

而托落茨基匪徒却不喜歡這一點，所以他們想把這一種情形，亦加以改變。他們想恢復地主、富農在

農村中的地位，想重新建立富農的威權，想在農村裏恢復富農底主人翁地位，把農民交給富農去奴役，剝奪我們的集體農民用熱血爭得的權利。

由我國農民底利益看來，托落茨基匪徒之力謀恢復資本主義，力圖把我們的國家交給資本家、富農、地主統治的綱領，其意義便是如此。

最後，由於蘇聯社會主義勝利的結果，蘇聯智識份子已經從資本底僕役變爲蘇維埃社會之享受平等權利的份子，而這也是托落茨基匪徒所不能容忍的。托落茨基匪徒所不能容忍的，就是我國底智識份子。

『與工人和農民携手並進，建設新的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斯大林）

托落茨基匪徒對於這一點也是不能容忍的。他們想改變蘇聯現存的社會政治制度。這就是說，他們想改變工人、農民和智識份子在我們國家中的社會政治地位及作用，想使他們回復到他們在舊有資本主義社會中所處的地位，使他們遭受剝削和失業的痛苦，使他們從事於暗無天日的、繁重不堪的苦工，使他們遭受永遠飢寒交迫的磨折。

我上面所說的托落茨基匪徒恢復資本主義的綱領中的七個要點，其意義就是如此。

因此，季諾維也夫、加米業夫的及反蘇聯的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底其他匪首，便多方隱瞞這一個綱領，竭力否認這一個綱領之存在。因此，『平行』總部底匪首們——托落茨基、皮達可夫、拉迪克、

索考里尼可夫等等，也是多方隱瞞這一個綱領的。

拉迪克在自己的口供中說托落茨基曾指示他們道，『現在，切不要向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裏的普通份子明白提出綱領的問題。他們會害怕的……。』拉迪克說道：

『當時我和皮達可夫都看得很明白，這一指令已使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走到了盡頭，這一指令在給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底工作做一總結並指出其工作前途時，已經把這聯盟底資產階級性完全暴露了。自然，我們當時不能公開承認這一點，因爲這樣一來，我說就必須或者是承認自己爲法西斯蒂，或者就主張取消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了』……。（見案卷第五本，第一四七頁。）

拉迪克之所以沒有能夠把那次會議召集成功，同時豈不也是由於這個原故麼？他們在這次會議上能夠談些什麼問題呢？關於恢復資本主義的問題嗎？關於分裂蘇聯的問題嗎？關於瓜分蘇聯領土的問題嗎？關於割讓領土的問題嗎？關於將我國領土拍賣給德日侵略國的問題嗎？關於進行偵探和暗害工作的問題嗎？他們曾極力隱瞞自己綱領中的這幾點，而這幾點正是他們綱領底基礎哩。但大家知道，任何秘密都會有水落石出的一天。而反蘇聯的托落茨基聯盟這一可恥的綱領，也就水落石出了。

這個綱領已由皮達可夫、拉迪克、索考里尼可夫在這裏供認了；關於這一點他們自己在這裏，在本法庭上，說出了。

或許這都是些憑空說出的話吧？或許他們之所以這樣說，只是因爲他們想玩弄悔過自新的把戲吧？既然他們悔了過，他們就得說些話，就得揭穿些東西。或許托落茨基從來就沒有給過這樣的方針吧？

但是，諸位審判員同志，你們知道，大家都曉得托落茨基在國外出版有所謂『反對派彙刊』，你們如把一九三〇年四月份第十期『彙刊』拿出看一下，就會知道那上面登載的東西，實際上是與他們在這裏說的一樣。

『……退却，橫豎是必不可免的。應當盡量早些來實行這種退却……』

『……要停止「全盤」集體化……』

『……要停止賽馬式的工業化。根據已有的經驗，必須大大降低速度……』

『……必須放棄那進行閉關自守的經濟的「理想。」必須以力謀與世界市場發生最廣泛的關係爲基礎，製定新的計劃草案。

『應實行必要的退却，改變戰略方向……不經過危機和鬥爭，是無法擺脫現有矛盾的……。』

而在一九三三年托落茨基則要求：

(a)解散大部份集體農莊，因爲這是虛空的東西；

(b)解散國營農莊，因爲這是不生利的東西；

(c)放棄消滅富農的政策；

(d)恢復租借政策，將我們許多工業企業出租，因為這是不生利的東西。

這個綱領不僅僅反映出反革命托落茨基匪徒底觀點與期望，而且如審察結果所查明的，同時也是托落茨基匪徒與垂涎蘇聯領土的外國侵略者妥協之基礎。審察結果已經查明，拉迪克、皮達可夫及其同謀者曾根據這一綱領而與外國侵略者，與外國侵略者底代表進行談判，希望從他們方面得到軍事上的援助，並允諾給予他們以各種經濟上及政治上的利益，以至於要把蘇聯一部份領土讓給他們。這些叛徒們簡直是無惡不作，竟不惜拍賣祖國的領土。他們幹了最卑鄙齷齪的賣國勾當，他們比之最下賤的鄧尼金白黨或高爾察克白黨還更加卑鄙無恥。最下賤的鄧尼金白黨或高爾察克白黨還不像這般匪徒這樣低下。鄧尼金白黨，高爾察克白黨，米留科夫白黨，倒還沒有墮落到像托落茨基匪徒這般無恥叛徒這樣卑汚下賤的地步；這般無恥的叛徒，竟不惜如尤大叛賣耶穌一樣，以三十個銅錢，而且是三十個假銅錢，拍賣祖國，力圖把我們的國家奉送給外國資本去任意奴役。所有這些都是事實。所有這些都是已由審察結果所確切查明，而不容有絲毫疑義的事實。

這個賣國綱領，當然為我國人民所一致唾棄。如果竟有人擅敢拿着這一綱領跑到我們的工廠、集體農莊、紅軍營房去宣傳，那他就會立刻被羣衆抓住，就會立刻被他們處決死刑。而且這是應該的，因為賣國叛徒，除被處決死刑而外，別無他法。這一個綱領乃是最卑鄙最下賤的賣國綱領。而我們却以自己的綱領——蘇聯政府底綱領來與這一綱領對抗。如果以為這只是兩個派別之間的鬥爭或爭論，其中一派幸虧

運氣好，所以就掌握着政權，而另一派因爲運氣不佳，命途多乖，』所以就沒有掌握政權，——誰如果企圖這樣描寫問題，那是徒勞無功的。

這裏的鬥爭乃是兩個綱領，兩個原則上相反的系統，兩個反映這些原則的互相敵對的路綫、觀點之間的生死鬪爭。我們以自己的綱領——消滅資本主義，消滅我國資本主義一切殘餘的綱領來和托落茨基匪徒這一反動綱領對抗。蘇聯全國人民，工人、農民和智識份子，在我們偉大的黨，列寧——斯大林黨領導之下，在我們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斯大林領導之下，英勇地爲着這綱領而奮鬪。孜孜不倦地努力鞏固我們國家的獨立自主和我國邊界及領土之神聖不可侵犯權。

我蘇聯勞動羣衆以萬衆一心的偉大熱潮——在專制俄羅斯時代，以及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所未曾有過的偉大熱潮，以蘇維埃愛國主義的熱潮，英勇地建設着我們新的社會主義的祖國。我蘇聯各族人民以空前未有的熱忱，創造驚天動地的偉業。我蘇聯人民對於自己的國家，對於自己祖國的愛國心，是異常强烈的。

斯大林同志曾在一九三一年說道：

『從前我們沒有而且也不能有祖國，但是現在，在我們推翻了資本主義，建立了工人政權以後，我們就有了祖國，並且我們將竭力捍衛我們祖國的獨立。』

現在蘇聯全國人民，在全世界面前高聲重複斯大林同志底這些話，而且預備隨時響應黨和政府底

號召，萬衆一心地捍衞自己的祖國。

斯大林同志說過：

『我們的政策是和平政策，』『我們今後也將用一切力量，一切方法來進行這一政策。別人的土地我們一寸也不要，但是自己的土地呢，我們也決不讓給任何人以半分半毫。』

讓我們的敵人牢牢記着這些話吧。

我們偉大的俄羅斯民族的人民，我們偉大的烏克蘭民族的人民，別洛羅西民族的人民烏玆別克民族的人民，喬治亞民族的人民，阿則倍疆民族的人民，阿美尼亞民族的人民，韃靼民族的人民，以及蘇聯其他各民族的千百萬的人民，大家都萬衆一心，肩並肩，挺着胸膛，捍衞着我們國家的邊界，捍衞着我們蘇聯每一分毫神聖不可侵犯的土地！

列寧曾寫道：

『我們充滿着民族自尊心的意識，因爲大俄羅斯民族也產生了革命階級，也證明了牠能給與人類以偉大的爭取自由和爭取社會主義的鬬爭模範，而決不僅僅是什麼屠殺異族人的暴行、絞刑架、監獄、大飢荒，向牧師、皇帝、地主、資本家的卑躬屈膝的心理。』（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八十一頁）

可是，諸位審判員同志！現在被告席上坐着的這班人却想在外國槍炮援助之下，使我們的國家去受資本主義的奴役。列寧關於這班人以及類似於他們的人，曾寫道，這是一些『不得不令人憤恨、藐視與憎

惡的鄙夫和奴才。』就是這班人，就是這些資本主義鄙夫和奴才，竟企圖褻瀆我們的神聖而偉大的民族自尊心，蘇維埃愛國主義的自尊心；竟企圖摧殘我們的自由，嘲弄我國人民爲爭取自由而受的犧牲；他們已經叛變了我國的人民，已經投到敵人方面，投到侵略者與資本主義走狗方面了。我國人民底義憤一定會把這班無恥叛徒殲滅無餘，碎尸萬段，掃除乾净的！

托落茨基總部之敗北主義的立場——挑起戰爭

在司法機關預審時，已經確切查明了：反蘇聯的托落茨基總部在自己的綱領裏，還規定有一條，即力圖加速戰爭的爆發和使蘇聯在這戰爭中陷於失敗，他們想藉助於戰爭，想經過蘇聯之失敗，來抓得政權，奪取政權，並利用這政權來達到其恢復資本主義的目的。

托落茨基總部的份子，皮達可夫、拉迪克、索考里尼可夫與舍列布略可夫，當然知道，他們那種力圖推翻蘇維埃政權，奪取蘇維埃政權之犯罪作惡的陰謀，在我們蘇聯安然存在與和平發展條件下，是完全沒有希望實現的。他們當然知道，在我們國內，他們是沒有什麼眞實的力量可以依靠的。因此這個總部的頭目，主要地是指靠未來的戰爭，指靠侵略國武裝侵犯蘇聯之必不可免，指靠這種戰爭爆發之必不可免，並指靠到在這戰爭中必須保證我們敵人的勝利與使到我們國家的失敗。

皮達可夫在自己口供中說，托落茨基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間與皮達可夫談話中，曾經直截了當說：「戰爭是必然要在最近時期內爆發的。」我們在這裏已經儘可能地查明了這一點。他們並且斷定了，戰

爭爆發的時間是在一九三七年。

我在這裏不能不說及昨日在不公開的庭訊時所審理的一件事情。正是由於托落茨基，以及顯然也由於托落茨基曾與之約定的某一外國之直接主持此事的人物與機關底指示，他們爲保證一九三七年戰爭之爆發，便決定採取許多必要的步驟，以造成使蘇聯在那個時候必遭失敗的情況。昨日在不公開的庭訊時，皮達可夫與拉達依查克已詳細說明，他們已經極力進行了一切破壞的工作，以便使我國在一九三七年戰爭爆發時遭受必不可免的失敗，特別是使無法供給我們的軍隊以必要的防禦的工具。昨日他們向我們供認了，他們那種向我們敵人出賣我國的計劃，卑鄙齷齪到如何駭人聽聞的地步。他們供認了，他們的計劃是如何想在戰爭爆發時，於我們最重要最危急的關頭，解除我們紅軍、我們國家、我們人民的武裝。

現在已經明白了，爲什麼他們的計劃正是預定在一九三七年，使我國在實行具有國防意義的某些措施方面遇到嚴重的困難。

昨天在不公開的庭訊上所已查明的他們那種駭人聽聞的罪行，他們正是預定到一九三七年應當準備就緒的。他們的力圖使蘇聯敗北的主要方針，正是預定在一九三七年實現的。

大家都知道，早在十年以前，托落茨基就已援引克列蒙梭的故事，來辯護他自己主張蘇聯遭受失敗的敗北主義的立場。托落茨基當時寫道：必須恢復克列蒙梭底策略，而克列蒙梭，大家都知道，曾在德軍僅

離巴黎八十公里的時候，起而反對法國政府。斯大林同志當時譏笑了托落茨基這一個『小歌劇中的克列蒙梭』及其『唐吉訶德式的小團體。』托落茨基及其同謀者當時之援引克列蒙梭，決不是偶然的。他們現在又來這樣幹了；可是現在，他們主要已經不是在理論上準備，而是在與外國偵探機關勾結之下，在實際上準備，事實上準備使蘇聯遭受軍事失敗了。

托落茨基及反蘇聯的托落茨基總部，會千方百計，用他們力所能及的各種辦法，以加速侵略國對蘇聯的進攻。

『加速衝突』——挑起戰爭，準備使蘇聯遭受失敗，——這便是托落茨基總部綱領之所謂外交部分底實質。

這是外國奸細、外國偵探底綱領，這些奸細偵探，只要有可能時，就鑽進敵方底隊伍內部，而圖謀從內部來破壞敵方底隊伍。這就是托落茨基總部綱領之所謂外交部分底實質。

兩個綱領，兩個不共戴天的仇敵，彼此對立。兩個綱領，兩個營壘。一方面是脫離民衆和仇視民衆的，成了外國偵探機關偵探的一小羣窮極無聊的敗類；而另一方面却是深受蘇聯全國人民擁戴的蘇維埃政府。兩個綱領，兩條根本相反，原則對立的鬥爭路線。

很明顯的，托落茨基組織在其反蘇聯的托落茨基總部領導之下所進行的其他許多實際步驟和辦法，正是從他們這種原則立場——挑撥戰爭，設法使蘇聯戰敗，搗亂蘇聯國家，出賣蘇聯國家利益於窮兵

黷武的法西斯主義之立場出發的。

組織與實行軍事破壞及暗害工作

拉迪克和皮達可夫已經在法庭上再度供稱，進行暗害和軍事破壞工作是『總部』中的叛徒們準備使蘇聯戰敗的主要方法

皮達可夫供稱，托落茨基與他會面時曾解釋過，托落茨基與德國國社黨代表所訂結協定底主要點之一，就是托落茨基匪徒負有以下的義務：

『……在德國對蘇聯作戰時……必須使蘇聯遭受失敗，加強軍事破壞工作，尤其是在具有軍事意義的企業中……務須遵照托落茨基已與德國總參謀部商妥之指示而行動。』

在預審時已經查明『平行』總部，或者簡直說反蘇聯的托落茨基總部為履行他們的這種義務，曾的確在我們蘇聯的某些企業內組織了大規模而有系統的暗害工作甚至軍事破壞工作，這種工作是由他們特別組織的軍事破壞團及暗害工作團進行的。為實行這計劃起見，『平行』總部不僅在蘇聯的工業中，並且亦在蘇聯的運輸業中佈置自己的人力。我們已經知道，他們是怎樣進行這一工作的。當總部覺得西爾伯利亞方面的暗害和軍事破壞工作進行不好或不能十分滿意時，皮達可夫便趕快特別派多羅布尼斯到那裏去加强領導暗害和軍事破壞工作的西西伯利亞總部。

我們知道，他們佈置人力的工作，是按照一定計劃進行的，而不是偶然進行的。他們指定有專門接納

新從外國來的偵探的人員及其地址。對於這些偵探的安插佈置，他們也是依照一定計劃進行的；他們正是把這些偵探派到他們覺得必須實行『最嚴重打擊』（如皮達可夫和托落茨基所說）的地方去。皮達可夫在總部內親自領導軍事破壞和暗害的工作。而鐵路運輸業方面之暗害和軍事破壞工作的指揮，則交由舍列布略可夫協同克尼亞節夫、屠洛克、巴古司拉夫斯基去担任。

自然的，此犯罪總部對於庫茲巴斯煤礦區，尤其是克梅洛沃聯合廠，曾加以最大的注意。所以正是在西西伯利亞組織了很有力量的邊區總部，而以老練的托落茨基份子——摩拉洛夫、多羅布尼斯和巴古司拉夫斯基為中堅，這決不是偶然的。

皮達可夫把拉達依查克與諾爾金拿來做自己的最親信的助手，而摩拉洛夫與多羅布尼斯則以舍斯托夫與司托羅依洛夫為自己的支柱。

進行暗害和軍事破壞工作的主要份子，是分配得十分巧妙的，並依照一定計劃分配的。進行暗害和軍事破壞工作的主要活動份子，並不是分散，而是集中的。這些份子根據秘密工作的一切必要要求而集中起來。這些份子集中在最大、最重要而多半具有國防意義的企業內。同時，他們當然也顧計到在創辦每一新事業，如創辦克梅洛沃聯合廠時，所自然發生的種種困難。他們簡直是連什麼都不讓其錯過的。就是每一件瑣屑小事，他們也是仔細顧計到的。他們是用『經理人眼光』計量一切的（要是可以在壞的意思上運用『經理人』這一個概念的話。）皮達可夫在這裏，是以這種暗害事業的經理人、組織者的資格，

從事活動的。

他是個人面獸心的人。他對於一切，甚至對於暗害和軍事破壞行動，都是詳加斟酌，仔細計較的，他考慮這一行動底結果、方法和時機，而決不隨便瞎幹。皮達可夫無論在進行暗殺方面，無論在實行暗害方面，無論在組織軍事破壞方面，都是反對隨便瞎幹的。他的一舉一動都是以嚴格考慮過的計劃爲標準：他的每一個暗害行動，都是根據情勢之不同，而在一定的地方，一定的時候，用一定的方法，在一定的程度內進行的。他能顧計情勢，他能顧計環境，他能顧計自己托落茨基匪徒的力量，他能顧計一切手段以及掩飾方法。所以，他們的暗害和軍事破壞活動，便有很廣泛而有計劃的擴展，而有時竟達到駭人聽聞的地步。皮達可夫在預審時供稱：

『我曾囑咐自己的人（而且我自己也正是這樣幹的，）在進行暗害工作時，切不要分散自己的力量，而要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於主要的、巨大的、具有國防意義及全國意義的企業。

『在這一點上，我是依照托落茨基之指示行動的，這指示就是「要在最要害的地方實行最嚴重的打擊。」』

應當說公道話：皮達可夫的確善於在眞正要害的地方實行嚴重的打擊。

我們在預審時已經知道，托落茨基、皮達可夫這一指示底實際行動表現是怎樣：其實際行動表現就是破壞和毀壞大小機器和整個企業，焚燒和轟炸整個車間、礦井及工廠，翻車，殺害人命等等。

在我國歷史上有過不少反對工人政權，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罪行。在我國歷史上有過種種令人深惡痛絕的反蘇維埃的密謀案件。我們記得『沙哈亭案件』我們記得而且親眼看見『工業黨案件』『孟塞維克社會民主黨人駐蘇聯局案件』但是就暗害行爲無恥勾當以及可恥軍事破壞工作之技巧而論，托落茨基匪徒是遠勝於他們所有一切前輩的；他們要算最卑鄙而最可惡的罪犯了；——我這樣說，未必是過甚其辭。如把皮達可夫拿來和他的前輩比較一下，那末我認爲：他的前輩若是與皮達可夫這一個藉本人身任人民委員會重工業部要職作掩護而暗中進行的那種滔天大罪比較起來，是一定要相見形拙的。

托落茨基反蘇聯總部之組織暗害和軍事破壞工作，實質上是要同時解決兩個任務：第一個任務就是要削弱蘇維埃國家底經濟力量和國防能力，第二個任務就是要激起工人、勞動者、全國人民對蘇維埃政權的怨恨，挑撥人民來反對蘇維埃政權。他們爲要解決這第二個任務，便進行最下流的無恥罪行。他們不僅不惜進行這一種罪行，而且還竭力設法儘量擴大這一種罪行，竭力增加人命的犧牲。由此可見，皮達可夫在這裏說什麼『這種犧牲是必不可免的事』等語，實等於撒謊騙人。皮達可夫在這裏沒有勇氣把坐在他背後的多羅布尼斯所說出的一切實情供出來。

托落茨基總部當時並不是把爆炸、放火、翻車、傷害人命——這種種有系統的辦法，看作是什麼迫不得已的、不可避免的事情。組織這種罪行，乃是托落茨基總部計劃以內的事，是他的計劃底組成部份。多羅

布尼斯供稱：

『如果在礦井內將有人命的犧牲，那就更好了，因爲這結果會引起工人之怨恨，而這正是我們所需要的。』

克尼亞節夫供稱，利夫什茨曾特別囑咐他：

『佈置並實現足以傷害大批人命之種種軍事破壞行爲（如爆炸企業，造成翻車事件，施放毒素。）』

諸位審判員同志：在本法庭上我們已經聽到幾件驚人的事件，我現在不妨再向你們提起一下。我要提起中央礦井方面的爆炸事件，這次爆炸底結果，工人斃命者十名，重傷者十四名。我也要提起蘇米哈站翻車的事情，這次翻車底結果，紅軍戰士死二十九人，傷二十九人。

很值得注意的，就是陰謀份子在幹這種罪惡勾當的時候，會很鎮靜而考慮周詳地設法消滅自己的痕跡，想把這種痕跡掃除乾淨。我們已經看到，當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間克梅洛沃北方區第六號礦井內工人中毒事件發生時，托落茨基暗害組織中的人皮舍霍諾夫以及其他人竟特地擬定了一個調查紀錄來掩飾他們故意造成這一中毒事件的眞相。克尼亞節夫和屠洛克不得不在本法庭上再度供認，他們所組織的幾樁翻車事件，事後還是沒有找到肇禍的罪魁，因爲他們用無恥的精巧手段把肇禍眞相隱藏起來了。

我們知道，這般人曾企圖欺騙審察機關，向他們報告顯然虛僞，顯然不符事實的消息，力圖隱瞞組織翻車事件的罪犯！他們竟善於將自己的罪惡，推在他人身上，例如推在轉轍女工邱金諾娃這樣完全無辜的人身上。

在這一方面，他們這種有系統的强盜勾當眞是駭人聽聞的，他們不惜殘害任何人，不惜採取任何手段，他們不僅力圖傷害他們所直接與之鬥爭的人，而是力圖傷害那一切可以妨碍他們幹罪惡勾當的人。

我們必須指出，因爲這般曾善於欺騙了我們的匪徒，曾在工業和運輸業方面抓得某些要職，這就很便利了他們破壞和暗害行動之組織及實現。技術專家鑑定委員會，已在這裏報告了他們自己的鑑定結果，牠們已經完全確切而具體地查明，凡起初有人企圖指爲不幸事件之結果的所有一切所謂遇險、爆炸、起火事件，實際上都是由暗害份子依照預定計劃故意造成的。我們亦已查明，在郭爾洛夫斯基化學工廠內，在比較很短的時間內，就由被告拉達依查克領導組織三次軍事破壞事件，其中二次是爆炸，結果引起許多人命犧牲，且使我們的國家受了重大的物質上的損失。

諸位審判員同志！爲要把這些駭人聽聞的罪行作一個完完全全的估計，就不僅要注意到這些已成事實的罪行本身，而且要注意到那些犯罪的人是什麼人，而這些人正是曾被國家委托來保衛我們國家的利益，以防止任何的侵害。拉達依查克本應首先就設法保衛我們的化學工業使之不受到一點侵害並防止遭受任何的損失，可是這個人却實行背叛的勾當。他們的行動是直接叛國者的行動，如果在軍事環

境中，他犯了這樣的罪，就應就地槍決，立被剷除了。

在蘇聯其他的化學企業裏，托落茨基組織，也曾按照拉達依查克的指使，進行了同樣的軍事破壞的事件。這些爆炸事件之軍事破壞的性質已完全查明了，證實這一點的，不僅有諸被告人的口供，而且還有諸見證人的口供，末了，還有技術專門家鑑定委員會的鑑定書，技術專門家鑑定委員會的鑑定書已在這裏說得透澈無遺，使人對於軍事破壞工作確是事實的問題，毫無懷疑的餘地。

我想簡單地談到這一種鑑定的結果；我曾請求鑑定人回答我關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郭爾洛夫斯基化學工廠輕氣合成部爆炸案的幾個問題。我問：當時是否有可能預防這次爆炸呢？鑑定人回答說：絕對有可能。在當時要做些什麼才能使這爆炸不至於發生呢？

原來要做的並不多。只要遵守『安全工作細則』就能預防這次爆炸事件了。這個細則上指示，本來可以保障工作之常態與安全的進行，可是却沒有按照細則做，因此就有爆炸事件的發生。後來，我們又向鑑定人問：也許這次爆炸事件終究還是出乎意外吧？當我們審查諸被告人供詞是否屬實的時候，鑑定人就回答說：『這事件之爲故意搗亂之結果，乃是無庸絲毫懷疑的事實。』

我們根據鑑定人的鑑定，詳細審查了諸被告人的供詞，雖然我們知道，在歐洲某些國家法律上，認爲被告人對自己犯罪的口供，已經是完全足以信服而不再對被告確係犯罪的事實，作絲毫的懷疑，於是法庭便認爲自己可以免除審查供詞的麻煩；可是，我們爲要遵守絕對客觀的原則，因此，縱有犯人本人的口

供，還畢竟又從技術方面審查了他們的供詞而得到肯定的答案，如對十一月十一日爆炸事件，普洛科比也夫斯克礦山遭火，克梅洛沃聯合廠遭火與爆炸等事件的回答。於是便判明了所有這些事件之為惡意搗亂的結果，實無絲毫懷疑的餘地。

由此，我們便看見托落茨基匪徒暗害工作及軍事破壞工作散佈得如何寬廣的情形，這種工作侵入了我國工業最重要的部門，即關係全蘇聯利益及我國國防與國防能力利益最大的部門。

托落茨基總部也曾在鐵路運輸業方面組織散佈頗廣的暗害工作與破壞工作。我們已查明了，在這種駭人的罪行中，或者確切些說，在這種駭人的罪行的總和中，利夫什茨、屠洛克、克尼亞節夫、巴古司拉夫斯基，實起了積極的作用。可是我在這裏也不能不另提出利夫什茨來說，因為他與皮達可夫一樣，也是把一切想像得到的罪行都做到極點了。真的，利夫什茨，當時並不簡單是鐵路運輸方面的工作人員，並不簡單是人民委員會交通部一個負責人員。利夫什茨，當時乃是人民委員會交通部副部長。雖然一般說來，他的作用與皮達可夫比較起來，是次要的；然而他在這方面却與皮達可夫沒有什麽不同。正是我們的工業與鐵路運輸業在鄂爾卓尼基茲同志與卡岡諾維赤同志英明領導之下，打破種種難關，日勝一日、月勝一月、年勝一年地向前進展的時候，而那個對他們本應盡職幫助的人，却無廉恥、無氣節地欺騙他們，欺騙我們大家，欺騙我們的黨，欺騙我國的人民。

所以我認為，對於前任蘇聯人民委員會重工業部副部長皮達可夫、對於前任蘇聯人民委員交通部

副部長利夫什茨，對於前任蘇聯人民委員會外交部副部長索考里尼可夫——對於這三個曾負有我國所給與的特殊信托，負有國家重任的人，即令他們三人未曾犯有其他駭人聽聞的大罪，也是應特別提出刑事處分的問題。

被告克尼亞節夫，照托落茨基『平行』總部的直接指示，佈置過並實行了好幾次翻車的事件，這幾次翻車，多半是兵車，而且傷害不少的人命。蘇米哈站曾有翻車事件發生，當時紅軍戰士死二十九人，傷二十九人，亞赫尼諾站與烏斯特·卡諾夫站之間也曾有翻車事件發生，此外還有其他兵車及貨車出軌傾覆的事件。這都是由克尼亞節夫佈置好的，而且根據調查的結果，我們知道，他所有這些佈置，不僅是根據托落茨基『平行』總部與利夫什茨底囑咐與指使，而且是根據一個外國，即日本偵探局的探子H先生底直接指示，H先生眞是推動克尼亞節夫與屠洛克進行犯罪勾當的發動機之一。

克尼亞節夫供認，兵車翻車的佈置，也是屬於他們那些預定給我們紅軍以打擊的辦法之一種，而且不能不承認這種萬惡的辦法眞能給我們以厲害的打擊。

托落茨基組織的利益就是這樣地與外國偵探機關的利益互相交錯起來了。他們雙方利益之所以不能不互相交錯，就是因爲他們雙方有共同的政治任務，共同的工作方法及組織上的聯繫，因此，實在說起來，托落茨基組織與日本或德國偵探機關的組織，已經是毫無二致了。

關於克尼亞節夫及屠洛克兩人與別人的聯繫，即偵探及軍事破壞工作性質的聯繫，我們在不公開

的庭訊時，已經査實了，同時也已完全確切地査明了，H先生是什麼人並判明了諸被告在庭上所供認的一切情形。

我在這裏應當提起本案案卷中的兩封信，從這兩封信中，可以明白看出克尼亞節夫與H先生的聯繫。這兩封信只是再三再四與完全客觀地證實克尼亞節夫底供詞。

克尼亞節夫供稱，他按照與H先生的協商，他發出了並親自執行了關於戰時佈置燒燬軍用庫、軍糧站及衞生處的指示。克尼亞節夫照實招認日本偵探機關曾特別嚴烈地提出要在戰爭時採用毒菌傳染的方法佈置破壞工作，其目的卽在乎使預備轉運軍隊的列車以及軍糧站和衞生處受到傳染甚烈的毒菌的傳染。

這便是兩件特別顯著的事實，顯然說明了這個反蘇聯的托落茨基總部無論大員小卒都是墮落到極點，眞是心術敗壞到極點。克梅洛沃聯合廠的一幕及克尼亞節夫從H先生方面所接到的關於在戰爭發生時軍事破壞工作的指示——使紅軍戰士受到傳染甚烈的毒菌的傳染病——這兩件事實便足以認定這裏所告發的叛國罪，是已完全判明了的。

這些犯人底行動，是極端卑鄙齷齪、厚顏無恥、胆大妄爲的。他們之所以如此厚顏無恥、胆大妄爲，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因爲他們當時佔居有相當的職位，於是，他們以爲他們已暗藏得很巧妙，而不會被揭露到底的。的確是，他們爲什麼能在較長的時間內犯有如此大罪而逍遙法外呢？這當然是個正當的問題。可是，

既然那些本來負有關照國家利益使其不受任何損害的『執政官』（照古代羅馬慣例說來，執政官是負有不容許他人給國家以任何損害的責任的，）本身卻做了主要的暗害者，做了這些罪犯主要的組織者，那又有什麼辦法呢！既然有人玩着這種最可恥的兩面手腕的花樣，既然有人過着像本案諸被告所過的那樣人面獸心的生活，那末，當然可以暗害到一個月，可以暗害到兩年、五年，甚至還可以暗害到整個十年之久。是的，這些罪行之所以可能，正是因為這些罪行是在這樣一種人掩護之下進行的，這些人本來應當一感覺得有這類罪行就應首先敲起警鐘，發出警號，並與之作生死的鬬爭的。這就是總的原因。

可是在這裏我要提出別一個問題：為什麼雖然有拉達依脊克這樣的密探與偵探，有利夫什茨與皮達可夫這樣的叛徒與逆賊，鑽上了領導機關，雖然有了這一切情形，而他們破壞工業精力，削弱國防工業力量，動搖我國國防能力之種種努力，終究還是徒勞無功呢？這是最重要的問題；我們必須給以確切的與透澈的回答。

是的，在某時期內，在某時機內，在某部門內，我們曾經不能不感到困難。可是我國工業與鐵路運輸業雖受到暗害工作與軍事破壞工作的打擊，但仍然經常前進，蒸蒸日上。我要從托落茨基陰謀家作奸犯科的活動所涉及的幾個工業部門中舉出幾點來作參考。

在煤炭工業中，採煤數量增長情形如下：

在頓巴斯，一九一三年為二千五百二十八萬八千噸，而在一九三六年則已增至七千五百二十萬零

二千噸。

在庫茲巴斯，一九一三年爲七十九萬九千噸，而一九三六年，則已增至一千七百二十五萬九千噸。

在莫斯科附近煤區，一九一三年爲三十萬噸，而在一九三六年，則已增至七百二十萬零一千噸。這是如何偉大的增長！

在十九年內，我國已創立了强有力的化學業，已佔全世界第三位，而在個別部門方面甚至于已佔全世界第二位。

至第一次五年計劃開始時，就創立了許多有全民經濟意義的新工業部門，如靛青染料工業，焦炭，揮發油工業及藥料化學業等等是。蘇聯化學業，第一屆第二屆五年計劃是化學工業發展中最顯著的階段。須知世界化學業一般發展歷史，是從十八世紀末葉開始的。因此，現代世界化學工業約有一百五十年的發展史，而蘇聯化學工業的發展，則不滿十年。但蘇聯化學工業在這十年內却走過了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在一百五十年內所經過的道路。我們已獲有巨大成績。結果我們在硫酸與蘇打方面只次於德國與美國，即佔世界第三位；在燐酸鹽方面，除美國外，我國便佔世界第一位，在淡素肥料方面，我國便進佔世界第四位。這是含有重大意義的事實，特別是把我們在這裏所聽到的及引起全國震怒的那些駭人的罪犯加以注意時，更感到這件事含有重大的意義。這是說，我國人民，我國社會主義工業，正是用這樣的發展，回答了叛賊與法西斯偵探局探子的破壞工作。那怕是有暗害工作，那怕是有破壞工作，那怕是有幾百個優秀的

斯塔漢諾夫工作者性命喪於偵探與軍事破壞者之手，那怕有人實行有系統有計劃的辦法來故意破壞斯塔漢諾夫運動，但是我國工業却總是蓬勃發展，並超過執行自己的生產計劃。

在鐵路運輸業方面，亦有相同的情形。我們在這一方面也看見鐵道事業有一日千里的發展，關於這一點，可拿平均每日裝載量的數字來說明，這裝載量，在一九三四年爲五萬五千四百一十七車箱，在一九三五年爲六萬八千〇九十八車廂，在一九三六年，則已經增至八萬六千一百六十車箱。在這幾年內，每年轉運的總量爲二千〇五十萬萬公里噸，二千五百八十萬萬公里噸，三千二百三十萬萬公里噸。由此可見，鐵路運輸業是已經英勇地打破了舊日的難關。

怎樣解釋這種神奇的事情呢，怎樣解釋這種現象呢？世界上並沒有神奇的事情。究竟爲什麼我國工業及鐵路運輸業能有這樣光彩奪目的增長，這樣的蓬勃繁榮的發展呢？因爲在暗害者方面只有寥寥無幾的蟊賊。這寥寥無幾的蟊賊所作出的害處却被千千萬萬的大衆從速來補救！因爲在蘇聯政府與社會主義建設方面，却有千千萬萬的羣衆。

偵探與暗殺

預審結果所得到的材料，以及被告拉達依查克、克尼亞節夫、普森、屠洛克、格拉舍、舍斯托夫、司托羅依洛夫等親口供出來的話，都證實了：反蘇聯的托洛茨基總部，除從事軍事破壞及暗害陰謀等活動之外，還廣泛地，有系統地替外國偵探機關做了偵探工作。關於這一問題，我不來詳細敍述，而僅就其中最主要者，

約略說一說。與德日外國偵探機關所建立的聯繫，這並不是根據什麼屠洛克或舍斯托夫個人的主張來實現的，這是爲着執行托落茨基底指令而實現的。在托落茨基與皮達可夫領導之下，與德日外國偵探機關勾結的人們，以其偵探行動力圖造成這樣一些結果，這些結果不僅使我國的利益，而且使許多與我們共同爭取和平，與我們共同愛好和平的國家底利益，都是受到極嚴重的損失。

斯大林同志在其致西班牙共產黨中央黨部，致何芝・佳斯同志電中說：

『蘇聯勞動大衆之給西班牙革命羣衆以力所能及的幫助，這不過是盡其應盡的義務而已。他們清楚瞭解：使西班牙從法西斯反動勢力壓迫下解放出來，這並不是西班牙人私自的事情，而是整個先進和進步人類底共同事業。』

因此，我要請求你們，審判員同志們，希望你們在權衡本案一切事實，估量被告罪行之意義時，亦以保護我國利益，保護整個先進和進步人類底利益爲標準。

我們很希望每一個愛好和平，力爭和平的國家之政府，以最堅决的辦法去剷除他們每一國內一切偵探的、軍事破壞的、暗殺的活動；這活動乃是和平底敵人，民主底敵人，反動法西斯勢力，即極力準備戰爭、企圖破壞和平事業者、因此也是破壞整個先進和進步人類底事業者所組織的。現在已經完全查明了，這些坐在被告席上的大小偵探，小者如格拉舍及拉達依查克，大者如這班被告底頭領，在這一方面究竟幹了些什麼勾當。克尼亞節夫，利夫什茨，拉達依查克，舍斯托夫，司托羅依洛夫，普森，格拉舍——這就是德日

兩國偵探機關底一羣直接代辦。當然，這並不是說，既有這些代辦，於是該總部的頭領就不要負責了，相反的，他們應負同樣的責任，因爲正是他們組織了和運用了這些代辦。

公訴書中，提出托落茨基總部參加者及其同謀者，有組織暗殺行爲之罪。

這裏，首先要談到一個總的基本問題，這就是現在已經證明，反蘇聯的托落茨基總部綱領中有採取暗殺手段一項，而且這種暗殺手段已經見諸實行。

在我們手裏有具體文件可以證明托落茨基至少曾有兩次，而且是以很公開的、毫不隱瞞的方式授與了暗殺的方針。這些文件已由他們的作者昭示於全世界。我所指的第一個文件，就是一九三二年的一封信，托落茨基在那封信中，喊出了他的卑鄙無恥的叛賣口號——『幹掉斯大林』；第二個文件，發表得比較晚些，那就是托落茨基所辦的反對派彙刊第三六及三七期（一九三四年十月）在那上面，他再三直接指明暗殺乃是反蘇維埃政權的鬬爭方法。

眞的，在這篇帶有綱領性質的文章內（該文除其正式的總題目之外，還有一個小題目是『第四國際問題』）托落茨基完全公開地談到以暗殺爲方法的問題，而這個方法，還在那幾年，托落茨基匪徒就已當作是實際行動的方法了。使我們萬分痛心的，就是他們竟能於一九三四年實現了這暗殺手段，把我們的基羅夫同志刺死了。

在這篇帶有綱領性質的文章裏，有一章曾談論到『能否以和平手段撤去官僚？』的問題。托落茨基

及托落茨基匪徒稱我們的蘇維埃機關爲官僚機關。

那覃說：

『就拿究竟如何改組蘇維埃國家這個關係重要的問題來說吧。』

你們看，托落茨基是關懷着蘇維埃國家改組問題同樣，他的親信助手——皮達可夫、索考里尼可夫、拉迪克、舍列布略可夫及其他等，如我們在這次審案中所看到的，亦關懷着這一問題哩。究竟應如何改組蘇維埃國家和能否以和平方法解决此任務呢？問題是提得很明白的。凡反對恐怖暗害方法者，一定會這樣說：是可以用和平方法解决的，例如，在憲法基礎上。

但是托落茨基及托落茨基匪徒怎樣說呢？他們說：

『如果以爲可以經過共產黨或蘇維埃代表大會來撤銷斯大林的官僚，那末免太幼稚了。要剷除現時當權的政客（他們正是這樣誣衊我們的政府的）已經沒有任何正•軌•的憲法道路可走了。』

『要逼迫他們轉交政權於無產階級先鋒隊，（他們稱爲先鋒隊，他們所指的「先鋒隊」顯然就是這類以暗殺、破壞、偵探爲業的老爺們了，）則非用武•力•不可。』

而且『武力』兩字，還特別用着重點着重指出的；這是你們一看就相信的。問題是提得很清楚的！和平方法嗎？和平方法是沒有效力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武力，因此就要用武力來剷除了。可是，我們知道，他們究竟能用如何樣的武力來剷除，何况他們所要依靠來掌握這種所謂武力的『先鋒隊』乃是現時坐在

這裏的這些老爺哩。（聽衆發笑。）

他們接着便直接談到『斯大林的機關，』他們說如果這個機關，我們的國家機關，終究還要反抗的話，那就要採用特別辦法去對付了。

我已經引證的，以及我的政治道德不許我再引證下去的話，都異常明顯地說明，托落茨基匪徒在其所謂雜誌中，是怎樣提出鬬爭方法問題的，說明托落茨基在所謂『改組』蘇維埃國家問題方面，有些什麼方針。關於這一托落茨基『反對派彙刋，』皮達可夫順便向我們說過，他說托落基茨曾告訴他，不要完全注意將來『彙刋』上所登載的東西。他說，要知道，在『彙刋』上，我們不能把我們和你們談的，以及向你們要求的，都完全公開說出。要知道，有時候，在『彙刋』上，我們甚而還要說些完全與我們所要求你們做的相反的東西。而既然在這些條件之下，他們還說出了像我剛才所引證出來的話，那這種還不是直接號召以暴力來反對我們的國家，反對我們的領袖，是什麼呢？怎麼能說這不是直接號召暗殺？別的稱呼，我實在想不出來。

而這便是一種極其客觀的證據，證明：當皮達可夫、拉迪克及這夥犯罪匪徒中其他份子說他們是依照托落茨基底直接指示而組織暗殺行動時，他們所不能不說的，乃是眞正的事實；對於這一種千眞萬確的事實，是無論用怎樣的空談，無論用怎樣的誣衊，無論用怎樣的毀謗，無論用怎樣的托落茨基的謠言，都是無法抹煞的。我們手中有具體的文件可以客觀證明，暗殺是擺在托落茨基組織的議事日程上，暗殺是

由托落茨基提出的暗殺是由皮達可夫接納採用的。

在我們面前，坐着暗殺兇手，這些兇手不僅單是自己一方面，而且與那個同他們有些競爭的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協同組織了暗殺。請你們看看早已公佈的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總部案底審問記錄吧！從該記錄可以看見，季諾維也夫份子之惟恐托落茨基份子在其犯罪活動中會超過他們的心理，鞭策了他們。難道在這次審判中，我們沒聽到同樣的話嗎？難道『平行』總部中的托落茨基份子不正是如拉迪克在此地所供認的那樣，曾力圖把季諾維也夫份子握在手中，曾力圖在他們將來分配總長位置時，不致被季諾維也夫份子所排擠嗎？這個『先鋒隊』渴想得到總長的位置。拉迪克想得到外交總長，而拉達依查克——一定是什麼宗教儀式總長（聽衆發笑，）因為他在自己的口供中說，他曾經在某地向某人宣過誓，這個誓詞，一直到現在還耿耿在心呢！而預定給皮達可夫的位置（這是我們知道的）便是軍政總長，而且又是『陸軍』與（他們並沒有過什麼海軍人材）『空軍』（我是指『老飛行家』拉達依查克而言）總司令（聽衆發笑。）

托落茨基總部組織了許多暗殺團。在皮達可夫手下有洛根諾夫，葛魯丙科等人；在拉迪克手下有普里果任等人；在索考里尼可夫手下有查克斯·格拉得涅夫，梯月里等人；在舍列布略可夫手下也有自己的暗殺團如木梯凡尼；是在多羅布尼斯手下便有什麼波多里斯卡婭，她也準備了暗殺事件。在多羅布尼斯手下，還有自己的暗殺團。至於摩拉洛夫手下，那更不用說了。他早先是當過司令的，手下沒有軍隊還成

麼？如果不能指揮蘇聯的軍隊，難道還不能指揮反蘇聯的軍隊麼？他是個『軍人』——人家命令他指揮什麼和如何去指揮，他就得照樣去指揮。甚而至於舍斯托夫手下，也有暗殺團，卽阿爾諾里特及其同伴，這個暗殺團從牠的任務的見地看來，却是不壞。不錯，這個暗殺團在表面上看來不很好看，但在實際上却會活動。

皮達可夫經過其烏克蘭的代表們，準備暗殺坡斯特舍夫和科西沃爾同志，而在一九三五年便準備暗殺斯大林同志。關於這點，我們問過皮達可夫，我們也傳訊過洛根諾夫來做見證，他也照實證實這件事。拉迪克則準備了列寧格拉方面的暗殺的幹部；查克斯·格拉得涅夫等人在索考里尼可夫領導下，準備暗殺斯大林同志；木梯凡尼在舍列布略可夫領導下，準備暗殺伯里亞同志，並收集暗殺工作人材，預備派赴莫斯科，以便保證最順利的實現所謂大批暗殺之舉。他們還準備暗殺葉若夫同志。多羅布尼斯也準備暗殺葉若夫同志。摩拉洛夫準備暗殺一切來到西伯利亞碰到他的人至於他們所準備暗殺的愛依赫同志，因本來就住在西伯利亞，自當別論。他們的方針是這樣：要計算到並利用黨政領袖出巡外省的機會而實行暗殺他們。摩拉洛夫無論如何不同意把準備暗殺鄂爾卓尼基茲同志的事情，歸到他的頭上，可是同是這一個摩拉洛夫却肯定地、直言不諱地（我不能說是『忠實的』，因爲這三個字對這類的叛徒，是不適當的）承認，說他的確佈置了暗殺我們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同志的事情。這一次暗殺行爲，不僅只是佈置而已，而且還已實際試圖由舍斯托夫與阿爾諾里特實現哩。

當然，也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暗殺團這樣多，卻沒有作出什麼多大的『事情。』可是這正是我們的幸運。須知這些老爺們並沒有親自動手暗殺，而這正是我們的幸運。我們同拉迪克，同皮達可夫，同索考里尼可夫，都時常會過面，在一起討論過各種問題，當時我們以爲坐在自己身旁的，是我們的同志呢。到現在卻明白了，原來坐在我們身旁的，都是幾個兇手！如果他們當時能夠公開主張暗殺，那麼情形就當然更吃緊了。但是他們的策略卻不是這樣。他們的策略正是不宜露托落茨基匪徒準備暗殺行爲的消息。他們的策略是要設法把暗殺行爲推到別人身上——如推到白黨身上（他們正是這樣打算的。）在這樣的條件下，他們當然不容易找到像阿爾諾里特這樣廣見多聞的，來甘願冒此滔天大罪的人。阿爾里諾特、舍斯托夫、摩拉洛夫、西西伯利亞總部，整個托落茨基總部當然是全體都負有準備這種行爲的罪惡，因爲這是按照他們的總部訓令而行的，這種訓令，如皮達可夫所說，這『已具體地由代數文字譯成算術文字了』。但是他們卻忘掉了還有一種文字，這就是刑法的文字，這種文字知道什麼是犯罪，知道犯罪的人，又知道應如何依法治罪。他們挑出阿爾諾里特來幹這類罪行，認爲他是完全適當的人，担任實行一次或十次暗殺行爲，這在阿爾諾里特這個人看來有什麼要緊呢？你們已經親自看見這位阿爾諾里特了。阿爾諾里特只有一個長處，而托落茨基匪徒這班陰謀家卻沒有估計到這個長處，這個長處，就是胆小！他曾準備暗殺鄂爾卓尼基茲同志，但是我們眞萬幸啊，他到最後一分鐘要動手時卻害怕起來了，結果沒有成事。他又曾準備暗殺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同志，但是我們又眞萬幸，他又怕起來，結果又未成事。

但是，事實終歸是事實。暗殺莫洛托夫同志的行爲，是做過了的。這就是在十五米突深的『小溝』（如摩拉洛夫在此地所客客氣氣說的那樣）岸邊所發生的險事，這是事實。

又比方拿工程師巴亞爾石諾夫被害事實來說吧。巴亞爾石諾夫是什麽人呢？他曾經有一個時候，曾因暗害罪而被判徒刑的人。可是後來，他已變成好人了。他竟變成一個忠誠的人了。他拒絕了按照暗害工作的計劃，去建築魯希莫維亦礦井，並且曾再三反對工作做得落後及反對司托羅依洛夫的犯罪行動。他時常揭露司托羅依洛夫。

巴亞爾石諾夫這樣忠誠的工作者，便遭受了這些軍事破壞者匪夥底仇恨。於是他們便佈置把他謀死。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五日，工程師巴亞爾石諾夫乘馬車出火車站。他後面便有載重汽車趕來，把他壓死。這又是那麽一種手段，從前舍斯托夫、徹列普杏等一股匪徒曾用過這種手段，這股匪徒當中也有阿爾諾里特一班人，還有幾個曾被破獲、審判與治罪，例如卡贊釆夫就是參加過這回事。這是事實，這並不是什麽冒認，他們的確是行凶殺死了巴爾亞石諾夫。他們又曾嘗試過用類似的手段去暗殺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同志。

所以這個總部——從阿爾諾里特起，到皮達可夫止，又從皮達可夫起，到阿爾諾里特止，——全部都負有進行暗殺行爲之罪，負有準備暗殺之罪。他們所負的責任，是同樣的，是連帶的。

我認爲，公訴書中所歷數的罪行，完全證實了。被告的這些犯罪，也完全被揭穿了。

訴訟法律問題

按照我國法，法庭應根據本案一切情節之總合的審查，並按照其內心的確信，而給案卷中所有證據以估計。

蘇俄刑事訴訟法第三二〇條，規定必須在法庭下判決時提出一些問題交付法庭解決。其中我認爲最重要的是頭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被告發的行爲是不是事實；第二個問題就是這種行爲是否係刑事罪。對於這兩個問題，公訴方面均給予肯定的答覆。是的，向被告人所提出的罪狀的確是事實。被告人的確犯這被告發的行爲，而且這種行爲，的確是十足的刑事罪。對於這兩個問題，是不能有任何懷疑餘地的。但是從法律要求的觀點看來，我們手上，究竟有什麼證據呢？

我們應當指出，本案底性質是如此，就是這種性質預先決定了關於本案各種可能證據之特性。我們所審的案子是一樁陰謀案，我們所審的是這樣一些人，這些人曾圖謀實行國家政變，這些人曾把自己組織起來並在許多年內進行了或實行了一種以力圖實現這一陰謀爲目的的活動；這種陰謀組織並與國外法西斯勢力相勾結。試問在這種情形之下，關於證據的問題可以怎樣提出呢？也許可以這樣提出：你們說這是陰謀，但你們究竟有些什麼證據呢？你們說他們有綱領，但他們的綱領究竟在什麼地方呢？這班人是否有什麼成文綱領呢？這一點不過是由他們口中說出的。你說這是一個組織，這是一夥什麼匪幫，（而他們却自稱爲政黨，）但究竟他們的决議案在什麼地方呢？他們這一種陰密行動底物證——章程，記錄，

圖章等等又在什麼地方呢？

我根據刑事訴訟學底基本要求，敢大胆地斷定，關於陰謀案件決不能提出這樣的要求，決不能要求我們在審理陰謀案、國家政變案的時候，一定要根據這些陰謀者底記錄、決議案、加入組織的憑證以及憑證底號數等等；亦決不要以爲陰謀者之實行陰謀是要經由什麼正式機關明文批准的。凡是思想健全的人，遇到叛國陰謀案時是不會這樣提出問題的。果然，我們在這一方面是有一些文件的。但就是沒有這些文件，我們亦還是認爲我們有權根據被告和證人底口供及解釋，以至於用間接的證據而提出罪名。在這裏，我至少要引證一位出色的訴訟學家——英國著名的老法律學家維爾雅姆·威里茲底話，他在其間接證據論一書中說明，間接證據有時是很有力量的，間接證據往往比直接證據更可信得多。

我想，我的尊敬的對手，從他們的辯護人立場方面看來，也是會同意我的。但是，我們還有客觀的證據。審判員同志，我已經說過被告們底綱領，並將托落茨基所辦的彙刊給你們看過，因爲在這彙刊上曾發表了這個綱領。根據這文件來對證這個問題，比你們當時根據像片來對證德國暗探局中某些人物的面貌時，還要容易得多哩。

我們所憑藉的種種證據，可以證明公訴書中所提出的各項罪名都是正確的。第一，就是歷史上的來歷，這種來歷根據托落茨基份子已往行動而證實公訴書中所提出的罪名。其次，我們又有被告人底口供，這些口供，本身就有非常重大的證據意義。在審理本案時，當被告人之口供是證據之一的時候，我們不僅

只使法庭只聽了被告人底口供就了事，我們並且還用一切可能的和我們力所能及的方法審查了這些口供是否正確。我應當指出，我們對於這一事情是用十分客觀的善意態度和儘量可能的仔細手續去進行的。

當然，爲要在法庭上辨別那些是實話，那些是假話，那只要有相當審判經驗就夠了。每一個參加過數十次審案的審判員、檢察員、辯護人、都知道，被告人是在說實話，抑或是爲着某種目的而撒謊騙人。但就假定被告人底口供不能作爲可信的證據吧。那就應依照刑事訴訟學上的要求，答覆幾個問題。如果這些口供不合乎事實，那這便是刑事訴訟學上之所謂冒認和揑造。而如果這眞是冒認和揑造，那便應當解釋這種冒認和揑造之原因。這些原因能有各種各樣的。應當說明是否有這些原因存在。這些原因或者是圖個人的利益，個人的方便，或者是想向某人報仇，以及其他等等。如果從這一觀點去觀察本案，那你們也就應當在自己的會議室內把這些口供分析一下，看一看被告親口說出來的話可信到什麼程度，你們也應當考慮到被告人或證人所以作出某種口供的動機問題。已用非常仔細手續調查清楚之本案一切情節，都證據確實地證明被告在這裏所作的口供是合乎事實的。沒有任何根據，以爲皮達可夫不是總部份子，以爲拉迪克沒有參加過接見過外賓，沒有和K先生或和H先生、以及和其他某某先生談過話，以爲他和布哈林沒有給非正式來見他的某些人吃過『香腸煎雞蛋』，以爲索考里尼可夫沒有和某代表談過話——『認准托落茨基之代表資格。』他們關於他們的活動所說的一切話，已由鑑定人的鑑定、預審供認、口

供等所證實；因此絕不能有任何懷疑的餘地。

我認爲，因爲有這種種情形，我們已經可以斷定說：在本案審理中，即使有缺點的話，那缺點並不在於被告在這裏把他們所幹的勾當完全說出，而在於他們到底還是沒有把他們所幹的勾當，他們反蘇維埃國家的勾當全盤供出。

但是，諸位審判員同志！我們在上幾次的審案中也見過這樣的情形，因此我特請你們在最後估量被告歷數小時後將作的最後陳述時，也注意到這一點。我要請你們記起，例如在審判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合總部案時，有些被告，就在此地，就在這些被告席上作最後陳述的時候，曾經宣誓——有的央求饒命，有的未曾這樣央求——說他們已把一切眞情實況都說出來了，說他們心裏再沒有留下絲毫反對工人階級，反對我們人民，反對我們國家的心思了。然而到後來，當我們更進一步來追究他們這種駭人聽聞的萬惡勾當的時候，我們就處處看出了，這般人直到臨死時，還是繼續撒謊騙人哩。

如果可以說本審案是有缺點的話，那我認爲唯一的缺點，就是我深信本案被告人甚至沒有把他們反對我們國家、反對我們偉大祖國的滔天大罪，說出一半來！

我向這般坐在你們面前被告席上的人所提出的罪狀是，他們在一九三三年，依照托落茨基底指示而組織了所謂『平行』總部，以本案被告皮達可夫、拉迪克、索考里尼可夫、舍列布略可夫爲其成份，而且該總部實際上的確是從事積極活動的托落茨基總部；我向他們提出的罪狀是，該總部曾遵照托落茨基

底命令，經過索考里尼可夫和拉迪克而與某些外國的代表實行接洽，以便共同組織反蘇聯的鬪爭，接洽結果，該總部担承下列的義務：當牠上台執政時，牠應給予這些國家以種種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優待條件以及領土的割讓；我向他們提出的罪狀是，該總部曾經過自己的份子以及托落茨基犯罪組織中的其他份子，而爲這些國家做了偵探工作；供給外國偵探機關以各種非常重要的祕密的，關係我們國家利益極大的統計和材料；我向他們提出的罪狀是，該總部及其同謀者曾爲着破壞我國經濟力量及國防能力起見，而組織了並實行了種種軍事破壞和暗害行爲，以致引起了人命的犧牲，並使我們蘇聯國家受了重大的物質損失。

這是我向反蘇聯的托落茨基『平行』總部份子——皮達可夫、拉迪克、索考里尼可夫和舍列布略可夫提出的罪名，也就是說，我認爲他們犯了蘇俄刑法第五十八條第一款甲項——賣國罪，第五十八條第六款——偵探罪，第五十八條第八款——暗殺罪，第五十八條第九款——軍事破壞罪，第五十八條第十一款——組織祕密犯法團體罪。我向其餘一切被告：利夫什茨、摩拉洛夫、多羅布尼斯、巴古司拉夫斯基、克尼亞節夫、拉達依查克、諾爾金、舍斯托夫、司托羅依洛夫、屠洛克、格拉舍、普森和阿爾諾里特所提出的罪名是，他們犯了同樣的罪，因爲他們都是這一組織中的人，他們對於這些罪行負有全部和連帶的責任，雖然他們每個人的罪行是不相同的。總之，他們都是犯了蘇俄刑法上引各條所定明的罪。

諸位審判員同志，我向本案被告所提出的主要罪名是賣國罪。而賣國罪則應依蘇俄刑法第五十八

條第一款甲項之規定懲辦之。該條定明賣國罪係有損蘇聯軍事力量、國家獨立、領土不可侵犯之行爲，係實行偵探，將軍事祕密和國家祕密告密於敵人，投奔敵人之行爲。所有這些行爲，除最後一點——逃往國外——以外，他們都已具備。依法律之規定，凡犯此叛國重罪者——我國斯大林憲法稱這叛國重罪爲罪大惡極是很正確的——應受最嚴厲之懲罰。根據法律之規定，在此種罪犯之罪行被證明確實時，應判決此種罪犯以死刑；僅在情有可原時，才可減刑。

諸位審判員同志！你們應在自己的會議室內解決一個問題，即這些被告或個別被告是否有個別和具體的情由足以減輕他們依法應受之刑罰？我認爲這種足以減輕罪狀的情由是沒有的。我根據公訴書中所援引的蘇俄刑法諸條文，向已交本法庭究辦的被告人，提出全部的罪狀。

我不是一個人來控告的！諸位審判員同志！我覺得好像就在這裏，在我身旁，站着被這些罪行和這些罪犯所傷害的犧牲者，這些犧牲者成了殘廢者，成了半死半活的人，撐着枴杖，有的兩隻脚都沒有了，例如絮索夫斯基站的轉轍女工拉果維村娜同志就是這樣。拉果維村娜同志今天特地經過眞理報寫信給我；她因爲當時設法防止這些敗類所組織的翻車事件之故，在年方二十歲的時候，就把兩隻脚喪失掉了。我不是一個人來控告的。我覺得好像就在此地，就在我身旁，站立着這些業已殉難或已成殘廢的犧牲者，他們要求我，要求國家公訴人，向這些敗類提出全部的罪狀。

我不是一個人來控告的！殉難者雖然是被這些被告所謀害而葬身地下了，但是他們還是好似站在

我的身旁，用那可怕的手指着這被告席，指着這般被告哩！我不是一個人來控告的！我是和蘇聯全國人民一塊來控告的，而且我所控告的是些罪深惡極的犯人，這班犯人，是只配受槍斃，只配處死刑的！

二十六・辯護人布拉烏德的辯護詞

審判長烏爾里赫向諸被告每一個人——即向皮達可夫、拉迪克、索考里尼可夫、舍列布略可夫、巴古司拉夫斯基、多羅布尼斯、摩拉洛夫、諾爾金、舍斯托夫、拉達依查克、司托羅依洛夫、利夫什茨、屠洛克、格拉舍等被告人——詢問他們是否願意享受他們所有的發表辯護詞的權利。但上述諸被告均拒絕作辯護詞。

審判長：現在請被告克尼亞節夫底辯護人布拉烏德同志說話。

布拉烏德：諸位審判員同志！我不對你們隱瞞本案辯護人所處的那種特別困難和非常苦惱的地位。諸位審判員同志！辯護人首先是本祖國的子弟，蘇聯的公民，因此辯護人就不能不具有現在我們全國大大小小非常憤恨震怒與驚駭的情感，即總檢察長在其控訴詞中所表現的情感。

可是，諸位審判員同志，蘇維埃法律，斯大林的憲法保證了每一個被告，無論犯了多大的罪，都有辯護權，根據這種法律的意志，根據斯大林憲法的意志，我們辯護人的公民義務及職業上的責任，便在於幫助

實現那種賦與被告的辯護權，只要被告願意享受這種權利。

我現在所辯護的，是克尼亞節夫；而克尼亞節夫曾任鐵路局長，曾執行日本暗殺局的囑咐，撞翻了工人與紅軍戰士乘坐的列車。我不隱瞞，當我閱讀本案的材料時，當我翻閱本案的證據時，當我聽到克尼亞節夫的供詞時，我就似乎聽見列車撞翻時的轟烈聲與紅軍戰士死傷時的呻吟聲。然而我並不因此就可以說，沒有什麼根據來替他辯護。

要知道，克尼亞節夫罪行的主使犯，就是卑污思想——即所謂托落茨基主義的創立者，是叛賣祖國與組織暗殺的主使者，是勾結外國偵探機關的策畫者——這就是托落茨基。克尼亞節夫犯了很大的罪。他是直接執行這些罪行的人，可是主使犯並不是他；那怕他犯了這些罪，在外表上看來似乎主要的在他自己。

檢察長同志在這裏說過：托落茨基組織連最小最小的羣衆基礎也沒有過，不但在過去從來就沒有過，而且現在也沒有，將來也不會有。這個組織始終是有將無兵，始終是一小股陰謀家的結合。因此他們曾竭力採用由於他們同外國偵探局接近和勾結的關係所得出的種種方法來勾引別人入夥。這種勾引方法，便是勒逼、狡詐、要挾與威脅。而克尼亞節夫也就由於這種方法被勾引入夥了。

克尼亞節夫並沒有像同他一起坐在被告席上的許多被告一樣，進行了多年反黨的鬭爭。實在說，他是一個年輕的托落茨基份子。

克尼亞節夫在一九三〇年曾發生過動搖。當時却碰到了一個人，卽被告屠洛克，屠洛克在那時就是一個托落茨基份子，已經與日本偵探機關勾結。屠洛克便着手趁着克尼亞節夫的動搖與懷疑去勾引他入夥。

克尼亞節夫在一九三〇年曾表示拒絕入夥，在一九三〇年，H先生想拉克尼亞節夫去替日本偵探機關幹事，便找到克尼亞節夫進行談判。當時克尼亞節夫在回答H先生時曾嚴辭拒絕了這件事情，可是他並沒有把這次談判告訴任何人。

經過四年以後，屠洛克又來找克尼亞節夫談話，又向克尼亞節夫提出要他入夥的問題。克尼亞節夫又拒絕了。當時屠洛克便向他說：我知道你在一九三〇年與日本偵探的談話及其所囑咐你的事情，如果你不入夥，我就向法庭告密，說你是一個暗藏的托落茨基份子，而且是一個偵探，因爲你與H先生接近，並沒有把這件事情報告相當機關。

克尼亞節夫，因逼得無路可走，就同意加入反革命的托落茨基組織。於是克尼亞節夫便開始受托落茨基暗殺組織的指使而進行可惡的行爲了。

沒有過半年以後，在徹里賓斯克有一個穿灰色衣服的人，不知是誰，到辦公室來找克尼亞節夫。這個人告訴克尼亞節夫說，他是H先生派來的，派他來的目的，就是要繼續一九三〇年那一次的談話。克尼亞節夫曾企圖嚴辭拒絕。但是這個人却說，我已經知道你在半年前加入反革命的托落茨基組織。如果你現

在不接受日本偵探局的囑咐，我就去告發你是托落茨基暗殺團的份子，你就會受到審判。

你們看看，這兩個組織所採取的手段是完全一樣的。托落茨基組織採用了日本偵探機關的手段，而日本偵探機關也採用了托落茨基組織的手段。

克尼亞節夫曾在本人供詞中說：我當時曾被迫到沒有出路的地步，並且害怕我眞正會被法庭判定爲托落茨基匪徒，於是我就答應了替日本偵探機關幹事。

克尼亞節夫加入暗殺與偵探的組織，並非出自本意。他因爲胆怯，因爲意志薄弱，就成了受人利用的執行者——我不願說他成了完全不自覺的犧牲品。

我認爲還有一種情節可以作爲減輕他的刑罰的理由。這就是他十分誠懇，眞正誠懇的認罪。我認爲這樣誠懇認罪，不管被告犯了何等重大的罪，都可以作爲從寬治罪的理由，這在司法中是有這種實例的。克尼亞節夫一切供詞都是誠懇的，眞正的。看看他在申明書（這紙申明書，是他的審訊案卷的第一頁）中所寫的下述一段話吧：『……我不期待，也不請求給我任何寬宥。我不顧個人的一切事情，而願說出眞正的實情，並願澈底揭露一切犯罪的托落茨基份子與日本勾結起來所進行的破壞工作。』

他此後的行爲證明了，這不是空話，這不是想欺騙審査機關和法庭的企圖。這是痛改前非的人所說的話。

克尼亞節夫無論對自己或對別人都是無情面的，他是說實話的。這就給了法庭一些方便去査明這

個駭人聽聞的稀有的案子。

幻想已消滅了……而剩下的，只是他們無可掩飾的十分可惡的事實。克尼亞節夫所聽從的所謂領袖，也不成其爲『領袖』了，而是被告席上醜態畢露的政治破產者，賣國賊。這個可怕的教訓，不能不使克尼亞節夫這一種人也離開反革命的毒氣，雖然這種人直接犯了極重大的罪。

這就是可靠的保障，保證克尼亞節夫在法庭認爲可以保全其性命時，再不至於走上那條會把他引入深淵的道路。

我想，克尼亞節夫在申明書末段所說的話，是誠懇的，他說：『如果無產階級的法庭，顧計到我的誠懇的供述而認爲可以保全我的生命，那時，我將盡我所有的力量，憑我不怠倦的工作來設法贖罪；我將以萬分努力的精神，來爲我們的強大祖國福利而工作。』

我願意相信克尼亞節夫這種申明的誠懇。這就使我有權來請求你們酌量，是否可以保全克尼亞節夫性命的問題。

二十七・辯護人卡茲諾徹也夫的辯護詞

審判長：現在請被告阿爾諾里特底辯護人——辯護人公會會員卡茲諾徹也夫同志說話。

卡茲諾徹也夫：諸位審判員同志！這種賣國叛民案情在這幾天裏完全暴露在你們的面前，這是多麼駭人聽聞的案子。這些被告犯罪之重大，是無可計量的。這，當然引起我們蘇聯全國民衆之震怒。無論托落茨基組織的工作，無論這種組織在勾引別人入夥時所採取的手段，都是十分透澈地、十分顯明地在法庭面前被揭露了。本案事實方面已查明了，這不僅由於本案諸被告的招認，而且還由於你們所獲得的種種鐵證。那種可以使你們注意的證據，那種可以用來作爲減輕本案某個被告罪名的理由，是非常有限的。

就估計本案每個被告情況而論，所可惜者，只有一點，就是那個從我們蘇聯國外來指揮這個組織活動的人，却還能逍遙法外，未被提交本庭審判！

阿爾諾里特，在從前本來毫無政治主張，但是過後却成了那些人，卽在許多年內非常積極地玩着政治上的兩面手腕的人的夥伴。這是怎麼一回事，初看起來，似乎是不可解的。

舍斯托夫在他口供中不害羞地供述了他如何勾引了阿爾諾里特入夥的事情。他說：『我逐漸把他豢養起來。我用非法的手段給了他經常在外僑供給處購買物品的權利。我在經濟上幫助了他，我關顧了他一家。我查明了他過去的劣蹟，我就用來威迫他。』結果阿爾諾里特就因受威迫而入夥了。

阿爾諾里特說：『我曾被强迫而同意了舍斯托夫叫我入夥的要求。』在入夥之後，阿爾諾里特曾受了長期的誘惑。這一點情節，已由舍斯托夫的供詞與本案其他種種客觀的材料證實了。

阿爾諾里特如何執行舍斯托夫與徹列浦杏的指使呢？舍斯托夫說，他們指使他的時候，曾要求他犧

牲自己的性命。當時阿爾諾里特切實允許了犧牲自己的性命，而在事實上，阿爾諾里特却因他個人的畏縮，他自己求生本能的發現，並沒有決心把這種可惡的指使執行到底；我們在本案的材料中可以看到這一點，而維省斯基同志也十分正確地指出了這一點。這種暗殺的舉動並沒有成功，這是蘇聯全國人民的幸事啊！這些可惡的舉動其所以沒有成功的原因，多半是由於阿爾諾里特的畏縮，由於他兩次都企圖欺騙托落茨基組織。在我看來，阿爾諾里特對於這一點供出了眞情實話，因爲，據我看來，除了上述原因以外，不能推測到還有什麼別的使他不去行凶的動機。他說，『我一生從來沒有像這樣地畏縮過……』『我不願死或成爲殘廢。』這就是當時使他不去行凶的動機！再則還有一件事實，就是阿爾諾里特曾在相當的程度內欺騙了托落茨基組織。

在我們面前，必然要發生下列的問題：阿爾諾里特是否曾有過脫離這個組織，與這個組織決絕的嘗試，那怕有一次嘗試也罷。如果他眞有這種嘗試，那麼這種嘗試在目前就有重要的意義而成爲決定他將的來命運時所必須顧及的一點。我們根據本案案卷，知道阿爾諾里特曾去到塔什干，曾來到莫斯科，他曾與徹列浦杳斷絕關係。我們知道這一點是事實。

這樣一來，阿爾諾里特在暗殺行爲沒有成功以後，恐怕徹列浦杳方面報復，因此企圖與托落茨基組織斷絕關係——這種企圖，根據本案案卷看來，應當認爲是業已查明的事實。

諸位審判員同志！無論阿爾諾里特的行爲如何可惡，我想，這個向來就過飄流生活的阿爾諾里特，當

然多半可以說是被告巴古司拉夫司基在這裏所說的那種悲劇的騙局下的犧牲品。如果那些人，既在托落茨基組織內許多年來佔重要的地位，既在這個組織的上層許多年來進行了反黨反政府的鬪爭，還在這裏法庭上宣稱他們自己做了托落茨基悲劇的騙局下的犧牲品，那末，另一種人，在以前與托落茨基組織從來就沒有關係，而只是在以後才被勾引入夥，這種人，就更有權利來說他們是那種更可惱可惡的騙局下的犧牲品。在我看來，阿爾諾里特，便是托落茨基頭目們所設的這種悲劇的騙局下的犧牲品之一。

從證據方面看來已完全明晰。可是在我看來，被告阿爾諾里特在托落茨基組織所有份子（無論是坐在被告席上的或不坐在被告席上的）當中，只是一個極小的角色，他在這個組織中只是奉命執行、別無作用的一個人。

他參加這個組織的時期並不長久，因而他更處在渺小的地位。最後一個理由，就是：當時被告阿爾諾里特眞是願意離開他因强迫而被加入的組織。

阿爾諾里特在各國長期的流浪，老實說，在普通口供單上，在普通履歷表上，是塡不完的。因此須承認他是沒有受過適當的政治教育。而在他這次審判中才受到了最後一課的政治教育。

諸位審判員同志！我想當你們在會議室中決定阿爾諾里特的命運，決定他是否活命的問題時，你們會估計到上述各點，使阿爾諾里特在本案中所受的這種政治教育不會成爲他一生的最後一課。

諸位審判員同志！這就是我的請求。

（在辯護人卡茲諾徹也夫說完了話之後，審判長烏爾里赫宣佈退庭。至一月二十九日上午十一時再行開庭。）

二十七·辯護人孔莫多夫的辯護人

審判長：現在請被告普森底辯護人——莫斯科辯護人公會會員孔莫多夫同志說話。

孔莫多夫：諸位審判員同志，你們都知道，反蘇維埃政權的鬬爭，是在蘇維埃政權產生以後就立刻開始了的。這種鬬爭是很殘酷而劇烈的。結果，敵人是被擊潰了。

由於蘇維埃政權底這種勝利，敵人的數量是縮小了，而友人的數量却擴大了。在敵人當中最有見識和最有天良的人都已經懂得，既然蘇維埃政權不能用武力加以推翻，既然國民經濟並不因遭受嚴重的困難而受到破壞，那可見這種政權在民衆中間有牠深刻的根源。但是，已被擊破的階級敵人底殘餘，並沒有放棄自己的武器。

于是就開始了托落茨基反對派底活動，關于這種活動，公訴人在這裏已經指出來了。托落茨基反對派底這種活動，從最初就已成了所有一切反革命勢力底集合點。當時，各種各樣的反革命份子，都把托落茨基主義看作自己的希望，希望牠來推翻蘇維埃政權，希望牠來恢復資本主義。

維省斯基同志認定這一鬭爭是兩個系統之間的鬭爭，這是千眞萬確的。這的確是兩個宇宙觀之間的鬭爭，而且始終是這兩個宇宙觀之間的鬭爭。而既然法西斯主義目前是舊有生產關係中最壞的一種生產關係系統之最積極的擁護者，那就顯然可以明白，爲什麼法西斯主義向托落茨基主義握手，而托落茨基主義則向法西斯主義握手，並且他們已經締結同盟來共同進行剝削、壓迫和奴役。

你們應該諒解我們。我們的職務是不容易盡的。如果我們在這次審案上，將以將護人資格請求你們審判員同志，對某個被告不要採取公訴人所提議的極刑，那末，我們這樣幹，並不是根據罪行之性質或被告之個性爲理由，而是根據蘇聯實力雄厚强盛的事實之本身爲理由的。這是我們在作辯護時所持的基本理由。我之所以替普森辯護，除了這一基本理由以外，同時亦因爲普森在其本身組織內作用渺小之故。我不能同意將所有一切被告，不分其作用之大小，而相提並論，混爲一談。

總檢察長同志在此地，在法庭上，問向普森『你是否曾經知道平行總部之存在？』普森答覆：『我沒有知道。』這是可以相信的，因爲他和該總部任何一個人，和其中任何一個魁首，都沒有直接的聯繫。他也沒有知道總部所實行的一切指令。

諸位審判員同志！請你們不要忘記，就是在普森的滔天大罪之中總算還有一線光明。他和那個一提起就使我們心胆俱寒的指令，不僅沒有直接的關係，而且也沒有間接的關係。我這裏所指的就是關於暗殺的指令。

我們辯護人在這次審案中，給這個或那個被告所能找到的可以辯護的東西，簡直是微乎其微的。

我認爲我可以給普森辯護的地方，就是普森在托落茨基組織內的作用是不大的。但是我所要說的還不止這一點。普森犯罪的一切內容和事實，在他被捕那一天——十二月二十二日，就由他自己供出了，而且供得非常詳細。他在被捕後經過幾小時，就親手寫了一封信，把一切都說出來了，而且說得非常詳細，令人不能有絲毫懷疑，以爲這些供詞是不合乎事實和不誠懇的。

現在讓我來向你們提起一樁事情吧。我們知道，在偉大的建設中，有許多人是被感化了。在這法庭上不是說出了巴亞爾石諾夫工程師所遭的慘事麼？我很清楚記得這一個人。我覺得他現在好像站在『沙哈亭案』的審庭上那樣，活活地站在我跟前。他當時是一個暗害者。但是你們已看到，這一個過去的暗害者如何忠誠坦白地變成了很好的蘇維埃工作人員。在本案審判期內，我曾讀了他的同事對他的好評。無怪他們在寫到西伯利亞發生駭人聽聞的行兇事件——寫到這位過去曾爲暗害者而後來變成了忠誠工作人員的工程師被人故意用載重汽車壓死的時候，是多麼傷心啊。

誰知道，也許普森在他被捕後立刻親手寫成的那封信，以爲他所作的那些口供，詳細而誠懇的口供，就正是他內心早已發生的那種改過心理底反映哩。

我可以說，事實上，還在一九三五年秋天的時候，普森就已經離開托落茨基組織的工作了。維省斯基同志曾經問他，『也許是因爲你沒有得到指示麼？』就算他沒有得到指示罷，但須知他曾有可能表現自

己的自動性哩。當他在一九三六年七月間來到加明斯克聯合廠並和那些過去由他勾引加入托落茨基組織的人見面的時候，他只是遠遠地順便地招呼問好，而不願談起暗害的事情。這件事實沒有在這次法庭上說出，但普森在一九三七年正月十七日所作的口供中却曾再三提到。這樁瑣屑小事是很重要的，因爲牠可以幫助說明普森的口供是誠懇的，可使我們給他的口供以公正的估計。在最近一年內，無論在暗害行動方面，無論在密報消息方面，你們却絲毫不能找到可以加罪於普森的緣由。這也是一個優點。我覺得，所有這些優點綜合起來，就使我有理由求你們而請你們也有理由從寬辦理，對普森不處以由公訴人所提議的極刑。

二十九·被告皮達可夫的最後陳詞

諸位審判員，我之所以不願作辯護詞，是因爲公訴請中所提出的罪狀，無論對事實的查明，或對我本人罪名底判定，都是正確的。但是我不能同意公訴人的一種斷語，說我現在仍舊是托落茨基份子。不錯，我在許多年內曾經是一個托落茨基份子。我曾經與托落茨基份子携手並進，但要知道，我之所以作出我已作出的那些口供，唯一的動機，就是我因爲我想使自己擺脫自己那種托落茨基的可惡的已往，就算到現在來擺脫也罷，就算擺脫得太遲了也罷。

因此我明白，我的供認，我之把我以及我的同謀者所進行的那種卑鄙齷齪的反革命的罪惡行動供出，在時間上說來是未免太遲了，因此不能替我本人作出什麼實際的結論。但是我請你們不要剝奪我們的覺悟之權，而且只是覺悟之權，我覺悟到：雖然是太遲了，但我終究是把這種卑汚骯髒的東西從內心掃除了。

諸位審判員，使我感覺到最痛苦的倒不是你們將下的那個公正的判決。使我感覺到最痛苦的首先是我內心的覺悟，我在預審時的供認，我在你們面前的供認，我在全國人民面前的供認；我供認了：由于過去一切罪大惡極的祕密鬬爭底結果，我已經落入反革命——最可惡可恥的、法西斯蒂式的、托落茨基的反革命底臭坑中了。

如果有人以爲我在開始托落茨基活動的時候，就已知道這種活動將弄到什麼結局，這樣想是不正確的。如果有人以爲我在主觀上就會抱定反革命的目的，就會覺悟到我們歸根到底將陷于何等萬惡可恥的地步，如果這樣想，那是不正確的，——雖然這並不能絲毫減輕我的客觀上的罪行，但是這樣想是不正確的。

真的，我曾經作過一次想離開托落茨基主義的企圖。這是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〇年的時期。但這一企圖却沒有作到底。我當時沒有把自己已往的一切殘餘剷除乾凈，當時還剩下了托落茨基主義思想殘餘底毒液。這種毒液當時還仍舊保存着，牠起初對於我還沒有發生很大的實際影響，但後來牠就脹成了

一個毒瘡，結果使我走上了犯罪、叛逆、賣國的道路。這個毒瘡現在已經被割開了。

諸位審判員，你們不要以爲在這幾年內，在我們進行悶人的托落茨基祕密工作的年份內，我是沒有看到國內的情形，因爲雖然是個犯罪，但我終究是一個人哩。你們不要以爲我是沒有明白工業方面的實際情形。我現在爽直說，有時候，當我做完托落茨基秘密工作而着手辦理正式事務的時候，我就好像覺得輕鬆一些。當然，這種兩面性不僅是表面上的，而且是內心上的。

要知道，我當時不僅明白週圍的情形，我並且也看到，——這絲毫不能減輕卑污的罪行及其客觀意義，但我終究是看到：我們這一個如國家公訴人所正確指出的小小的托落茨基團體，我們這一個法西斯反革命勢力先鋒隊，用我們的暗害行動是絲毫也不能改變工業的發展，一般經濟發展之實際行程的。但我們還是這樣做了。而在一九三五年年底，一九三六年初的時候，當我們緊緊走近了——不，說的不對，正確些說，不是緊緊走近了，而是完全落入了賣國叛民的最公開的法西斯的反革命深淵的時候，當我們自己也明白我們正在變爲法西斯主義走狗的時候，那時候，不僅我曾有過離開這一點的希圖，但我却沒有找到充分的勇氣，也沒有找到充分的決心，走上這一條唯一可能的道路——把自己的活動情形自願供出，把托落茨基組織以及我過去的行動報告當局，也就是說，我沒有早些做那我現在所做的事。

後來我就被捕了。我之被捕，曾起了好的作用，牠使我關於托落茨基組織的活動給了詳盡完滿的口供。但這次逮捕只盡了這樣的作用，就是：過去我曾想用不正當的方法自行爬出這一陷阱，而逮捕却向我

迫切提了一個問題：或者至死也不覺悟，不供認而仍舊甘作敵人，甘作托落茨基份子；或者是走上我現在已經走上的道路。

我知道，這不能成爲寬容我的理由。我只是向法庭說明，爲什麼我歸根到底還是詳盡無遺的供認了。而且我想這種供認對於這一齷齪罪行的審理至少也給了些許的幫助。

諸位審判員，我更不必說，當局對於我自然是沒有採取任何的壓迫方法或要挾手段，這是用不着我說的，在這裏說這一點是很可笑的。而且即使採用這種手段，至少對於我個人是不能成爲逼我作出口供的動機的。

我之所以說出自己的罪行，並不是由於恐懼。自己覺悟並承認自己所犯的各種滔天大罪，這豈不是最難受的事麽！

對於我個人，你們所要下的任何處罰，都要比我親自供認本身罪行這一事實輕些。因此我不能同意國家公訴人底話，他說：現在坐在被告席的我，和過去一樣，仍舊還是個托落茨基份子。

現在我在蘇聯法庭面前受審；根據蘇聯的法律，我對自己的罪行向蘇聯法庭負着全部的責任，我們對自己的一切罪行負着全部的責任，——但在這個時候，我們爲着他而做了這些事情的那個人，我們依照其直接指示與囑咐而進行了這種種罪行的那個人，我想——我很知道他這個人——他只會採取一種辦法就是否認我們和他一塊做的並在他領導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情，並誹謗我們，造謠撒謊，責駡我們

是胆小鬼以及其他等等。

托落茨基只會採取這種辦法。他這個人我知道得太清楚了，因此對于這一點不能有所懷疑。他不到這法庭上來當面反駁公訴書上所提出的罪名或當面責備我，——而他一定是會責備我的；他不來同我對質，却仍舊繼續其陰謀危害的勾當，因爲他覺得繼續進行這勾當，當然是要簡便和安全些哩。

諸位審判員，這對于我個人是沒有多大關係的。我所很可惜的事就是這一個罪魁，這一個沒有悔過而犯罪到底的要犯，——托落茨基，却沒有與我們一起坐在被告席上。

我很深切感覺到自己的罪惡；因此我不敢請求你們寬宥，我甚至不敢請求你們饒命。

經過幾個鐘頭以後，你們要下判決了。你們看，站在你們面前的是一個因爲自己犯罪作孽而弄得渾身汚穢的人，他由於自己本身的罪過而失掉了一切，失掉了自己的黨，失掉了朋友，失掉了家庭，失掉了自己！

諸位審判員！不過有一點，請不要把我剝奪了，請你們不要剝奪我的覺悟之權，我覺悟到我在你們的面前，雖然是太遲了，但畢竟還是找到了力量來斷絕自己過去的罪行。

三十．被告拉廸克的最後陳述

諸位審判員！在我供認自己犯了賣國罪以後，已經沒有任何可能來作辯護詞了，一個成年而沒有喪失意識的人，是不能提出什麼理由來辯護自己賣國行爲的。而且我也不能替自己找到可以減輕罪過的理由。一個參加了工人運動有三十五年之久的人，旣承認了自己犯了賣國罪，便不能以任何理由來減輕自己的罪惡了。我甚至于不能從事推諉，說是托落茨基把我引入了邪路。我和托落茨基初次會面的時候，我已經是一個成年的人了，我的人生觀也已經確定。就算托落茨基在這些反革命組織底發展上一般的說來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在我走上了反黨鬬爭道路的時候，托落茨基底威信，對于我是最低限度的。

我和托落茨基組織携手，并不是爲着托落茨基底所謂理論，因爲我在初次被放逐的時候，我已看出這一所謂理論底腐敗了；也并不是因爲我承認他的領袖的威信。我之所以和托落茨基組織携手，是因爲我爲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計，我所能夠倚靠的，除托落茨基組織以外，再沒有別的團體了。而我在過去旣和托落茨基組織有聯繫，所以我就和他們携手了。

我之所以和托落茨基携手，并不是因爲我被拉入了這一鬬爭的道路，而是根據我自己對於形勢的估計，根據我自願選定的道路。因此我對於這一點是負着全部的特別的責任，這一責任你們將根據法律之規定和你們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審判員之天良來加以衡量。

我的最後陳述本可以說到這裏爲止，但是我認爲我必須起而反對這裏對於本案所作的估計中的一部分，不是基本點，而是一部分。我之所以不同意這種估計，并不是從我個人的觀點而是從政治的觀點

着想的。我承認了自己的罪過，并關於自己的罪過作出完滿的供詞，這并不是從簡單須要悔過的觀點出發的，因爲悔過可以表現爲內心的覺悟，而這種覺悟可以不給任何人表白；這也不是從一般鍾愛眞情的觀點出發的，因爲這種眞情是很令人痛心的，并且我已經說過，自願招出眞情時之痛苦，勝于槍斃我三次；——我之所以要承認自己的罪過，是因爲我估計到，這種眞情之供出，是有益處的。因此我一聽到說被告席上坐着的無非是一些强盜和偵探的話，我就要反對，我之所以要反對，并不從辯護自己的觀點出發，因爲我既然承認了賣國罪，那賣國怎樣賣法，是否和將軍勾結賣國，這從我的觀點上看來，從人的觀點上看來，是沒有多大意義的，而且我也並沒有抱高傲的態度，以爲和將軍可以勾結賣國，而和偵探則不可。

情形是這樣的，這次審案表明了兩件大事實：國內反革命的組織是和國內一切反革命的力量勾結着。這是一件事實。但這件事實是巨大的客觀的證據。暗害行爲是可以由鑑定人來查明的，暗殺工作是許多人彼此聯繫而進行的，因此，除了物證以外，這些人底口供也說出了全部的情形。但是這審案有雙重意義，牠還有另外一種巨大的意義。牠指出了戰爭底製造所，牠指出了托落茨基組織已經成了準備着新的世界大戰的那些力量底走狗了。

證明這件事實有些什麽根據呢？證明這件事實是有兩個人的供詞可以作證，這就是曾接到托落茨基指令和信件（可惜信件却已燒去了）的我的供詞，以及和托落茨基談過話的皮達可夫底供詞。本案其他被告底一切供詞，都是以我們兩個人的供詞爲根據的。如果你們所審判的是一些平常的刑事犯、偵

探，那你們根據什麼可以相信我們所說的是實情，是不可動搖的眞情實况呢？

當然的，國家公訴人，審理本案的法庭，他們旣知道托落茨基主義底全部歷史，旣知道我們這些人，自然便沒有任何的根據，以爲我們負了暗殺罪名以後，我們還嫌其不足而隨便供說自己犯了賣國罪。這一點你們自己知道得很淸楚。用不着向你們來說明。我們所要使之相信這一點的人，第一就是國內那些零星散漫而飄泊無定的托落茨基份子，他們還沒有拋棄武器，他們還是很危險的，他們應當明白我們在這裏所說的眞心話，明白我們所說的是實話，而且祇是實話。還應當把列寧——我在被告席上提起他的名字時不禁毛骨悚然——在致蘇聯出席海牙會議代表團的信內關于戰爭內幕秘密動機所說的話，昭示於全世界。第一次大戰底一部份內幕，當時是爲塞爾維亞青年民族主義者卡夫亞爾·普林千巴所知道的，他當時可以不揭露這一內幕而死于獄內。他是塞爾維亞的民族主義者，他覺得他有理由不揭穿這種內幕，因爲他覺得這和塞爾維亞民族運動休戚相關。但是我却不能把這一秘密藏起來，帶到棺材裏去，因爲我雖然由於我自己供認的罪狀而沒有權利說我已悔過自新，沒有權利拿共產黨人底資格發言，但是我在三十五年來參加了工人運動，不管我這種參加是因爲犯了怎樣的錯誤和怎樣的罪行而結束了，我終究有權利向你們要求要你們相信我一點，就是我曾和他們一塊走的那些民衆，在我看來，總不是絲毫不關痛癢的。假使我也和加米業夫一樣，和季諾維也夫一樣，和馬拉其科夫斯基一樣，把這一眞情藏起來而帶到棺材裏去，那我在臨死時就會聽到那些將在下次大戰中犧牲而我的供詞能給他們以反戰戰具

的那些人底又一次咒駡。

因此，我反對這樣的話，說被告席上坐着的是一些喪失了一切人類氣味的刑事犯。我這樣爭辯，并不是爲着自己的榮譽，我的榮譽已經喪失了；我這樣爭辯，爲的是人們承認我們作出的供詞是實話；不是要使本廳內的人，國家公訴人以及法庭承認這一點，因爲他們已經很透徹知道我們了，而是要使更多的人，三十年來知道我而現在不能明白我怎能墮落到這個地步的人，承認這一點。我要他們從頭至尾知道，爲什麽我作這種供詞，因此我便不得不將最近期間，尤其是從接到托落茨基最後一個指令時起所發生的事件，以及我心內的掙扎詳細說一說，雖然關於這一方面，我已作了局部的陳述。

我應當說明，爲什麽我在正月間打定的主意——把一切都告發出來的主意，結果沒有實行，并應當說明，爲什麽在訊問我時沒有這樣做，爲什麽到了人民委員會內務部以後，亦沒有實行這個主意。國家公訴人底懷疑是絕對合乎情理的。因爲外表上的事實的確使人不相信我打過這樣的主意。除此以外，國家公訴人既親眼看到加米業夫曾寧願不說出其政治綱領而像普通强盜那樣死去的事實，所以他就自問道，爲什麽我在這裏所說的話可以認作誠懇之極的話，認作說盡了的實話呢？

我並不想誇大我個人的身價——我在這裏的身價是再小沒有的，——但是我却應當指出我個人方面的原因，這些原因曾幫助我，使我的內心比其他人更早些和更堅决些把托落茨基十二月份的指令認作是一個終局，認作是一條末路，認作是必須與他斷絕關係。這會是個人方面的原因。本案其他被告，其

中一部份人之所以重新走上了鬪爭道路，是因爲他們是十足相信托落茨基主義的人，他們所擁護的觀點，就是始終不斷否認社會主義有在一國內建成功之可能。而我在重新走上鬪爭道路的時候，已經不相信托落茨基底這一思想系統，我之所以重新走上鬥爭道路，是因爲我被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時期社會主義建設所遇到的困難嚇倒了。這不過是證明，只在理論上承認可以建設社會主義，要比具備那些始終與黨一塊走的人——從沒有作過反黨鬥爭，因內心深深覺悟到黨的正確而與黨一塊走的人——所特具的那些堅强剛毅精神，是容易些。相信理論本身，而同時却不相信領導幹部或者不十分相信他們，相信理論而同時却與這種幹部沒有聯繫，——那這種理論本身，就是死的東西，牠祇是一種理論的觀點而不是實際的觀點。正在這一點上，我就失足了，就回到了秘密活動的道路。而在這條道路上我就立刻成了實行欺騙的對象。我這樣說，并不是爲的減輕自己的罪過，而是因爲我向我們普通的托落茨基份子擴大了這種欺騙，擴大了無數倍，我這樣說，是爲的使你們明白，我那些個人方面的原因幫助了我去了解轉變之必要。

當我加入組織的時候，托落茨基在其信上一字也沒有提到奪取政權的事。他當時感覺到，這一思想在我看來會覺得是太冒險的。他當時祇利用了我那種非常不安的心理，並顧計到，我由于這種心理，會下歸附於他的决心。他當時這樣想着：以後一切是會弄妥的。當皮達可夫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間和我談話時對我說：『你怎麼這樣，你怎樣還不知道，這是事關政變的密謀哩！』那便是最初時期內就已發生的第

一個裂痕。

一九三三年九月間，羅木把托落茨基底一封信帶給了我，在那封信上，已經說到暗害的行爲了，好像這是不言而喻的事，那時我又疑惑不解，因此羅木在自己的供詞中說，我當時讀到這一點時簡直是目瞪口呆。爲什麼呢？因爲當我進行談判的時候，他們對我一字也沒有提到暗害行動的事，而且沒有提到也不是偶然的。他們當時知道，在經過反對暗害行動的鬥爭時期以後，在暗害行動底全部卑汚性被揭露了以後，恐怕我是不會同意于這一點的。因此他們對我隱瞞了這一點。但當皮達可夫向我說出這些東西的時候，我顯然明白後路已斷，關于這一點要來紛爭是很可笑的。但這已經是第二個裂痕了。

最後，就是我在接到托落茨基一九三四年的指令以後將總部的答覆轉寄去的時候，我曾用本人的名義附帶告訴他說我同意探試探試，可是你自己不要與那些人發生聯繫，因爲環境有變遷的可能。我幷提議：談判事情讓與日德軍界領導人物有聯繫的普特納去進行。托落茨基信上回答我說：「我們不經過你，什麼聯繫也不去建立，什麼決定也不能採取。」他在一年之內沒有來信。但經過一年之後，他才把他和這些人已經實行勾結的事情事後告訴我們。請你們明白，我說我反對他這樣做，並不是要表白我的德行，我不過是把事實說給你們知道罷了。

而我所看到的實際情景是怎樣呢？第一個階段，基羅夫被暗殺了。那時準備暗殺的年期，幾十個暗殺團奔東奔西，等着機會，好把黨底領導者之一殺害。但暗殺的結果，在我個人看來，祇有人命的犧牲而對於

我們却沒有發生任何政治效果。爲要實行大批的暗殺，我們當時却不能將我們所須要的領導者和組織者召到莫斯科來，這也表明各暗殺團的實力如何。而另一方面，我當時與政府以及黨底領導人物很接近，因此我知道，不僅維持治安的機關戒備森嚴，就是民衆底警惕性亦已經提得很高，所以凡以爲可以用暗殺手段，甚至藉最頑强可靠而無所不爲的暗殺團來推翻蘇維埃政權，乃是空想，犧牲人命是可能的，但蘇維埃政權幷不因此而顚覆。

現在再講事情底另一方面。我當時看到托落茨基本人也已失去了信心。第一個方案是掩飾着的；『孩子們，來吧，試一試不要希特勒而用自己的力量來推翻蘇維埃政權吧。怎麽，不能麽？試一試用自己的力量來握取政權麽？不能麽？』當時托落茨基自己已經感覺到自己內部軟弱無力，所以就指望着希特勒。此時他就指靠着希特勒了。老托落茨基主義者之出發點是以爲社會主義在一國內沒有建成功的可能，因此就要勉强加速西歐的革命。現在托落茨基却對他們這樣說：在西歐不能有任何革命發生，因此你們要破壞在一個國家內的革命，要破壞已在蘇聯建設成功的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在我們的國家已經建設成功，這是誰都不能不看見的。

第二，便是力圖要使蘇聯戰敗。

我是個稍有軍事智識的人，並且我也能夠估計國際環境。我曾看得很明白，一九三四年是蘇聯必然戰敗、必然滅亡的時期，——這是由於我的悲觀主義而來的；但是在一九三五年的時候，却已經有了這一

個國家取得勝利的一切可能，因此誰是在以前還假裝自己是迫不得已的敗北主義者，說他要想挽救可救的東西，那麼在一九三五年時，他便應對自己說：我是賣國賊，我幫助別國來滅亡自己這一個強大有力、蓬勃發展、蒸蒸日上的國家。爲着什麼目的呢？爲着要使希特勒能在俄國恢復資本主義。

國家公訴人在這裏說到，不僅托落茨基底指令帶有資本主義復辟的性質，而且托落茨基份子底全部活動都帶有資本主義復辟的性質，他關於這一點所說的話都是無庸懷疑的事實。這些指令本身就是主張完全恢復資本主義的指令，而且這些指令也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牠們祗是總結下列的事實：人們既然向革命底大本營實行襲擊，既然破壞國民經濟，亦就是破壞社會主義，而破壞社會主義，亦就是爲資本主義効勞。

這是事實，這是基本的事實，牠對於托落茨基主義這一社會思潮之估計是有決定的意義，而這一點是國家公訴人所明白的。並且這又指出，我們在這個綱領之下，甚至沒有可能使自己的同事達到什麼一百人之數。如果國家公訴人承認這一點——而且他的確完全承認這一點——並認爲我們甚至連決定召集來查明實況的會議都沒有召集成功，連我們親近的幹部都不同意這種方針——那麼這正表明：托落茨基份子，這一般犯罪的、渾身染着革命領袖之一底鮮血的、幹了無數罪惡勾當的人，他們那種要恢復資本主義的方針，終究是失算了。

要是人們帶着黑罩眼去鬬爭，面前什麼也看不見，那他們能幹而且實際幹的便是有可怕結果的事，

有可怕意義的事。

但是當你們審判員分別權衡這些人——而且你們不能不分別權衡——時，你們就不能不顧計到這一點。

審判員同志……

審判長：被告拉迪克，不要稱『審判員同志，』而稱『諸位審判員。』

拉迪克：諸位審判員，請原諒。我現在要把我們曾想召集的那次會議底內幕說出來。舍列布略可夫說我們當時還沒有決定，這是完全對的。那次會議正是要召集來下決定哩。為什麼會議沒有召集成功呢？會議底內幕又是怎樣呢？為什麼連我們的知己朋友，如布哈林——當時知道我們正在和西歐和遠東列强代表實行聯絡的布哈林，我都沒有把托落茨基十二月份的指示說給他聽，也沒有把皮達可夫與托落茨基會面的事情告訴他呢？

我要說出這一點，因為這在以後能有實際的意義，並且將解答一個問題：現在是否還留下了秘密的東西。我覺得是有的，我覺得現在還留下了瞞過我們也瞞過當局的秘密東西，但這是可以揭破的。我當時已經明白，自行取消暗殺團是沒有意思的。在這托落茨基組織內有各種各樣的人，原來亦有與外國偵探機關有直接聯繫的人。這一點我在當時是沒有知道的。但我在當時不能不推測到有人正在利用我們的事。因此只要我們把四個人所知道的這一秘密洩漏出來，那立刻就會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現在我關於特列采爾要講幾句話。國家公訴人曾經說過我在以後來講到特列采爾罷，現在當我說到一件這裏所沒有說過的事實時，就要來講到他。

特列采爾曾有七八個月未到莫斯科來，我當時以爲這是由於嚴守秘密的緣故，但是他在正月間還不來，並且在接到我請他參加會議的通知以後來到莫斯科的時候，他還不到我這裏來，——一九三五年他在莫斯科，但却沒有到我這裏來，——那時我才明白，托落茨基因從他和我們的信件來往中看到皮達可夫底反抗以及我們對於敗北主義路綫的懷疑，正在建立什麼新的和『平行總部』並列的組織。這一點，我是從特列采爾在一九三五年不來見我們的事實中看出的。

當我們閱讀關於聯合總部審案的材料時，我看到那裏所列舉的事實，沒有一件是我所不知道的，沒有一件是我們其他人所不知道的。這就是說，還有什麼第三個組織底存在。

末了，當皮達可夫從外國回來後談到他和托落茨基的談話時，他順便指出托落茨基曾告訴他說托落茨基正在造就沒有被斯大林領導所腐化了的幹部人材。但是當我談到沃里伯爾格這一姓名而問其他人是否知道這人的時候，我就曉得並沒有人知道他，於是我便明白了：托落茨基除了由他自己訓練成的幹部以外，還在建立由德國法西斯主義所訓練成的代辦組織。而這一點，我在召集會議問題發生的時候就直接知道了。那時我已經明白了，如果特列采爾知道我們將用這種方式提出關於托落茨基指令的問題，以致於能如一九二九年那樣發生分裂，那麼，在我們未將這一問題提出以前，我們就會早被暗害了。

這並不是因為特列采爾對我們感情不好，而是因為他是托落茨基最親信的人，他不經過我們，而和托落茨基有了更直接的密切的聯繫。因此，我便無論如何不能把召集會議的事情告訴其他人。而當我們告訴他們的時候，逮捕事情便發生了，要把他們召集攏來已經是不可能了。

我在被捕以前，是否知道這一定會得到被逮捕的結局呢？怎麼會不知道呢，因為那時我秘書處底組織股長——梯月里已經被捕了，我最近數年來與之時常會面的傅略得梁特也已經被捕了。其他的姓名我不必一一列舉，我還可以舉出幾個和我時常會面的人底姓名來。我當時絕對相信，這件事結果一定要被人民委員會內務部破獲的。既然這樣，我就應當回答一個問題：為什麼我當時還是要召集什麼會議而不去把此事報告黨，報告當局？如果在被捕以前沒有這樣做，那在被捕時也不這樣做呢？

對這問題的答覆是很簡單的。答覆如下：我曾是組織的領導者之一。我曾知道，蘇維埃的法庭並不是一架切肉機，並知道在我們中間，各人犯罪的程度是不同的。我們是領導者，就應當以頭顱來贖自己的罪，但有很大部份人是由我們引上這條鬬爭道路的，他們沒有知道托落茨基組織底基本方針，他們是盲從瞎鬧的。

我當時提出召集會議問題，是想劃清界限，看看那些人眞想走到底——這些人甚至可由我報告給當局；而對其他人，則給以退出的可能，並使其有可能向政府自首。

我一到人民委員會內務部的時候，審查長就立刻明白了我所以不肯供認的原因。

他對我說：『你又不是小孩子。十五個人的口供都揭發了你的罪狀，因此你是推諉不了的：你是個有頭腦的人，決不能抱定這樣的目的；我知道你之所以不願供認，祇是你想等待和考慮一下。好的，請你考慮一下吧。』我在兩個半月之內曾使審查員受了苦。如果這裏問過我們，我們在審查期內是否受了苦，那我便應指出：我沒有受苦，倒是我使審查員受了苦，因爲我逼他們做了些不必要的工作。我在兩個半月之內，曾使審查員對我作種種的訊問，把其他被告的供詞反覆對照，拿出給我看，使我知道誰已經供認，什麼人已供認了什麼。

這繼續了兩個半月之久。有一次，審查長跑來對我說：『你已經是最後一個了。你何必還要花費時間，從容不迫，不把你能供的話供出呢？』於是我便告訴他：『好的，我明天開始向你們供認就是了。』我的供詞，從首至尾都沒有任何的修改。我當時把我所知道的情形完全供出，審查機關只能把我關於這人與那人的聯繫方面所說錯的某些地方改正過來。但是我敢斷定，凡是我向審查機關供認的事實，後來絲毫也沒有被人推翻，絲毫也沒有加以補充。

我承認我還犯了一種罪過：在我已經承認了自己的罪行和揭露了組織以後，我還是硬不肯作出關於布哈林的供詞。我當時知道，布哈林所處的境況和我一樣的無辦法，因爲我們倆所犯的罪行，即不是法律上相同，那在實質上是相同的。但是我們倆是知己朋友，而智慧上的交情要强於其他的交情。我當時知道。布哈林在內心上一定是和我一樣的痛苦，因此我相信他一定會向蘇維埃政府作出誠懇的供詞。因此

我不願向人民委員會內務部告發他。我對他也和對我們其他幹部一樣，是希望他自己能夠拋棄武器。因此，祗當我看到法庭行將開審的時候，我才懂得，在我上庭受審時，我決不應隱瞞其他一個暗殺團體存在之事實。

總之，諸位審判員，我用下列的話來結束我這最後的陳述。根據蘇聯的法律，我們將受最嚴厲的懲罰，我們認爲你們所下的任何判決都是公正的，但是我們要以覺悟者的態度來接受這一判決。我們知道，我們沒有向羣衆說話的權利，——我們不能做他們的導師。可是對於那些與我們有聯繫的份子，我們則想向他們說三件事情。

第一，托落茨基組織已經成了所有一切反革命力量底中心；與托落茨基組織有聯繫並已走上合併道路的右派組織，同樣是國內所有一切反革命力量底中心。對於這些暗殺團體，國家政府一定是有辦法處置的。這一點，我根據自己親身的經驗，沒有絲毫懷疑的餘地。

但是在國內還有着半托落茨基主義者，四分之一的托落茨基主義者，八分之一的托落茨基主義者，這般人因不知道暗殺組織底存在，所以會同情我們，幫助我們；這般人因爲自己的自由主義，因爲不滿意於黨，就給了我們這種的幫助。我們現在要告訴這些人：在打鐵的鋼錘上如有裂痕，那還不大危險，可是在飛機扇的軸釘上如果有裂痕，那就會出險的。我們處在非常緊張的時期，戰爭行將爆發的時期。我們在法庭的面前，在清算罪孽賬的時候，要告訴這些份子：誰要是與黨有絲毫的裂痕，他就該明白，他明天可以成

爲軍事破壞者，可以成爲賣國賊，要是他不在黨面前，用開誠佈公的態度來仔細彌補這一裂痕的話。

第二，我們要告訴法國、西班牙以及其他國家中的托落茨基份子：俄國革命的經驗已經證明，托落茨基主義是工人運動中的蟊賊。我們要警告他們：如果他們不從我們的經驗中去求得教訓，他們便將用自己的頭顱來贖罪。

最後，我們要告訴全世界，告訴那一切爲和平而奮鬥的人：托落茨基主義是挑撥戰爭的工具。我們並且要用堅决的口吻說出這一點，因爲我們已經親身知道了這一點，親身嘗到了這一點的苦味，當我們承認這一點時，我們的內心是覺得萬分悲痛的，但這是歷史事實，並且我們現在是爲着這件實有的事實而以自己的頭顱來贖罪。

這就是我們，我本人所要說的話，這些話的意思就是要使我將受的那種懲罰，不僅祇是一種肉體上的懲罰，而至少能給予小小的裨益。

我們，我也在其內，不能要求什麼寬宥，我們絕對沒有這種權利。我這樣說不是由於什麼自尊，這裏根本談不到什麼自尊！我要說，我們用不着這種寬宥。最近將來的五年十年之內，將解決世界的命運，在這時期內，人祇有參加實際生活，那怕是參加最粗笨的工作，他的生活才有意義。但我們所犯的罪已經擯除了這種可能。既然這樣，那寬宥對於我們祇不過是多餘的苦痛而已。我們這些人，是很意氣相投的夥件，因此當托落茨基最親信的一個人，我曾深信他一定會不供一字而死在獄裏的那個人，摩拉洛夫，結果竟也供

認不諱，並指出其所以供認的原因是因爲他不願在臨死時尙感覺到他的名字可以成爲一切反革命混蛋底旗幟，——摩拉洛夫竟能這樣做，這的確是這次的審案底最大的結果。

我們已經澈底覺悟到我們是成了歷史那一種勢力底工具。可惜我們雖然都是有智識的人，但我們覺悟到這一點未免太遲了。我們希望我們這種覺悟能成爲某些人借鏡的資料。

三十一·被告索考里尼可夫的最後陳述

我不想利用最後陳述來否認或辯護審訊中某些材料或公訴書與國家公訴人某些結論。我在預審時，承認過我自己的罪過與我自己的犯法行爲，在這裏又完完全全承認了，我再沒什麼補述的供詞。我只請求庭上相信我一件事，就是我沒有隱秘什麼，我所說的，不是半眞半假的，我所說的都完全是眞話。我之所以說到這一點，就因爲昨天國家公訴人在公訴詞中講到從前曾有過這樣的事實，因此我認爲自己必須着重指出這一點，恰恰因爲國家公訴人已經講到了這個問題，所以我必須着重指出這一點。

公訴人提起在審判聯合總部時，諸被告曾隱瞞了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底政治主張。我在供認時，已把這一段空白補上了。我不認爲在這個問題上可以含糊其辭。在我們聯盟底政治主張方面，凡是我所知道的東西，我在預審時都說出來了。

我本人對於這種政治主張的態度是怎樣呢?我雖在過去許多年內是一個忠實的黨員,但是後來又如何成爲擁護這種政治主張的戰士呢?要說明這一點,我就應當說在我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的言論中,無疑的就已經含有資本主義復辟這一綱領所有的一切主要成份。當時我的言論受到了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致命的批評,受到了全黨的打擊。這就使我在某時期內醒悟了。可是我應該承認,我並沒有完全拋棄當時所抱的觀點,於是在一九三二年我的舊毛病又發作了。

我又完全抱定了這些方針,並又爲這些方針而鬪爭。這種現象是由於什麼因素而發生的呢?這種因素,是在於一切主要的反黨的團體,到那時,到一九三二年都在共同的立場上勾結起來了。季諾維也夫份子與托落茨基份子在右派綱領的基礎上恢復了密切的聯盟,至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三年時又與右派有了最密切的聯絡,雖然在那時候右派並未正式加入該聯盟內但過後却已加入了。我應當說,這一點對於我發生了大影響。右派會以最廣泛的形式,會以最澈底的(或許不是最澈底的,然而却是澈底的)態度擁護了資本主義復辟的方針。擁護了指靠富農的立場,擁護了反工業化的鬥爭,擁護了反集體化的鬥爭,這裏右派及其總部也加入了鬥爭,這一點無論是在一九三二年或一九三三年及以後一九三五年,對於我都有了巨大影響。

在以後,在一九三五年——關於這件事情,我在預審時已經供認,我在這裏還要提一提——在一九三五年,當平行總部開始恢復自己的工作時,右派以湯姆斯基爲代表(他在這種事情上是右派整個總

部的全權代表）在那時會同意加入聯盟，這一點會有重大的影響。這就非常鞏固了該聯盟的陣地，這就有了眞正的鬬爭可能，這就推動了平行總部。這一點對於我個人也有影響。

我們的綱領是完全反黨的綱領，是完全與社會主義綱領相反的綱領，然而我們究竟怎樣由這種政綱走到這樣一種實際，這種實際會使平行總部成爲投機冒險的一個小團體（這個小團體昨天國家公訴人還愈加無情地加以形容）底首領呢？試問在綱領的性質，在這個政治綱領（這無論如何總算是一個政治團體的綱領）的本身與平行總部所幹的那種犯罪的最可惡的行爲底方式——在這二者之間是否有矛盾呢？我認爲我應該說明這一點，就是用兩三句話來說明也罷。我要說明的第一點就是這個綱領本身的性質，卽主張在社會主義國家內恢復資本主義的綱領本身的性質，不能有別的什麼意義，不能不是赤裸裸的投機冒險主義的實際行動。

我要說的第二點，便是：該聯盟旣受有這種方針的束縛，旣抱有恢復資本主義的目的，所以牠就受了那種所謂鬬爭規律的支配。這句話用得很廣泛，可是僅僅用這種形式所說出的這句話當然是不具體的。要知道這句話的具體內容，就要看，我們所經過的情形如何，就要看那種會使得平行總部底份子受到鐵一般的必然性的支配，會把他們一步步拖下去的鬬爭規律怎樣。

我以爲在這裏不必說些個別的事實，因爲這些事實在預審時及審訊時都已宣佈過，而且你們，諸位審判員都知道得很好。我以爲在這裏必須爲你們，爲全國而且爲凡是或許有動搖、或許能夠犯罪、或許能

夠着手進行反蘇聯鬪爭的人，簡要地敍述這件事情的特性。

我應當說：我們由反黨的觀點開始，於是就必然地進行了反社會主義的鬪爭，就站上反黨鬪爭的立場，就把自己與擁護黨的全體民衆對立起來。

我們的綱領是反黨的，是反社會主義的。因此這個綱領就立卽擴大而成爲反人民的綱領。昨天國家公訴人在這裏所說的話，都是正確的。我們過去除了自己總部最親近的人以外，不能把這個綱領告訴任何人。我們在過去甚至還不敢把這個綱領寫成一個什麽文件，也不敢把這個綱領傳播出去，因爲，這樣的綱領一經揭露，就等於我們的破產。

我們的綱領是反人民的綱領。因此我們當時就不能以羣衆爲靠山。這就是說，往下一步，我們不得不企圖採取陰謀的鬪爭手段。我們當時除了陰謀以外就沒有別的辦法了。我們連一點羣衆鬥爭的可能也不會有過，可是要實行陰謀，我們自己原有的力量也是不够的。甚至實行陰謀都不够力量啊！

假使當時我們能夠指望國內有什麽足以威脅蘇維埃政權、足以威脅蘇維埃制度的陰謀團體（卽是一些小小的陰謀團體也罷，）來擁護我們的罪惡計劃、罪惡綱領，那麽，我們當時也許就把我們的陰謀策略開展起來——這樣的例子已經有過。可是我們爲了進行陰謀也沒找到充足的力量，於是我們當時就應在我們團體外，在我們國家外去尋找一些力量，一些同盟者。我們不得不找我們所碰到的任何同盟者，而我們所碰到的同盟者，便是人民底死敵，而我們就協同這些同盟者進行反人民的鬪爭。

這樣我們便由陰謀而轉入投機冒險勾當，又由投機冒險勾當而立刻墮入法西斯險惡的陷阱中去了，因爲我們在法西斯組織中找到了同盟者，而他們却把我們控制了，於是我們便成了他們的傀儡。

這件事情，具體地說來是如此，我們所能想到的就是如此，我們現在所想到的，我們現在所了解的，就是如此！我想平行總部以及托落茨基組織中的其他參加人——我們大家都是如此觀察這件事情。

我們曾想像過，我們能夠利用敵人的力量，可是我們在事實上却完全成了敵人手中毫無辦法的極卑鄙齷齪的傀儡。但是我應當說，當一九三二年夏天我同意加入後備總部做其中一份子時，我當然沒有想到所有這一切情形……我不知道，這在目前對於庭上是否有什麼用處，有什麼意義，但是在當時事實確是如此。當然，這一切情形，我當時並沒有想到，這種情形究竟如何發展下去，我當時也沒有想到；後備總部往後要幹些什麼事情，我當時並沒有想到。我當時也沒有想到：我們的力量，是如此渺小，沒有想到，我們這種力量十二分渺小，結果，我們的政策，弄到非常可恥的結局，而我們弄到墮落與消滅的地步。

我想，當然，誰也料到，在這幾年鬬爭中，我曾發生過一些動搖，曾在這種鬬爭中發生過猶移不定，發生過難受的心理。這一切都是發生過的，是有過這種情形的。可是，我應當說出，當然，在進行這種鬬爭時，無論我個人，無論總部其他份子——我是這樣想的——都被這鬬爭中的一種狂熱所支配，我們曾指望得到一些勝利，於是一步一步墮落下去了！

雖然我們曾發生動搖，雖然我們每一個人，總部每一個份子，我們組織中的每一個份子，有過第二種

心靈（我此地所指的是好的心靈，就是我們在墮落以前，在盲目胡爲以前，在喪失良心以前，由於過去的革命工作所培植出來的心靈，）雖然這種心靈會使我們捫心自問，會使我們想想自己做的勾當，然而還是一步一步地墮落下去了。

諸位審判員，我還要說，我被捕以後，並知道審查方面所獲得的關於平行總部存在的材料，於是我就領悟到，這是完全失敗了，卽是說，我們這個聯盟已經一敗塗地。而推動我供認及認罪的第一個原因，正是由於我領悟到這是我們聯盟活動的末日；領悟到保存這聯盟一些餘孽之企圖，只能引起將來更壞的墮落；領悟到這種企圖是毫無意義的；領悟到須要有勇氣來承認自己的失敗，須要有勇氣來担負自己行動的罪過，以便儘可能地改正那種已做的罪惡。

可是我在審查的過程中，抱定了認罪的主意，還因爲我在審查的過程中知道了我過去所不知道的關於團體內工作的許多材料，我雖然是總部底一份子，但是由於秘密條件的關係，對於這些工作，就根本沒有一一清楚知道，總部其他份子也是一樣，並沒有一一清楚知道。我還要說，我們聯盟中普通的參加人，甚至外省幾個著名的參加人，當然，也不知道全部情形。可是我們——總部參加人，也是不知道全部情形。我們過去由於秘密條件的關係是互相隔絕的。當然，我不能不說，在審查時，使我知道關於我們聯盟活動的材料，使我知道了我們的指令變成什麼東西（我並不否認我們要負這些指令的責任，）使我知道了這種指令得到了怎樣齷齪，怎樣可惡，怎樣政治墮落的結果……這種情況，我們犯罪作惡的這種情況，使

我不能不恐懼萬分。因此我自己十分誠懇，十分自願地把我們團體的一切活動宣露無餘，以便從此結束這一切活動。

諸位審判員，我不把我的話拖長下去，我還要說不多的幾句話。關於托落茨基在我們團體工作中的作用，總部參加人——皮達可夫與拉迪克在這裏供述過並估計過，我沒有什麼可補述的話。我想，這些估計，是做得很爽直的，我完全贊同這些估計。在這裏我不能由自己方面來補充什麼話，因爲我當時與托落茨基沒有直接交接過，沒有直接發生過聯繫，而是經過別人才接到過消息。

昨天，國家公訴人，總檢察長，在公訴詞結尾時說，我們全體，即坐在這法庭中的諸被告，是應受死刑的，我不能答辯，我沒有任何理由可以答辯，來反對國家公訴人的結論；這種結論當然是有十足根據的。但是我要說：我認爲公訴書上的材料，審問時的材料，甚至國家公訴人昨日的公訴詞，便已經使我們在政治上受到了死刑，把我們在政治上埋葬了。

我自己相信，或者至少是希望在蘇聯再找不到一隻手會去試一試撐持托落茨基旗幟的旗桿。我認爲，在他國，托落茨基主義也被這次審判揭破了，托落茨基本人也是被這次審判揭破了：他是資本主義的同盟者，他是法西斯極卑鄙的奸細，他是世界大戰的挑撥者，因此他到處必將遇到千千萬萬人民的痛恨與追究。

因此我認爲：托落茨基主義這種反革命的政治力量既然正在滅亡，既然完全被擊潰，我認爲，無論我

本人或其餘被告，一切被告，可以請求你們，請求審判長和審判員，從寬治罪。我認爲這種請求，對於我自己或對於別的被告並沒有什麼不可能，並沒有什麼羞恥。當然，我們每一個人在本案中自有個人所應負担的罪。我完全相信蘇聯最高法庭是完全公正無私的。我認爲，在我的案件或其餘被告的案件中，凡是可以用來作爲減罪與寬宥理由的情節，無疑地，庭上自會加以斟酌。因此我本人不舉出那些在我看來可以做寬宥理由的情節。我重複說，我等待最高法庭的公正判決。

可是，如果不是就個別的人的罪來說，而是就諸被告集體的罪來說，那麼，我就重複地說，我認爲托落茨基組織，托落茨基主義已經死亡，已成爲羣衆可痛恨的東西，已被埋葬而不能再起了。我想法庭或許要把這種情形當作從寬治罪的理由，我還重複地說，我向法庭提出這種從寬治罪的請求，並經過法庭向我國全體人民公開認罪並請求從寬治罪。

三十二・被告舍列布略可夫的最後陳述

我作被告最後的陳述，不是爲自己辯護。我想在這裏說，昨天總檢察長對於我反祖國、反蘇聯、反黨犯了十分重大的罪所說的一段話，我完完全全承認是公正的。我早年就參加革命運動，並當過二十年誠心的忠實的黨員，而結果却成了人民之敵，到現在竟在這裏坐在被告席上，想起來，眞傷心！可是我現在明白

這樣的結果之所以產生，就是因爲我在當時既犯了政治錯誤，又固執不改，因而就加深了這種錯誤，按照鬭爭的必然趨勢，這種錯誤便轉而成爲最重大的罪惡了。當然，這種覺悟對我個人是已經遲了。可是這種覺悟，或許還可做凡是始終不覺悟到在黨內固執自己的錯誤就會必然走到我所走的地步的那種人的教訓。

我在預審時及在法庭上都已誠懇的供出了我的口供，因爲我已眞正堅決徹底與托落茨基及托落茨基主義的反革命匪徒思想斷絕了。因此我請求法庭相信我的誠懇，並請在判決前顧及到與注意到這一點。

三十三·被告巴古司拉夫斯基的最後陳述

在這次審判中，暴露了犯罪、殺人、賣國、叛民的最可惡的醜事。我在這些醜事中，也佔有一定的地位，這種地位就是公訴書中所提出的幾條用刑法上的文字所正確認定的罪名，也就是昨日國家公訴人在法庭審問後所認定的罪名。今天站在你們面前的我，便是國事犯，賣國賊，罪逆者。

我不能不向自己問過幾百次，問過幾千次，而現在這一次却在你們，審判長審判員諸位之前，在你們所代表的階級之前，卽在那個生育我教育我的階級之前，問問自己：究竟爲何發生了這樣一回事呢？這不

是平常的問題。我須回答這一問題，我把這問題翻來覆去地想了很多遍以後，就給了下述的答案。

鬬爭的必然趨勢——這眞是籠統的話，而且在我看來，這狠少能解答問題。鬬爭的必然趨勢並不一定要使任何人們去進行那些最可惡的罪惡，像這一次這種所謂鬬爭的必然趨勢使我及其餘被告去進行我們所犯的罪惡一樣。

請看看我所見到的幾個原因，我認爲必須把這幾個原因在這裏呈述於你們，審判長審判員諸位之前。

我似乎是從那一件初看起來並非罪過的小事情而開端的。一九二三年一部份托落茨基份子以托落茨基爲首（當中有一部份人現在與我同坐在被告席上）草就了所謂四十六人聯名的信，在這封信內就已蘊藏了我們日後犯罪的一切要素。當時我在這封信上也簽了自己的名字，現在我還記得我簽名時的感覺，在我看來這不僅是我一個人有這樣感覺。我當時感覺到，我面前這班人是有威望的同志——布爾塞維克，在黨內和國家中居極負責的地位。可是我却忘記了列寧的話，列寧不止一次教訓黨的同志說，只是相信威望，只是相信言論是不可以的；他教訓要細心分析一切爭論的文件以便定出自己的意見。現在我個人見到這一種對威望的盲從，便是我不僅深深地而且極端地墮落的原因。

第二個原因。這又是由於我忽略了列寧關於黨的建設一個基本的遺訓；列寧說，你既然走錯了路，既然犯了錯誤，你就不得固執與堅持自己的錯誤，因爲這正如國家公訴人昨日所正確提到的一樣，就可以

把人，而且已把我們引到了法西斯反革命的深淵中去。

再則，還有第三個原因。我在這裏向庭上供述時，曾說到這個原因，我認爲現在必須把這個原因再說一次。這就是一貫的欺騙手腕，這就是經常一貫的欺騙手腕，而且我應當說托落茨基及其親信的欺騙手腕，不僅發現於一九三四年及一九三五年把那種所謂訓令隱秘起來的時候。要是把這鬬爭的整個時期分析起來，就明白這種欺騙手腕是常常採用的。我應當把這一點告訴法庭。我爲什麼說這是欺騙手腕呢，我現在就加以說明。我應當告訴法庭：例如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街上反蘇維埃的示威，當時我們托落茨基份子中有許多人以及我個人都住在莫斯科並且與托落茨基及其親信很接近，但是當時這種反蘇維埃的示威的發動，却是幾乎出我們意料之外。他們事前對我們把這件事情隱瞞起來了，而這一次示威當我們知道時，却已成了事實，於是我們劈面就碰到了既成的事實，我們就不得不爲了這種妄行，爲了這種反蘇維埃的罪行，爲了第一次街上示威的嘗試而鬬爭。我提起這件事情，爲的是指出這不是偶然的。這是一種手腕，這是一貫的手腕，而我到今天所以還把這一點再着重說一次，就是因爲托落茨基到底還是活着的，他的毒螫到底還沒有拔除，他到今天不僅還繼續欺騙他自己方面的人，而且他還想欺騙工人，幸而他欺騙工人沒有効果。在我們國家內，他欺騙工人並沒有成功，可是他在別的國家內欺騙工人或許多少會得到一點效果，可見這種欺騙手腕的揭露是非常必要的。而我認爲墮落到這樣深沉、墮落到這樣的極點，其原因之一，就是這種一貫的欺騙手腕。請你們諸位審判員相信，我所說的這一點，並不是爲減輕罪，

減輕我個人的罪；我不知道如何找到減罪的理由，又從何處找到減罪的理由，憑心說罷，我自然是願意找到減罪的理由，而且願意你們諸位審判員幫助我找到減罪的理由。我願意你們把本案一切事情分別清楚，這樣就幫助了我求得減罪的理由。可是，我不認爲可以不請你們仔細注意到這種一貫的欺騙手腕，並且警告那些還沒有明白這種欺騙手腕的每一個人說，這種一貫的欺騙手腕，是致命的，像他致了我的命一樣。

自然，我沒有別的什麽話可說，我只能說要從各方面澈底揭露我們所有一切罪大惡極的行爲的慫恿者與主謀者，卽托洛茨基，實行這種揭露乃是基本任務，至於要在這裏，在我們國內找出具體的犯人，找出他的同謀者，當然更是一個基本任務。

諸位審判員！當你們討論到我的刑罰問題時，請你們顧及下述的事實：我已經不是年輕的人，我已過了五十歲，我並不是歲歲都犯了罪。黨知道我過去是一個忠實的戰士，會在游擊隊中、在赤衞隊中拿過槍，出過力，後來又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戰綫上、在經濟戰線上盡過勞。

我說這一點並不是爲要憑這些勞績來請求寬宥自己。這些勞績却已被我所犯的最可惡的罪行蓋過了許多層，可是我說這點，就是爲了答覆下述的問題。我曾捫心自問，是否我終於是一個怙惡不悛的犯人，我自己回答這一問題：不是，我决不會如此，因此這就使我可以請求寬宥，請求饒恕。

還在不久以前，我曾忠心做過大的工作，當我獨自提起這些事情時，我就想到也使得我可以請求你

們從寬治罪。

最後，我只有一點請求你們，諸位審判員！讓我享盡天年而死，使我能夠利用餘年，隨便在什麼地方，隨便做什麼工作來贖罪，來抵償我在全國面前、在工人階級面前所犯的罪，那怕是只抵償得一點點罪也罷。

昨天國家公訴人說得對：我們的國家，是强大的國家，勢力雄厚的國家，我們的最卑汚的罪行一點也未能妨碍我們國內革命勝利的行程。於是我就根據這一點來請求你們給我一種可能，以便盡我所有的精力來贖罪、償罪，那怕是只做得到一點點，總算是盡了我的心罷！這就是我請求從輕處罪的原因，這就是我請求保全我的生命的原因。

三十四・被告多羅布尼斯的最後陳述

昨日國家公訴人把我所犯的一切重罪作了極其完全的估計。我是一個工人，皮鞋工人，從十五歲起就成爲積極的革命份子與黨員，在俄皇時代坐過六年牢，受過三次死刑的判决，而現在我這個人却以重大罪犯與背叛祖國的資格坐上了被告席。

我受過自己工人階級的教養，但我却幹了反工人階級的事情而成了工人階級的死敵與賣階級的叛賊。我曾犯了一重又一重的罪，幫助托落茨基加緊促成流血的戰爭，幫助托落茨基多方拍賣社會主義

國家與工人階級。

這一切之所以發生的原因，就是由於我長期處於又霉又臭的托落茨基秘密組織之中。我在那裏就中了這種毒，因此甚至當我赴中亞細亞去而避免積極活動之時，我還缺乏充分堅强的意志以便與他們完全決絕。我聽到後備總部召我，我就轉赴西西伯利亞去增援，去進行可恥可恨的罪孽，而不知道這是爲了什麽。

受了迷惑的我，畢竟在我所服務的建築工程中造成了這種可恥可恨的罪孽，我當時看到工人的熱烈與忠誠，不覺被感動，但是黑暗的勢力却又把我拉回去了。

逮捕與拘禁，成了我的淨罪所，使我可以清洗我一身的汚穢。我淨罪是十分堅決的，十分澈底的。

國家公訴人昨天很正確地表示了懷疑，我請求相信：我已把我心中所有的這種腐敗的惡臭的托落茨基主義都洗淨了，我已把這種思想無情地剷除了。審察機關還可以證明，我曾有時催促訊問，因爲我要立即完全澈底滌除這種汚穢的東西。

我已四十六歲了。在我被捕不久以前，便是我入黨的第三十週年。我變成了勞動羣衆所棄絕與咒罵的子弟。法庭將判決我。無論什麽嚴厲的判決我都願担當，這是應該的。可是，諸位審判員，如果你們有可能（那怕是最小的可能）不使我死於可恥的結局，而讓我經歷一切艱難困苦以後回到我原來出身的階級隊伍之中，那麽我就認爲我有那種偉大而光榮的義務，有毫不辜負勞動羣衆這種賞賜並爲勞動羣衆

鞠躬盡瘁的義務。

三十五・被告摩拉洛夫的最後陳述

我拒絕了辯護人。我也拒絕了辯護，因爲我無論防衛與進攻都用慣了中用的武器。現在我却沒有中用的武器來辯護自己。

昨日國家公訴人曾懷疑我們的誠懇；我們供詞的誠懇。我認爲這同樣也是指我而言，因爲懷疑犯人自然是正當的。可是我請法庭相信，無論在預審時，無論在這裏法庭審問時，我在供詞中沒有隱秘絲毫，把我犯罪的一切事實都完全供出來，並且給了一個相當的估計。我已提及我如何達到這樣的結論。我自己和自己鬬爭了很久。我回想起了馬克思主義者偉大領袖的格言，我也想起了紀元前數世紀前古代最賢明哲人的格言，他說：「人孰無過，過而不省，愚莫大焉。」可是我還要補一句，犯罪而不改，罪莫大焉。我不願他做一個愚人，我也不願仍做一個罪人，因爲我要是抵賴到底，那就會成爲蘇聯領土上不幸還有的反革命份子之標榜。我不願成爲那種還會滋長毒草的禍根，我也不願成爲那種長莠而不長粮的毒種。就是這一點以及往日布爾塞維克的鍛鍊，使我不能不承認我所有的一切罪行，這也就是我絲毫不隱秘的原因。如果怪別人把我引進托落茨基組織，那是多麼可恥的事。我是出身於貧苦的勞動家庭，憑着苦工夫得到

學問與地位，無論我在一八九九年加入工人小組，一九〇五年加入黨時，無論在我往後的活動中，尤其在托落茨基主義開始活動時，我是一個自覺的、智識發達的、受有教育的人。我不敢怪別人，這只怪我自己。這是我的罪孽，這是我的不幸。

我做了托落茨基底忠實兵士已經十多年了，而托落茨基正是工人運動中的蟊賊，法西斯主義底萬惡走狗，工人階級與蘇聯底死敵。可是我做了布爾塞維克黨的忠實兵士却曾有二十多年。就是這一點，使我在預審時、在法庭上不能不說得十分誠實。這不是我的空話，因爲我在過去，在我生平最好的時候慣常是忠實的，慣常是革命的忠實兵士，工人階級的朋友。因此我請求在對我判決刑罰時顧計到我這種誠懇的供認。

三十六·被告諸爾金的最後陳述

我在預審時供出了自己的一切罪行，沒有什麼隱瞞。我完全懺悔了。我全部口供完全是誠懇的與確切的。這便足使法庭於分別一切細節詳情以後，能夠判定必要的刑罰。如果法庭找到某種可原的情由以便減輕我的罪與饒我的性命，那麼我就聲明我將用極大的熱誠來養精蓄銳，希望盡我全力爲反法西斯蒂而鬥爭。假使我會受到另一種判決，假使我在法庭上最後的陳述，就是我一生最後的一舉，那麼我就用

此舉來傳達我對托落茨基的十二分鄙視與仇恨。我這種鄙視與仇恨是極大的，儘夠托落茨基同他的夥伴及其法西斯總參謀部和偵探機關的眞正主人們共同受用。

三十七·被告舍斯托夫的最後陳述

諸位審判員，我之成爲反革命的托落茨基匪徒暗殺的、破壞的、法西斯的組織中的份子，到現在已有十三年了。我在最近五年內曾積極準備自己着手暗殺勞動人民的領袖，工人階級與資本主義世界被壓迫者的領袖。我在最近五年內，在庫玆巴斯礦井礦山內曾積極進行過極有害的破壞工作。在最近五年內，我是叛賊，是全世界資產階級最反動的隊伍的走狗，德國法西斯蒂的走狗。

什麽逼使我這個過去的工人，勞動者家庭的子弟，加進暗殺的組織，叛賣社會主義祖國的組織？我不隱瞞，我從一九二三年起，一步一步地，一級一級地，日益接近了法西斯奸細的組織者——托落茨基及其最親信的人物——謝多夫、斯米爾諾夫、皮達可夫。我同他們的認識與接近誘惑了我，尤其是一九三一年最末一次的會晤，以及他們對我的關注，更誘惑了我，於是我完完全全徹頭徹尾致力於反革命的暗殺行爲與偵探行爲了。在一九二三年，我第一次背叛了工人階級。在一九二三年，我第一次開始進行鬬爭反對黨，以及黨的領導者——斯大林，他堅牢穩固的撑持着馬——恩——列的旗幟。我在這種鬬爭中用盡了

一切可惡的、卑汚的、毒辣的手段。我在這裏，在你們的面前，把我的眞相完全揭露了。我把我犯罪的一切詳情細節都供出來了。我沒有在我被捕後的第一天認罪。我曾抵賴五個星期之久。在這五個星期內，向我提出了一件又一件的事實，如同我的醜事的照片一樣，當我回顧起來，我所幹的一切勾當也就使我不寒而慄了。

我尚未喪盡的一點良心——工人的良心，勞動人民的良心，逼使我說出了實話。我決心像回頭的浪子一樣走向階級兄弟面前訴述我所知道的與我所做的一切。在那裏，在西伯利亞，在內務部管理局內，在預審時，在二十三號獄房內，我往往一想到自己的罪行，就一身瑟瑟縮縮地戰慄起來，好像臨風的樹葉一樣，而這就驅使了我平心靜氣來向你們這裏供述我犯罪的詳情。我曾知道我要幹什麼勾當。我曾知道我走向什麼地方去。我曾知道，我所領導的組織一經破獲以後，我的命運又將如何。我不請求饒命，我亦不要寬宥。無產階級的法庭不應當也不可以饒我的命。在這裏，在你們面前，在全體勞動人民的面前，在資本主義各國被壓迫者的面前，我憑我自己的能力槍斃了那種曾經俘虜了我十三年之久的思想系統。而現在我只願一樣的平心靜氣走上受刑的位置，用我自己的血來洗清叛國的污點。

三十八·被告司托羅依洛夫的最後陳述

我本人的口供以及國家公訴人公訴詞中的詳盡分析，都完完全全表明了和認明了我的罪行，我的無可恕宥的罪孽之深重。最初，我在些小事上，背叛了祖國，後更每況愈下，變成德國偵探局的偵探，執行她的卑鄙下賤的委托。我既未曾加入黨，又未曾做過托落茨基份子，但我却做了托落茨基份子底走狗，他們給我的委托較諸德國偵探局底委托，不僅沒有絲毫區別，而且往往有過之無不及。

雖然我的種種罪行，都是這雙方面對我重壓的結果，但我却不能絲毫減輕我的罪惡，減輕我這萬分深重的罪孽，減輕我在國家面前所作的這種無限重大的罪過。如果念及黨和政府待我之異常宏厚，則此罪過就更深更重了。這種厚待，表現于我的社會地位，亦表現于當局對我的多方鼓勵及種種褒獎。厚待的地方，還在委任我的職務，是全國非黨工程師中，最負責任的職務。我曾有過的優越的物質生活條件，的確超過了富裕生活若干倍。一九三四年初，我曾企圖與敵國偵探局斷絕那違法犯罪的聯繫，然而，我遇到了托落茨基組織西伯利亞總部激烈的反對，牠叫我繼續共同工作。

當時我眞不解，德國偵探局與托落茨基份子底親密關係，從何而來，因爲我既不曉得平行總部底所謂政綱，又不知道牠底所謂政治任務。

現在，在審訊當中，我才明白了，他們是親戚，他們之所以成爲親戚，是因爲他們工作手段相同，是因爲他們決定出賣蘇聯的領土。

我既身居要職，同時又目睹採取激烈方式之陷害行動日趨猖獗，逐有時曾企圖爲國家利益計而將

若干組織上、技術上、生產上之辦法眞正實現。然而，這裏，我又碰到托落茨基組織代表們底强制，他們催促我，罵我是自由主義者，是智識份子等等，于是我又繼續進行這一工作。一九三五年下半年，我與德國偵探局，以及整個地與外國斷絕了關係，然而我繼續感覺着托落茨基份子方面的壓迫。這兩重的心理，經常地重壓着我。一方面，我執行了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合總部的委托。另方面，看到黨、政府以及社會對我的好關係，我感覺到這種暗害陰謀，實違反我工程師底創造精神。于是我曾不能不超出托辣斯總工程師底職權以外，而採取了一些辦法。我在蘇聯刊物上發表了一些技術問題的著作。我作了一些新的發明，有一部分發明不僅已在庫茲巴斯礦山中大規模的採用着，而且在其他煤礦托辣斯中也開始採用了，這些新的發明，保護工人底生命，給予經濟上與技術上的利益。

一九三六年二月底，我曾毅然決定根本脫離庫茲巴斯礦山，到別的地方去。我只和礦務方面的上級機關談到這點，然而在新西比爾斯克與莫斯科方面都未得到允許，迫不得已，又重新留在庫茲巴斯礦山，仍然嘗受與托落茨基份子非法勾結底痛苦。

我不來把暗害方面的罪行一一舉出。這些罪行是很重大的，在預審時以及公訴人，都已替牠們算了總賬。在算這總賬時，我看見我的罪行底一張大清單，看見蘇維埃國家要求我償清的一張大清單。

但我請求審判庭，下判決時，念及我因爲我的階級出身是小農家庭；因爲我僅在一九二一年才開始辦事，就是說，我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沒有做過任何事情；而且就我的本性而論，我並不是敵視無產階級的

份子，我是完全不仇視蘇維埃政權的人。

我之墮落以至于叛國，這件事不是發生在祖國，而是發生在國外，這是層出不窮的陷害與追迫的結果，也是我與托落茨基份子發生關係的結果，他們採用這種種辦法來對付我，就是要達到敲詐與要挾的目的。

我同樣請求法庭，念及我從來與暗殺行動，沒有過任何關係。我甚至沒有聽說過暗殺的活動，更不知牠們底準備過程，但我的罪過總歸是深重的。我對這些，從頭至尾，完完全全地，誠懇地承認。

我請求法庭，對我從寬發落，留下我的生命。我有經驗，我要採取一些辦法，利用我的經驗及智識，用有效的工作，創造的工作，去清洗我在無產階級國家面前所犯的滔天大罪，那怕清洗去一點也好。

我懇請你們相信我這個聲明底誠意，懇請法庭顧念到這一點，給我以重新回到蘇聯各民族之偉大的勞動家庭中的機會。

三十九．被告阿爾諾里特的最後陳述

一月二十九日晚庭

諸位審判員，我自幼就從俄皇時代承受了一個『私生子』的醜名。我迎合了那種紛擾混亂的生活，

這我只能歸咎帝制的俄國，歸咎資本主義社會，因爲我是在這種社會中迎合的。我是工人的子弟，本身又是工人，可是因爲誤入迷途的結果，我却落入托落茨基份子底隊伍了。

我在審訊時，已經說過，現在再着重地重覆一下，我的政治認識是薄弱的、低淺的，我沒有了解重要而困難的政治問題的能力，結果落到這些厲害的托落茨基份子影響之下，而變成其組織中的一員。我參加了謀害共產黨及蘇維埃政府最高領袖的罪行，我曾企圖暗殺他們。幸而未遂，這是我非常慶幸的。我感覺到我的卑鄙的罪孽，所以便立刻離開了普洛科比也夫斯克。我曾在工作中，努力洗清我的下賤的罪孽。

在預審中，在這裏的審訊中，我都完全承認了，我的汚穢，半點也沒有隱瞞，現在我已把我的罪惡完全訴說了，我從沒有感覺到我的生平的歷史，有如現在這樣清白。諸位審判員，我還沒有成爲完全不可救藥的人，我還能工作，對那產生我的社會，還能做一個有用的人。雖然我犯了滔天大罪，雖然公訴人要求處我以極刑，但我總還請求留下我的生命，我將不是空口說白話，而是在事實上去努力贖罪。

四十·被告利夫什茨的最後陳述

諸位審判員，下層工人出身的我，被黨提拔到管理國家的地位——直至人民委員會交通部副部長，由這一點看來，國家公訴人對我提出的罪狀，就更該加重了。黨信任過我，斯大林底戰友——卡岡諾維赤

信任過我。我把這種信任，踐踏在托落茨基反革命的泥坑裏，而走上了叛賣祖國的道路。

這是怎麽發生的？我怎麽陷落到了反革命的泥坑裏？開始，是在我國無產階級革命底最重要而有决定意義的問題上，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不同意于黨，而擁護托落茨基以後，由于鬬爭發展底規律，一步一步地，由小組織活動，走到秘密活動，由秘密活動，走到暗殺陰謀、軍事破壞、以至叛賣祖國。雖然，實際上，在審判中揭穿的托落茨基和總部底綱領，我未曾全部知道，但我不能說，而且也不能藉口說我不知道這個綱領。事實終究是事實，托落茨基是在我國恢復資本主義的組織者，主謀者，這是事實。托落茨基同那些無惡不作，兇殘暴虐的法西斯蒂勢力，共同準備戰爭，力謀使蘇聯在戰爭中遭受失敗，而我就在這無恥的賣國勾當中，幫助了他。這樣，我就走到了盡頭。而此次審案就給我們走盡的路作一總結。

諸位審判員！我請求在審查公訴材料以及審訊材料時，念及我年僅四十。我的生活不單是充滿着罪孽。我過去曾在多年內忠于黨，忠于工人階級，忠于革命，我曾忠實誠摯地作過工，我不承認我此生已休，我認爲我還有忠誠地爲黨、爲革命、爲工人階級効勞的能力，因此，敢請無產階級的法庭，蘇維埃的法庭，留下我的生命，使我能在忠誠的工作中贖洗我的萬惡罪孽于萬一。請求無產階級的法庭從寬治罪。

四十一．被告克尼亞節夫的最後陳述

昨天，我特別靜心地傾聽了國家公訴人底公訴詞。

雖然公訴詞是鋒芒銳利的，但我，說句老實話，應該直爽地、勇敢地說，牠是完全公正的，公訴人把我在黨國面前的罪行，指數形容得完全正確。我在此地所要補充的，只有一點，就是我在兩年半來的托落茨基組織罪惡行爲中，與日本人勾結中，無論何時都沒有抱着私人目的，貪圖個人利益。在這一點上，我的心是純潔的。是的，我要比國家公訴人所說的，還多說一些。我做了準備戰爭的工作。簡單地說，就是使戰爭趕快爆發，來替惡棍托落茨基之奪取政權掃清道路，打開大門。兩年半的工夫中，我經受了不少內心的痛苦，但是此次在審訊中所聽到的，聽到我們的總部怎樣批發零售蘇聯底領土，我公開地說，就是我這飽經風霜的人，也驚得頭髮直往上豎了。

我不是政治家，這是眞的，但我也不是完全不懂政治的。我完全明白，什麼叫做割讓烏克蘭，什麼叫做割讓濱海省與黑龍江沿岸。他們只有一點還沒說出；而且這一點，據我由公訴詞中所聽到的，顯然已在他們的計議中露出了。這就是再把巴庫與哥羅茲念的煤油和全國的鉄路，割讓出去，那時候俄國就完全會成德國法西斯蒂底標本殖民地。

我非常懂得，任何一個國家底一切政治力量，都首先建築在牠的經濟基礎上。因此，除了不可救藥的，直至經營這種批發零售買賣的，直至變成元字號法西斯蒂的人以外，誰還能這樣幹？

如果，我們這些在外省工作而信任總部的人中，有一個人知道了這種情形，——這裏用不着說什麼

悲慘的話，——我敢直接了當的說，那時，那些實際的政治家，先就被人把鬍子都連根拔去了。那時，我就會拉他們一塊兒到人民委員會內務部去。可是，現在，是人家把我們抓來了。

我誠懇地聲明，我沒有參加這種以國家爲買賣的罪行。利夫什茨從沒有同我談過這點。

我還想說一說翻車事件。

國家公訴人說，我們的一切搗毀的、暗害陰謀的、軍事破壞的工作力量，都集中在翻車方面，這種說法是完全正確的。爲什麽？因爲鐵路上的翻車事件，這正是暗害陰謀者、軍事破壞者、階級敵人所能夠進行其工作而可以不被發現，逃出法外的地方。

其所以加此，是因爲，雖然卡岡諾維赤在鐵路運輸上作了一年半有餘的大規模的創造工作，可是某些工作人員及許多專門家總還認爲在鐵路運輸工作中，是不能沒有翻車與不幸事件發生的，認爲這是在鐵路運輸複雜的生產過程中，不可避免的，非有不可的。于是敵人也就因人們對這種理論，尙未完全剷除的理論之信仰而找到可乘之隙了。我們在此地，也尋得了實行暗害工作之隙。

諸位審判員！我的生平是與我們整個革命密切聯繫着的。我升任到重要鐵路局底局長，我實際上曾做過兩次全國車務處技術主任，而車務處乃是鐵路運輸上最重要的一處。還在謝爾任斯基在世的時候，我就與他共同工作，在他跟前辦事。得他的委任；我是第一個與外國政府訂定國際交通協約的。升任要職的我，曾受到黨、政府以及卡岡諾維赤非常的信任。在這一年半中，我曾與卡岡諾維赤不止

一次單獨會面，我們談過很多次，老說實，在每次談話中，我的內心都感到莫大的痛苦，因爲卡岡諾維赤總是對我說：『我曉得你是一個博通变通理論與實際的工作人員，但是我爲何總感覺不到我理當要求你有的那種魄力呢？』這種魄力是被我的違法犯罪工作所牽制住了。我重覆說，要有一種非人的力量，才能熬過這種談話給我的痛苦。但是，我却沒有自首的勇氣。

在預審以及庭訊中，從審察的第一天起，我就盡力誠懇地，從頭至尾，完完全全地，不須任何催促，供認出來。我覺得這一點，在審訊本人時，是始終如一地完成了，就是國家公訴人對我的罪行加以嚴厲的判斷時，也不能不承認我的供詞是誠懇的。我請求審判員顧念到我的這種誠懇。

我同樣請求在解決我的命運時，顧念到我在審查開始前所寫的聲明書，在那聲明書上，我寫道：如果我的生命尚可保留，我將努力以一切的力量，所有的智識，忠誠地洗淨一切罪孽。現在我再一次地肯定地說，我一定能洗淨這種罪孽。

四十二．被告屠洛克的最後陳述

諸位審判員！一九三一年我走上了托落茨基的道路，自然地，由于鬥爭發展底規律，到一九三四年在烏拉爾辦事時，我將從這條道路走上直接反革命的、實行暗害陰謀的、以至背叛祖國的道路。

從那時起，我積極地參加了這一反革命的實際工作，實際上執行了我們總部以及托落茨基由國外發出的罪惡綱領。

這裏，我應該指出，一九三一年我之走上托落茨基的道路，如果是偶然的，那末我于一九三四年積極進行的卑汚工作，就已經不是偶然的了。正因爲不是偶然的，所以才積極。

諸位審判員！公訴人于公訴詞中，把我叫做强盜，把我以及把與我一塊的被告和一致行動的人，一樣地比做手持長槍短棍，在大路上行兇打刼的强盜，這一名稱並不是公訴人隨口說出的，這是我犯的罪惡底結果。身爲賣國賊，身爲土匪而請求無產階級法庭，實質上就是請求蘇維埃人民，減輕我的罪，這當然是非常痛苦的事。但我應當向你們聲明，我一生並不全是作了反黨的鬥爭，更不全是在公開反革命的道路上。

我在黨的二十年中，我曾忠實地、誠心地爲革命効勞有十四年之久。我積極地參加了國內戰爭，我得有政府底獎章。諸位審判員！我當然不是說，而且不妄想，以爲我過去的功績，能超過我所犯的而因此受審的滔天大罪于萬一。但是，我這點小小的功績，總可以使我能夠來請求你們的寬宥，容許我能不以法西斯走狗之資格而死。如果賞給我這條命，我一定能夠以忠誠的、努力的工作，回到社會主義建設者底家庭中去。諸位審判員，我懇請你們顧念到我這一聲明。我對我的活動，以及我所參加的組織底活動，都毫不留情地、最坦白地供了出來。我再一次地請求，如有可能，希望顧及到我的聲明。

四十三・被告拉達依查克的最後陳述

諸位審判員！講到我們參加托落茨基反革命組織的每個人底一切罪行，令人痛心。特別是現在，在國家公訴人詳盡而正確地把該反革命組織及被告一切活動整個的和分別加以判明以後，更其令人痛心。

在審訊時，我詳盡而誠懇地把那些由我委託而進行的罪行供了出來。我之所以把我知道的該匪徒組織底參加人，都完全講出，是爲的一網打盡，爲的是使與托落茨基組織有半點關係的人，也一個不留。在與托落茨基組織發生聯繫之前，我從未做過偵探，從未做過冒險勾當。與該反革命組織發生關係之後，我便變成了托落茨基底走狗，變成了法西斯主義底走狗。這裏的區別是很難說的因爲托落茨基底走狗與法西斯底走狗，是沒有區別的。

我做過很多反黨、反蘇維埃政權、反蘇維埃人民的滔天罪孽，而在我的委託之下，同我有勾結的人們也做過很多這類的罪惡勾當。在一九三五年就已很明顯地看出，這一切鬥爭，並不是什麼反對黨及政府領導人的鬥爭，也不是什麼要改變黨及政府政策的鬥爭，這乃是眞正反對建設新生活的全體俄國人民的鬥爭。我們的血手，事實上，搗亂了社會主義眞誠建設者所創造的東西。我們破壞了，搗亂了俄國人民多年以來在改革生活的鬥爭中、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鬥爭中所創造的東西。我們已經很明顯地看出，我

們的鬥爭是完全沒有用的，我們的罪惡行動，反革命的行動，是絲毫也不能改變蘇聯底眞誠勞動者爲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的鬥爭。

我們在企業中的每次暗害行爲，都只引起了工人熱情底新高漲，引起企業工作上的新反應，使企業得到新的成績。我于一九三五年，事實上停止了該反革命組織底一切積極工作。但這是不夠的。我離開我的同謀者，事實上停止反黨、反政府、反人民的積極鬥爭，但我沒有那樣大的勇氣，來報告與揭破一切惡行，一切反革命工作，以便永遠和牠斷絕關係。我找過出路，要想私自與那些被我所牽扯的以及牽扯着我的人們離開。我再重說一句，這是不夠的。一直到被捕的那一天，我關于我們組織中的參加人及其罪行，一字都沒有說出。

我的罪過，和本案其他許多被告底罪過一樣，更因爲我居于頗重要的職位，居于最重要工業部門之一底領導地位而加重。我的罪過，更因爲人民委員會重工業部部長，以及黨與政府對我總是特別的信任而加重。我既担負了重要的職務，自然應比這種罪行底普通參加者與同謀者，負更大的責任。

諸位審判員！我只想說，我還不是此生已了、不可救藥的人。我還有工作能力，如果法庭覺得還有留我生命的可能，給我以在蘇維埃國家面前，以忠實的工作清洗罪孽的可能，使我能贖我所犯的罪惡于萬一，則我誠懇地、忠實地聲明，我是能夠以忠實的工作，洗清不少的罪孽的。我所請求於法庭的，就是這一點。

四十四·被告格拉舍的最後陳述

諸位審判員！我放棄了辯護自己的權利，在最後的陳述中，我還是不願意多說我是怎樣弄到這種地步的，怎樣墮落到出賣勞動羣衆利益的。我的鉄一般的犯罪事實，使一切企圖，縱使是想解釋罪過的企圖，也顯然只能加重我的罪孽。我請求法庭相信我，我在蘇聯勞動羣衆面前，從頭至尾，完完全全地承認了我的罪行，我既沒有隱瞞絲毫，更沒有想減輕我的罪過。

我只請求准許我，對國家公訴人在此地對於我所下的判斷作一點更正。在我的罪惡工作中，我有過各種各樣的主人，其中有法西斯偵探，也有托落茨基份子。請你們相信，我曾有過改過的企圖，但是左一個右一個的偵探來抓住我，我就從狠牙轉到虎口，結果，托落茨基份子、法西斯偵探梅伊葉羅維茨，把我交到托落茨基份子拉達依查克手中去了。但是，雖然如此，我總沒有成為老奸巨猾的敗類——托落茨基份子。我的卑鄙的賣國行為，應該使我自愧，我不能像托落茨基份子那樣以什麼思想系統或是政治立場來掩飾這一點。

請求法庭念及這一點，並念及我對罪行的完全的、誠實的供認，給我一個機會，至少使我能刷洗一部分的罪孽。

我再一次請求你們相信，我在預審與庭訊中所承認的，是詳盡的、眞實的。就算這是因爲我不能不想擺脫那多年來使我日夜不安的畏罪心理所引起的吧。

四十五・被告普森的最後陳述

諸位審判員！在預審與庭審中，我都把我所知道的反革命托落茨基組織的工作完全公開說出了，我也說了我自己的滔天大罪。我一絲一毫都沒有向法庭隱藏，因爲我想用誠懇的供詞，把我在我的祖國面前犯罪的沉痛感覺，洩露出來，這種感覺，自我開始了解反革命托落茨基組織底眞正實質與目的以來，就籠罩着我，結果便發爲誠懇的供認。

如果我現在請求法庭減罪，那只是爲着萬一法庭有保留我生命的可能，我就把這條生命供獻到誠實的工作中，爲我祖國，爲我人民效勞，不僅以供認懺悔，而且要以實際行動和實際工作來證明這點。

廿九日下午七時十五分法庭退堂會議。

一月卅日上午三時，審長烏爾里赫宣讀判決判詞。

四十六・判決詞

代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之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庭

審判長　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庭庭長軍團軍法長烏爾里赫；

審判員　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庭副庭長，軍軍法長馬都列維赤；

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庭審判員，師軍法長雷赤科夫——

並由一等軍法長考斯裘石科爲書記，經國家公訴人——蘇聯總檢察長維省斯基同志及莫斯科辯護人公會會員布拉烏德、孔莫多夫及卡茲諾徹也夫等同志之參加，於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三日至三十日，在莫斯科城，在公開庭訊上，實行審理下列十七名被告犯蘇俄刑法第五十八條第一款甲項第五十八條第八款，第五十八條第九款，以及第五十八條第十一款所指明之罪而提起之公訴案：

一、皮達可夫（尤利・喬治・勒翁尼多維切）一八九〇年生，職員；

二、索考里尼可夫（格利哥利・亞科夫列維切）一八八八年生，職員；

三、拉迪克（卡爾・畢爾加爾多維切），一八八五年生，新聞記者；

四、舍列布略可夫（勒昂尼特・畢特洛維切），一八八八年生，職員；

五、利夫什茨（亞科夫・阿布拉莫維切），一八九六年生，職員；

六、摩拉洛夫（尼古拉・依瓦諾維切），一八七七年生，職員；

七、多羅布尼斯（亞科夫・拉烏莫維切），一八九一年生，職員；

八、巴古司拉夫斯基（米哈依爾・索洛莫維切，）一八八六年生，職員；

九、克尼亞節夫（依凡・阿列克山特洛維切，）一八九三年生，職員；

十、拉達依查克（索達尼斯拉夫・安托諾維切，）一八九四年生，職員；

十一、諾爾金（波里斯・沃希波維切，）一八九五年生，職員；

十二、舍斯托夫（阿列克什・阿列克山特諾維切，）一八九六年生，職員；

十三、司托羅依洛夫（米哈依爾・索鉄班諾維切，）一八九九年生，職員；

十四、屠洛克（約西夫・特米特里葉維切，）一九〇〇年生，職員；

十五、格拉舍（依凡・約西伏維切）一八八六年生，職員；

十六、普森（格夫列依爾・葉夫列莫維切，）一八九六年生，職員；

十七、阿爾諾里特（瓦連亭・沃利夫里多維切，）即瓦西里也夫（瓦亭連・瓦西里葉維切，）一八九四年生，職員。

偵查及審訊之結果查明下列各種事實：

一九三三年，依照一九二九年被逐出蘇聯境外之人民公敵托落茨基之直接指示，除當時業已存在之季諾維也夫、加米業夫，斯米爾諾夫以及其他等等所組織之所謂「托落茨基——季諾維也夫聯合暗殺總部」外，同時又在莫斯科設立秘密的反蘇聯的托落茨基平行總部，而該總部之成份，即爲本案被告

皮達可夫（尤・勒、）拉迪克（卡・畢、）索考里尼可夫（格・亞、）舍列布略可夫（勒・畢。）

反蘇聯的托落茨基平行總部，曾根據人民公敵托落茨基之指示，以在蘇聯推翻蘇維埃政權並恢復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政權為其基本任務，而以進行暗害、軍事破壞、偵探以及暗殺工作，以破壞蘇聯之經濟力量及軍事力量，加速武裝侵犯蘇聯，幫助外國侵略者並使蘇聯在戰爭中遭受失敗等為實現此基本任務之方法。

人民公敵托落茨基曾在國外，而反蘇聯的托落茨基平行總部則以拉迪克與索考里尼可夫為代表，曾在莫斯科，完全依照上述基本任務，而與德日兩國之個別代表進行談判。人民公敵托落茨基，在與德國國社黨領導者之一魯多里弗・格斯談判時，曾經允諾以下之條件：即托落茨基份子一旦因蘇聯失敗而上台執政時，即將犧牲蘇聯利益而對德日兩國實行種種政治上、經濟上及領土上之讓步，以至於將烏克蘭割讓於德國，將濱海省與黑龍江沿岸一帶割讓於日本。人民公敵托落茨基在該談判中復担負下列之義務：即彼輩於一旦取得政權時，即取消國營農場，解散集體農場，放棄國家工業化政策，並在蘇聯境內恢復資本主義關係。此外，人民公敵托落茨基在該談判中，担負儘量幫助侵略國之義務，其幫助方法，即為在平時，尤其在侵略國侵犯蘇聯時，擴大主張蘇聯失敗之煽動，開展暗害、軍事破壞及偵探工作。

反蘇聯的托落茨基平行總部份子，皮達可夫、拉迪克、索考里尼可夫、及舍列布略可夫，為執行拉迪克所屢次接到以及皮達可夫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沃斯洛城附近與人民公敵托落茨基會面時所親自

接受之托落茨基之指示起見，曾開展暗害、軍事破壞、偵探及暗殺工作。

為就地直接領導反蘇聯的工作起見，曾在蘇聯某些大城市中組織地方托落茨基總部。例如在新西比爾斯克，曾依照皮達可夫之直接指示，由本案被告摩拉洛夫（尼·依、）巴古司拉夫斯基（米·索）及多羅布尼斯（亞·拉）組織西西伯利亞反蘇聯的托落茨基總部。

本案被告曾依照人民公敵托落茨基之指示及德日兩國偵探局偵探之囑咐，並由此種偵探直接參加，在工業中——主要是在有關國防之工業中——以及鉄道運輸業中，進行軍事破壞及暗害工作，此項工作之內容，卽破壞生產計劃，降低產品質量，組織焚燒與炸燬工廠及個別車間和礦井之事件，組織翻車、撞車事件，損壞車頭、車輛及鉄道。

被告在進行軍事破壞工作時，實以人民公敵托落茨基所謂『在最要害的地方予以重大的打擊』之指示為其標準，除此項指示外，又有皮達可夫、利夫什茨及多羅布尼斯之補充指示，卽不惜傷害人命，不惜引起人命犧牲，因為『引起人命犧牲愈多愈好，因為這會引起工人底痛恨。』

被告拉達依查克及普森，曾依照被告皮達可夫之囑咐，在化學工業中進行暗害工作，以破壞國家生產計劃，延擱新工廠及新企業之建築工程，——並使此種建築工程質量惡劣。

此外，被告拉達依查克及普森，於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在郭爾洛夫斯基淡素肥料聯合廠內曾實行三次軍事破壞事件，其中兩次爆炸之結果，炸死大批工人並引起巨大物質損失。

在沃斯克列辛斯基化學聯合廠及聶夫斯基工廠內，依拉達依奮克之囑咐，亦造成軍事破壞事件。

被告多羅布尼斯、諾爾金、舍斯托夫及司托羅依洛夫，曾依照皮達可夫和摩拉洛夫之指示，在庫茲巴斯煤炭工業和化學工業中進行暗害及軍事破壞工作，以破壞採煤計劃，延擱並阻止新礦井及化學聯合廠之建築及發展，並對採掘處及礦井施放毒氣，造成有害工人生命之工作條件。而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參加當地托落茨基組織之份子，曾受多羅布尼斯之囑咐，在克梅洛沃礦區『中央』礦井中造成爆炸事件，結果炸死工人十名，重傷工人十四名。

被告舍列布略可夫、巴古司拉夫斯基、利夫什茨、克尼亞節夫及屠洛克，曾根據反蘇聯的托落茨基總部之方針，在鉄路運輸業中進行暗害及軍事破壞工作，以破壞國家裝載計劃，尤其是最重要貨物（煤炭、礦石、糧食）之裝載計劃，以損壞車輛、車頭及鉄道，組織列車出軌和碰撞事件，尤其是軍車出軌和碰撞事件。

被告克尼亞節夫，曾依照利夫什茨之指示，並受日本偵探局偵探H先生之囑咐，於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組織並造成多次貨車、客車以及軍車之碰撞和出軌事件，並引起人命之犧牲，而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在蘇米哈車站上軍車碰撞之結果，紅軍戰士死二十九名，傷二十九名。

反蘇聯的托落茨基總部份子皮達可夫和舍列布略可夫，曾依照人民公敵托落茨基之直接指示，在有國防意義之工業及最大鉄路幹線上，準備種種軍事破壞事件，以備武裝侵犯蘇聯時之用。

被告諾爾金，曾依照皮達可夫之指示，準備在戰爭開始時放火焚燒克梅洛沃化學聯合廠。

被告克尼亞節夫，曾依照利夫什茨之指示而接受日本偵探局偵探H先生之囑咐，担任在戰爭時實行炸燬鉄道設備，放火焚燒軍用庫和軍糧站，組織軍車碰撞及出軌事件，並在準備輸送軍隊之列車上，工農紅軍之糧站上及衞生處散播有毒之傳染病菌，以引起瘟疫。

除暗害及軍事破壞工作外，被告利夫什茨、克尼亞節夫、屠洛克、司托羅依洛夫、舍斯托夫、拉達依查克、普森及格拉舍，曾依照反蘇聯的托落茨基總部之囑咐，搜集極關國家重要之秘密材料，交與德日偵探局偵探。

被告拉達依查克、普森及格拉舍，曾與德國偵探局偵探梅伊葉羅維茨及倫茨勾結，且於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將關於各化學工廠生產狀況之特別秘密材料交與上述偵探；普森並於一九三五年將關於蘇聯一切化學工廠一九三四年出產情形之秘密材料，一切化學企業一九三五年生產計劃，以及淡素聯合廠之建築計劃，交與德國偵探局偵探倫茨，而被告拉達依查克則曾將關於各軍事化學工廠一九三四年出產情形之絕對秘密材料，以及各軍事化學工廠一九三五年工作計劃交與倫茨。

被告舍斯托夫及司托羅依洛夫，曾與德國偵探局偵探舍別斯托，弗利沙·弗洛達，左梅勒格爾以及其他等等勾結，並將關於庫茲巴斯煤炭工業及化學工業之秘密材料交與他們。

被告利夫什茨、克尼亞節夫及屠洛克，曾經常將關於蘇聯鉄道技術狀況、動員準備程度以及軍用運

輸之絕對秘密材料，交與日本偵探局偵探H先生。

反蘇聯的托落茨基總部，曾依照人民公敵托落茨基之指示，在莫斯科、列寧格拉、基也輔、洛斯托夫、新比爾斯克、索赤以及蘇聯其他某些城市中均組織有暗殺團，多方準備暗殺蘇聯共產黨及蘇維埃政府之領導者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岡諾維赤、沃羅希洛夫、鄂爾卓尼基茲、葉若夫、史丹諾夫、科西沃爾、愛伊赫、坡斯特舍夫、伯里亞諸同志，而且其中某些暗殺團（在莫斯科、新西比爾斯克、烏克蘭、南高加索）曾由反蘇聯的托落茨基份子——被告皮達可夫和舍列布略可夫所直接領導。

反蘇聯的托落茨基總部在組織暗殺事件時，曾努力利用蘇聯共產黨及蘇維埃政府領導者巡視外省之機會。

例如，一九三四年秋，舍斯托夫曾依照摩拉洛夫之指示，企圖在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同志到庫茲巴斯時，實行暗殺莫洛托夫同志；當地托落茨基暗殺團份子被告阿爾諾里特，爲達到上述目的計，曾企圖開翻並撞碎莫洛托夫同志所乘坐之汽車。

此外，被告舍斯托夫，曾依照皮達可夫及摩拉洛夫之指示，準備暗殺西西伯利亞蘇聯共產黨特區黨部書記愛伊赫同志，而被告阿爾諾里特，則曾在舍斯托夫教唆之下，準備暗殺鄂爾卓尼基茲同志。

據此，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庭認定：

一、皮達可夫、梅伊葉羅維特茨、拉迪克、考索里尼可夫，係反蘇聯的托落茨基總部份子，他們依照匿居

國外之人民公敵托落茨基之直接指示，爲加速武裝侵犯蘇聯，協助外國侵略者搶佔蘇聯領土，推翻蘇維埃政權，恢復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政權起見，曾領導蘇聯境內反蘇聯的托落茨基組織所進行之叛國、暗害、軍事破壞、偵探及暗殺工作，卽犯蘇俄刑法第五十八條第一款甲項，第五十八條第八款，第五十八條第九欵，第五十八條第十一款所指明之罪。

二、第一項中所指出之皮達可夫及舍列布略可夫，以及反蘇聯的托落茨基組織之參加者摩拉洛夫、多羅布尼斯、舍斯托夫、巴古司拉夫斯基，曾組織並直接主持反蘇聯的托落茨基組織份子所進行之叛國、偵探、暗害、軍事破壞及暗殺工作，卽犯蘇俄刑法第五十八條第一款甲項，第五十八條第八款，第五十八條第九款，第五十八條第十一欵所指明之罪。

三、克尼亞節夫、拉達依查克、諾爾金、舍斯托夫、屠洛克、普森及格拉舍，係反蘇聯的托落茨基組織之參加者，曾實行反蘇聯的托落茨基總部關於叛國、偵探、暗殺、軍事破壞及暗殺工作之指示，卽犯蘇俄刑法第五十八條第一款甲項，第五十八條第八款，第五十八條第九款，第五十八條第十一款所指明之罪。

四、阿爾諾里特，係反蘇聯的托落茨基組織之參加者，他在被告摩拉洛夫及舍斯托夫教唆之下，曾試圖暗殺莫洛托夫同志及鄂爾卓尼基茲同志，卽犯蘇俄刑法第十九條第五十八款第八項，以及第五十八條第十一款所指明之罪。

五、司托羅依洛夫，曾局部執行關於偵探工作及暗害工作之某些指示，卽犯蘇俄刑法第五十八條第

六款以及第五十八條第七款所指明之罪。

基於上述種種，並根據蘇俄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十九條及三百二十條之規定，

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庭特判決如下：

一、皮達可夫（尤利（喬治）勒翁尼多維切），

二、舍列布略可夫（勒翁尼特・畢特洛維切）係反蘇聯的托落茨基總部份子，因曾組織並直接領導叛國、偵探、暗害、軍事破壞及暗殺工作，特處以極刑——槍斃；

三、摩拉洛夫（尼古拉・依凡諾維切），

四、多羅布尼斯（亞科夫・拉馬莫維切），

五、利夫什茨（亞科夫・阿布拉莫維切），

六、巴古司拉夫斯基（米哈依爾・索洛莫維切），

七、克尼亞節夫（依凡・阿列克山特洛維切），

八、拉達依査克（索達尼斯拉夫・安托諾維切），

九、諾爾金（波里斯・沃希波維切），

十、舍斯托夫（阿列克什・阿列克山特諾維切），

十一、屠洛克（約西夫・特米特里葉維切）

十二、普森（加夫列依爾・葉夫列莫維切），以及

十三、格拉舍（依凡・約西伏維切），右列諸人，均係上述罪行之組織者及直接執行者，特處以極刑——槍斃；

十四、索考里尼可夫（格利哥利・亞科夫列維切）以及

十五、拉迪克（卡爾・畢爾加爾多維切），係反蘇聯的托落茨基總部份子，因負有該總部犯罪行爲之責任，但未直接參加組織及實現各種暗殺軍事破壞、偵探及暗殺行爲——特各處以十年監禁；

十六、阿爾諾里特（瓦連亭・沃里夫里多維切），——特處以十年監禁；

十七、司托羅依洛夫（米哈依爾・索鐵班諾維切），由於本判决詞上述第五項之理由，——特處以八年監禁。

判處監禁之索考里尼可夫、拉迪克、阿爾諾里特及司托羅依格夫各被褫奪政治權五年。

所有被判决者之個人財產，均沒收之。

一九二九年被逐出蘇聯境外並由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决議實行褫奪蘇聯公民權之人民公敵托落茨基（連夫・韃維多維切）及其子謝多夫（連夫・連沃維切），已由被告皮達可夫（尤・勒）、拉迪克（卡・畢）、舍斯托夫（阿・阿）、及摩拉洛夫（巳・依）之口供，以及被本庭傳訊證人羅木（烏・格）與布哈爾切夫（特・普）之口供和本案各種材料，證實其確係直接

領導反蘇聯的托落茨基總部之叛國罪行，一經在蘇聯境內發現，卽應立予逮捕，並提交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庭審判。

審判長——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庭庭長，軍團法長烏爾里赫。

審判員——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庭副庭長，軍軍法長馬都列維赤。

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庭審判員師軍法長雷赤科夫。

（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0992B

類號

冊數　　定價 4.00

上 海 旧 書 店

$1.20

26
1606939